新文化史经典译丛

政治文化史

姜　进　主编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大革命一直迷惑我们至今

它催生了这么多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

它应该是一个时刻

就在这一时刻人们发现

政治是蕴含巨大效力的活动

意识转变的代理人

性格、文化和社会关系的铸模

[美] 林·亨特 著

Lynn Hunt

汪珍珠　译

著名商标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CNUP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新文化史经典译丛

政治文化史

姜进 主编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美】林·亨特 著 汪珍珠 译

PDG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美)林·亨特著;汪珍珠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
(新文化史经典译丛)
ISBN 978-7-5617-8520-1

Ⅰ.①法… Ⅱ.①亨…②汪… Ⅲ.①法国大革命(1789~1794)—政治—文化—研究 Ⅳ.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793 号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著　　者　[美]林·亨特(Lynn Hunt)
译　　者　汪珍珠
责任编辑　储德天
审读编辑　孙　浩
责任校对　赖芳斌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9.5
字　　数　217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520-I/K·344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Lynn Hunt

Copyright © 2004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 - 2008 - 624 号

总　序

还记得1990年代初，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正是后现代学术横扫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时，权力、建构、再现、认同、身份、性别、种族、酷儿(queer)等名词在前辈学者的著述和讲演中满天飞。研究生们很是兴奋，议论纷纷，都说这一轮后现代主义来势凶猛，但不知会不会也像此前一波又一波的学术新潮那样，转眼即逝。一位英国来的高才生此时淡淡地说了一句话："风暴过后的大海，难道还会是原来的大海吗?"他的意思很明白，可是这句话却有点儿费解。风暴过后的大海，恢复了平静，不还是原来的大海吗？不过，仔细想想，也可能已经不是了。谁知道呢？因为费解，所以就留下了记忆。不管大海的比喻是否恰当，事到如今，我们看到的经过后现代风暴洗礼的西方学术界的大海已经是"换了人间"。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真理、规律、客观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分析范畴成为批评的对象被重新审视，权力和建构等新概念当仁不让地入主学术界，全面刷新了学术研究的理论前提、路径、方法、目标和作用，导致了汤玛斯·库恩意义上的科学范式的革命，西方学术界进入后现代时期。

后现代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初见端倪。法国思想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模式。他的名作《诊所的诞生》(1963)、《疯癫与文明》(1965)、《规训与惩罚》(1975)、《性史》(1976)等，对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王国发起了颠覆性的批判，揭示了对理性的顶礼膜拜是如何导致了对个性和差异性的敌视，理性又是如何运用强大的技术手段去控制、压制并企图消灭差异和不同，从而建立起井然有序的现代社会秩序的。福柯的批判可谓石破天惊，打破了现代理性主义作为人性解放运动的神话，使人们看到了以理性之名对个性和人性自由发展的种种干预：

从个人的性取向到如何思想、如何做事、如何生活都必需依从理性的规训，因为理性本身代表着某种类似被其推翻的上帝的最高原则。福柯的著作描述了理性王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历史的终极。现代理性主义是一种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并非如其宣称的绝对真理。理性是一个思想和言说的武器，是某些人手中的权力利器，另一些人的克星。福柯对现代理性运动的描述和反思使理性时代从绝对真理的神坛上走了下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后理性时代宣告来临，后现代也从此粉墨登场。西方社会中的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等边缘和弱势人群在学术界的代言人接过文化批判的武器，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及其理论根源，大众文化研究、同性恋及性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学术和族群理论成为弱势群体争取社会公民合法身份的武器，成为后现代学术的重镇。后现代理论又反过来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特殊人群对保持和追求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西方社会中的个人自由从而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后现代亦成为一个社会现象。

西方学术界的后现代之风中也有其来自东方之源。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早已纠缠在一起，互相影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后现代之风，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界、跨文化的东、西方左翼学者共同推动形成的，而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其中最为强劲的一支力量。出身于巴勒斯坦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于 1978 年首创东方主义理论。萨义德在哥大的来自加尔各答的同事嘎娅特利·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于 1988 年首创了下属群体研究，并正式提出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印度学者吉安·普拉卡什(Gyan Prakash)等的大力倡导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强势登场，成为后现代学术中的正义之师，从女性、下层民众、殖民地人民等边缘人群的角度，对西方中心的现代启蒙主义思想体系及其全球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揭示出在这一理性秩序之下所隐藏着的东、西方不对等的权力结构。

后现代学术在史学界是以新文化史的样式来表达自己的。早在 1960 年

代中到1980年代初,新文化史一批最早的经典就已陆续问世,包括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1966,又名《丰收巫师》)和《奶酪与虫:一个17世纪磨坊主的世界》(1976年)、埃曼纽·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1975年)和娜塔莉·戴维斯(Natalia Davis)的《马丹·盖赫返乡记》(1983年)等。这批著作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极大影响,在试图摆脱传统史学的精英主义的同时也扬弃了当时盛行的社会史、经济史的计量方法,而比福柯的历史更远离精英世界及其普世原则。这些著作所注重的是生活于此时此地特殊环境之中的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将研究聚焦于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世界,用叙事史学的方式细细描述,将读者带入了一个个不同的微观世界,使历史这一古老的学科变得愈发迷人、有趣、生动,昭示了历史原来是可以如此书写的。1980至1990年代是新文化史迅速扩张发展的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新的经典,一方面用文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刷新了传统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同时更开拓出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史运动。除了上述微观史的一些代表著作外,著名的政治文化史著作有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林·亨特(Lynn Hunt)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1984)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1993)、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制作路易十四》(1992)、以及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的《启蒙运动中的法国》(1993);社会文化史方面有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与社会》(1972)、杰克·古迪(Jack Goody)的《欧洲家庭和婚姻的演变》(1983)、以及娜塔莉·戴维斯的《边缘上的女人:17世纪的三个故事》(1995);物质文化史方面的领军人物是杰克·古迪,著有《烹饪、菜肴和阶级:比较社会学研究》(1982)和《花的文化》(1993),以及丹尼尔·罗什,著有《服装的文化:"古王朝"的装束与时尚》(1989)和《日常物品的历史:消费文化在法国的诞生1600-1800》(1997);感性文化史方面有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

(1968)、阿兰·柯尔本(Alain Corbin)的《傻子与香味:嗅觉与法国社会想象》(1982)和《时间、欲望和恐怖》(1991);身体性态史方面有林·亨特主编的《艳欲与身体政治》(1991)和《色情的发明:淫秽与现代性的起源 1500-1800》(1993)、朱蒂斯·克维奇(Judith Walkowitz)的《恐怖乐趣的城市:维多利亚晚期伦敦的性危险的叙事》(1992);罗伯特·达恩顿是媒体与传播史中研究印刷和阅读文化的领军人物,著有《启蒙运动的生意》(1979)、《大革命前法国被禁的畅销书》(1995),与丹尼尔·罗什合作著有《印刷中的革命:法国的出版业 1775-1800》(1989)、与彼德·伯克合作著有《媒体的社会史:从古腾堡到互联网》(2001)等。这批著作深受福柯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以及文化研究、符号学的影响,以文化体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模式,代之以存在与意识互动、更强调文化对社会关系的形塑作用,颠覆了盛行一时的社会史模式。在此背景下,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于 1989 年问世,明确打出了新文化史的大旗,确定了历史学主流之"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的事实。

我在斯坦福大学求学之时,正是新文化史风起云涌之际。当年阅读上述那些史学新作时所感受到的巨大的精神上和智力上的冲击和挑战,与同学老师讨论时的兴奋和激动,记忆犹新。如今,新文化史已经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不再新鲜,甚至已经成为反思的对象。林·亨特本人和她的同事们就在打出大旗的十年后,出版了《超越文化转向》(1999)一书,对文化转向后的史学理论和多元化史学实践中的问题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作了一次审视和检讨。史学界对文化转向的怀疑之声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不过,无论是来自新文化史内部的反省,还是来自史学界其他部分的质疑,似乎都在不断地被新文化史所消化和吸收,使文化转向的基本理论主张和研究方法更富有涵盖性和普遍性,不仅吞并了传统思想文化史领域,更渗透到传统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领域里,使基于文化转向的史学模式进一步扩大其应用范围,当仁不让地稳坐史学主流的第一把交椅。

史学的文化转向并非是对此前社会史主流的简单修正,也并不仅仅是研

究重点的转移,而是后现代理论对从 19 世纪的兰克学派到二战后兴起的社会史将历史学科学化的现代主义史学潮流的一次清算。新文化史的叙事史也不是对古典叙事史学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有着一组十分不同的理论假设和叙事策略的史学新范式。这一新范式的特点是对前科学时代叙事史的重新发现,对史学的文学性的重新肯定,其最感兴趣的是语言建构和改变社会政治生活的机制和过程。如果说现代主义史学是以寻找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以此种"客观真理"来解释和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那么新文化史则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多元的、充满偶然性的开放体系,而史学的功用就是去探寻和解读社会所赖以运行的语言和技术系统,如此而产生的史学知识本身就会形成对社会政治的干预,成为改造社会政治的一种力量。我们可以通过其中一些关键概念对史学的文化转向作一个粗陋的描述。

文化转向有时也称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其知识论的来源是语言学中的符号学。在后现代的批判中,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之事物之间并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符号在使用过程中会脱离原来所指之事物而成为某种意义的象征。语言所构成的意义世界绝非其所处客观世界的镜像,反而是形塑人们感知客观世界的滤镜。简而言之,存在并不一定决定意识,而意识反过来却一定有塑造存在的功效。这就打破了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或年鉴学派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只有人类才拥有的语言及其抽象能力被看作塑造人类生存状态的特殊重要的力量,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史学研究也从调查人类社会的客观状态转而探寻文化体系是如何塑造和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也就是说语言是如何通过知识的生产去形塑和改变社会、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的。既然存在和意识之间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简单的因果关系、线性的历史发展观,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的史学对统一性、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强调在新文化史中被宣告出局。地点、时间以及人群组合的特殊性、差异性、偶然性、多元性成了常态,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解读(reading)也就代替了对前因后果的解释(explaining)。新文化史注重于细致描述具体人群的具体生活,并不刻意把自己的描述对象当作某种统一性的典

型代表,反而对其特殊性更觉兴味盎然。达恩顿说得好:“很多貌似过时的史学争论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力求接触人类最大多数的努力。想想有多少人已经消失在过去,他们在人数上远比如今生存于地球上的后代为多。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生存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字: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什么标签儿,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去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的哲学之谜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前人对此问题的回答。”①

无论是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还是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新文化史研究的焦点都是当时当地参与其中的人群对自己的生活和周围世界的体验和理解,她/他们的生存策略以及表达自己诉求的特殊方式,相信生活在过去的男男女女正是以自己特殊的生存策略和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开辟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无限可能性。相对于将重大历史事件放在某一目的论体系中去寻求因果解释的现代史学来说,新文化史感兴趣的是事件的具体过程,要根据事件过程中发生的新的话语和社会实践来认识其特殊意义。以法国大革命史为例,现代史学所关注的是大革命的原因及其后果,由此而形成的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又会向前后两个方向延伸,形成一条线形的因果链。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将大革命解释成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演进中的一环,还是现代主义学派将大革命看作从中世纪政治走向现代国家的转折点,其关注的重点都越来越远离大革命本身而转到大革命之前和之后的比较。在新文化史看来,这种目的论史学为了解释大革命的因果关系而牺牲了对大革命过程的具体考察,忽视和过滤掉了许多不能被特定因果链所容纳的重要现象。林·亨特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一书中对大革命过程中的政治表达模式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后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成就在于构建了一

① Robert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s*: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p. 4. 转引自本丛书萧知纬译,罗伯特·达恩顿著:《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 6－7 页。

种全新的政治文化,发明了意识形态。她在导言中指出:"法国大革命让时人感到震惊,并不是因为它为资本主义发展或政治现代化打下了什么基础。英国人找到了更多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效途径,普鲁士人则证实了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民主,没有革命,但同样可以实现政治现代化。法国大革命对经济增长或政治稳定几乎没什么贡献。然而,它确实开发了民主共和主义在民众动员方面的潜力,并营造了革命变迁中催人奋进的紧张气氛。民族复兴的语言、平等博爱的姿态、共和主义的仪式都不会被很快遗忘,民主、恐怖、雅各宾主义和警察国家在政治生活中也一再出现。"①

如果说新文化史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目标的话,那也许就是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仪式、再现(representation)中权力运作的机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所达到的成效,从而揭示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知识的生产来展开博弈的。有意思的是,这些权力运作的策略是中性的,压迫者以此来达到控制、统治和压制他人的目的,被压迫的人们也会以此来进行反击,压迫与反压迫之间的斗争就围绕着知识的生产和运用而不断地进行。对于新文化史来说,一切经济、社会、文化都是政治的,充满了权力的博弈的。新文化史就是要在世人面前展示权力运作的真相,同时指出人们又是如何反抗压迫的;其对权力运作机制的深刻解析和批判,及其反对压迫和控制的政治、道德倾向贯穿始终,可以说是新文化史的灵魂。更重要的是,后现代对于压迫和控制的批判、新文化史对个体性、具体性、特殊性的强调都是建立在个人权利(human rights)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具有普适性的价值预设之上的,其反对的不仅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或者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压迫,而是一切形式的对任何个体天赋人权的剥夺和压制。在这方面,新文化史秉承了马克思以人性解放为标的的政治理想。

新文化史的理论和实践给古老的历史学科带来了新气象。后现代对现

---

①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15. 转引自本丛书汪珍珠译,林·亨特著:《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第 27 - 28 页。

代主义建立在目的论基础上的宏大叙事的批评加速了百科全书/通史类史学模式的式微，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批判史学开辟了道路。以问题为中心的史学必然是自主的、多元的、大众的。因为每一位史学家都会有自己的身份认同，都会对某些个人和社会群体所遭到的压迫持批判态度，从而产生自己迫切想要调查研究的问题，并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干预和改造现状。以问题为中心的史学又必然是跨学科的，因为史学家需要动用所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方法对自己的课题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读。新文化史文化批判的理论和方法渗透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此影响下，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使这些领域的传统研究对象都和文化政治搅和在了一起。政治史不再只是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变成了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传统经济学因为文化因素的介入而演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史也不再满足于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的客观状况，而是要了解文化体系是如何塑造了民众的身份认同、情感和日常生活的。传统思想文化史更是被新文化史彻底颠覆。在这里，主要的任务不再是如何正确理解大师们的思想，而是要探究思想、仪式、知识、风格作为话语是如何产生的，某些话语是如何取得霸权地位的，其作用于社会的功效如何，等等。史学研究的领域从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对日常生活和重大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覆盖。史料的范围也空前扩展，从仪式、个人的口述史、小报、民间传说、戏剧、小说、绘画、流行歌曲到服饰，都可以成为史料。就研究专题来说，也是应有尽有，从福柯对疯癫、性文化、监狱、诊所等的研究，到达恩顿的《屠猫记》、凯斯·汤玛斯(Keith Thomas)的《宗教与巫术的兴衰:16－17世纪英格兰的大众信仰研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都为读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常生活场景中一个个全景式的片断，使读者在了解过去民众的生活的同时能够反观自己的世界，而不只是充当帝王将相历史的无关紧要的旁观者。

汉文世界介绍新文化史的工作近年来做了不少。其中台湾对新文化史的推介工作要比大陆的更为积极，出版的译著也较大陆为多。大陆学者也间或有翻译出版福柯及有关新文化史经典专著的。而留学欧美的汉文学者是

译介新文化史及其他有关西方经典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这十数年中,陆陆续续出版的有关译著不下几十种,但大多是各自为战,零零散散,未能形成体系。其中不乏精品译作,但滥竽充数的也不在少数。这些译著对汉文人文社科学术界的影响各有优劣,好的译著影响深远,劣质的译著往往令读者茫然不知所云,更要受误译误导之苦。有鉴于此,我们希望能够出版一套丛书,在已有译著的基础上,再系统地翻译出版海外新文化史的一系列经典著作,向汉文世界集中而较为全面地介绍这一重要的学术运动。在我们精选的著作中,有林·亨特主编、影响巨大的论文集《新文化史》和罗伯特·达恩顿讨论方法论的《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这样的理论经典,提纲挈领地给出了新文化史的开端、发展,及其基本理论假设、方法论、研究策略以及其所关心的一些课题的概况。也有如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及罗伯特·达恩顿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和《大革命前法国被禁的畅销书》等重写法国大革命史的经典之作。海外新文化史的成果丰富,覆盖面极广,而且多为跨学科的研究,很难有明确的分类。为了读者的方便,这套丛书仍将所选经典大致分出一些专题,陆续翻译出版。这些专题包括理论经典、微观史、政治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感性文化史、身体性态史、物质文化史、媒体与传播史等。

近年来,多次给历史系和中文、社会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生开设新文化史的阅读课,深感年轻学子对了解海外新学术之渴望,亦深感高质量译著之至关重要,却往往叹其可遇而不可求。翻译学术著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的译者均任教于海内外不同高校,都是凭着对学术的热爱和为学界服务之心,自告奋勇,接下艰苦的翻译任务,辛勤耕耘,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读者奉献一批合格的、出色的译著,为新文化史这一重要的学术运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推介工作。

在此丛书即将面世之际,我们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本丛书的策划储德天编辑,她对学术的热爱、她的学术眼光和她作为编辑的专业精神,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学生

们，是她/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课堂上的热烈讨论，使我相信这是件值得做的事情，才下决心和储编一起来做这套丛书。谨以此丛书献给我们的学生——中国学术的未来。

姜进

2010年3月8日

写于海上凤凰城

目 录

二十周年庆版本序言/1
1984 年版本致谢/6
1789－1799 年法国大革命简明纪事表/8
缩略表/11

导论 解读法国大革命/12

第一部分 权力的诗学/29
第一章 革命的修辞学/31
第二章 革命实践的象征形式/69
第三章 激进主义的意象/107

第二部分 政治社会学/145
第四章 革命的政治地理学/147
第五章 新政治阶级/174
第六章 局外人、文化经纪人和政治网络/207

结论 政治文化中的大革命/244
附录 A：精选政治、经济与人口变量的相关矩阵图/269
附录 B：亚眠、波尔多、南锡和图卢兹市议员的职业分析/274
译名对照表/277

图表

1. 政治派别和革命经验表/161
2. 不同政治倾向之省份的社会差异表/162
3. 抽样省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数据表/164
4. 1790 -1799 年亚眠、波尔多、南锡和图卢兹的市议会各职业代表情况表/186
5. 亚眠:1790 - 1799 年市议会各职业代表的变化表/189
6. 波尔多:1790 - 1799 年市议会各职业代表的变化表/189
7. 南锡:1790 - 1799 年市议会各职业代表的变化表/190
8. 图卢兹:1790 - 1799 年市议会各职业代表的变化表/190
9. 恐怖时期的市议员在其他革命市政机关任职的情况表/197
10. 督政府时期的市议员在前革命市政机关任职的情况表/198

插图

1. 1792 年 10 月自由节/45
2. 1790 年 7 月联盟节/50
3. 马克西姆廉・罗伯斯庇尔像/52
4. 1789 年 10 月禁卫军在凡尔赛的狂欢/76
5. 1792 年共和国印章/79
6. 1793 年 11 月理性节/82
7. 1798 - 1799 年元老院议会会议/98
8. 1798 - 1799 年政府官员的服装/99
9. "独立人"/101
10. "排外分子"/102

11. 亨利·格雷古瓦像/110
12. 杜普尔绘赫拉克勒斯草图/116
13. 1793 年 8 月“巴黎人民制服联盟主义九头蛇”图/118
14. “人民食王”图/132
15. 1794 年 6 月最高主宰节细节图/135
16. 1795 年杜普尔绘以赫拉克勒斯像为图案的硬币草图/138
17. 1798 年行政通讯录上的官方花饰图/143
18. 雾月 18 日进入五百人院大厅的波拿巴/259
19. 拿破仑任执政官时的印章/261
20. 共和十三年的五分钱硬币/261
21. 拿破仑任皇帝时的印章/262

地图

1. 大革命时期法国的政治地理图/155
2. 亚眠地区革命官员的居住区分布图/226

二十周年庆版本序言

每本书都能反映出创作时的背景,本书也不例外。那段时期对我而言尤其寓意深远,因为就在那时,研究兴趣引领我投身到了历史研究中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之一。我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项研究,希望研究结果能证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法国大革命的做法依然可行。马克思主义阐释理论的批评者坚持认为,是律师和官员,而不是商人和制造商——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领导了革命。我把目标锁定在大城市里发起革命的人,因为我推测,在地方城市里会有更多的商人和制造商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崭露头角。我确实发现了这样的商人和制造商,但其模式却难以预测:商人们在有些地方随时间推移获得了影响力,在有些地方却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甚至在另外一些地方却影响甚微。同样,当我采用计量研究方法来分析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认为这些因素可能解释不同地区的不同政治倾向时,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研究结果:左翼政治观点在偏远、相对“落后”、几乎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地区保持着持久的吸引力。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不一定是最革命的地区,这一形式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不相符。所以,其他因素也应该被列入考虑范围,包括地方政治冲突(旧制度精英的敌人现在获胜了)、地方社会网络(姻亲、共济会和政治俱乐部),以及地方上的权力经纪人(如教师、旅店老板和游商)的影响。简而言之,政治身份不仅取决于社会地位,还包括重要的文化成分。

我在最初的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正好契合了历史学科普遍提出的问题。1980年代早期,文化史开始挑战社会史的主导地位。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对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抨击,该抨击横扫整个法国史研究领域。文化史学家(往往以前也是社会史学家)认为,社会身份只有通过语言和文化的再现(representation)才能确定;"商人"这一身份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与此观点相似,傅勒坚持认为不能将法国大革命解释成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而应该是为争取对语言和象征物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政治斗争。1977年我在卡纳瓦雷博物馆(Musée Carnavalet of Paris)参观了关于法国大革命印刷品的展览,之后就对革命象征物越来越感兴趣。像大多数其他法国大革命史学家一样,我很自然地就将文字文本作为研究材料,比如报纸、回忆录、警察报告、国会演讲、退税单和会员名单。自从参观了那次展览以后,我就不可能再忽视革命版画、信件、日历、扑克牌和插图等视觉再现材料的重要性了。

一段时间以后,我手头上已经收集了大量风格各异的资料,包括法国不同地区的计量分析数据、大量官员的个人卷宗、共和国印章的草图和关于革命服装的版画。能不能通过综合这些资料得出某种结论呢?我相信这是可行的,但却烦恼如何编排这些资料。哪些应该排在前面?怎样的安排能体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重要性呢?我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也就是认为经济和社会关系是基础,是最根本的因素,而政治和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基础之上自动生成的副产品。但我也不能接受与之相反的简单解释,即政治是社会分化与经济变化的先锋。于是,我将重点放在"政治文化"上。我的阐释不是通常所指的政治史或文化史,而是对形成革命政治的社会模式和文

化假设所作的一种分析。为了摆脱基础—上层建筑或其他关于不同层次的隐喻,我采用了莫比乌斯带(Möbius strip①)理论,想象社会是这根带子的一"面",政治是另一面,两者相互纠缠盘绕,无法分清它们在何处开始,何处终止。 xii

莫比乌斯带作为视觉隐喻的效果不错,但作为印刷书籍的架构则不然。印刷书籍中的文字必须以线形次序出现,所以我必须选择是从政治还是社会、从文化假设还是社会模式来开始。我选择从"权力的诗学"而非"政治的社会学"开始,不是因为我相信诗学在因果关系上一定优先于社会学,而是为了震撼那些仍旧视社会学势必优先于诗学的读者。许多人坚信社会学(社会)就是要解释诗学(政治),反之则不成立。当这本书于1984年出版时,几乎每个人都视前半部分(诗学)最富原创性,也最具争论性。当时,历史学家已经开始了"语言学转向",相比于新文化史对修辞、仪式与比喻的研究,政治社会史已显得老套沉闷了。

然而,潮落必有潮起。既然学者们已经详细分析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化、语言、视觉与诗学维度,读者可能会开始对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更感兴趣。这部分对地理模式与社会模式的强调也契合了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新趋势。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正经历着一场巨变。19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纪念标志着傅勒影响的巅峰和马克思主义阐释的低谷。然而,自那以后,许多史学家开始批驳盛行的傅勒的正统理论(认为什么都是政治的),寻求新途径来分析大革命的社会意义。对傅勒的批评和随之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他们潜在的相似性:正如马克思本人从未忽视过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层面,傅勒也并

① 译注:是一种拓扑学结构,将一条窄长形纸带旋转180度后再将两端黏结而成。

未忽视其社会意义。然而,两者相互纠缠的关系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攻击中却被忽视了。既然共产主义在西方世界不再像以前那样会激起“不成功毋宁死”(do-or-die)的反应,那么我们就可能以新的眼光
xiii 来重新审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你无需为了评价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意义而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无需为了发现革命的政治文化自有逻辑而完全赞同傅勒,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极权主义的源头。社会与政治之间如何联系这一问题本身就非常有趣。

本书的后半部分也直接反映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落后技术。尽管当时我使用了一台最早的个人电脑(奥兹勃尼电脑,缝纫机般大小,可以在一张单面单密度磁盘上存储32页文档内容)来撰写此书,但做计量分析时却只能使用简单的计算器,或者在电算机主机上使用键控穿孔卡(同时还少不了研究助手的帮助)。这些费力的办法根本不可能提供当今电脑所能提供的灵活机动和高速度。然而,目前还不清楚运用新科技是不是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因为,尽管新科技有助于数据的输入和处理,但据我所知,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就本书提供的分析提出反驳、修正或拓展。近来出现了许多新资料,尤其是关于选举的研究和关于社会及文化因素的地图,但还没人将这些材料整合成全新的全面阐释。[1] 如果对法国大革命之社会意义的兴趣继续增长的话,重新采

---

① 关于选举可参见 Malcolm Crook, *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 1789 - 17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 Aberdam, S. Bianchi, R. Demeude, et al., *Voter, élir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9 - 1799; Guide pour la recherche* (Paris: Ed. Du CTHS, 1999); Serge Bonin and Claude Langlois, eds., *Atla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1 vols. (Paris: E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7 - 2000)。

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和系统地尝试使用这些新材料可能会很有裨益。

我本人还没有着手系统性回顾，所以对本书的主体未做重大修改。1984年以来，出版了无数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书籍和文章，新材料被发现，曾经散失的材料也收复。无疑，当我在二十年前着手这项研究时，难免会错失一些有用的信息。① 如果将这些新信息进行整理综合，可能会 *xiv* 写出一本新的、而且很可能不同的书。虽然我不会原封不动地保留本书中的全部内容，但是其基本方法——政治与社会的平衡、权力的诗学与政治的社会学的平衡——依旧代表了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有没有说服力，读者自有判断。 *xv*

① 许多关于波尔多共济会会所的记录在2000年从莫斯科重新回到了法国，我在巴黎大东方共济会总部翻阅和参考了这些资料。德国当局在1940年没收了一部分关于共济会的记录，并为了"证实"确实存在过犹太人与共济会的共谋，就把它们带回了柏林。1945年，俄国人将这些记录从柏林带回莫斯科，并进行了分类整理，但不对研究者公开。其他共济会的记录被法国维希政府充公；战后，这些记录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成为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研究基础。我决定不再重复波尔多的共济会体制问题；本书内容主要集中在当时资料充分的南锡和图卢兹地区。如果要增加波尔多部分的内容，就需要重新评价现在才刚刚得到的记录和我参考过的所有次要文献，但这种评价却缺乏充分的记录。事实上，即使是现在，这些记录都不完整，因为几乎没有会所持续连贯地保留会员的记录。然而，资料宝藏的重获肯定会使法国共济会的研究焕然一新。

1984 年版本致谢

1976 年开始本书的研究时,我脑子里的计划跟现在的不同。当时,我打算写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四个城市的地方性政治权力结构。但在研究这四个城市时,我的兴趣重点发生了转移,一部分是受到了我的朋友和伯克利分校的同事们的影响,另一部分是受到了弗朗索瓦·傅勒、莫纳·鄂哲芙(Mona Ozouf)和莫里斯·阿格宏(Maurice Agulhon)的法国历史新著作的影响。结果,最初设想的大革命政治社会史慢慢演变成了文化分析,四个城市的政治结构也只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但是,权力依旧是本书关注的中心,因为我认为权力是法国革命者最关心的问题,无论他们在巴黎、省会还是远离政治主流的农村。

几年以来,我受益于许多学术机构和个人的帮助。我的研究得到了密歇根大学研究生协会(University of Michigan Society of Fellows)助学金和美国学术协会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资助,而且最近古根汉姆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也提供了资助。才华横溢的研究生们所做的研究协助也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Research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和伯克利国际问题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Berkeley)的资助。我前往法国几次都受到了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在这里要向他们表示感谢,其中有国家档案馆,吉伦特省(Gironde)、上加龙省(Haute-Garonne)、默尔特省(Meurthe)和索姆省

(Somme)省立档案馆,亚眠市(Amiens)、波尔多市(Bordeaux)、南锡市(Nancy)和图卢兹市(Toulouse)市立档案馆,巴黎国家图书馆,巴黎卡纳瓦雷博物馆;波尔多市图书馆,亚眠市和图卢兹市内大学图书馆。在伦 *xvii*
敦,我在公共记录办公室工作过。

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都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一起工作的研究生经常给我一些最终证实卓有成效的建议。在法国,我有幸获得了两个朋友的帮助:莱斯利·马丁(Leslie Martin)和丽兹贝斯·柯恩(Lizabeth Cohen),前者在1976年我第一次研究结婚契约和税收记录时在地方档案局工作,后者在1980年为我提供了图卢兹的数据。两幅地图都是由安德瑞恩·摩根(Adrienne Morgan)绘制。伯克利和其他地方的同事阅读了部分书稿,我非常感谢他们的评论。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兰道夫·斯达恩(Randolph Starn)、雷金纳德·泽尼克(Reginald Zelnik)、托马斯·拉科尔(Thomas Laqueur)、杰克·森赛尔(Jack Censser)和维克多利亚·博内尔(Victoria Bonnell),他们阅读了全部手稿,并为我的改进提出了精准的建议。乔伊斯·麦凯恩(Joyce MaCann)仔细阅读了每个章节,并就如何增强可读性提出了建议。书中随处可见朋友们对我的深远影响,他们激励我更加广阔清晰地思考。最后,我要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给予的虽不具体但绝对真挚的贡献表示感谢,因为它不仅提供了资金和时间,还贡献了在此珍贵环境中激人奋进的同事和学生们。 *xviii*

1789－1799年法国大革命简明纪事表

1788年8月8日	国王同意召开自1614年以后就没再召开过的三级会议
9月21日	巴黎高等法院建议三级会议延用1614年的相同程序
1789年5月5日	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
6月17日	第三等级决定自称国民议会
7月11日	国王撤了受人民爱戴的大臣内克尔的职
7月14日	攻陷巴士底狱
10月5－6日	“十月事件”，一群民众从巴黎长途跋涉至凡尔赛，胁迫国王一家回到首都
1790年7月12日	通过《教士公民组织法》
7月14日	庆祝攻陷巴士底狱一周年，举办全国联盟节
11月27日	通过教士宣誓效忠的法令
1791年6月20日	国王企图化装外逃，在瓦伦被截
10月1日	新选举的立法议会召开
1792年4月20日	对奥地利宣战
6月20日	民众进攻杜伊勒里宫
8月10日	巴黎发生暴动，杜伊勒里宫被攻占，国王被悬置
9月2日	凡尔登被普鲁士军队攻陷

9月2－6日	屠杀在押犯人的“九月屠杀”事件 xix
9月21日	新选举的国民公会开幕，废除王政
1793年1月14－17日	审判国王时的投票
1月21日	路易十六被处决
2月1日	对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宣战
3月10日	建立革命法庭
3月11日	旺代叛乱开始
5月4日	通过第一个谷物限价法令
5月31日－6月2日	暴动导致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成员被捕
7月27日	罗伯斯庇尔被选入公共安全委员会
9月5日	国民公会内发生的群众请愿事件促使雅各宾派将“恐怖”提上日程
10月5日	采用革命历法
10月16日	处决玛丽·安托瓦内特
1794年2月4日	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被废除
3月13－24日	埃贝尔派成员被批捕、审判和处决
3月30日－4月5日	丹东派成员被批捕、审判和处决
6月8日	最高主宰节
7月27日	“热月九日”——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及其支持者被捕(7月28－29日被处决)
11月12日	巴黎雅各宾派俱乐部被关闭
12月24日	限价法令被废除
1795年4月1－2日	巴黎发生民众叛乱
5月20－23日	第二次民众叛乱也失败

5月-6月	南方的“白色恐怖”，反对之前的恐怖统治支持者
8月22日	国民公会通过共和三年宪法
10月5日	右翼分子在巴黎发生反抗新宪法的暴动，被镇压
10月26日	共和四年（1795年10月）选举后产生督政府
1796年4月-1797年10月	波拿巴在意大利之战中连捷
1797年3月-4月	保王党在共和五年选举中获胜
xx 5月27日	巴贝夫被处决
9月4日	“共和五年果月18日政变”，王党分子被清除出立法院
1798年3月-4月	共和六年选举，雅各宾派抬头
5月11日	“共和六年花月22日政变”，反对议会中的雅各宾派
5月-1799年10月	波拿巴在埃及和中东
1799年11月9-10日	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雾月18-19 xxi 日）。

缩略表

档案馆和图书馆

A. N. Archives nationales 国家档案馆

A. D.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省立档案馆

A. M. Archives municipales 市立档案馆

B. 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国家图书馆

B. M.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市立图书馆

PRO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公共记录办公室(伦敦)

期刊

AESC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年鉴:经济、社会、文明》

AHRF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法国大革命编年史》

RHMC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现当代史期刊》 xxii

导论　解读法国大革命

> 我认为政治决定一切，而且，不管从什么角度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所以，在我看来，有关什么是可能做到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可以如此归纳：什么样的政府能够造就出兼有最高的德行、理性、智性——总之在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人民？
>
> 卢梭《忏悔录》
>
> (Jean-Jacques Rousseau, *Les Confessions*①)

当卢梭宣称“政治决定一切”时，他说出了一句耸人听闻却又含糊不清的话。在他看来，社会生活的根基是政治，而非习俗、道德或宗教。政府的性质决定人民的品格。当卢梭问出“什么是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时，他实际上表明政府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可能变得更好。但是这个更好的政府从何而来呢？凡夫俗子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才能塑造出“兼有最高的德行、理性、智性——总之在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人民”呢？政府又如何能比它要塑造的人民更开化呢？法国革命者必须面对这些
1 问题。他们奉卢梭为精神向导，但卢梭却在他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上显

---

① *Oeuvres complètes* 1 (Dijon, 1959): 404—405. 除特别注明之外，所有翻译皆为作者林·亨特所作。

得含糊不清。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重新协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可是,这个契约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呢? 1790 年代法兰西的共同意愿是什么? 可能做到的最好的政府(卢梭的"最广义"的政府)又是什么?

大革命展示了政治是如何决定一切的,但其方式却会让卢梭大吃一惊——如果他再多活 15 年的话。革命者并没有仅仅就君主制与共和制或贵族制与民主制等有关政府的经典问题展开辩论,他们更以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式采取了行动。在如火如荼的辩论与政治冲突中,"政治"这一概念被拓展、重塑。政体结构在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和民众大动员的影响下改变:政治语言、政治仪式和政治组织都呈现出新形式、新意义。以卢梭所预言但却难以想象的方式,政府成了塑造人民的工具。议员格雷古瓦(Grégoire)在 1794 年 1 月宣告:"法兰西人民已经超越了其他所有民族,然而,我们正努力摆脱的可憎的旧政权仍然阻挡着我们接近自然,在我们差强人意的存在方式与我们可能达到的最好存在形态之间仍旧横亘着巨大的鸿沟。让我们加紧填平这鸿沟,让我们重新构建人性,给人性打上新的印记。"①

这种以重建和新生为目标的奋斗经历哺育了我们关于政治的大部分想法和实践。到大革命结束时,法国人民(和一般西方人)已经熟悉了一套新的政治游戏:意识形态以观念的形式出现,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挑战了欧洲传统中有序而和谐的宇宙论;宣传成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雅各宾俱乐部让人领略了群众性政党的潜力;拿破仑则建立了第一

① *Rapport sur l'ouverture d'un concours pour les liv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rmierè éducation, par Grégoire* (Séance du 3 pluviôse an II).

个世俗警察国家，将自己置于政党之上。

政治不是法国人发明的，政治利益这样的概念也不是。我们至今仍
2 不清楚，法国人是如何将巨大的情感和象征意义注入到政治中去的。他们有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朦朦胧胧的意识，但却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的传统，延续至今。吊诡的是，法国人中最革命的那部分人创造出诸多政治形式和含义，把各种政治游戏都玩了个转，却是出于对政治的深切不信任。政治领袖人物从不称自己为政客，他们为“公众利益”（la chose publique）而不是为狭隘的“党派意识”（esprit de parti）服务。政治和政治活动一直被等同于狭隘、刻薄、拉山头、搞派系、机会主义、自我中心与自私自利。在如此痛陈“政治人”（homo politicus）之古代理想所遭受的种种扭曲当中，革命者跨入了现代，他们开辟了全新的国内政治前沿，收获了预料之外的果实：民主与专制、社会主义与恐怖统治、革命独裁与断头台。本书所要研究的正是革命政治的这些出乎意料的发明创造。

我们现在很难体会1790年代的革命政治是如何出人意料的。几乎每本历史教科书都将1789年作为近代史的分水岭，法国大革命也是西方历史中最常被论及的事件之一。既然成了老生常谈，法国大革命也就失去了新奇感。回望历史，大革命显然就是历史的转折点。试想想，如果没有了政党、意识形态、独裁者、群众性运动、政治的和甚至反政治的修辞，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最近在学术界，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似乎也将大革命的发生视为当然。论争所关心的不是大革命的经验，而是大革命的因与果。大革命成了一长串历史因果关系的载体，而革命政治也只是预料之中的结局而已。法国大革命史的三种主要学派都有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大革命的阐释最近几年受到了猛烈的攻击，部分是

因为它的理论化程度最高。① 马克思本人对法国大革命非常感兴趣。 3
在1840年代中期，他收集资料，广泛阅读，为撰写国民公会的历史做准备。② 但直接的政治兴趣和此后对资本主义更广泛的研究使他未能实现之前打算撰写国民公会历史的计划。然而在马克思的所有历史著作中，法国大革命是一块试金石，它通过打破封建主义对生产的绝对控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使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掌握了权力。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框架的建立和资产阶级成功的阶级斗争——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叙述的重要特征。“经典法国大革命史”的晚近捍卫者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就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的出现、成长和最后的胜利。”③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其原因与结果都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资产阶级在1780年代面对贵族反对时进攻性地提出并坚持了自己的主张，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胜利。④ 而如

---

① 关于这些研究的有用评论可参见 William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80) and Geoffrey Ellis, “Review Article: The ‘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3 (1978): 353—376。

② Jean Bruha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formation de la pensée de Marx”, *AHRF* 38 (1966): 125—170.

③ “L’Historiographie class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Sur des controversies recentes”, *Historical Reflections: Réflexions historiques* 1 (1974): 141—168，引自第142页。重印于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Problèmes polit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9－1797)* (Paris, 1981)。

④ 参见 Albert Soboul,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7－1799: From the Storming of the Bastille to Napoleon*, trans. by Alan Frorrest and Colin Jones (New York, 1974)。

何解读连接这个故事的各种不同的革命经验呢，则要视其对剧情发展的贡献而定。资产阶级为了摧毁封建贵族制度而与民众联合，又为了防止恐怖制度失控而与民众决裂，还为了确保自己在财产和司法改革中所取得的利益而与拿破仑结盟。这一切似乎都不容置疑，有因才有果，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的经济与社会霸权。

“修正主义”学派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发出了
4 挑战，但暗中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本理论假设，即社会因果关系构成了对大革命的解释。在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学派最早而牵涉面很广的一波攻击中，阿尔弗莱德·寇班（Alfred Cobban）坚持认为，大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发动的，而是由那些渐渐命运不济的腐败官吏和职员发起的，结果却便宜了地主阶级。也就是说，革命经历事实上延缓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叙述，即他所谓的“社会解释”，把革命年代的因与果全都搞错了。

同样，有些评论家指出，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在大革命之前并没有有意识的阶级冲突。贵族阶级并没有妨碍资产阶级；其实，这两个阶级有着诸多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利益。[2] 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

---

①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1964).

② 有关这一巨大研究领域的最新综述可参见 Doyle, *Origin*。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 George V. Taylor,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2 (1967): 469—496; David D. Bien, “La Réaction aristocratique avant *1789*: L'Exemple de l'armée”, *AESC* 29 (1974): 23—48 and 505—534; and Guy Chaussinand-Nogaret, *La Noblesse au XVIIIe siècle: De la féodalité aux lumières* (Paris, 1976)。

贵族发起了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而不是失意的资产阶级。[1] 虽然这些修正主义学者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但他们的分析却与寇班的一样，仍然跳不出社会渊源与后果这种窠臼。弗朗斯瓦·傅勒和柯林·卢卡斯（Colin Lucas）的文章非常中肯地概述了修正主义学派的观点。[2] 两人都认为，由贵族与资产阶级组成的精英群体内部存在着一种因社会流动与地位焦虑所引起的危机，而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就在这种危机当中。18世纪，人口与财富得到了增长，但是社会地位提升的渠道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扩展；结果，在精英群体内部的各种社会“压力区”中，摩擦开始增多。 5
当巴黎高等法院固执地要求新召集的三级会议必须遵循 1614 年制订的章程时，紧张局势终于引爆了革命，因为这个致命性的决定加速了精英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虽然可以被理解但却不必要。[3]

这种关于大革命起因的解释还隐含着这么一种观点：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后果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个更加团结的显贵精英的诞生，这个精英的基本自我界定就在于拥有土地。[4] 一旦贵族与平民之辈认识到因

---

① Denis Richet, "Autour des origins idéologiques lointain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lites et despotisme", *AESC* 24 (1969): 1—23；关于 1788 - 1789 年更加具体的讨论可参见 Elizabeth L. Eisenstein, "Who Intervened in 1788? A Commentary on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1 (1965): 77—103。

② Furet, "Le Catéchism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ESC* 26 (1971): 255—289，重印于其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78。译注：汉译本参见傅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英文版，*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Elborg Forster (Cambridge, 1981)；and Lucas, "Nobles, Bourgeoi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no. 60 (1973): 84—126。

③ Lucas, "Nobles, Bourgeois," 120—121.

④ 这一融合大约到 1848 年才成功完成。参见 Guy Chaussinand-Nogaret, Louis Bergeron, and Robert Forster, "Les Notables du 'Grand Empire' en 1810", *AESC* 26(1971):1052—1075。

为自己错误的想法和做法而导致的后果，他们就能重新团结起来，为建立一个以财产和提供的服务来界定身份的社会这一共同目标而奋斗。在这种修正主义的解释中，大革命变成了一个错误，所以才失去了其预定的品质。但大革命的意义却仍然取决于其对长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影响，革命经验成了一段实验性的、纠错的经历。例如，资产阶级就认识到，对民众的依赖可能会危及他们特别看重的法制改革，甚至会削弱他们维持法律与秩序的能力。① 根据这种观点，大革命是法国朝着自由、精英统治的发展大趋势中一次戏剧性的短暂偏离。

在关于社会解释的争论边缘，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现代化学派。托克维尔并不否定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冲突置于政治框架之内。在他看来，大革命代表的是国家力量的强化和集中，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没有任何阶级在这次竞争中获胜。法国人民还是不自觉地屈从于一个权威政府，只不过他们之间比以前更加平等了
6 而已。托克维尔将大革命以及18世纪社会问题的渊源追溯到绝对君主制的实施。君主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而摧毁了贵族的政治权利，因而使贵族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无法被其他社会群体所接受。② 革命者以为他们挑战了君主制政府，结果却弄出了一个比绝对君权更绝对君权的国家。因此，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大革命也不过是因果链中的一环而已，革

---

① 为了增强纲要式展现的效果，在此我有些夸大修正主义观点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关于这种观点最全面的阐述请参见 François Furet and Denis Rich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 vols.（Paris, 1965），英文版（London，1970）。其他修正主义者对此叙述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可能持异议。

②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Stuart Gilbert（New York, 1955）. 关于托克维尔的文章可参见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虽然傅勒在导论中过度强调托克维尔和"叙事"史学家之间的区别。

命经历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从路易十六到拿破仑的过渡。

在最近的一次比较研究中,斯达·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重新提出了托克维尔关于国家力量增长的主要思想。① 她虽然赞同托克维尔的观点,认为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更加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的国家,但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却有着不同的分析。她认为,法国与后来的俄国与中国一样,瓦解的原因是国家无法应对现代国际竞争中出现的军事紧急事件。由于法国这种"农业君主制度"的结构弱点,农民叛乱发生了。农民叛乱在革命形势下摧毁了农业社会的阶级关系。后来发生的战争(即国际竞争)就催生了一批中央集权化和官僚主义化的革命精英,正是这些人缔造了"现代国家组织"。尽管斯科克波尔强调社会结构的先决条件和农民起义的作用,但她与托克维尔还是很相似的,因为她也把革命经验置于长期的因果之间,使法国大革命这一实实在在的事件只出现于整个计划的夹缝之中。同托克维尔的经典分析一样,在这里,法国大革命看起来只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工具。②

因为时下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阐释都着重因果分析,所以很自然,研 7
究的努力方向就越来越集中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和之后的时间段。③ 而

---

①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1979).

② 在此我没有考虑巴瑞汀·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尽管他的叙述与斯科克波尔的有许多相似之处。重要的是,他的阐述也强调因果,尤其是现代化的结果(*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1966], esp. pp. 106—107)。

③ 关于大革命的研究仍在继续,但不可否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的兴趣中心都从大革命的十年转向了之前与之后的时期。而且,大部分有关革命十年的研究都没能对大革命史学史的论争产生很大影响。近来关于大革命十年的最重要研究领域是印刷史、对各种形式的文化革命(教育、节庆,非基督教化)的分析和地方性研究。

且,现在大部分研究都是为了要检验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阐释。为了证明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确实出现了阶级分裂,研究者考察了旧制度下的军官、行政官员和精英文化机构。[1] 拿破仑时期与后拿破仑时期的精英也被研究过,因为他们的社会特征会影响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分析。[2] 尽管这些研究确实详尽了修正主义学派,但却没能迫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放弃他们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者只回应说,应该在其他地方,以其他方式来寻求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3]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史学家都研究过革命者及其活动,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因果解释体系。在修正主义学者看来,革命冲突没有什么社会重要性可言,要有的话也是关于富人与穷人,城镇与乡村,
8 巴黎与外省等等一些宽泛而模糊的概念。[4] 因为马克思主义叙述中的一些特定内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攻击,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退回到更加结构化的观点:只要能在大革命之前或之后的时间段里找到因与果,

---

① 最重要的成果参见 Bien, "La Réaction aristocratique"。关于文化方面的成果参见 Daniel Roche, *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en province: Académies et académicians provinciaux, 1680 - 1789*, 2 vols. (Paris, 1978); 和 Jean Quéniart, *Culture et société urbaines dans la France de l'Ouest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78)。近来关于法国大革命思想起源方面的研究出现了注重探究社会氛围的倾向,综述可参见 Keith Michael Baker, "On the Problem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 eds.,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Ithaca, N. Y., 1982), pp. 197—219。

② Chaussinand-Nogaret, Bergeron, and Forster, "Les Notables du 'Grand Empire'"; Louis Bergeron and Guy Chaussinand-Nogaret, *Les "Masses de granit": Cent mille notables du Premier Empire* (Paris, 1979); and Thomas D. Beck, *French Legislators, 1800 - 1834: A Study in Quantitative History* (Berkeley, 1974).

③ Claude Mazauric, "Quelques voies nouvelles pour l'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HRF* 47 (1975): 134—173.

④ 寇班在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中提出要强调这些其他社会区分的重要性。

并以此证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谁发动大革命，或者谁在特定时期掌权又会有什么不同呢？①

形成对比的是，托克维尔学派几乎没有激发任何实证研究。虽然它在强调因果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学派相似，但由于这些因果跨越的时间太长，范围太广，很难以实证研究去做检验。例如，托克维尔本人并没有将国家权力的发展与任何特定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民主”和“平等”是具有渗透性的结构趋势，尽管它们可能如“巨大扫帚”般扫过一切，但却似乎是一把没有人掌控的扫帚。结果是，在托克维尔的阐述中，革命行动者的身份和意图与大革命的进程几乎毫不相干，“他们对此一无所知”，“（革命的实际进程）与他们的意图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法国大革命“注定的过程”与革命者自以为正在取得的成果完全是两码事。②

这三种阐述立场都程序化地漠视革命的意图。托克维尔与受其影响的评论家们都认为，革命者是谁，革命者有什么想法，这些都没有意义，因为革命者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被卷入到绝对权力的梦想之中的，是绝对权力的梦想最终形塑了法国大革命的整个过程。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似乎也承认社会身份的重要性，但结果还是与托克维尔一样，都怀疑革命的意图与目的——尽管他们的分析有所不同。革命者的社会身份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叙述，也不符合修正主义的叙述（革命者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1791年之后的自由贵族或精英平民），所以这两种叙述最后都认为，谁是革命者和革命者如何思考他们正在进行

① Mazauric, “Quelques voies nouvelles”.

②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引自第 vii、3 页。

9 的行动，这些都不重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阐释，革命者虽然曾经敌视过资本，但到底还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胜利。而修正主义学派却分析说，革命者错将革命进程拽出了他们自己制定的自由主义的不同轨道。由此可见，革命最终的结果并不是革命者所期盼的，因此革命者的意图并不重要。这样，对因果关系的关注使革命经历本身显得毫不相干了。

结果，政治形式与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创新往往看起来不是注定的就是偶发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叙述，自由立宪制、民主制、恐怖统治和专制统治都是陪衬，重点还是要加强资产阶级霸权。托克维尔则分析说，它们都是为加强中央集权服务。修正主义叙述在这方面却不那么一致，因为修正主义者参考的不是共同的原始文本，比如马克思或托克维尔的著作。例如在理查德·寇伯(Richard Cobb)的著作中，革命政治表达的是少数好战派的愤恨与失望，背后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历史逻辑。比如，人民之所以成为“恐怖分子”，只是因为他们对邻居怀有敌意。[①] 马克思主义和托克维尔的阐释认为，革命政治是由从因到果的必然过程所决定的；修正主义叙述则认为政治无法形成因果关系，所以是偶然发生的。但是所有叙述的结论却一致，就是政治失去了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

本书意在恢复革命的政治，但绝对不是一部政治史。我没有重述革命事件的叙事，而是尽力挖掘政治行为的规则。历史学家并不是简单地

① R. C. Cobb,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French Popular Protest, 1789 - 1820* (Oxford, 1970). 例如，“无套裤汉当时并不是一种社会或经济存在，只是一种政治意外事件”(第 120 页)。

将法国大革命中个体行动者自称的意愿相加,就能理解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看法。如果革命经历中存在任何统一性或一致性的话,那么它应该来自相同的价值观与共有的行为期待。这些价值观与期待正是我的研究所聚焦的主要问题。这些表述并塑造了集体意图与行动的价值观、期待和隐性规则,正是我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 10
提供了革命政治行为的逻辑。

现在也有学者强调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其中大部分都是从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的。乔治·泰勒(George V. Taylor)在其颇具影响的文章《非资本主义财富与法国大革命的起因》("Non-D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得出的结论是:"实质上这是有着社会结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有着政治结果的社会革命。"[1]傅勒也区分了社会与政治,并将其发展成为对恐怖统治的一种解释,他认为恐怖统治取决于"与政治相关的社会自由"。[2] 恐怖统治是对社会与政治正常关系的革命性曲解所造成的逻辑结果;政治不再是表现社会利益争斗的竞技场,而成了重塑社会的恐怖工具。这两位评论者都质疑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政治与社会之关系的假设,认为革命政治并不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前提条件;相反,政治塑造社会,至少在某些时刻如此。

傅勒的近作《思考法国大革命》成功地使我们注意到了"政治"的重要性。他极力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坚持认为有必要广义地看待政治,政治不仅仅是政策、决策和组织,还是世上新的行动模式的源泉。但是,他自己关于革命政治的讨论却太抽象。虽然他看到大革命的

---

① 第491。

②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 41.

政治创新被用于重塑社会，是革命性的，但却没能更多关注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哪些人参与了这些努力。结果，虽然他令人钦佩地成功反驳了政治源于社会结构这一机械推论，但却让革命政治看似脱离了所有情境。新政治文化只凭借自身内部的民主逻辑运作。①

我们在分析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时碰到了困难，多是由于现今在社会
11 分析方面充斥着一些陈词滥调。一说到“政治”，脑子里就出现了结构的隐喻，尤其是关于空间等级关系的隐喻，如层面、层次、基石和基础。不管赞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似乎很自然地就建立在社会基础或社会次结构之上。大家都认为，社会网络、社会群体、社会阶级或社会结构赋予了政治可持续性模式，以及衍变的可能性。结果，不管是普遍的还是有关法国大革命这一特定专题的争论，大部分关注的都是业已存在的社会基础与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具体政治布局之间的关系。政治特征要通过参考社会来阐释，政治布局上的变化要追溯到之前的社会关系变化。几乎所有讨论都得自这一假设，即政治的基本特征只能通过其与社会基础的关系才能被解释。尽管有些研究者极力回避这种思维方式，但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进一步证实了它。所以，傅勒认为革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病态的，就是因为其政治没有以一种正常的或预料中的方式来表现社会利益。由此可见，当政治优先时，整个形势在界定上就是不正常的。

在本书的分析中，我竭力避免层面的隐喻。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不能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或革命者的社会身份中得出。政治实践也不仅仅是“下层次的”(underlying)经济与社会利益的表达。革命者通过语

---

① 参见我在 *History and Theory* 20 (1981): 313—323 中的评论。

言、意象与日常的政治活动，致力于重新构建社会和社会关系。他们有意识地寻求与法兰西的过去决裂，为新型的民族共同体奠定基石。在此过程中，他们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和新的社会与政治群体。政治与社会斗争的经历迫使他们以新的方式去看待世界。

革命者试图与过去决裂，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的创造发明。革命者及其敌人犹犹豫豫、极不情愿地逐渐意识到，政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重重。传统已失去了既成性，法国人民开始实践卢梭所坚信的理念，认为社会与政治的关系(社会契约)是可以被修改的。但是，关于 12
修订的性质，人们的分歧却日益明显，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就被发明出来以解释这种发展状况。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权力主义和民主共和主义等等，都是回答卢梭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实践答案。所以说，革命政治激活了——而不是表达了——意识形态。在革命进程中，法国人民重新铸造了社会思想与政治行为的范畴。

然而，这不是说法国大革命仅仅是思想上的革命，或者政治一定先于社会而不可能相反。政治上的革命应该是想法与现实，意图与环境，集体实践与社会情境之间的激烈互动。即使革命者的社会身份不能解释革命政治，但也不能将其置之不理，毕竟法国大革命是由人缔造的，而且有些人相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对革命政治更感兴趣。关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有一个更好的隐喻，那就是“结”或“莫比乌斯带”，因为正如莫比乌斯带的两个面，社会与政治之间也是错综交织，根本没有永久不变的“上”“下”之分。革命政治吸引了一些个人与群体，而他们反过来也塑造了革命政治的运用。与革命政治的关系塑造了新的政治阶级(广义的阶级)，而新的政治阶级也塑造了革命政治。

因此，为了重新构建革命行动与创新的逻辑，我们不仅要探究革命

政治,还要考察革命政治的实践者。我的观点是,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但并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革命的政治文化由诸如语言、比喻和体态(gesture)等象征实践组成,相比于别的地方、别的群体,这些象征实践可能在某些地方会受到某些群体的更热烈欢迎。但无论如何,这些象征实践——修辞的使用、象征物与仪式的传播——在很多方面还是促使了新政治阶级的产生。例如,关于国家新生的议论和联盟的节庆活动都促使新兴的政治精英更统一、更具目的性。另一方面,对新的象征实践的不同接纳态度,也影响了革命政治的运转方式,尤其会影响革命政治的成
13 与败。虽然普遍的修辞不能吸引每个人,但还是吸引了足够多的人,使得其影响深远而持久。

为了便于分析,我在书中将政治与政治的实践者分开讨论。第一部分的三章分析了通过象征手法来表现政治行为的逻辑,比如人们如何交谈,如何将法国大革命和作为革命者的本人置于意象与体态当中。第二部分探讨了革命经历的社会情境,尤其是革命经历的差异性,思考了大革命时期法国的地理与社会分界线,以及革命政治文化在何处受到了最好的接纳等问题。两个部分的重点都是新政治文化的创造,也就是"大革命"成为一种连贯性经验的方式。虽然不乏学术著作论述过法国大革命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①但我尽力展现的却是大革命如何形成了一定的统一性,甚至在其多样化中仍旧存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和连贯性的渊源有几种,本书将其置于象征性与社会性这两大类别下进行

---

① 对于特殊性的强调在那些受寇伯和寇班启发的著作中尤其突出,例如,Martyn Lyons, *Revolution in Toulouse: An Essay on Provincial Terrorism* (Berne, 1978) and Gwynne Lewis, *The Second Vendée: The Continuity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Gard, 1789 - 1815* (Oxford, 1978)。

讨论。象征性类别下包括关键词与原则的不断重复、将政治作为一种活动的共同态度，以及对自由树与共和国的女性再现等相同象征物的使用。社会性类别下则包括在不同地方出现了相同类型的领袖人物，以及革命行动的前沿分布在相同类型的地方。

虽然本书的主题是政治，但很少论及具体的政策、政客、党派纷争、正规机构或组织。本书强调的是政治文化中的隐蔽模式，正是这些模式才使不同的政策、新政客、新冲突与新组织的出现成为可能。本书的焦点不是诸如谷物限价、罗伯斯庇尔或雅各宾派俱乐部之类，而是革命语言的普遍原则、革命象征物的运作，以及对仪式与体态的普遍关注。采 14
取富有政治意义的象征性行动会使具体的政策、个人和组织产生比在非革命时期更强大的冲击力。

本书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主要仰赖三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他们是研究革命政治文化（虽然他们自己并不一定使用此术语）的先驱。首先是傅勒，他在恢复历史地理学讨论方面做的工作最多，并为该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在更具体的方面，阿格宏则指出了塑像与印章上的共和国意象如何影响法国人的政治观念。① 同样，鄂哲芙也展现了革命节庆如何被用来塑造新的民族共识。② 阿格宏与鄂哲芙的研究都表示，文化展现是革命政治的一部分，鄂哲芙尤其指出，革命仪式存在逻辑。历史学家再也不能以为政治领域与文化截然两分了。

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就在于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法国大

---

① *Marianne au combat: L'Imagerie et la symbolique républicaines de 1789 à 1880* (Paris, 1979)，英文版(Cambridge, 1981).

②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1789 - 1799* (Paris, 1976).

革命让时人感到震惊，并不是因为它为资本主义发展或政治现代化打下了什么基础。英国人找到了更多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效途径，普鲁士人则证实了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民主，没有革命，但同样可以实现政治现代化。法国大革命对经济增长或政治稳定几乎没什么贡献。然而，它确实开发了民主共和主义在民众动员方面的潜力，并营造了革命变迁中催人奋进的紧张气氛。民族复兴的语言、平等博爱的姿态、共和主义的仪式都不会被很快遗忘。民主、恐怖、雅各宾主义和警察国家在政治生活中也一再出现。

新政治文化的起源在 1789 年前的几年或数十年都不十分明显，其结局乍一看也并不激动人心，因为拿破仑及之后的波旁王朝都费尽心机
15 地清除这种文化的残余，并在许多方面确实颇有成效。然而，革命的新传统，连同其价值观和期待，却并未消失。甚至在法国之外，革命传统仍旧暗暗地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精灵在拥护保守主义这种新意识形态之人的恐惧与著作中依然生生不息。即使在为了遏制它而新建立的警察权力机构中，革命的记忆也仍在继续。一旦革命者将卢梭的信仰——
16 政府能够塑造新的民族——付诸实践，西方世界就再也不一样了。

第1部分

权力的诗学

第一章 革命的修辞学

"言词,犹如具体事物,都是残酷可怕的。"(*Les mots, commes les choses, ont été des monstruosités.*)

罗伯斯庇尔失势后,著名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拉·哈尔卜(Jean-Francois La Harpe)[1]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革命语言的狂乱》(*Du Fanatisme dans la langue révolutionnaire*)。[2] 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荒谬始于《教士公民组织法》的颁布,并将"可恶的革命精神"中的狂乱情绪归咎于哲学思想的肆虐,这一观点本身并不出人意料。但他坚信,语言是解开法国大革命偏离正道的关键,这一点颇具启示性。事实上,拉·哈尔卜本人并没有对语言本身做较多分析,因为他感兴趣的是谴责语言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研究其原因或功能。然而,这本讽刺作品的确意义重大,因为它表明革命者本身在大革命时期已经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

1786 年之后,法兰西国家的动荡局势已经滋生了大量言词(words),出版物、会谈和政治会议都在增多。1780 年代的巴黎有几十

---

① 译注:拉·哈尔卜(1739 年 11 月 20 日-1803 年 2 月 11 日),法国剧作家、作家和评论家。

② *Du Fanatisme dans la langue révolutionnaire ou de la persécution suscitée par les Barbares du dix-huitième Siècle, contr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et ses Ministres*, 3rd ed. (Paris, 1797), p. 14.

种期刊(这种期刊几乎没有任何我们称之为新闻的内容);1789 年 7 月 14 日到 1792 年 8 月 10 日之间又有 500 余种期刊开始出版。[1] 剧院的情
19 况也相似:大革命之前每年大约只推出几部新剧,而 1789 - 1799 年间却出现了至少 1500 部新剧,其中不少是关于时事的,而且,单是 1792 - 1794 年间就有 750 余部戏剧被推向舞台。[2] 各层次的政治俱乐部数量激增,选举会议在大革命早期让人头晕目眩的那几年似乎一直在召开。另外,全国各地还组织了无数次纪念性或庆祝性的节庆活动。[3] 总之,处处有言谈,言谈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言词似潮水般大量涌现,但更重要的还是其独特性与神奇性。大革命一开始,言词就被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到 1789 年的秋天,“您是国民一员吗?”(Etes-vous de la Nation?)已经成了国民自卫军巡逻队的口令。[4] 随着国王在社会中的神圣地位开始衰落,政治语言的情感意义就愈益浓重,甚至达到生死攸关的程度。与旧制度有关的言词和王权、贵族或特权玷污过的名称都成了禁忌。旧制度的检察官和律师(procu-

---

① Claude Bellanger et al.,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resse française. 1: Des origins à 1814* (Paris, 1969), p.434.

② 有关恐怖时期剧院的启示性分析可参见 Beatrice F. Hyslop, “The Theater during a Crisis: The Parisian Theater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Terro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7 (1945): 332—355。Emmet Kennedy 正致力于修正 Hyslop 有关此问题的许多观点。还有一种能够衡量言词,尤其是政治言词增长的现象,那就是 1789 - 1794 年间新政治歌曲的稳定增长:1789 年有 116 首,1790 年是 261 首,1791 年 308 首,1792 年 325 首,1793 年 590 首,到 1794 年达到 701 首。后来,该数量从 1795 年的 137 首急剧下降到 1800 年的 25 首(Robert Brecy, “La Chanson révolutionnaire de 1789 à 1799”, *AHRF* 53 [1981]: 279—303)。

③ Mona Ozouf,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1789 - 1799* (Paris, 1976).

④ 最初的出发点是 Ferdinand Brunot,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es origines à 1900* 9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in two parts) (Paris, 1937)。

reurs 和 avocats)变成了简单的“法律人”(hommes de loi)才能继续他们的法律生涯。“贡献”也取代了“义务”(impôts),因为“贡献”听起来更加积极主动。与旧制度的价值观相关的名字也被新的革命名字(往往是希腊罗马式的名字)取代。人们用古典英雄的名字命名新生儿,用地理方位命名历史名省,发生叛乱的城镇被攻占后也被重新命名。1793 年,对名称的关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来自巴黎某区的代表团向国民公会提议,要求以“共和国必需的所有美德”系统地重新命名街道和公众广场,给国民上一门“无声的道德伦理课”。① 20

一些关键言词成了实施革命魔法的工具。“民族”(nation)可能是最普遍的神圣言词,还有政党(patrie)、宪法、法律以及其他一些更具体的言词,例如激进派、复兴、美德和警戒。这些言词不管是在特定场合才被运用,还是不久以后就成了大众熟知的公式化表述,都与革命共同体有着紧密联系。革命者为了寻求王权魅力的替代品,非常重视言词在仪式上的使用。最首要的仪式言词就是革命誓言,也就是拉·哈尔卜曾经嘲笑过的“对誓言无可救药的躁狂症。”②正如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所说,对革命宣誓效忠成了重要的仪式,因为它强调了国民主权与国王威权之间的区别。国王在祝圣仪式上从超然的上帝那里获得了“超自然的权力标志”;与之相反,革命誓言却在共同体内部创造了国民主权。③

本章对革命语言的阐释并没有与序言中提到的三种学派完全重叠。马克思主义学派与托克维尔学派在语言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修正主义

---

① 引自 Bronislaw Baczko 的引文。Bronislaw Baczko, *Lumières de l'Utopie* (Paris, 1978), pp. 366—367.

② *Du Fanatisme*, p. 71.

③ *1789: Les Emblêmes de la Raison* (Paris, 1979), pp. 66—67.

学派还没有形成任何观点。马克思主义学派直到最近才对革命语言产生了兴趣，而修正主义学派即使表现出对语言的某种兴趣，目前也只是延用了托克维尔的一些基本观点。第三种是涂尔干式(Durkheimian)阐释，这种分析强调革命语言的文化功能，尤其是其综合功能。三种观点有着共同的预设，就是认为语言的"真正"含义被隐藏了，分析语言的任务就是要揭开语言的面具。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政治语言是意识形态的表述。根据这种观
21 点，革命的修辞掩盖了资产阶级真正的社会利益，尤其是阶级目的。马克思本人特别强调了法国革命者的错误意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角斗士在古典简朴的罗马共和制传统中寻获理想与艺术形式，以及他们所需要的自我欺骗，以此掩盖资产阶级在斗争内容上的缺陷。"[1]尼克斯·普朗萨斯(Nicos Poulantzas)也坚持这种基本观点，认为雅各宾派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政治性被掩盖了，因为它采用的是伦理道德的语言，而不是政治的语言"。[2] 相似地，让克·吉约姆(Jacques Guilhaumou)也认为，迪歇纳老爹(Père Duchesne)的激进修辞在"希望成为无套裤汉"的背后其实掩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3] 所有这些观点都认为，资产阶级话语做好了伪装，企图掩盖其作为实现资产阶级政治与社会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的真实身份。

---

①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1963), p. 16.

② *Pouvoir politique et classes sociales*, 2 vols. (Paris, 1971) 1: 191.

③ "L'Idéologie du Père Duchesne: Les Forces adjuvantes (14 juillet - 6 septembre 1793)", *Le Mouvement social*, no. 85 (1973): 115. 与其说"迪歇纳老爹"是革命刊名，倒不如说是供膜拜的嘉年华式大众形象。所有报纸中最有影响力、维持时间最长的就是激进派埃贝尔的《迪歇纳老爹报》。背景知识可参见 F. Braesch, ed., *Le Père Duchesne d'Hébert. 1: Les Origines — La Constituante* (Paris, 1938)。

最近,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摆脱这种语言的简约化观点。吉约姆就写道,不能简单地认为雅各宾派话语就是为了要掩盖或神秘化。然而,尽管他与瑞金纳·罗宾(Régine Robin)都认为语言不仅仅是社会现实的镜像或促其再生产的机制,但他们采用的仍然是一种相对僵化的分析架构。他们将话语基于一种特定的境况"变局"(conjuncture of circumstances)之中,他们所界定的境况"变局"就是"特定时刻社会形成过程中各种矛盾的联合,政治层面上多因素的联合"。[①] 虽然这种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语言的分析,但还是基于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隐喻,认为社会形成是政治与语言的下层基础,语言只是表达了下层的社会矛盾。只有参考了"语言之外"的层面,才能对政治话语进行合理的分析。[②]

托克维尔学派不认为语言是阶级冲突的意识形态工具,但也强调了自 22
我欺骗的成分。托克维尔认为,革命者"愚蠢地希望,在理性而且只在理性的协助下,非常古老、高度错综的社会体系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遽然的激进转型"。他们"偏好广泛的普遍性、设定后就不容更改的立法制度和学究式的对称美",这使他们无法看清,其实他们正在复制自己所憎厌的旧制度的绝对权力。[③] 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中,傅勒复原了托克维尔的学说,并对其进行了语义符号学方面的扭转。他认为,语言不仅掩盖了政治延续性的真相,还替代了政治竞争的现实:"演说成了一种权力,"因此,

---

① 参见导论,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Bulletin du Centre d'Analyse du Discours de l'Université de Lille III* (Villeneuve d'Ascq, 1975), 第 1—14 页。

② Régine Robin, *Histoire et linguistique* (Paris, 1973), p. 22.

③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Stuart Gilbert (New York, 1955), pp. 146, 147. 托克维尔的语言分析可参见 Linda Orr, "Tocqueville et l'histoire incompréhensib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oetiqué* 49 (1982): 51—70。

"掌握了语义符号的把戏就是绝对的政治大师"。[1] 社会与政治间的正常关系已被打乱,政治成了一种争夺为国民说话的权利而进行的角逐。语言成了一种权力的体现,而权力就是通过为民说话的权利而得到体现。大革命期间,语言的这种重要性恰恰反映出当时的法国社会已经偏离了正常轨道。

鄂哲芙在分析革命节庆时提出了另一种颇有说服力的观点。她没有揭示这些节庆的社会内容或政治欺骗,而是按涂尔干的方式考察了节庆仪式的功效。涂尔干本人使用了阿尔伯特·马修斯(Albert Mathiez)关于革命祭仪的著作,而且多次引用法国大革命中的例子来论证自己关于宗教的一些观点。[2] 鄂哲芙认为,那些明显相互矛盾的节庆揭示了深刻的"相同的概念化行为"和"相同的群体需要"。这些节庆实现了神圣中心朝新型革命共同体的转移。"法国大革命关于自身的话语"通过节庆的制度化,
23 展现出一种在新共识的基础上组建新民族的努力。[3] 有关仪式的语言以及被仪式化了的语言都是为国家统一服务,表达了对社会团结的渴望。[4]

---

① (Paris, 1978), pp. 71—72. 在 *History and Theory* 20 (1981): 313—323 中我已经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傅勒的符号学阐释。

② 例如:"这种尊自身为神或造神的社会倾向在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几年里表现得最为明显。"(E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trans. by Joseph Ward Swain, [New York, 1915], pp. 244—245)

③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pp. 35, 339; and Ozouf, "De Thermidor à Brumaire: Le Discours de la Révolution sur elle-même", *Revue historique* 243 (1970): 31—66.

④ 功能主义分析强调演说者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参见 Hans Ulrich Gumbrecht, *Funktionen parlamentarischer Rhetorik in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Munich, 1978)。Gumbrecht 运用"接受理论"来分析三个修辞方面的例子:米拉波于 1789 年 7 月 16 日对国王的演讲、审判国王时对集体身份认同的开发,以及马拉的悼词中对制度化全民一致性的捍卫。他的著作精确例证了文学批评方法的使用。关于革命音乐的功能主义分析可参见 Adelheid Coy, *Die Musik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Funktionsbestimmung von Lied und Hymne* (Munich, 1978)。

对语言的历史分析尤其容易采用层次或层面的隐喻；毕竟语言通常是被用来表达某种比言词本身更"真实"的其他事物的。对革命语言的解读通常都遵循着以前的一些假设，诸如语言是社会冲突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政治自欺的载体（托克维尔的观点），或文化统一的媒介（涂尔干的观点）。每种观点都各有长处，彼此之间未必不能达成和解。但这里我要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革命者自己的修辞学。我不提倡纵向地层层剖析以求得到革命语言的"真正"含义，而是提议横向地看待语言，即通过其内部模式及其与政治文化其他方面的联系来分析语言。我不想在言词之下或之外去探寻政治话语的含义，而希望首先阐明其修辞语境。

革命语言不是简单地去反映革命变化与冲突的现实，而是将自身转化成了一种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工具。因此，政治语言不仅表达了由下层社会利益与政治利益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有助于形成对利益的感知，从而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换句话说，革命的政治话语是修辞的；是劝服的工具，是重新构建社会世界与政治世界的方式。拉·哈尔卜认 24
识到了革命语言的修辞力量，宣称要通过"考察革命语言这一首要的、最令人惊异的工具"来描绘法国大革命。他意图"说明，这种语言如何形成、如何被合法神圣化都是非常奇特的，是世上闻所未闻的丑闻，绝对令人费解，不能仅仅将其解释为神的报复"。[①]

"神的报复"不再是历史学阐释的标准答案。为了便于理解政治修辞如何成为"闻所未闻的丑闻"和法国大革命的"首要工具"，我建议将革命的修辞看作文学评论的文本。但毋需说，文学评论也不是只

---

① *Du Fanatisme*, pp. 13—14.

有一种方式;文学评论家同历史学家一样,都可以根据各自采用的不同方法被分成不同种类,诸如新评论家、建构主义评论家、后建构主义评论家、接受理论评论家(reception theorists)等等,不胜枚举,而且他们几乎在每一点上都存在分歧。[1]然而,文学理论内部的论战还是为历史学家开辟了许多可能性。例如,如果我们认为革命政客的各种言论是在构建一个文本,那么,有关文本本质的争论和解读文本的方法就直接相关了。

实质上,革命的修辞提出了许多与当今文学批评中常见问题相同的问题。与现今关于文学阐释标准的争论一样,1790 年代也出现过关于政治阐释标准的论战。现在的文学评论家关注作者权(authorship)、读者、情节结构和叙述功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政治演说者同样关注威权、听众和对革命历史的正确解读。当第三等级的代表决定为自己以及其他所有愿意加入的人组建"国民议会"时,他们其实正
25 在挑战君主制的传统基石,提出了威权归属的问题。议员们宣称主权归民,但在之后的几年,谁才能为国民说话这一问题在法国却一直悬而未决。[2]

换句话说,威权——革命文本的作者权——一直都不确定。国王作为传统的、神圣的社会中心,魅力一直在消退,但又没有任何个人、机构

① 可以先参考 Kenneth Burke,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1996)。近来可以为历史学提供借鉴的批评文章有 W. J. T. Mitchell, *On Narrative* (Chicago, 1981)及 Susan R. Suleiman and Inge Crosman, *The Reader in the Text: Essays on Aud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Princeton, 1980)。后结构主义立场的评论可参见 Josué V. Harari,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Ithaca, N. Y., 1979)。

②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尤其是第 70—76 页中强调了为国民而言的重要性。

或文件能成功取代他的位置。哪里才是复兴民族的神圣中心呢？拿破仑掌权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任何极富个人魅力的领导者；法国没有乔治·华盛顿，虽然也有许多希望承担这一角色的候选人，但新国家却不承认什么国父。法国大革命没有父系根源，也没有清晰的谱系，那么多宪法和国民议会中也没有任何一个能获得代表国民的固定地位。由于政治威权的持续更替，言词，即为民而言的本事，就展现出了实实在在的魅力。正如拉·哈尔卜所说，革命语言是“狂热的”，因为它被赋予了神圣的威权。

虽然革命“文本”很神圣，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根本没有什么革命圣经可以确认并批准革命实践。法国的革命修辞必须为自己注解：衡量革命实践的原则或教规就根植于政治实践和政治话语之中。然而，新修辞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原则也不会一成不变。而且更糟糕的是，新修辞的大部分原则都没有经过检验，即使它们都自称非常新颖，或者正是由于它们自称的新颖才未能得到及时的检验。1789年之后，革命者时不时地刷新修辞，而且只在政治斗争激烈时才阐明原则。

革命的修辞坚信法国人民正在创建一个新的民族，借此信念则实现了文本的统一。虽然共和国和法国大革命经常被引作参考，但它们自身却没有历史可供借鉴，正如一个地方革命者所说： 26

> 革命从来不可能部分成功，如果不能完全胜利，就会中途流产。历史上有记载的革命和当代我们曾经尝试过的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人们希望新法律能与旧风俗一致，想让旧时代的人来治理新机构……革命意味着抛开所有的形式与规

则;意味着肯定革命,巩固革命,扫除所有阻挡进步的障碍物。①

要与民族的过去彻底决裂的强烈愿望,使法国大革命与以前的革命运动截然不同。美国激进派的新共同体其实就是当时现存的传统;美国人一直生活在一个"新世界"里,远离他们所谓的腐化的英国政治。英国激进派所指的则是一种属于他们萨克逊民族的、过去在宗教上持异议的、更纯洁的共同体。法国的革命修辞与这些都不同:法国人民没有因宗教异议而促成的民众共识的悠久传统,也没有公认的"生而自由"的法国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来支撑并激活革命修辞。② 相反,法国人民注意到的只是所谓的"神话般的现时",也就是创建新社会的瞬间和达成新共识的神圣片刻。在许多革命节庆上,人们通过在自由树下或民众面前宣誓效忠来纪念并重现缔结社会契约的时刻,仪式上的言词复活了神话般的现时,一遍又一遍。③

神话现时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结果法国大革命自身的历史也就不断变化。革命节庆的不断变化证实了这种暂时的不确定性,不同的政体

① A. N. F[1c] III Meurthe 15, Correspondance et divers, 1789-an V, 引自"Discours pronouncé a l'ouverture des séances du Comité des Sans-Culottes, par Marat-Mauger, Président de ce Comité, et comite, et commissaire du Conseil exécutif près le département de la Meurthe", 第4页(无日期,但从内容及上下文判断,显然是1793年夏末)。请注意,Mauger将名字改为Marat-Mauger,是为了表达对最近被暗杀的激进派报人议员马拉的忠诚。另可参考第六章对Mauger这类人在地方上的作用的讨论。

②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1963), 尤其是第一部分。

③ 根据斯塔罗宾斯基的说法,宣誓"在瞬间提升中建立了未来",但体态还是沿用了一种古老的契约式模式(1789年,第67页)。

和派系都是通过选择不同的庆祝日期来表达他们对革命历史逻辑的不同解释。[①] 攻占巴士底狱日(7 月 14 日)一直以来最有可能被确定为新社会的成立日,因为它最早发生;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其他日子也被赋予了相等、甚至有时更重要的意义,比如 8 月 10 日(1792 年)推翻君主制日、1 月 21 日(1793 年)处死国王日和热月 9 日(共和二年)罗伯斯庇尔倒台日。然而,尽管节庆有很多不同,但目的却一样,就是要重现新共识达成的时刻。节庆提醒着所有参与者,他们才是所处革命时代的神话英雄。 27

虽然革命语言的表述饱含着宗教热诚,但在内容上却非常世俗。当革命者与教会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时,他们就迅速剔除了肯定基督教的言词。其实,拒绝参考基督教或天主教教义也是宣告革命要与法国的过去及欧洲的过去决裂的一种方式。新的社会契约不需要参考圣经的立约,它的根本应该是理性和人的天生权利。革命者跨越了法兰西民族的过去,转向罗马与希腊模式去寻求灵感。18 世纪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了解一点古典历史,但激进派革命者,诸如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圣茹斯特(Saint-Just)和罗伯斯庇尔却在古典历史中找到了建立新秩序的想法;他们将古典历史空想成一种新的、纯净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一种理想的共和国。[②]

革命的历史观认为,希腊罗马的共和派发明了自由,法兰西的任务就是要传播这个好消息。《巴黎报》(*Gazette de Paris*)的保守派编辑早在 1790 年 7 月就认识到了这种观点的含义。他在有关联盟节的评论中称:

---

① Ozouf,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pp. 199—222.

② 同上,第 330—331 页。教育背景可参见 Harold Talbot Parker, *The Cult of Antiqu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aries* (Chicago, 1937)。

“(这个节庆)可与希腊罗马的节日相提并论。人们忘记了,有人总是援引那些共和国作为典范。……我们是君主制国家……我们不做罗马人,也
28 不做希腊人,我们要做法兰西人。”第二天,他又表达了这种保守的历史观:

> 啊!旧的方式不能改(“国王万岁”和“王后万岁”的呼声都快被“国民万岁”湮没了)!法兰克人(Franks)的后代们,我们在领袖们的伟大高贵之映衬下,实现着自己的辉煌,让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去战斗、去爱、去活,或去死,并忠实于父辈的原则吧……我们是在一家之长的注视下联合在一起的大家庭……我们结义为兄弟,有着共同的父亲。①

在这里,保守派将君主制、传统和父权制威权同法兰克人的历史模式相联系,这也是那些为了保卫贵族特权不受专制主义蚕食之人最喜欢参考的模式。保守派明确坚持要延续传统的修辞——“旧的方式”。保守派报纸长篇累牍地类比以前的法国历史,在议会中,保守派演说家也采用法国以前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②

---

① *Gazette de Paris*,1790年7月15和16日。

② 例如,1790年7月15日,保守派报纸《国王之友》(*L'Ami du Roi, des françois, de l'ordre, et surtout de la Verité, par les continuateurs de Fréron*,编辑是教士 Royou)给一本宣传小册子作书评,这本小册子分析比较了分别发生于1358年和1789年的两起革命。书评的结论是,这两起“革命”都源自金融问题,所以“认为我们正目睹的这起革命与过去历史上任何革命都不相同的人是错误的”(no. 45)。另外,还可以在1790年7月15日教士 Maury 对国民议会的演讲中发现保守派演讲中使用历史先例的做法。Maury 争论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安置国旗,他开篇就说“只要简明地考察一下历史,就足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它了”。他认为国旗应该委托给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国王(*L'Ami du Roi*, no. 46[1790年7月16日])。

激进派则恰恰相反，他们讲自由，讲与过去的决裂，提倡古代模式。他们认为古代模式没有体现过去的历史，所以可以用作未来的社会模式。1793 年的一份激进派文献写道："要成为真正的共和派，每个公民都必须经历，而且主动寻求一种与过去曾改变过法国的革命相同的革命。暴君的奴隶和自由国家的公民绝不相同；后者的风俗、原则、情感、行动，所有一切都必须是全新的。"[①]对全新的强调有时也会走向对古代 29
威权的否定。孔多塞(Condorcet)在他 1792 年发表的开创性的《为制定关于公共教育普通机构的法令的报告和计划》中就直言不讳地说：

> 最后，既然要言无不尽，今天就要消除所有偏见，那么(我坚持认为)，对古老语言的长期细致的研究……有可能弊大于利。我们要寻求一种教育，让人们明晓真理，但这些书却错误百出；我们要培育理性，但这些书却误导人们。我们已经远离古代，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已经遥遥领先，因此有必要将我们经过千锤百炼的理性再好好整理，等待进一步的充实，而不是被那些珍贵遗产侵蚀腐化。[②]

激进派参照历史起源，表示要同传统与威权的合理性决裂，这也暗

---

① "Instruction adressée aux autorités constituées des départemens [sic] de Rhône et de Loire, par la Commission temporaire" of Lyon (1793 年 11 月 16 日)，重印于 Walter Markov and Albert Soboul, eds., *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Volksbewegung, 1793 – 1794* (Berlin, 1957)，第 224 页。

② 重印于 M. J. Guillaume, ed.,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 (Paris, 1889)，第 200 页。

示他们拒绝了威权的父权制或家长制模式。官方印章、表现新共和国的版画和印刷品,以及关于节庆的生活画(tableaux vivants)中,古典的女性象征取代了国王的形象(见图 1)。这些女性形象,不管是真人还是塑像,通常都独坐或独站,周围环绕着代表威权和权力的抽象标志。这个象征共和国的形象身边可能有孩子,甚至男性保卫者,但从来没出现过父亲。[1]

保守派出于防守首先意识到,历史模式、家庭隐喻和威权的本质都与政治修辞密切相关。激进派则花了更长的时间去发展,但还是不能紧密融合修辞中的相异成分。然而,激进派从最初就发现,他们正在颠覆
31 关于权力的传统家庭式比喻。他们似乎早在公会真正投票决定死刑之前就在修辞上杀死了国王,即他们的父亲。激进派是保卫国民(la Nation)与自由(la Liberté)的兄弟,不是法国的"自由之子"。边远的热尔省(Gers)的地方激进派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在演说中称:"法国人民要组建,而且必须组建只有兄弟的家庭,由他们共同的母亲平等珍爱、平等爱护。"[2]1793 年,谋杀象征性父亲的模糊想法越来越清晰了。[3] 国王被处死,甚至基督教的上帝在非基督教化运动中也遭到了挑战。全国各地的

---

① 该发现基于本人对国家图书馆和巴黎卡纳瓦雷博物馆收藏的革命印刷物的研究。参见 Maurice Agulhon, *Marianne au combat: L'Imagerie et la symbolique républicaines de 1789 à 1880* (Paris, 1979), pp. 7—53; Hannah Mitchell, "Art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Exhibition at the Musée Carnavalet",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5 (1978): 123—145; and Lynn Hunt, "Engraving the Republic: Prints and Propaganda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y Today* 30 (1980): 11—17。

② 该引文来自 1794 年的一份讲稿,该讲稿在 G. Brégail, "L'Eloquence révolutionnaire dans le Ger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u Gers* 20 (1919): 119 中被引用。

③ 有关象征性谋杀父亲的简要讨论可参见 Michel Vovelle, *Idéologies et mentalités* (Paris, 1982), 第 30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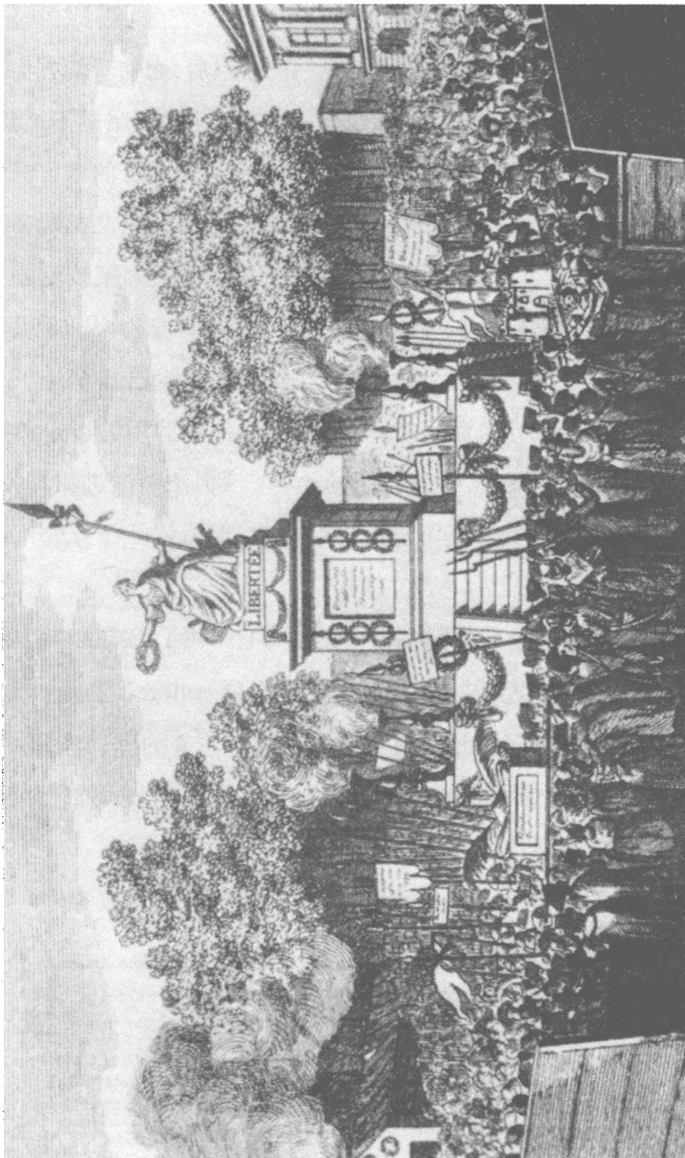


图1 1792年10月自由节

理性节上,自由女神像遍布所有圣地。

革命者砍断了与父权制威权这一支柱的联系后,面临着两方面的饱满情绪:一面是对新时代的欢欣雀跃;另一面是对未来阴暗的不祥预感。对于界域模糊的新共同体来说,神话般的现时与魅力无穷的语言只是脆弱的基础结构。人们一边欢庆民族复兴的神话现时,一边又担忧新共识是否牢固。早在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在有机会登上国家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经确认了他们的“内心召唤”和特别的“选举”身份。① 18世纪晚期,美国激进派在试图使殖民地脱离英国之前,至少已经享受了十年的强化政治教育与实践,而且在真正实施时,他们运用的也是英国辉格党和激进派早就已经发展完善了的语言。②但法国激进派却发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反思其岌岌可危的形势之前,他们就已经身处革命当
32 中了。

法国大革命的修辞非常新颖,并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正式文体,其实它采用的是古典狭隘的修辞结构。旧制度下的教派(collége)已经为革命者与非革命者之流提供了大量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陈词滥调。③ 各种全国性集会论坛上所作的演讲也几乎都是提前写好的,通常都遵循了昆

---

①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1965).

② J. R. Pol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England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Berkeley, 1966);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 – 1787* (New York, 1969),尤其是第一章;及 J. G. A. Pocock, “1776: The Revolution against Parliament”, in Pocock, *Three British Revolutions: 1641, 1688, 1776* (Princeton, 1980), pp. 265—288。

③ Marc-Eli Blanchard, *Saint-Just & Cie: La Révolution et les mots* (Paris, 1980), pp. 43—51.

帝连(Quintilian)提倡的布局(dispositio):首先是基本介绍(exordium),然后是事件陈述,通常采取叙事的形式,接下来就是赞成演说者立场的观点和反对者提出的反驳;最后是结束语,演说者概括事件,通过调动听众情绪使其赞成自己的观点。① 不难发现,这种衍生自司法雄辩术的古典布局,正是大革命时期主导国家政治的律师们曾经接受过的最实用训练。这种训练还可以追溯到学校教育,学生们在修辞练习中也学过如何安排演讲的布局、使用数据和范例,以及如何仰赖古典事例。②

这种古典修辞形式中的政治观点主要由 17 与 18 世纪的学术与政治成果塑造。正如 50 多年前金斯莱·马丁(Kingsley Martin)的解释:"17 世纪的科学家与学者文人们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新思想后来就成了参加三级会议的代表们的信仰。"③ 洛克(Locke)、牛顿、费纳龙(Fenelon)和贤哲们(philosophes)已经铺好了路。甚至贵族法庭也使用启蒙运动的语言来反对王权;1770 年代开始,尤其是在 80 年代,巴黎高 33
等法院也代表"公民"与"民族"的利益提出过告诫。④ 连共和制与民主,以及有关美德与腐化之类的语言都不是法国人的发明,而是波科克

① Peter France, *Rhetoric and Truth in France: Descartes to Diderot* (Oxford, 1972), pp. 10—11. France 在该书中叙述了旧制度下法国学校提供的修辞训练。任何阅读过一些革命国会演讲稿的人都能看出它们的相同结构。

② 关于该问题的有用讨论可参见 Blanchard, *Saint-Just & Cie*, 第 25—68 页。还可参考 Roger Chartier et al., *L'Education en France du XVIe au SVIIIe siècle* (Paris, 1976), 第 196—199 页。

③ *The Rise of French Liberal Thought: A Study of Political Ideas from Bayle to Condorcet*, 2nd ed. (New York, 1954), p. 2.

④ Bailey Stone, *The Parlement of Paris, 1774 - 1789* (Chapel Hill, N. C., 1981), 尤其是第三章和第六章。但是,Jacques Godechot 争论道,"民族"只在 1789 年的选举运动中才被赋予了革命意义("Nation, patrie, nationalisme et patriotism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AHRF* 43 [1971]: 481—501, 尤其在第 495 页)。

(J. G. A. Pocock)称之为“大西洋共和传统”的一部分。他认为“大西洋共和传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①

法国革命者从哲学家和高等法院(parlementaires)那里学会了改革与对抗的语言,但还必须发明属于自己的革命语言。在大洋对面人口稀少的殖民地,美国人民宣布了独立;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也自觉地要创建一种世上全新的东西——革命。1789 年之前——甚至在美国——“革命”这个词代表的只是回到过去的状态,而不是走向未来的飞跃。②但在过去的法国,从来没有什么历史或宗教的黄金时期值得激进派去追回;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和动荡不安的现在,他们只能勇往直前。

革命进程一直不确定,这一点从革命修辞所采用的叙事结构的转型中可以看出。大革命刚开始的几个月,大部分修辞都不自觉地受到了诺斯若普·弗莱(Northrup Frye)称之为喜剧的“一般情节”(generic plot)的影响。③ 喜剧展现了旧社会秩序(旧制度[ancien régime]这一短语就是在该时期被发明的)与新社会秩序的冲突,往往表现在儿子希望从独断专行的传统父亲那里获得自由。在戏剧情节中,“阻碍性角色”(父
34 亲,在法国就是国王)往往会和其他角色达成和解,而不会被抛弃。

---

①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1975).

② 参见 *The Compact Edition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71)中“Revolution”这一词条。

③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1957), pp. 163—186. 历史学家对弗莱观点的运用可参见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尤其是第 1—42 页。译注:汉译本有刘世安译《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 年;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 年)。

所以，往往节庆仪式的最后就会表现最后的和解，以及新社会的欣喜出现。

1790年7月14日联盟节(见图2)的评论最好地描述了革命修辞中的这种喜剧结构。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刚萌芽的激进派，在描绘巴黎节庆时都强调了对和解和幸福团聚的向往："在路上，在窗边，在屋顶上，到处都是欢聚的人们，洋溢着聪慧明智的喜悦，奴隶们挣脱束缚的喜悦也无法与之相比。"①公民成了臣民，国王好像也认可了新社会的出现。在拉法耶特(Lafayette)的率领下，新官员、国民自卫军、前线部队和8-10岁儿童组成的儿童团都共同宣誓永远效忠国民、法律和国王。公众一致感谢"不可分离的所有法国人民的联合，无论性别、年龄、生活状况或职业"。② 甚至颇具影响的保守派报纸《国王之友》(*L'Ami du Roi*)也提到，联盟节是在庆祝"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时代"。编辑还重述了几起事件来证实"所有法国人民都发自内心地热爱国王和王室家庭"。③ 联盟节让法国家庭重新走到了一起，父亲应儿子们的强烈要求做出了让步。

然而，和解并未持续很久，革命的叙事也未终止于1790年。国王只是在表面上默许了和解，激进派也不满意家庭和睦的恢复。1792年，尤其在9月宣布共和制之后，激进派掌握了话语权，一般情节从喜剧转向了浪漫剧。现在，法国大革命更像是一种求索，具有革命博爱精神的弟兄们就是其中的英雄，他们同反革命的邪恶势力展开了一系列的殊死

---

① Anon., *Description fidèle de tout ce qui a précédé, accompagné et suivi la cérémonie de la 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u 14 juillet 1790* (Paris, 无日期), p. 16.

② Anon., *Description de la Fête du Pacte fédératif, du 14 juillet, fixée par la ville, avec le réglement de la police* (Paris, 无日期).

③ No. 56 (1790年7月26日)和 no. 57(1790年7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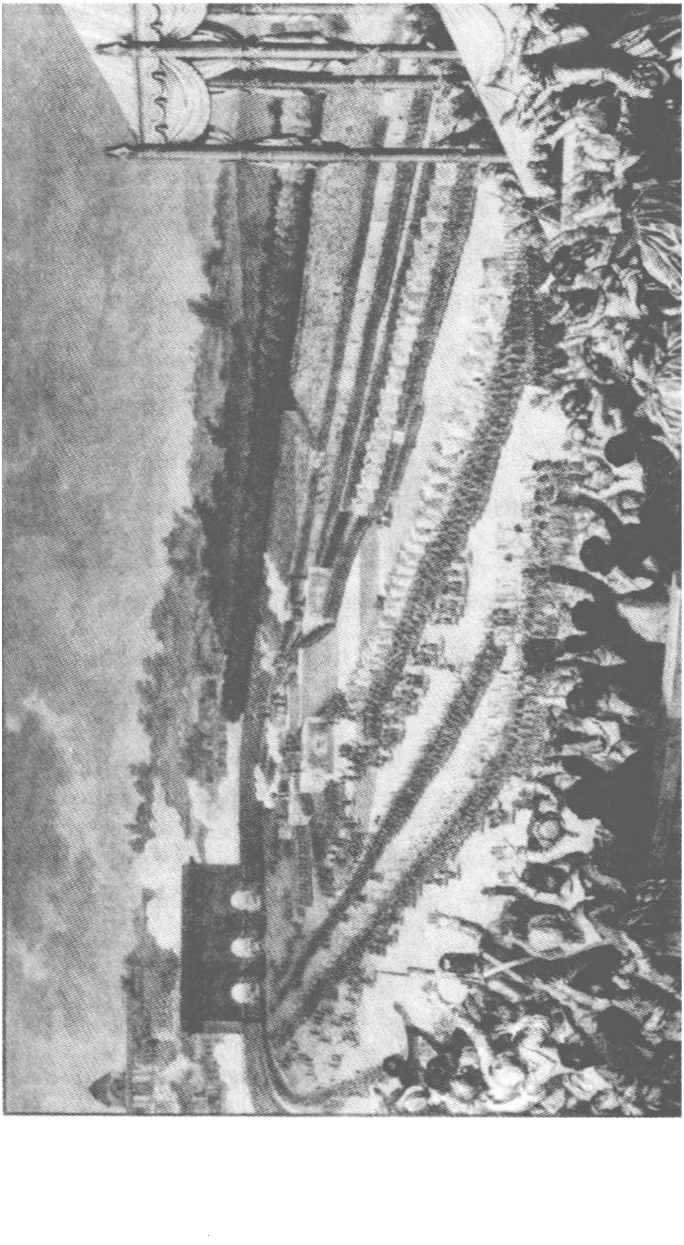


图2 1790年7月联盟节

搏斗。

正如弗莱所说,浪漫剧不喜欢特别复杂或微妙的形象,只青睐神话 35
英雄和与之为敌的流氓、懦夫及恶龙。[1] 所以在 1792 和 1793 年,共和派一边强调他们为解放法国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与过去决裂的坚定决心和努力奋斗的高尚德行,一边凸显敌人彻头彻尾的道德败坏。虽然像幸福家庭般的法国不会再有了,但人们仍坚信,共和派会重塑一个美好的法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议员看到了求索的紧迫性,他说:“大灾难的时刻来临了。应该立刻消除所有偏见,如果不彻底消灭偏见,我们就会被打垮。我们必须在 1792 年 8 月 10 日到 1793 年 1 月 1 日之间勇敢无畏地跨越几个世纪。”[2]他是在 1792 年 12 月中旬说这席话的,正好在他预计的期限之前。他劝诫其他议员要遵循的美德正是浪漫剧的典型特征:勇敢、无畏、直率向前。

当预想的朝着未来的飞跃遭遇越来越多的障碍时,当 1794 年 1 月格雷古瓦所见的“在我们差强人意的存在方式与我们可能达到的最好存在形态之间仍旧横亘着”的巨大鸿沟无法填平时,第三种一般情节——悲剧就开始浮出了表面。悲剧中,半人半神的英雄(在法国就是越来越孤立的共和派领袖),其非凡命运几乎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其丰功伟绩光辉灿烂、永不褪色。然而,虽然目标正确,但追求目标的尝试却最终失败,这就是悲剧。追求目标的英雄也为共同体牺牲了自己。结果,正如弗莱所说,“悲剧的修辞需要最高尚的措辞”。[3] 1793 年末到

---

① *Anatomy of Criticism*, p. 195.

② 引自 Jacob Dupont 的演说,1792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的国民公会会议报告引用了此演说:*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14 (Paris, 1847), no. 744 (1792 年 12 月 16 日)。

③ *Anatomy of Criticism*, p. 210.

1794年初,共和派说出了最富悲剧性的言词。例如,1794年5月初,罗伯斯庇尔(见图3)在一次重要演说中为浪漫剧的延续主题作了悲剧性
37 的注解:



图3 马克西姆廉·罗伯斯庇尔像

自然界的万物都有了变化(多亏了科学的进步);在道德与政治的秩序里,一切也要改变。一半世界已完成了革命,另一半也应该圆满完成……我们要教导(全欧洲)记住为自由而牺牲了的英雄们的名字与美德……我们要让(全欧洲)知道为压迫者敲响丧钟的那一时刻……我是法国人,是你们的代表……哦!高尚的人民!请接受我本人这一祭品吧!诞生

于你们之间是多么幸福！为你们的福祉而死会更加幸福！[1]

似乎他已经知道，几周后他的末日就会到来。

叙事结构从喜剧到浪漫剧，再到悲剧，全由法国大革命对密谋的沉迷一步步推进。如果获得新生后的民族共同体的神话现时是革命者的伊甸园，那密谋就是那股邪恶的力量。大革命的敌人破坏了1790年的 38
表面和解。共和国的敌人始终在阻挠革命者对道德与政治复兴的求索。一个密谋刚被发现，另一个又接踵而至。法国人对密谋的沉迷并不是独一无二的，1760和1770年代美洲殖民地上的人们就坚信，英国的腐败大臣们一直在密谋剥夺他们传统的天赋权利。[2] 然而，虽然密谋的修辞并不是法国大革命所独有，但即使在旧制度被推翻以后，它在法国还一直主导着政治话语。在美国，密谋大概能让殖民地投入到与遥远祖国的斗争中，但当殖民地脱离祖国之后，美国革命者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如何代表新秩序下不同宗教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之类的问题。[3] 但在法国，密谋却发生在兄弟之间，造成了兄弟间的自相残杀。1789年之后这种沉迷密谋的现象更加严重。正如傅勒所说，对密谋的沉迷成了法国大革命修辞的核心组织原则。[4] 法国大革命的叙事由情节主导。

---

① 引自 *Oeuvres de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0 (Discours: 27 juillet 1793 – 27 juillet 1794) (Paris, 1967): 445 中罗伯斯庇尔的演说"Sur les rapports des idées religieuses et morales avec les principles républicains, et sur les fêtes nationals"。Vovelle 认为革命的行动者将法国大革命作为一种悲剧在经历着(*Idéologies et mentalités*, 第301页)。

②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67).

③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and Pol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④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p. 78—79.

密谋如同隐匿的幽灵，一直困扰着革命者，他们不停地谈论着如何揭穿阴谋。激进派报纸的撰稿人，例如马拉（Marat）和埃贝尔（Hébert）非常擅长这种痛斥型修辞，但从大革命一开始，各个政治层面上的人也都这么说。1789 年 7 月就已经有一份报纸名叫《国家检举者》（*Le Dénonciateur national*）。到 1793 年为止，有关密谋的措辞已经成了革命话语中固定的、必需的一部分了。从一份针对只有初等读写水平的读者的匿名布告中，我们能发现密谋的古怪反复的特点：

> 无套裤汉们，是敲响警钟的时候了……小心，是时候了，内战已准备就绪，那些可能控制共和国的恶棍们要把你们变成他们的玩偶。他们是巴黎的商人，是阴谋家，我唾弃他们。有些人读到了我的这些文字（其实这些都是纯粹的真相），就
> 39 会说我是密谋分子，因为我说出了真相。[①]

1793 - 1794 年的革命法庭为密谋的修辞制订了合法的形式，但没有说明如何使用它。

革命者对密谋的沉迷有两个明显的社会根源，一个是通俗文化，另一个是 1789 年“爱国者”对“贵族”反革命的担心。法国老百姓对密谋的迷恋有着悠久的历史，僵化的生存经济培育了它，依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消息的共同体又轻易地维持着它。老百姓对藏宝的迷信引发了很多关于密谋的传说，比如贵族的武器密窖、秘密通信和秘藏的粮食

---

① 引自 1794 年 3 月 9 日汇报给警察局的“埃贝尔式”告示，重印于 Markov and Soboul, *Die Sansculotten*，第 203 页。

等等。① 饥饿和可能被饿死的威胁又让人们更加担心会有密谋。② 饥荒不是从来没发生过;老百姓对可能的投机行为及自发的价格限定怒不可遏,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但在旧制度的最后十年里,有关囤积和投机的谈话却越来越多地与国家政治事务有了联系。1760 和 1770 年代,王室曾交替采用两种措施:放宽对粮食贸易的限制和通过非公开化的政府干预来支持粮食贸易。政府的批评者指责机要大臣和国王本人通过人为地挑起饥荒来获利。作为反击,政府也开始宣传攻势,描绘了一些违反规章制度的地方行政官员,指责他们才是危机的制造者。③ 政府最高层面的互相推诿加深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高职位的人也认为粮食的主要供给都听命于政治操纵。

1789 年,在宪政危机中,老百姓开始怀疑粮食价格要上涨。当新国民议会的议员看到大批军队开入巴黎和凡尔赛,就也开始相信确实存在贵族密谋,而且是政治性密谋,不是社会性密谋。一名议员在 7 月 24 日的家书中描绘了他所见到的情形,认为这是"加强奴隶制枷锁"的企图。④ 7 月 10 日,这名议员(是一名来自特鲁瓦[Troyes]的商人,政治温 40
和派)写道:"所有人都坚信,军队的推进隐藏着某种暴力图谋",他认为此图谋是"贵族们,用钢条统治着我们的人"的"可怕密谋"。⑤ 大臣内克

---

① Richard Cobb, "Quelques aspects de la mentalité révolutionnaire (avril 1793-thermidor an II)", in Cobb, *Terreur et subsistances, 1793 - 1795* (Paris, 1965), pp. 20—21.

② Georges Lefebvre, "Foules révolutionnaires", 重印于 Lefebvre, *E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nd ed. (Paris, 1963), pp. 371—392.

③ 综合叙述可参见 Steven L. Kaplan, *B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 2 vols. (The Hague, 1976)。

④ A. N. W 306, "Dossier de l'abbé de Champagne", 特鲁瓦管辖区的第三等级代表 Camusat de Belombre 写的关于 1789 年 6 月 24 日的信。

⑤ 同上。

尔因为被怀疑同情国民议会的请求而遭到解职，这进一步加深了老百姓与资产阶级对密谋的担忧。

密谋的修辞渗透到革命话语的各个政治层面，但首先是被用作激进派的标语口号。根据保守派的分析，邪恶的始作俑者不是密谋者，而是传统社会纽带被摧毁后脱缰逃逸出来的怪兽、恶棍、流氓和食人者。1792 年 1 月，《巴黎报》的编辑总结说，是"那些卑鄙的革新者"引领人民走上了歧途："宣传（propaganda）这个怪物在世上所有民族中都开始出现……她的侧腹已被剖开，成千上万条毒蛇幻化成了人形，而且这些毒蛇还遗传了其母亲——宣传这个怪物——的道德、品性和本事。"①

不久以后，密谋的修辞出现在了法国的各式政治话语之中。1791 年，右翼报纸揭发了新教徒和共济会的秘密计划、归咎于奥尔良公爵的密谋和其他欺骗人民的狡猾企图。② 但是，保守派最有影响的密谋叙述却是作于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他们对整个革命进程作解释，而不像激进派评论家那样只作每日评论。③ 为普通大众写的激进派小册子、激进
41 派报纸文章、公会上的雅各宾派演说和由激进派主导的革命法庭所作的

---

① *Gazette de Paris*, 1792 年 1 月 4 和 6 日，以及 4 月 15 日。

② W. J. Murray, "The Right-Wing Pre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 - 1792)", 博士论文,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1. 虽然 Murray 没有特别分析这个主题，但提供了许多颇有启示的例子。

③ 关于新教徒的密谋可参见 *Les Véritables auteurs de la Révolution de France de 1789*, 属于 Sourdat of Troyes (Neufchatel, 1797)；关于共济会的密谋可参见 Abbé Barruel, *Mémoires pour serve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 5 vols. (Hamburg, 1798)；综述可参见 Jacques Godechot, *The Counter-Revolution, Doctrine and Action, 1789 - 1804*, trans. by Salvator Attansio(New York, 1971)。

起诉书等等,都充斥着冗长细致的分析检查,针对的都是那些遭受批评责难之人的政治行为和言词。[①] 开始时只是因为担心价格操纵和贵族的秘密花招而做出的反应,后来就越来越系统,欲罢不能,并席卷了公共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密谋的指责往往既含糊又具体,这一点让当时的观察家(和自那以后的历史学家)很讶异。所有人,尤其是朋友,都可能是敌人。一旦在革命朋友中发现了叛徒,大家就会不遗余力地重新解读他之前的所作所为。例如,圣茹斯特在 1794 年春整理对丹东(Danton)及其朋友的指控时,觉得很有必要检查丹东自大革命以来所有做过的事和认识的每个人。如果叛国的将军迪穆里埃(Dumouriez)赞扬了丹东的朋友法布尔·方德(Fabre-Fond)——也是法布尔·代格朗蒂纳(Fabre d'Eglantine)的兄弟,那么,"是不是可以怀疑你们曾商议密谋推翻共和国呢?"[②]密谋的蛛丝马迹几乎随处可见,每次发现都要求重写历史。

密谋在革命修辞中的核心地位很难从历史的角度充分解释清楚。它不仅仅是对饥饿的传统忿恨或王室密谋的延续,也不仅仅是基督教认为处处隐匿着邪恶力量这一信条下形成的古老道德感受。[③] 所有这些

---

① 苏珊娜·德山(Suzanne Desan)借给我的"'Avec des plumes': Parisian Journalism in 1791-1792",(这是 1979 年 4 月普林斯顿大学未出版的四年级学生论文)注意到了激进派报纸、温和派报纸和保守派或反革命报纸在形式上的差异,我从中获益良多。另参见 Jack Richard Censer, "*Prelude to Power: The Parisian Radical Press, 1789-1791* (Baltimore, 1976)。

② "Rapport sur la conjuration ourdie pour obtenir un changement de dynastie; et contre Fabre d'Eglantine, Danton, Philippeaux, Lacroix et Camille Desmoulins", *Oeuvres complètes de Saint-Just*, 由 Charles Vellay 作导论与注释,2 vols. (Paris, 1908) 2: 305—332, 引文引自第 319 页。

③ 傅勒在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 78 页中提到了密谋理论形成中宗教情感的重要性。

因素共同促成了密谋的可信度和情感上的驱动力。但是,直到革命者面对群众性政治这一新鲜事物时,密谋才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沉迷。傅勒将这种情况描述成“权力的民主式想象”的两个面:他认为,“密谋与人民
42 的意愿一样,都是关于权力的极度狂想”。[1] 一面是民主,人民的意愿,大革命;另一面则是密谋,反原则,否定论。这种说法意图哲学化和必然化民主与密谋之间的联系。但同时期的美国经历却显示,这种联系并不是必然的,美利坚共和国并没有受到叛国密谋的暗中破坏。区别在于,在法国,所有党派政治都与密谋策划密不可分。

在很大程度上,18 世纪大西洋东西两岸受过教育的人都对党派政治持矛盾态度。似乎大家都担心幕后的政治活动、隐秘的策划和派系的分裂,但在法国却没有“辉格党的政治学”,没有交替执政的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没有赞助体系和利益团体。[2] 所以,从旧制度的压抑政体到看似可以毫无约束地参与其中的新政体,这种过渡显得特别突兀混乱。除了要解释由远在国外或就在国内的大臣发起的政变,法国人民还有许多需要自我解释的地方。除了要担心在王室效忠方面的变化和“国家”对民族政体的掌握上出现的轻微起伏,法国人民还有许多其他担忧。由于新颖的政治动员方式、当时社会敌对的紧张局势(已在有关饥荒密谋的讨论中举例说明过)、以及要成就世上全新事业的极力强调,再生的法兰西民族与假想敌之间的争斗尤其容易产生分裂。如果说美国人和英国人难以接受党派政治和派系竞争的出现,那么法国人就更加坚定地拒绝认可它们,而这种拒绝只会带来更多灾难。

---

① 傅勒,*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第 79 页。

② 美国的背景可参见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当美国共和党致力于发展党派政治和不同利益的代表时(尽管此过程断断续续),法国人民却发现,尽管他们有美好的意愿,但却否定了"自由"政治的可能性。[①]杰弗逊或曼迪逊和罗伯斯庇尔或圣茹斯特之间的社会、政治差异不大,但演说时的语境却明显不同。他们在成 43
长过程中学会了同样的修辞方式,阅读了许多同样的书籍,但当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或与他们相似的某个人走上国民公会的演说台时,言词与修辞却有了不同的意义。法国的政治演说家在两种语域上开始演讲:一种是政治的,一种是神性的。在缺乏共同的法律传统和共同认可的神圣参考文本的情况下,保证人民能一直听到民族的声音就显得至关重要。演说与命名的意义重大;它们成了意义的源泉。[②] J. R. 波尔(J. R. Pole)得出的结论是,在美国,书面形式的宪法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后的政治话语都必须围绕利益、财产、权利、代表、制衡等等来开展。[③]而在法国,却是演说中的言词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至少到 1794 年,可能一直延续到 1799 年),政治话语由透明、公开、警惕与恐怖等概念构成。

在 1790 年代的法国,派系政治是密谋的同义词,而"利益"就是背叛联盟国家的代名词。特殊事物(所有"利益"在定义上就是"特殊的")不能分割普遍意愿。要始终保持警惕,坚持政治公开,这样才能防止特殊利益与派系的出现。支持这种想法的后盾就是,革命者相信

---

① 关于美国方面可以参见 Pol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没有关于法国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发展的相似研究。

② 对于所说言词权力的强调可参见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和 Blanchard, *Saint-Just & Cie*。

③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p. 511.

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个人意愿与普遍意愿之间的“透明”是可能实现的，而且他们也是如此盼望的。①相应地，也就不存在任何人为的方式或习俗能使人们彼此分离，也没有任何机构能阻挡公民
44 与他们的代表自由交流。于是，透明使公民宣誓和革命节庆有了意义，他们都热情高涨，希望消除公民与公民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共同体实质上就意味着公民之间的透明，是又一个证实神话般现时的词语。

政治上，透明意味着不再需要政客，也不需要对情感或象征物的职业化操纵；每个公民心情平静，从容不迫，不受任何关系、资助或派别的蛮横影响。埃贝尔的《迪歇纳老爹报》就是一个鲁莽粗犷的无套裤汉版爱国者形象，心地纯洁，没有花招。它表达的都是最简单最明确的情绪，要么“狂喜”，要么“狂怒”。1791 年 9 月 1 日，《迪歇纳老爹报》针对即将举行的选举建议道：“公民们，假如你们不想被背叛，那么就要谨防表面现象。不要相信巧舌如簧……不要被美丽的许诺迷惑……如果你们认识某个胸无大志、无名小卒样的公民，那么他就是你们应该选择的人。”②

激进派议员的语言更精致，但同样重视真情实感，他们结合了演说

---

① 我借用了 Jean Starobinski, *Jean-Jacques Rousseau: La Transparence et l'obstacle* (Paris, 1957) 中“透明”的概念。傅勒在讨论人民和权力（或权力的代表）之间的关系时采用了此概念，但是他没有将此概念用于公民之间的关系上（例如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p. 86, 103）。根据 Marc Richir 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所有‘革命’想法都来自大革命‘时期’对社会透明的信念”。参见其为 J. G. Fichte, *Considérations destinées à rectifier les jugements du public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所作的序“Révolution et transparence sociale” (Paris, 1974), 第 10 页。

② Braesch, ed., *Le Père Duchesne*, no. 72, p. 751.

的雄辩和心灵的纯净与美德。罗伯斯庇尔认为,人民代表必备的美德中,最重要的是"心灵的雄辩,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说服他人"。① 动词frémir(意思是"颤抖,战栗")一再出现在国民公会的演讲中;演讲者的话直接说到了听众的心坎儿里(虽然很少是即席演讲!),他们希望当即就能激起听众的情感共鸣,②也就是希望在政治上实现卢梭所谓的"真诚",真诚是公民之间彼此透明的前提条件。③

真诚的政治就是公开的政治;每个公民和他选出的所有代表都公开 45
地当着其他公民的面商谈。真正的爱国者没什么需要隐瞒。无论是最贫贱居民区中的战斗派(militants)会议,还是国家选出的立法者会议,都必须公开进行。居民区俱乐部选出的"检察员"巡视会议大厅,以杜绝"私人谈话"。④ 无套裤汉将"公开"这一"人民的警卫"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与法律规定相反,巴黎几个区坚持要求在选举中采用口头、甚至欢呼的方式来投票。他们坚持认为,这是自由人投票的方式、共和派投票的方式。⑤ 政治公开了,人民才可能保持警惕。保持警惕是必要的,因为很难相信最近才新生、而且并未完全新生的人民能够维持政治的透明;一再发生的密谋就证实了这点。要保持警惕,绝对有效的做法就是告发。当然,旧制度下也出现过向警察告发的告密者,但在大革命时期,告发却被提升成了好的德行、公民的职责。

---

① Pierre Trahard, *La Sensibilité révolutionnaire* (*1789 - 1794*) (Paris, 1936), p. 189.

② 同上,第186页。参见F.-A. Aulard, *Les Orateurs de la Révolution*: *L'Assemblée Constituante* (Paris, 1905)。

③ Starobinski, *Jean-Jacques Rousseau*.

④ 例如,可参见"Réglement pour la Société populaire de la Section de la République",重印于Markov and Soboul, *Die Sansculotten*, 第258—267页。

⑤ Albert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 2nd ed. (Paris, 1962), pp. 549—561.

群众的警惕和告发在恐怖时期被制度化了。罗伯斯庇尔解释说:

> 在这种形势下,你们的政策要遵循这个首要原则:用理性指导人民,用恐怖对付人民的敌人……恐怖就是公正、果断、刚正不阿;就是美德的流露……用恐怖击垮自由的敌人,你们作为共和国的建设者,完全有理由这么做。革命的政府就是反对暴政的自由专政。①

恐怖政策对罗伯斯庇尔和其他激进派来说是美德的流露,因为这是为了保障新共和国的安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在逻辑上延续了革命
46 语言关于公开透明的预设。② 如果大革命的第一步是建立新共同体,那么罗伯斯庇尔所谓的"革命政府"就是公有主义(communitarian)准则——"反对暴政的自由专政"——的执行者。革命政府不是彼此冲突之利益(例如农业与商业)的仲裁者,而是确保个人意愿能融会成一种单一、全面或全国意愿的机制。

与 J. L. 塔尔蒙(J. L. Talmon)等学者的观点恰恰相反,恐怖时期的政府不是极权主义政府,不是一党制国家,而是没有任何政党的公有主

---

① 引自他的"Rapport sur les principes de morale politique qui doivent guider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dans l'administration intérieure de la République", 5 February 1794, in *Oeuvres* 10: 356—357。

② 对于傅勒来说,恐怖政策是革命话语及其"有关政治幻象"的逻辑结果(*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尤其在第 229—259 页)。Patrice Higonnet 的立场与傅勒接近,但与托克维尔的不同;他强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资产阶级普遍论"中公有主义那部分内容的固有矛盾(*Class, Ideology, and the Rights of Noble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81])。

义国家。① 革命修辞的原则不允许雅各宾派成为幕后的统治代理人,雅各宾派俱乐部也没有接管革命国家,他们或多或少地融入到国家当中,退而充当为政府政策仗义执言的董事会角色。② 因为雅各宾派比别人更乐于接受革命修辞,所以在罗伯斯庇尔垮台以后,他们并没有组织反对加诸自己身上的各种约束。事实上,一些法律约束反而受到了欢迎,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限制有助于打消"认为群众社团能成为人民与公会之间的协调力量……的幻想"。③ 雅各宾派面对日益增长的压制与迫害,经过几年合法组织的努力,终于在1799年末改变了立场。他们在印刷品中开始作为一个政党、一股忠实的反对力量为自己辩护。④ 但一个月之后,波拿巴终止了这种实验,以及其他许多实验。 47

虽然恐怖统治在逻辑上遵循了革命修辞的原则,但并不是这些原则唯一可能的结果。1795到1799年的大革命历史,甚至拿破仑崛起之后的历史都证实了这一点。督政府政体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对党派政治的抵制。虽然有些领袖努力组织中心政党,但大多数督政府的

①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Oxford, 1965). 傅勒在关于恐怖政策的判断上与塔尔蒙接近,但解释却不同。塔尔蒙强调极权主义的思想传统,即启蒙哲学的推论。傅勒(跟随托克维尔和Cochin)则强调民主在实践中被生成时产生的哲学问题。

② 在Crane Brinton, *The Jacobins: An Essay i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1930)中有许多颇具启发性的言论,例如,"当时,雅各宾派俱乐部不再对抗政府,不再是由会员完全主宰的机构,也就不再实施与其称号相关的策略了……可以说,这样的俱乐部最后就沦为一种辅助性行政实体了"(第129页)。

③ 议员Crassous,来自Isser Woloch, *Jacobin Legacy: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under the Directory* (Princeton, 1970),第15—16页中的引文。

④ 关于此问题的较详细讨论可参见Lynn Hunt, David Lansky, and Paul Hanson,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Republic in France, 1795-1799: The Road to Brumair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1 (1979): 734—759, 尤其是第755页。

支持者都害怕中心政党会让雅各宾派和/或保王党受益。结果,他们拒绝许可任何对抗性政党的形成,不管左翼还是右翼即将赢得选举,他们都宣布解散议会。但与此同时,督政官们又不能说服自己放弃频繁的选举,为自己组建一党制国家。①

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对所有有党派之嫌的政治活动进行压制也体现了对党派政治的矛盾心理。督政官和拿破仑"解决"革命修辞中相互矛盾部分的办法恰恰反映了这种修辞最初的强大力量。透明、公开和警惕的原则衰落了,但取而代之的也不是有原则地代表部分人利益的党派政治(尽管有些督政府派政客确实有这样的愿望);最初的革命原则被认为是无效的,甚至是危险的,被弃绝了,但又没有别的令人信服的修辞可以取而代之。督政府希望在没有原则,或只有已经衰落了的革命原则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其统治;督政府既不想成为保王党,又不想成为恐怖派,但也没有新的突破。拿破仑却相反,他宣称会坚持革命修辞的原则,但又宣布自己就是人民的声音。他认为,关于国民、魅力或社会中心的定位,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革命修辞的失败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天生自相矛盾。在政治上,它不允许党派政治活动;在展示修辞力量方面,它否定修辞性演讲的合法性。
48 要代表新共同体,它又倾向于(以公民之间的透明为名)抹杀代表性。而谈到神话现时时,革命修辞还得解释现时中只有密谋政治才会导致的失

① 关于此问题的较详细讨论可参见 Lynn Hunt, David Lansky, and Paul Hanson,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Republic in France, 1795 - 1799: The Road to Brumair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1 (1979): 734—759, 尤其是第 755 页。

败。简而言之，作为文本，它一直在减损着自己的权威基础。① 然而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也为许多现代革命、有关政治实践的概念和许多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政治意识形态打下了基础。

法国大革命的修辞突破了以往政治的限制，建立了一个新共同体（而不是复兴了某个先前更纯粹的共同体），并坚信这个新共同体一定能通过政治得到实现（而不是通过真实的宗教、回归过去的传统，或墨守一些以前就制订好的社会契约）。既然大革命没能直接促进自由政治的发展，那么它就只能以公有主义的规范来界定。然而，那些"狭隘术语"在另一方面却意义广泛；从此以后，政治就不再只关注大臣、高等法院、宪法、利益或政府，还关注社会关系的本质。② 政治不是表现利益冲突的竞技场，而是重建人类本性的工具，它使依附于他人的人成了公民，奴隶成了自由人，受压迫的人成了共和派。

虽然革命修辞的综合功效最终受到了阻碍，但是对建立全新共同体的信念还是超乎想象地取得了成果。尽管 1794 年和 1799 年的革命失败了，但是，一种不同的、人人平等的共和传统已经建立了起来，这种传统彻底重塑了法国政治辩论和社会斗争的术语。所以说，涂尔干的观点对革命修辞的运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洞察。新共同体遭遇的阵痛与挫折并没有使这一概念本身成为痴心妄想。或者可以借用托克维尔的说法： 49

---

① 这里所作的有关革命政治文本的分析可以与德里达有关写作的分析相比较，参见其 *Of Grammatology*, trans.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1976)，"表现的形而上"(metaphysics of presence)与写作暴力的威胁之间存在紧张，同神话现时（指共同体的透明性、演说的充分性）与密谋政治的暴力之间的紧张相同。在此意义上，革命修辞一直"解构"着自身，即假定可能存在没有政治的共同体，但同时又在各处创造政治。

② 在 Claude Lefort 所作的关于 Furet，"*Penser la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的评论中可以参见其他启示性文章，*AESC* 35 (1980)：334—352。

假如革命者是为了创建“想象的理想社会”而行动,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如此行动的结局一定是“想象的”。

不能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革命修辞:资本、利润、劳动力和阶级在革命修辞中都不是结构性原则。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界定的某个阶级的革命话语来解释革命修辞。但是,它可以被称之为一种“没有阶级之阶级斗争的语言”。法国大革命的修辞明显是反贵族的,它最初就是作为打击旧社会的工具而被发展起来的。事实上,新修辞最初的成就之一就是发明了“旧制度”这个言词。一旦法国社会在修辞上分裂成新国家和“旧”制度或前制度,革命就已经开始了。[①] 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形成两个分裂的绝对概念。

大革命的修辞可以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因为它表达了要与过去贵族主导的制度决裂的意愿。但是,革命者并没有以资本主义的名义进行革命,而且事实上,尤其是激进派,一直受到商业腐败的困扰。[②] 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愿望就隐含着对创新本身的新评价。革命就是要创新,自命的革命者不害怕被称为“卑鄙的创新者”。这种对创造新事物的执著可能使革命者并没有发现他们如何助长了法国国家权力的暗暗滋长,但创新的修辞并不因此而成为一种幻影。正如对共同体的信仰在法国开辟了平等主义和共和政治的传统,相信他们有着全新的经历这一点也使革命政治可能成为不断延续的传统。毕竟,马克思是从法国大革命这个例子中形成了可以通过革命重新构建社会的观念,但是,他没有体会到

---

① 此术语的发明可参见 Pierre Goubert, *The Ancien Régime: French Society 1600 - 1750*, trans. by Steve Cox(New York, 1974),尤其第一章。

② 在法国情境下拓展波科克的“权谋术时刻”应该会很有成果。

这种观念的根源有着怎样的讽刺与意义：政治创新与革命的修辞不是最 50
先进的工业社会——英国的产物，革命的语言反而是法语。

美国的革命修辞没有发展出革命传统，相反却形成了立宪制和自由政治。法国的不同在于，它一再强调要摒弃法国以往历史上的所有模式。我们可以想象在共和国学校教授历史的难度，一篇小学文章是这样表现这个问题的："当年轻人翻阅历史书或记录人类不幸的书籍时，总会碰到国王、大贵族、随处可见的受压迫的人们，和每页书上像牲口一样被计数的人们。"①共和派发现，能与以往的不幸历史相对抗的只有一些孤立的例子，如罗马共和国、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与他们的现时接近的例子，如瑞士和美国。它们中没有一个能像法国那样，走得那么远，面临如此多的阻碍。革命预言家卢梭的出现是个奇迹——他在轻浮、玩世不恭的世纪里独自发出了理性和自然的声音。然而，之前被压迫的历史只是为了要彰显革命成就的伟大意义。

正如拉·哈尔卜愤慨地指出，语言是大革命"首要的、最令人惊异的工具"。政治创新的修辞使革命成为"世上闻所未闻的丑闻"，因为它激励着革命者涉足未知的水域，寻求能够抵达再生之国家和有德行之民众的彼岸。革命者发明了新言词，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激烈政治变化的语境中，在寻求激烈政治变化的过程中演说了这些新言词，并以此赋予它们新的含义。是他们演说的劝服力量——是修辞，而不是言词——

---

① 来自 Louis Trenard, "Manuels scolaires au XVIIIe siècle et sous la Révolution", *Revue du Nord* (1973): 107 中的引文。也可参见 Jean-Rrançois Chassaing, "Les Manuels de l'enseignement primaire de la Révolution e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in Jean Morange and Jean-François Chassaing, *Le Mouvement de réforme de l'enseignement en France, 1760 - 1798* (Paris, 1974)，尤其是第 142—143 页。

和新世俗价值观的劝诫才使得大革命成为震撼世界的经历。传统的形
成自有它的道理，但是，像其他新意识形态一样，它再也不会与语言
51 无关。

第二章 革命实践的象征形式

攻占巴士底狱、瓦伦出走、马尔斯校场大屠杀、攻打杜伊勒里宫、推翻君主制、吉伦特派倒台、罗伯斯庇尔倒台、整肃保王党、整肃雅各宾派、拿破仑的崛起——这一连串大革命的转折点,党派的兴起与倒台,令人头晕目眩。每次事件都需要公告、演讲、报告,以及最后的节庆和节庆的修正。在这绵绵不绝的词语生产中可以找到许多不同的叙述,其中一份 1797 年的典型公告就是一个地方性范例。在这份材料中,伊泽尔省(Isère)的政府代理人(隶属于省行政部门的督政府特派员)发表了他就地方人民如何对待国家立法院新近采取的清算行动所作的官方评论。在清算行动中,许多被认定是保王党的议员遭到批捕,其他议员的选举也被宣告作废。

> 听说共和国与共和三年宪法战胜了保王党的阴谋分子,并躲过了企图进行破坏活动的愤怒暴徒,每个优良公民当然可以尽情表达喜悦之情。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们会因服装与意见的不同而彼此威胁和挑衅呢?因为公民对服装的不同选择而对他们进行侮辱、挑衅或威胁……是违反宪法宪章的。让品味和礼仪来决定你的穿着;千万不要放弃赏心悦目的简洁风格……抛弃集结标志和叛乱服饰吧,那是敌军的统一服装。① 52

① A. N., F[1c] III Isère 9, Correspondance, 1791 – 1853, "Adresse du Commissaire du pouvoir exécutif près l'administration centrale du département de l'Isère", 2e jour complémentaire an V.

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服饰与政治的联系在1797年爆发。政府代理人想警告人民不要过度关注服饰，但自己也不禁认识到了服饰的力量，最后只能警告那些穿着与保王党复兴相关的颜色与褶边衣服的人。

服装的问题既不新鲜也不仅限于格勒诺布尔。政治不只是口头表述、议员选举,或俱乐部、报纸和集会上的公开辩论。政治意义被密密地织进了各式象征性表述之中,言词只是其中拉·哈尔卜所谓的“首要工具”。不同的服装标示出不同的政治含义,颜色的不同、裤子的长短、鞋的款式,或者错戴了帽子,都有可能引起争吵、拳斗,乃至街头巷斗。在大革命时期,即使最普通的物品和风俗都成了政治象征物,可能引起政治和社会冲突。颜色、装饰品、衣服、餐具、钱币、历法和纸牌都成了某一派别的“集结标志”。[①] 这些象征物不是简单地表达政治立场,而是人们认识其政治立场的工具。通过彰显政治立场,人们才有可能或赞成,或反对,或漠不关心。于是,这些象征物构建了政治斗争的战场。

革命的修辞说,权力来自国民(或人民),却从来没说清楚国民的意愿如何在实践中得到承认。正如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在1796年所说,“法国大革命消除了细微差异……一股潮流使万物趋同”。[②] 在革命事件的一波波冲击下,很难确定某个政府是否正当合法。在这种形势下,“拥有”权力就意味着能够掌控新民族向外声明的说话方式和措辞,即使掌控的时间很短暂。俱乐部和集会中的演说者都尽力

---

① 关于政治化日常生活用品的综述可参见 Serge Bianchi,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de l'an II: Elites et peuple (1789 - 1799)* (Paris, 1982)。

② *De la force du gouvernement actuel de la France et de la necessité de s'y rallier* (1796), p. 10.

争取为国民说话的权利,但个人的声音很容易就被淹没,更持久的还是 53
那些更集体化、更易被复制的革命象征物与仪式,例如自由树和自由帽、代表自由与共和国的女性形象,以及像节庆、学校竞赛、选举和俱乐部会议等各种仪式性场景。仪式的形式同具体的政治内容一样重要。政治象征物和仪式不是权力的隐喻,而是获得权力的工具与目的。

权力的练习少不了象征性实践。没有不使用仪式或象征物的政府,即使它看上去既不神秘也不魔幻。① 治理国家不能没有故事、标识和象征物,因为它们能以各种非言说的方式来传达和确认这种治理的合法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合法性就是人民对标识和象征物的普遍认同。所以,革命运动要挑战传统政府的合法性,就必须向传统政府的象征物发出挑战,着手发明可以准确表达新秩序的理想与原则的政治象征物。

这种发明象征物的过程在法国大革命中尤其生动突出,因为革命者发现,在有机会思索所处形势之前,他们就已经身处革命当中了。法国人民的革命不是始于有组织的政党或连贯的运动,他们没有旗帜,只有一些简单的标语。他们是在革命的进程当中才发明了象征物和仪式的。革命者从贤哲那里得知,其他社会有各种象征物和仪式。但是以前的社会根本不值得仿效。罗伯斯庇尔说:"革命政府的理论,与建立革命政府的革命一样,都是全新的。我们没必要到政治作家的书本中去寻求

① Clifford Geertz, "Centers, Kings, and Charisma: Reflections on the Symbolics of Power", in Joseph Ben-David and Terry Nichols Clark, eds., *Culture and Its Creators: Essays in Honor of Edward Shils* (Chicago, 1977), pp. 150—171. 这些"思考"在 Geertz,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Princeton, 1980 年。译注:汉译本有赵丙祥译《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中有更全面的展开(虽然与欧洲的关联不多)。

什么理论，因为这些作家根本不能预见这次革命；也不要到暴君的法律中去寻找，因为他们只醉心于滥用权力，根本不会尽心实现合法公
54 正。”①荒谬的过去不具备任何指导意义。

然而，法国君主制曾经展示过象征的力量。托克维尔认为，波旁王朝不仅彻底限定了法国臣民的政治责任，还成功地将权力与君主制的象征性机构，尤其与君主本人相联系，权力的大小就取决于是否能接近国王本人。法国人民要重新获得作为公民的政治责任，为自己夺回权力，就必须消灭所有与君主制和国王身体有关的象征物。最后，他们采取了审判并当众处死国王的方式。就是因为波旁王朝非常重视象征统治的人或物，革命者才对其意义尤其敏感。

革命政治的修辞策源地也促进了象征形式的输入。由于对党派政治心存矛盾，所以新象征物和庆典仪式就成了发展政治态度最容易被接受的媒介。种植一棵自由树，或穿上表现新国家颜色的衣服不会代表任何“派系”。在象征领域里，政治冲突可以在不提政党或政客名字的情况下进行。所以，革命者对讽喻化、戏剧化和风格化的执著并不是古怪的失常，而是努力塑造自由人的基本要素。而且，从长远来看，象征形式让革命经验在政治心理上有了连续性。象征物和仪式为大革命提供了“长时段”(longue durée)，切切实实地向人们提醒着共和制和革命的世俗传统。

但是在有些方面，革命者只是在旧制度的政治实践上进行了简单的

① 来自他的“Rapport sur les principes du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25 December 1793, in *Oeuvres de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0* (Discours: 27 juillet 1793 – 27 juillet 1794) (Paris, 1967): 274。

拓展。托克维尔很早就观察到,革命者在打击君主制国家方面,并不如
在提高其官僚政治与行政权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高。君主制的现代化
梦想在共和政府下得到了实现。[1] 而且,在地方上,同国家部门一样,旧
制度与新制度之间也存在延续。例如,虽然市府官员由更多的公民选 55
出,但他们也得做会议记录,搞辩论,选择委员会,批准仪式,并全面管辖
地方生活。[2] 所有革命城市议会的会议记录与旧制度相同机构的一样,
语气都尽心尽责。

行政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也在激增,尽管革命者讨厌政客和政治花招。俱乐部、报纸、宣传册、海报、歌曲和舞蹈(所有这些"门外"政治利益的通常表现形式)在1789年至1794年间快速增长。然而,不管报纸与俱乐部相比于革命前增加了多少,它们并没有使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更加革命化;政府大厅外的政治性激增只是让法国看上去更像英国或新建立的美国。使法国人民不同,使他们在自己和观察家的眼里更像"新人类"的是他们的坚定信念:他们深信,就在当前,他们史无前例、独树一帜地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community)。

因为革命修辞坚持要与过去彻底了断,所以它质疑所有风俗、传统和生活方式。国家再生需要新人和新习惯,人民要在共和主义的模子里被重新锻造。因此,日常生活的所有犄角旮旯都要被检查,找出旧制度的腐化痕迹后彻底扫除,以做好迎接新制度的准备。修辞上拒绝政治的

① 参见最近出版的一本观点独特的书 Clive H. Church, *Revolution and Red Tape: The French Ministerial Bureaucracy, 1770 - 1850* (Oxford, 1981)。

② 有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市政府研究可参见 Christiane Derobert - Ratel, *Institutions et vie municipale à Aix - en - Provence sous la Révolution, 1789 - an VIII* (Aix - en - Provence, 1981)。

另一面就是积极地到处发展政治。[①]政治不是发生在限定的领域里，而是侵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化日常生活不仅是革命修辞的结果，也是自觉地否决党派政治的结果。通过政治化日常生活，大革命大幅度地提高了权力练习的可能性，而且增加了行使权力的方法与策略。[②] 通过拒绝特定的政治，革命者也为权力的表演开辟了意想不到的
56 新天地。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从一开始，参与者与观察者之类就察觉到了法国正在经历某种变革，他们通过象征物来体验并接受这些变革。多尔赛(Dorset)公爵在1789年7月16日写给伦敦英国政府的信中提到了"我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他还详细描述了人们所戴帽子上的缎带。[③] 7月22日他汇报道："我想，法国宪法与政府革命现在看来是圆满结束了。"因为最近国王被迫去了巴黎。在一次默许7月革命的象征性游行中，"他像一头温顺的熊，被议员和民兵趾高气扬地牵着"。[④] 这些象征性行为，如戴上爱国帽饰和"羞辱"国王进入巴黎的情景都是最清晰的革命变化标志牌；它们也是革命政治形成中最初犹豫不

---

① François Furet："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st cet ensemble de pratiques nouvelles qui surinvestit le politique de significations symboliques"（*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78], p. 73）对这种行动进行了颇有启示性的描述。但是，傅勒对那些"新实践"(pratiques nouvelles)本身却没有做很多分析。

② 关于这方面，福柯有关权力的分析比托克维尔的分析更富于成效，但福柯从来没有分析政治舞台上的权力。此章开发了一种可称作福柯式的分析方式，认为政治是为捍卫权力而被创造发明出来的新策略。我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这一过程的典型案例。福柯有关权力的定义可参见其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 An Introduction*(New York, 1978)，第94—95页。译注：汉译本有福柯著，张廷琛、林莉、范千红等译，《性史》(第一、二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

③ PRO, FO 27, 法国, 32, 1789年5-8月, 信 no. 39。

④ 同上，信 no. 42。

决的步伐。

第一批象征物一被发明出来,政治与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就立刻变得
明显了。帽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多尔赛公爵所说,第一批帽饰是
用绿缎带做的,但未被采用,因为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家的仆人制服
是绿色的,而这个伯爵臭名昭著。① 绿帽饰很快被红、白、蓝三色帽饰替
代。三色帽饰被广泛接受后,就呈现出了重要的政治意义。路易的生命 57
简直就取决于他是不是戴上这三色帽饰。关于“冒犯”三色帽饰的谣言
还促使许多妇女于 1789 年 10 月向凡尔赛进军。无疑,妇女们在向凡尔
赛进军时都明白她们是在保卫革命,但没有任何关于“革命”的演说能
像帽饰那样动员她们。当她们听说凡尔赛的士兵践踏了三色帽饰,并在
原来的地方换上了代表波旁王朝的白色帽饰或贵族反革命的黑色帽饰
时,她们就出发了。图 4 是一位佚名雕刻师绘制的当时冒犯的情景。一
篇关于“十月事件”的报纸文章就引用了这幅图,这也体现了象征物在
情绪调动上的重要性。当“象征法国自由的神圣标志”被践踏于脚下,
国民本身就被侮辱了。② 甚至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象征物就已经明确 58

---

① PRO, FO 27, 法国, 32, 1789 年 5-8 月, 信 no. 39(1789 年 7 月 16 日)。多尔赛认为,绿色被红色和白色取代是因为它们是奥尔良公爵的颜色。但是,大部分人则认为三色帽饰或花饰综合了王室和巴黎的代表颜色,可参见 Albert Mathiez, *Les Origines des cultes révolutionnaires, 1789 - 1792* (Paris, 1904), 第 30 页。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人们采用了这三种颜色,帽饰都是一个发明革命象征物的好例子。马修斯是这么描述的:“Le symbolisme révolutionnaire, qui s'est formé comme au hazard, sans idées préconçues et sans plan d'ensemble, avec une spontanéité remarquable, au cours des années 1789, 1790 et 1791, fut l'oeuvre commune de la bourgeoisie et du peuple.” (第 29 页)

② 引自 *Révolutions de Paris*, no. 13, vol. 1 中的文章, “Détails du 3 au 10 octobre 1789: Conjuration formée par les aristocrates contre notre liberté: Preuves et suite de cette conjuration.”(该文章所附的版画就是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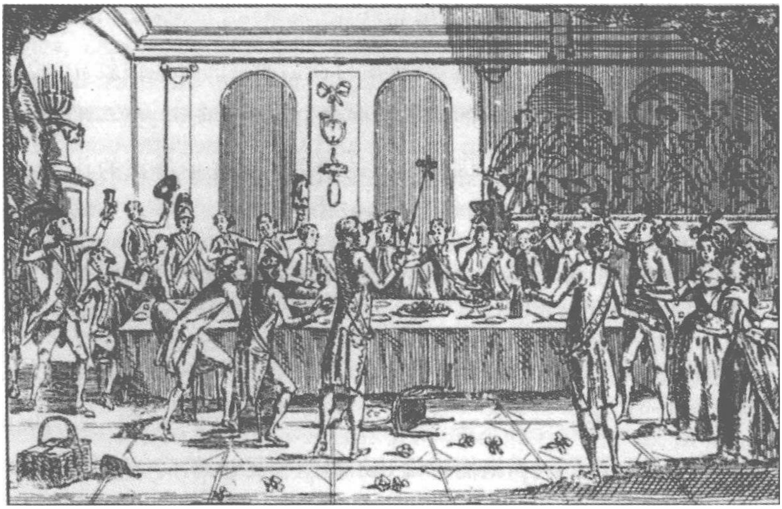


图4　1789年10月禁卫军在凡尔赛的狂欢

了敌对双方——如果他们还没有真正形成的话。

跟帽饰一样，自由帽、爱国神坛和自由树都出现在大革命的最初几个月。每个象征物的谱系不同，但都被广泛接受了。自从被发明并得到广泛传播以后，这些象征物就引发了各种竞争与对抗。例如，大革命的敌人拔出或任意破坏自由树，而地方政府又重新种植。权力的象征物不仅卷入到一时的政治斗争，还出现在官僚作风与民众热情之间更隐秘的紧张之中。官员们有时希望能找到最初发明某民众象征物的个人，然后控制该象征物。格雷古瓦写了一篇《关于自由树的历史与爱国主义散文》，在文中，他断言，第一棵自由树是1790年5月居住在普瓦图(Poitou)农村的教区牧师种的。但是，历史学家现在却发现第一批“树”其实是1790年冬天，居住在佩里格尔(Périgord)的农民在反抗当地地主的叛乱时所种植的五月花柱。柱子看上去像绞刑架，经常被用来悬挂恐

吓标语。被派去调查的牧师、贵族和国家特派员认为这些五月花柱是“侮辱的见证”、“反叛的象征”和“叛乱的纪念碑”。[①] 然而,不久以后,自由树就成了象征坚持革命的普遍象征物,到 1792 年 5 月,全法国已经种植了 60,000 棵自由树。[②]

一旦象征物通过广泛传播得到了普及,它们就被官方化了。1792 年 7 月 5 日以后,所有男子都必须戴上三色帽饰。而几天前,立法议会还请求各个公社(commune)建立爱国神坛来迎接新生儿。雅各宾派俱乐部和地方政府接管了种植自由树的任务,并将其变成了自己的一种庆典。禁止过度表现的法令也得到了通过。例如,在博韦(Beauvais),敌 59
人们会被拖到新种的树前,被迫表示效忠。官员们对此很头疼,[③]就在树周围竖起栅栏,划分出圣地,并规范进入圣地的行为。栅栏、法令以及将这些象征物纳入到官方典礼和节庆中,都是为了要规范新形式的民众权力。

这种规范行为的最重要表现就是节庆的制度化,正如鄂哲芙所做的生动描述。[④] 第一批“原始”节庆诞生于 1789 年末至 1790 年初那段忧虑、恐惧又开心的日子,只是一些简单、暂时的联合行动,或反对假想出来的阴谋策划,或推行新的革命象征,如种植自由树、强制大家戴帽饰和

---

① Mona Ozouf,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1789 - 1799* (Paris, 1976), pp. 280—290.

② 关于革命象征物的普遍传播可参见 Maurice Dommanget, “Le Symbolisme et le prosélytisme révolutionnaire à Beauvais et dans l'Oise”, *AHRF* 2 (1925): 131—150; 3 (1926): 47—58, 345—362; 4 (1927): 127—134; 5 (1928): 46—57, 442—456; 6 (1929): 372—391; 7 (1930): 41—53, 411—442。

③ 同上,3(1926)。

④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另参见 Michel Vovelle,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fête en Provence de 1750 à 1820* (Paris, 1976)。

对革命宣誓效忠等等。1790 年的联盟节就是规范举措的第一步。在典礼上,穿制服的人被有意安排在中心位置。正午时分,法国所有士兵、国家卫兵和官员都宣誓,承诺保护人民和财产,保证粮食的自由流通和税款的缴纳。[①] 普通老百姓聚集在典礼周围,观看三色帽饰、爱国神坛和其他自由标志如何通过他们的使用在新的国家仪式上被神化(见图 2)。最初,是人民的热情赋予了象征物意义;现在,官方的典礼对它们进行了规范。这样,人民的贡献立刻得到了承认,并在部分地区传播开来。

随着节庆越来越复杂精巧,一批比较隐晦的象征物也加入了进来。有些是从圣经或天主教教义中获得的灵感,但更多的则来自古代或共济会,自然得不到良好的"民众"共鸣,例如象征平等的共济会水平仪、象征联合的罗马权威束棒、标志公民美德的罗马和高卢的月桂、象征警惕的埃及人的眼睛,和一群不仅代表自由还象征理性、自然、胜利、情感、怜
60 悯、慈善等的女神[②]。长长的行进队伍挥舞着教化的旗帜,去参观那些能启迪民智的讽喻型"分站"。革命的新再现形式取代了天主教圣人;新制度下的官员和盛大庆典的主持人代替了教堂和教区的牧师。[③]

革命制度下的官员们极力规范民众的政治庆典,正如 17 世纪末反对宗教改革的教会尽力规范民众的宗教庆典一样。官员们将民众的象征物融入到有组织的节庆和典礼当中,同时也为民众设计了其他象征

---

① Anon., *Description de la Fête du Pacte fédératif, du 14 juillet, fixée par la ville, avec le réglement de la police* (Paris, n. d.).

② 革命图像的充分阐述可参见 Jules Renouvier, *Histoire de l'art pendant la Révolution considéré principalement dans les estampes* (Paris, 1863);还可参见 Dommanget, " Le Symbolisme"。

③ David Lloyd Dowd, *Pageant - Master of the Republic: Jacques - Louis David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Lincoln, Neb., 1948).

物。其中,自由女神最广为人知,也最成功。其实在1792年自由女神被选为共和国印章的图案(见图5;在第3章会更具体地讨论这个选择)之前,法国人民就已经从肖像画中认识了自由女神。1775年,莫洛 61



图5 1792年共和国印章

(Moreau)绘制了一幅自由女神像,这是一位身穿罗马式样服装的年轻女子,手拿一根长矛,长矛上顶着一顶自由帽。[1] 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女神最早出现在一枚为纪念1789年7月新成立的巴黎市政府而设计的勋章上。1792年11月,自由女神的形象得到了擢升,但在此之前,她的重要性却一直被其他法国"守护神"的形象所掩盖,如墨丘利(Mercury)、密涅瓦(Minerva)和其他代表巴黎市的女性形象,她们都被印在

① Renouvier, *Histoire de l'art*, p.401.

1791 年新发行的王室钱币的背面。[①]等到法国大革命末期，她的形象就与共和国紧密相关了。在集体记忆中，共和女神（*La République*）就是“玛丽安娜”，这个名字最初是革命的敌人为嘲笑自由女神——共和女神——而取的，但不久就成了一种满怀感情的亲密昵称，她的形象也频繁出现在以后建立的共和政体中。[②]

1792 年印章上的自由女神泰然自若，很难让人联想到革命“日子”里民众运动的疯狂暴力。就像一位反宗教改革的圣贤，她表现了新秩序梦寐以求的美德：以更规范更普适的崇拜方式来超越地方主义、迷信与特殊主义。自由是基于理性的抽象品质，她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特定地区。她与 1790 年激进派所谴责的“荒谬习俗、粗野俗套话、荒唐幼稚的礼节和被教士篡夺的权利”完全相反。[③] 然而，当自由女神得到官方承认和广泛传播后，她也为广大民众所用。革命政治实践运动，像其他反宗教改革的运动一样，不是单方面被规范的。[④]

著名的“理性节”就很好地体现了象征物的这种顺应性，尤其是自
62 由女神的顺应性。根据激进派巴黎市政府的决定，原本定于 1793 年 11

---

① Michel Hennin, *Histoire numisma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 vols. (Paris, 1826) 1: 32—33.

② Maurice Agulhon, *Marianne au combat: L'Imagerie et la symbolique républicaines de 1789 à 1880* (Paris, 1979).

③ 根据 1790 年联盟节的一个观察员所说，这些都是用来描述加冕礼庆典的词语（“cette fête bizarre [sic] instiuée à l'avènement au trône”）(Anon., *Description fidèle de tout ce qui a précédé, accompagné et suivi la cérémonie de la 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u 14 juillet 1790* [Paris, n. d.])。

④ 这里所作的关于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比较是基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篇博士论文 Keith Phillip Luria, “Territories of Grace: Seventeenth-Century Religious Change in the Diocese of Grenoble”, 1982。

月10日以自由的名义举行的节庆被改为"理性的胜利"。最初决定在以前的王宫举行,但为了能更加明确对天主教的攻击而改在圣母院举行。节庆既有精英的主题也有人民的关注,因为巴黎公社或市政府认为,自己能够调和公会议员的激进看法与巴黎底层阶级更切实的关注之间的矛盾。① 一座"山"被安置在以前是天主教堂的圣母院中央,象征着公会中的左翼。山上的神庙流光溢彩,上面镌刻着"献给贤哲"(A la philosophes)的题铭。神庙入口处还排列着贤哲的半身像。一个组织者注意到:

> 这次庆典与希腊、拉丁的虚伪仪式毫无相像之处;它直接触及人们的灵魂。乐器不像教堂里的蛇那样嘶叫。共和国的乐队在山脚下演奏着共同的语言(en langue vulgaire),人们都能理解演唱的曲调,因为它表达了自然真理,而不是神秘、异想天开的阿谀奉承。②

两队年轻女子身穿白裙,头戴月桂花环,手举火炬从山上款款走下,然后再折回,又袅袅走上山去。然后,"由一名美丽女子装扮的"自由女神从神庙里漫步走出,坐在绿色植物装饰的王座上,接受在场共和人士的宣誓效忠(见图6)。

---

① 参见 F. -A. Aulard, *Le Culte de la Raison et le culte de l'Etre Suprême (1793-1794)* (Paris, 1892)的分析。另外参见 M. J. Guillaume, ed.,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è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2 (3 juillet 1793-30 brumaire an II [20 novembre 1793]) (Paris, 1894): 803—806。

② 根据 Guillaume (n. 26),有关节庆的唯一最好的描述是一名叫 Momoro 的省行政人员,也是节庆的组织者之一所作的 *Révolutions de Paris*。引文来自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2:805。



图6 1793年11月理性节

节庆中最令人意外的发明就是由一名活生生的女性装扮成自由女神。三天前，当市政府投票决定变更庆典地点时，人们脑中想的还是平常所用
63 的塑像："自由女神像要竖立在'前圣母像'的地方。"[①]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但在许多外省城镇，这种仪式被一再模仿。[②] 让真人来扮演自由女神（或理性女神、自然女神或胜利女神——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很多地方，甚至在巴黎，对于参与者或组织者来说都不甚明了），[③]是出于对透明的再现形式的向往，因为这是一种接近本质的再现形式，不

---

① 公社的决定在 *Feuilledu salut public* 中有报道，引文来自 *Procès - 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2，第803—804页。

② 各省的理性节是非基督教化运动的顶点。理性节常伴随着中止牧师职务、允许牧师结婚、焚烧宗教书籍和法器，简而言之，就是在力图建立新的公民迷信崇拜的同时自觉地对天主教进行攻击。在 Aulard, *Le Culte de la Raison*，第112—194页中有具体详细的描述。

③ Ozouf,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pp. 116—117.

会引起像原来那种对虚假形象的盲目狂热的崇拜。一份报纸如此评论：

> 人们从最开始就希望改掉偶像崇拜的习惯；我们避免用毫无生气的自由女神来取代圣餐，因为普通老百姓可能会误解， 64
> 最终只是石头神取代了面包神……而这个活生生的女子，尽管有着迷人的魅力，但绝不会像石像一样被无知的人奉为神。
>
> 我们应该不厌其烦地告诫人民：自由、理性和真理都只是抽象的存在，不是神，准确地说，就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1]

自由女神应该看起来像个普通女子，而不是供人迷信的圣像。但是，几乎各个地方选出的自由女神都像嘉年华女王——是村里或居民区里最漂亮的女子。人们在那天也确实将她奉为女王。因此，激进派希望压制所有偶像的教育初衷却被民众的节庆仪式挪用并颠覆了。国民公会在节庆中没有承担角色，至少官方上没有。所以节庆结束后，参与者行进到国民公会，邀请议员参加重演。在巴黎地方政府的指引下，人民上演了自己的戏剧。

这种不久以后被称作理性节的节庆，展现了象征性权力领域中的复杂性。国民公会、巴黎市政府、地方战斗派和普通的巴黎民众都有着各自的利益与期盼。国民公会引介罗马的自由女神来取代法国的国王，成为政府及其正当性的核心象征。议员们企盼一种抽象的、与法国君主制的过去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共鸣的象征。巴黎市政府在节庆时寻求的则是能够挑战天主教地位的方式；自由女神是世俗的，容易让人联想到理性（两者在图像上都由女性形象来再现），所以能够与天主教

---

① *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 no. 215 (23—30 brumaire an II), vol. 17.

的核心女性形象——圣母玛丽亚抗衡。参加节庆的老百姓却将抽象、世俗的女神转化成了真人版的嘉年华女王，就像传统民众宗教仪式上的女王。然而，人民只能通过戏剧装饰、芭蕾舞演员的参与和戏剧音乐来塑
65 造真人版女神。① 人民将自由塑造成他们自己的女神，但却发现她只是个演员，扮演着教化他们的角色。

并不只有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才会使用象征物来进行政治斗争，拓展政治立场。1799 年 5 月，图卢兹市行政官员写信给巴黎的公安大臣，抱怨当地由黑圣母神像引发的示威游行。黑色的木制圣母神像（Notre-Dame-la-Noire）几个世纪以来在当地的宗教庆典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在 1785 年，市理事会还在一次求雨的公共游行中供奉了她。1799 年，这座神像被找到，供奉在当地的教堂里："她募捐到了大笔钱，牧师使用的荒谬祝福也有所更新；每个人都想拥有触碰过玛多娜的东西，比如一块手帕、一枚戒指或是一本书。"行政官员非常气愤，因为"在启蒙世纪末，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公社，那些可悲的狂热主义又死灰复燃，这都要归咎于这个无知迷信的时代"。几天后，神像被焚毁。②

除了传统的宗教象征，革命创新的敌人还复兴了民众的嘉年华活动。四旬斋之前，地方共同体组织了一些游行、巡游和舞蹈，这些庆祝活动往往失控，发展成为喧闹、甚至暴力的对地方政府的挑战。在这些节

---

① Judith Schlanger, "La Répresentation du bien", 重印于 Schlanger, *L'Enjeu et le débat* (Paris, 1979), 尤其在第 123—127 页。

② A. M., Toulouse, 2D4, "Correspondance de l'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共和七年牧月 7 日的一封信。关于塑像的历史可参见 Abbé Degert "Origine de la Vierge noire de la Daurad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u Midi de la France*, no. 31 (1903): 355—358。

庆上，戴面具和穿女人衣服的现象很普通。1794 年之后，“反恐怖”队的成员经常用这种方式掩盖身份，躲避当局。1797 年 1 月，波尔多的吉伦特派省行政机构通过一项法令，禁止使用化装或面具，尤其不能非法穿着“异性服装”。督政府特派员解释了制定这一法令的必要性：

> 在面具的掩饰下，复仇者胆大妄为地伸出了匕首；在面具的掩
> 饰下，邪恶之徒侮辱虐待他们认定的敌人而免受责罚；在面具的掩
> 饰下，小偷和恶棍轻易地抢夺他们觊觎的他人财物；在面具的掩饰 66
> 下，有人轻率地投身于给家庭带来毁灭荒芜的放纵游戏之中。①

官方认为，面具和化装即使没有真正导致，至少也助长了几乎所有人类共知的政治和道德恶行。

这种对革命的象征性抵制根植于传统的民众文化之中。在 16 和 17 世纪，地方民众使用嘉年华面具和地方圣贤来保卫其集体的身份认同，抵挡主张改革的主教和野心勃勃的地方贵族的入侵。在旧制度末期，这种战斗不再激烈了，但法国大革命却复兴了这种战斗，并注入了新的政治内容。在一些愤懑的当地人看来，革命思想家和共和派贵族只是从旧制度的主教和地主那里接管了政权而已。相反，坚定的共和派却认为，嘉年华面具和黑圣母像代表的就是大革命极力想克服的王权、狂热、无知和迷信，也就是法国所有应受指摘的过去。黑圣母像侮辱了自由女神；嘉年华面具遮盖了透明的公民的脸。

---

① A. N., F^7 3677^9, Police générale, Gironde, “Arrêté de l’administration centrale du département de la Gironde, qui prohibe les Masques et les Travestissements: Séance du 21 nivôse an V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une et indivisible.”

共和派明白，这些有关象征物的斗争远不"只是"象征性的，所以他们会经常拿起象征理性主义复仇的粗短棍。1796 年，图卢兹市坚定的共和派行政机构请求批准他们购买一座教堂来存储粮食；同年，他们又想将以前天主教的加尔默罗圣母会教堂（Carmelite convent）改造为植物博物馆；1798 年，他们还请求将修道院改造为粮食市场。[①] 不难想象，一些人特意明目张胆地去拜访当地的黑圣母像，就是为了要反对这些非基督教化的措施。共和派经常对这些象征性冲突激起的敌意感到迷惑不
67 解。例如，一个图卢兹行政官员被指责是"恐怖派"，他辩解说，"我总是基于最柔和的仁善来表达我的观点，"还引用卢梭、伏尔泰和爱尔维修（Hervétius）作为其"道德原则"的根源。[②] 其实就是这些原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与天主教会象征物和旧制度象征物之间的斗争。

革命者只有成功教化了民众才有希望赢得"象征的"战役。政治教育中必要的强化课程就是要教会人民如何区分现时共和派的自由女神和过去王权制的黑圣母。因此，共和派政治实践的基本就是教化，要教会人民如何解读革命的新象征文本。当然，教育要从孩子开始。真正的共和派新一代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全国性的、非宗教的公共教育系统才能得以实现。正如 1793 年罗姆（Romme）在报告中所说："宪法赋予了国家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存在；公共教育则赋予国家道德性和知识性的存在。"[③]

---

① A. N., C400 (no. 290), 402 (no. 327), 432 (no. 175).

② 这是 Jacques Vaysse 写给当地右翼报纸的一封信，*L'Anti-Terroriste*, *2 messidor an III*（1795 年 6 月 20 日）。

③ *Rapport sur l'instruction publique considérée dans son ensembel*, *suivi d'un projet de décret... présentés à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au nom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par G. Romme* (Paris, 1793).

因此,法国大革命中的各个议会都提出了重新构建各级教育的宏伟计划。天主教会对教育的控制权被打破,基础教育不论社会背景向所有孩子开放。学校"校长"被非宗教的、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学督(instituteur,字面含义是"建立新价值观的人")取代。① 虽然大部分计划由于时间仓促和经济窘迫被搁置,平等和免费入学的更激进观念在1795年之后也被放弃,但还是出版了许多教导手册和"共和教义问答",并分发给新式学校的教师。② 理论上来说,学生们除了要学习法语语法、读写一点自然历史和以 68
前的共和政体实例,还要学习《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共和国的领土分界、共和诗篇和赞美诗,以及共和政府的原则。但是,那些负责监督教育的地方行政官员却发现,教师人手不够,准备不足,而且还缺乏对新秩序的热情。③

无论如何,共和派不能只等待新一代的成长,他们还要努力改造成人。最重要的"雅各宾派学校"就是1792至1794年的军队。④ 国民公会派遣议员深入到每支正在战场上的队伍,监督士兵和军官遵守共和国纪

---

① 关于基础教育的立法,最好的概要可参见 Maurice Gontard, *L'Enseignement primaire en France de la Révolution à la loi Guizot(1789 - 1833)*(Lyon, 1959),第79—188页。

② 关于问答教学法的普遍讨论,可参见 Jean Morange and Jean-François Chassaing, *Le Mouvement de réforme de l'enseignement en France, 1760 - 1798* 中的 Jean-François Chassaing, "Les Manuels de l'enseignement primaire de la Révolution et l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Paris,1974), pp. 97—184;另可参见 Emmet Kennedy,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Catechisms: Ruptures and Continuities with Classical, Christian, and Enlightenment Moralities",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9(1981): 353—362。

③ 关于教育现状,可参见 G. Chianéa, "L'Enseignement primaire à Grenoble sous la Révolution", *Cahiers d'histoire* 17(1972): 121—160。关于法国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一种更肯定的观点可参见 Emmet Kennedy and Marie-Laurence Netter, "Les Ecoles primaires sous le Directoire", *AHRF* 53(1981): 3—38。

④ Jean-Paul Bertaud, *La Révolution armée: Les Soldats-Citoyens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79), pp. 194—229.

律。他们逮捕叛徒,设立革命讲坛,分发公告、演说、宣言、教义,甚至报纸。政府出资订购了5000份雅各宾派报纸《自由人报》(*Journal des hommes libres*),而且9个月里向军队直接运送了100万份《迪歇纳老爹报》。宣传攻势最高峰的时候,国民公会一天之内就往军队运送了3万份报纸。① 而且,还专门为军队策划了凯旋节,许多公民节庆也有大量军人参加。一名中尉给军事部官员写信,请求运送更多的报纸,从信中可以
69 清楚地看到这种改造成人的努力:"士兵们心地善良,但需要启蒙。"②

甚至革命官员也必须接受教育,以适应新角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国家政府开始了没完没了的信息公告,具体介绍官僚的职责和原则。国家政府要求各省办事处提供定期报告,各省又要求市办事处提供报告。定期统一的信息收集确保了政府能及时了解民众观点,与此同时又提醒其办事处和下级部门要保持忠诚。这种举措的精神可从旺代省的督政府特派员写的一封信中窥见一斑。这封信是写给旺代省某市级行政机构特派员的,提醒他们要每十天(décade,根据新革命历法,是"每十天"的意思)提供一份地方形势的"分析报告"。他抱怨许多人缺乏热忱,并坚持认为,"我有权利要求你们提供井井有条的精确叙述、有理有据的结论和新的观点,尤其要求准确"。为了鼓励他们,他还随信寄了几份印刷的表格,表格上是空白的柱状空间,以备填入每项问题。他的结论是:官员的热忱(他在信中多次用到该词语)是"完善政治机器"的关键。③

---

① Marc Martin, *Les Origines de la presse militaire en Franc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sous la Révolution(1770-1799)* (Paris, 1975), pp.149—227.

② 中尉特别要求了《迪歇纳老爹报》和《马拉之灵》(*L'Ombre de Marat*)(Arthur Chuquet, *Lettres de 1793* [Paris, 1911], pp.162—163)。

③ A. N., F^{1c} III Vendée 7, Correspondance et divers, 1789-1815, 日期为共和六年牧月28日的信。

实行全民教育、在军队中宣传以及执行官僚日常事务等等,都是为了拓展权力而采取的策略。这些策略通过将官员和普通公民纳入到共和制国家里,有效地"完善政治机器"。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这般野心勃勃的政治规范行为。1792年9月宣告共和后,共和派官员发现,几乎到处都可能发生民族振兴力量与反革命密谋之间的斗争。报纸、军装、政府表格和学校课本,如同帽饰和自由树一样,都可以是政治象征物。现在,甚至空间、时间和重量的测量单位也被列入考虑范围。所有人都要使用相同的语言、相同的重量及其他测量单位,并将旧硬币上交。而且,一个致力于建立新公制系统的专门委员会也成立了,公会还颁布了新的历法。七日为一周的历法被取消,开始使用十日一旬,每 70
月有三旬。"陋俗时代"的命名被取消,改用能够反映自然与理性的名称来称呼月份和日子,例如,让人联想到春天的嫩芽和鲜花的 Germinal(芽月),Floréal(花月)和 Prairial(牧月,从3月末到6月末)、无需借助圣贤之名就能理性地表明日期次序的 Primidi(第一日)和 duodi(第二日)。[①] 在图卢兹,市府官员竟然与钟表匠签约,要将市政厅的钟改为"十进制"。[②] 甚至钟也能见证法国大革命。

大革命时期的政府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在1792年后激进派掌权时尤其明显。巴黎的议会(1792-1795,国民公会)组建了中央政府,并

---

① 简要叙述可参见 Bianchi,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de l'an II*, 第198—203页。革命历法开始于9月22日(共和八年和九年的9月23日),月份名称是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穑月、热月和果月,多出来的5天(每个月有30天)被称为"补充日",并于共和二年被称作"无套裤汉日"。

② M. J. de Rey-Pailhade, "Etude historique sur l'emploi du calendrier républicain et sur le temps décimal à Toulous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Toulouse* 27 (1908): 429—457.

希望威权能够自中央政府传达到各省，最终到各市。然而，尽管国民公会通过法律法令重新组建了教育、军队和政府机关，但是，权术却并不是简单地从上至下传递到巴黎以下及以外的地方。正如某些革命象征物来自民众的实践，一些政治再教育的伎俩同样也来自地方。1789 年，甚至在巴黎的议员想到重新组建官僚政治之前，地方政府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官僚程序。① 有些省的地方行政在国民公会同意其计划之前就已经在重新组织公共教育。② 而且，这些地方政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都仰赖于当地民众的“热忱”。

在大革命的大部分时期，尤其是 1792 年和 1793 年，政治动员基本
71 上都发生在常规的、官方的政府渠道之外。俱乐部、民众社团和报纸主动承担了为共和主义事业改造地方人民的责任，包括改造地方军事要塞部队。妇女俱乐部、工匠和店主行会也明确投身于共和主义的自我促进运动中。例如一个由工匠和店主组成的“爱国主义协会”于 1790 年在波尔多成立，因为“既然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员，那么新秩序就可以号召任何人来参加公共行政管理”。协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讨论国民议会的法令和阅读报纸期刊来教育所有人民承担可能的责任。③

简言之，革命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因为领袖为自身利益操纵民主意识

---

① Lynn Hunt, *Revolution and Urban Politics in Provincial France: Troyes and Reims, 1786 - 1790* (Stanford, 1978), pp. 81—82.

② 例如，热尔省在 1793 年 11 月就通过了在小学设置教导课程的具体法令（G. Brégail, *L'Instruction publique dans le Gers pendant la période révolutionnaired* [Auch, 1899], pp. 3—6）。

③ Pierre Bécamps, "La Société patriotique de Bordeaux (1790 - 1792)", *Actes du 82e Congrès-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Bordeaux. 1957* (Paris, 1958), pp. 255—283, esp. p. 257.

形态和官僚实践才得到了扩张;当不同阶层的人民发明并学会了新政治的"微观技术",权力在每个层面才得到了扩展。[①] 做记录、旁听俱乐部会议、阅读共和主义诗篇、佩戴帽饰、缝制旗帜、演唱歌曲、填写表格、进行爱国主义捐赠、选举官员等等,所有这些行为汇聚在一起,共同催生了共和主义公民和合法政府。在革命形势下,这些普通行为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所以,权力不是某个派系所拥有的一个确定量,而是一个由各种创造了意外资源的活动与关系组成的综合体。革命队伍取得的意外胜利,只是在发现新的社会和政治能量过程中产生的最璀璨的果实而已。

虽然革命政治实践增长了权术策略,但同样存在困扰革命修辞的紧张,最主要的就是对透明的信念和必要的教化之间的紧张。如果人民意 72
愿的真实性与公正性不言自喻、刻骨铭心,那么,为了由美德来主宰一切,只要将人民的意愿说出来就可以。所以,政治机制即使不是完全不相干,那也只是次要的,至少在理论上应该如此。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美德是单纯、谦逊、贫穷,常常无知,有时粗糙;它们是不幸者的品性,人民的世袭财产"。[②] 心灵如果透明,美德就会闪光。如果人人都有好德行,有德行的共和国几乎就会自然生成。只有腐化的社会才需要政治;政治的存在就是社会败坏的标志。那么,革命实践就是要将人民的意愿从过去的镣铐中解放出来。

---

① 参见福柯的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New York, 1979。译注:汉译本有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135—194 页。政治权力的微观技术可以譬之于福柯的"数以百计的小型惩罚剧场"(第 113 页),除了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这些技术不仅具有监禁性,还具有潜在的解放性。

② *Oeuvres 10*: 278.

然而革命经验却显示,无知和迷信并不容易克服。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承认:“我们用双手托举起仍遭受着专制主义炙烤的自由神庙。”[1]大革命接近尾声时,德·斯蒂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总结说:“共和主义在启蒙思想为其铺好道路之前就来到了法国。”[2]结果,革命者必须坚信自己具备在短期之内重新建构社会和个人的能力。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启动了浩大的学究式力量,政治化了日常生活中所有可能的方方面面。教化铺平了道路,透明才能实现。

透明与教化之间的紧张可以从苦心经营权力象征物这一点上看出。民众“发明”的象征物,例如帽饰与自由树,因为体现了人民的声音,所以必须被纳入象征物的整套体系。但同时官员们又极力规范这些民众形式,并将他们自己的象征物(例如共和国的女性代表——自由女神)强加给人民,以此进一步教育人民去了解他们的权利与职责。但是,政府规范只有承诺恢复人民的声音、恢复自然和理性的价值观才具备合法
73 性。教化是否正当,取决于是否透明。

有时,透明与教化之间的紧张也会表现在言词与意象,即语言再现形式和视觉再现形式之间的相对关系上。共和派领袖赋予了言词,尤其是篇幅较长的散文特殊的意义。农民可能在五月花柱上悬挂恐吓标语,城市里贫穷的雇工和日间工人也能理解威胁粮食商人的粗简布告。但共和派领袖却对言词有着更多的希冀;言词是自由的标志和保证,同时也是通过阐述进行规范的一种方式。自发的民众节庆不需要公告,但每

---

① 来自 Alfred Cobban, “The Political Ideas of Robespierre, 1792 - 5”,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 1968), 第 192 页的引文。

② *Des Circonstances actuelles qui peuvent terminer la Révolution et des principes qui doivent fonder la République en France*, ed. by John Viénot(Paris, 1906), p. 33.

次有组织的巴黎节庆都准备了印好的节目单、识别性旗帜和刻着文字的意象。朱迪斯·西朗泽尔(Judith Schlanger)将这种行为称为"政治教育的话语构建":"这种题字证实,语言文字的阐明功效(l'explicitation)强于视觉再现形式的含义展示。"①

语言解释很重要,因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性架构需要不断阐述说明。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生来就不断变化;神话现时总是在更新。每几个月就有一批新象征和新意象,而"旧"意象也经历了频繁的修正。在大革命的流动政治形势下,对意象与象征物的解读出现了越来越多"正常"的不确定因素,结果,语言文本似乎比附录更加不可或缺。演说、旗帜和题字指引着参与者与参观者的注意方向,压制不需要的阅读,诱导"正确的"阅读。②而且,演说与文本还确保了革命经验的延续。尽管政权几经易手(见第5和第6章),象征物也多有变化,但阐释的原则却保持不变。

没什么比革命服装更能清晰地展现透明与教化之间的紧张。从革 74
命一开始,服饰就有了政治意义。例如,当1789年5月4日三级会议伴随着庆典游行召开时,许多观察者惊讶地发现,王室要求不同阶层的人穿不同的服装:第三等级的代表穿阴暗的黑色,贵族们则戴金色饰带,穿白色长筒袜,围蕾丝领巾,帽子上还插着精致的白色羽毛。③ 参观者约翰·摩尔(John Moore)评论说,着装的不同不仅激怒了第三等级,还引发了政治服饰的革命:"不久以后,在棕色、磨光绒毛的大衣外披一件小

---

① "Le Peuple au front gravé", in *L'Enjeu et le débat*, pp. 163—164.

② 关于言词与意象的关系可参见 Roland Barthes, "Rhetoric of the Image", in his *Image, Music, Text*, trans. by Stephen Heath(New York, 1977), 第32—51页。

③ *Costume de Cérémonie de Messieurs les Députés des trois Ordres aux Etats-généraux*(Paris, 1789).

小的黑色斗篷成了受人尊敬的装扮；后来，斗篷被搁置到了一边，……简朴、甚至破旧的着装……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表现。”①

1789 年之后的最初几年，革命者强调要消除讨厌的服饰差异。宗教服饰被取缔，城镇军官唯一被允许的服饰标记就是三色围巾。② 同时，一些个人装饰物可能暗示着装人是否支持大革命；帽饰的颜色，甚至帽饰的材料（羊毛比丝绸少一些虚饰）也都有了意义。1792 年之后，着装方面越来越重视社会平等。一些激进的政客开始穿短夹克和长裤，甚至穿上了无套裤汉和城市老百姓阶层穿的木屐，③巴黎一些区域的战斗派也经常佩戴红色的弗里吉亚便帽或自由帽（当然是羊毛制的）。但大多数资产阶级领袖鄙夷这种装束，还是穿着马裤和褶皱衬衫。

1794 年 5 月，对着装的关注达到了高潮，公共安全委员会向艺术家
75 议员大卫请教如何改进民族服饰，如何使民族服饰更适合共和及革命的特点。大卫认为，要通过服饰来确保外观上的平等，消除政治差异的表述，最合理的办法就是设计一套全国性的公民制服。④ 委员会非常喜欢他的设计，订制了 20,000 份设计版画的复本，分发到全国公共官员的手

① *A View of the Causes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 vols. (London, 1795) 1: 150.

② 在 1790 年的 10 月和 11 月、1791 年的 3 月和 1792 年的 8 月都提到过宗教服饰。市政官员佩戴围巾这一项是在 1790 年 3 月 20 日颁布的。参见 Yves-Claude Jourdain, *Table générale alphabétique des matières continues dans les décrets rendus par les assemblées nationals de France, depuis 1789, jusqu'au 18 brumaire an 8* (Paris, an X)。

③ Jennifer Harris, "The Red Cap of Liberty: A Study of Dress Worn by French Revolutionary Partisans, 1789 – 1794",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4 (1981): 283—312.

④ 同上，第 299 页。A. N., AF II 66,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Esprit public, Dossier 489: "Arts, Caricatures, Costume national, 1793 – an III", piece no. 15, 由 Barère, Collot d'Herbois, Prieur, Carnot, Billaud-Varenne, and Robespierre 签署。

中。珍妮弗·哈瑞斯(Jennifer Harris)在最近关于革命服装的研究中下结论说:大卫设计的公民服饰有历史、戏剧和同时期的灵感源头。短短的、敞开式的束腰上衣搭配贴身的长筒袜,让人联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尚;斗篷则让人想起了古典服饰。[①]

大卫的设计中,比折衷主义和古典主义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明显回避了无套裤汉的着装。如果所有人都要看起来一样,那也应该是以一种恰当的、高尚的方式看起来一样。如果要消除差别,那也应该是向上看齐,而不是向下。大卫的设计没有表现出对平等的激进冲动,只表达了资产阶级要将古典主义进行到底的幻想。实践上很明显,只有资产阶级精英才有钱穿那样的衣服,而且事实上,大卫设计的服饰从来就没有被生产过。但是,委员会的请求和大卫的回应不只具有逸闻的意义,它们还表现了当时对共和派外观的要求。服装,作为外观的表现形式,是界定革命实践的重要方面。

寻找合适的革命服饰包含了革命政治中的所有矛盾。大卫设计公民服饰的意义不仅在于他设计的服饰与无套裤汉的服装截然不同,还在于它是一项更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就是为军事、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设计不同的服饰。同时,每种官员服饰的版画都被预订了 6000 份复本。[②]虽然大卫设计的官员服饰看上去近似公民服饰,但区别还是很明显,例如,法官和立法官穿长及脚踝的斗篷。[③] 要使人们能够辨识 76
出他们的代表,代表的服饰就要体现出不同与区分。大卫的方案受到相

① Harris, "The Red Cap", p. 307.

② A. N., AF II 66, piece no. 19.

③ Harris, "The Red Cap", p. 307.

互矛盾的两股力量的影响。一方面,议员或人民的代表应该只是人民的透明反映,要像人民,因为代表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每个人应该穿着一种能够消除差别、新的、全国性的统一服装。但另一方面,很显然,代表们是他者,是不同的,事实上并不像人民,因为代表们是教师、统治者、人民的向导。相应地,官员制服就应该有区分,便于辨识。

罗伯斯庇尔倒台、恐怖政策结束后,推广公民服饰的想法慢慢消退,但立法议员还没有放弃制订官员服装的计划。1794 年 10 月重新组建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同意支付雕刻师德侬(Denon)复制大卫设计图的报酬;他复制了总共将近 30,000 份的设计图,得到了约 20,000 法郎的报酬。[①] 国民公会最后的行动之一就是通过了为新成立的督政府制定官员服装的法律:为两个立法院、督政官、大臣、国家信使、法庭坚守官、司法官、和平仲裁官和省市级行政人员设计服饰(1795 年 10 月 25 日)。[②]

1795 年制定的这条有关官员服饰的法律基本上依据了 1795 年 9 月 14 日格雷古瓦所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制定官员服装的最明确原则:"符号语言有其自身的说服力。不同的服饰就是这样,因为它们能

---

① A. N., AF II 66, pieces nos. 40—50.

② 议员 Boissier 在会议一开始就请公共指导委员会展示了他们设计的服饰,但这种服饰却被当场否决,因为看上去像雅各宾派的服饰。Chénier 称,目前的服饰不行:"Les tableaux ou les statues ne supporteront jamais la mesquinerie de notre habit actuel, et le retreci de nos draperies. C'est cette forme de nos habits qui a rendu presque inéxécutable le beau tableau du Serment du Jeu de Paume." Chénier 的观点反映了很多有关服饰的想法;议员们觉得有必要穿得像伟大人物一般,而唯一可能的做法就是穿着古时的服饰。得知这种观点之后,国民公会就投票决定采纳格雷古瓦的设计方案。*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26:165* (共和四年雾月 12 日[1795 年 11 月 3 日])。

激起与客体相似的想法与情感，尤其当它们凭借自身的生动逼真来左右人们的想象时更是如此。”[①]服装不是化装或面具，而是增强感知自然真理的一种手段。“公共官员的服装就是要告诉公民：穿这身衣服的人是法律人……自由民族不需要偶像，但在每件事上都需要秩序、良好的风俗和公正；自由民族在尊重尊敬立法议员、执法官，即自己的劳动成果（ouvrage）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尊自重。”[②]公共官员的服装要实现两个相关目的：通过区分公共官员与其他人民来描绘特定的政治区域，并在此过程中致力于建立更高的政治规范，也就是格雷古瓦所说的对立法议员的尊敬。让人民知道有人代表他们，并鼓励他们尊重尊敬这些虽然与自己不同但源自自己意愿的代表。 77

在1795年的报告中，格雷古瓦想避免的是使人联想到恐怖统治的“过度”民主：

> 服装的好处不仅在于以某种方式区分了立法议员，而且毫无疑问，也会给法国带来活力：从现在起，会议场所就不再混乱了，走廊被封，就避免了人员走进走出的干扰；会议可能不像以前那样频繁，持续时间也会更短……三年之内催生了15,000条法令的旋风般事件与激情都将被驱散。到时候，我们就能节省出更多仅次于真理与美德的宝贵时间。所有会议都将内容充实，立法议员凭着庄重的风度与体面的服装，让人回想起国家的威严。[③]

---

① *Du Costume des fonctionnaires publics: Rapport fait par Grégoir (Séance du 28 fructidor an III).*

② 同上。

③ 同上。

格雷古瓦的这份报告透露出议员们对那些看似琐碎如官服般的事物寄予了怎样的希冀(见图7)。通过服装来确定立法议员的身份,可以清晰地区分代表与被代表者、国民代表与国民。那些现在坐在楼座,却想象自己也能平等说话的人再也不可能干扰会议了,因为他们现在的穿着与
78 议员席上的议员不一样了。换句话说,官员服饰实现了政治区分,维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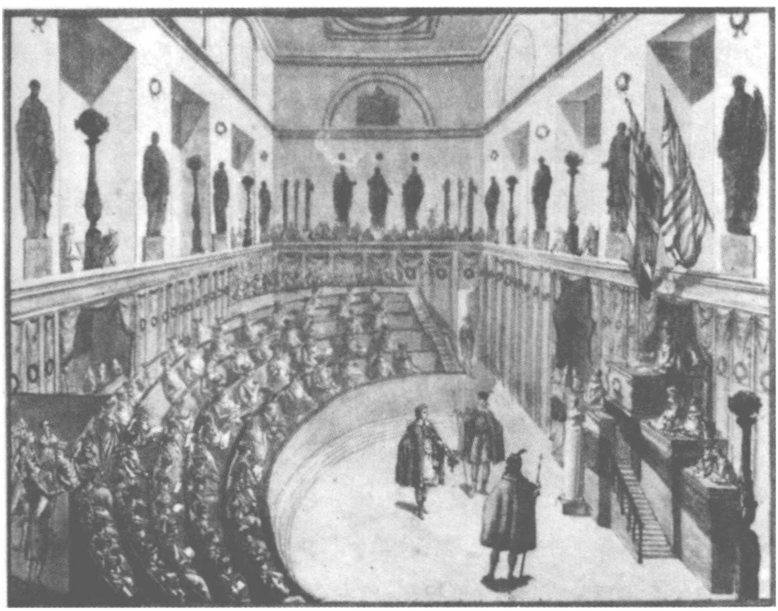


图7 1798-1799年元老院议会会议

了政治秩序。议员们在讨论斗篷与帽子的问题时,已经在形成政治、再现和等级的概念了。

官服继续困扰了议员们几年。格雷古瓦在报告中建议穿戴不同颜色的长袍和天鹅绒帽子(见图8)。红色、白色和蓝色毫无疑问是主要颜



图 8　1798－1799 年政府官员的服装

色，所有布料也应产自法国。1797 年 11 月，立法院认识到格雷古瓦的建议难以实现，就将此任务简化，规定所有议员的穿戴都一样："国民蓝色"的"法国"大衣、三色腰带、鲜红色的希腊式（a la grecque）斗篷和三色羽饰的天鹅绒帽子。[①] 尽管在运送上有困难，但所有议员还是在来年的 2 月都穿上了官服。[②] 公众并没有如格雷古瓦所希望的那样热情接受 79

① A. N., C 519 (no. 194). "Extrait du procès-verbal des séances du Conseil des Cinq-Cents", 29 brumaire an VI.

② 这批斗篷在里昂被误当作英国的走私品，被没收！（A. N., C 521 [no. 225], "Résolutions du Conseil des Cinq-Cents approuvées par le Conseil des Anciens", 27 nivôse an VI）

官服。《教练员报》(*Moniteur*)观察到,“这么多的红色衣服让眼睛感到极度疲劳;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服饰确实优美、威严、有参议员的风范”。然而,编辑又警告说,只有坚持定期穿着才能消除可能出现的讽刺意味。① 一个到巴黎参观的外国人发现立法院的服装“高贵优雅;但是,它与日常的穿着相差甚远,看上去有点像戏服……这个缺陷使它,至少在现在,很难实现严格意义上的体面和真正的威严”。②

80 督政府统治时期(1795－1799),尽管立法院对公民统一服饰的想法已经不抱指望了,但对公民着装的关注却没有消失。如何着装一直以来都是个人自由(1793 年 10 月 29 日国民公会宣布,着装是一种权利),但是直到 1798 年 12 月,五百人院还在讨论是否要惩罚那些不戴国民帽饰的人,及是否要禁止外国人戴这种帽饰。③ 在立法院之外,“集结的标志”还是像以前一样可能会引起派系分裂。1798 年一本配插图的题为《政治漫画》(*Caricatures politiques*)的小册子描绘了共和派中五种“阶层”的人。④ 这些阶层是按照他们不同的原则、旗帜和格言,即他们的政治来区分的。但是,通过日常服装或服饰、“风格”或生活举止更容易辨别他们。

“独立人”明显是真正的共和党人,“受过良好教育,能成就伟业”。他们外表上看上去骄傲高贵,举止自信,服装整洁,通常穿戴着制作精良的白色亚麻布的贴身裤子、及踝靴子、晨服和圆帽(见图 9)。相反,“排

---

① *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29*: 158(3 ventôse an VI [1798 年 2 月 21 日]).

② Henri Meister, *Souvenirs de mon dernier voyage à Paris* (*1795*)(Paris, 1910), p. 106.

③ 共和七年霜月 15 日(1798 年 12 月 5 日)和共和七年雪月 7 日(1798 年 12 月 27 日)的 *Moniteur* 中有相关报道。

④ 签名为 Beauvert, 共和六年。



图9 “独立人”

外分子”的脾性却粗鲁、“可疑”、烦躁（见图10）；眼睛不适应阳光，所以更愿意呆在黑暗中（这是一个不太精到的比喻，指他们不够开化的本性）；通常不关注头发，衣服有时很脏，穿短外套和普通羊毛制的裤子，鞋子用皮绳束住，戴古怪的帽子，多数时候都抽着短短的陶制烟斗，所以常常带着难闻的口气。“排外分子”是无套裤汉的战斗领袖。

人们可以通过穿着来辨别优秀的共和党人。合适的穿着是美德的标志，整体穿着能展现一个人的政治特征。真正的共和党人服饰是可以预见的，而“背叛者（les achetés）”却从来没有自己的特色外观，“恪守制



图 10 “排外分子”

度者”每两周更换一次衣服,“肥猫”(暴发户,les enrichis)则穿着只要是闪光奢华就能让他们愉悦的服饰。这种以穿着来分类的巧妙发挥是典
81 型的督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关注。罗伯斯庇尔倒台后,政治区分变得越来越复杂,结果,要弄清共和派的外表就越来越敏感微妙。即使在共和派内部也有五种阶层。

公民和官员的服饰成为关注的焦点,是因为服装是一种政治符号。在旧制度下,不同等级、职业与行业就是根据服装来确定身份的,

贵族、教士、法官,甚至共济会会员都是如此。革命者想打破讨厌的社会区分系统,但又相信服装能展现一个人的某些特征。服装,在政治上可以说是透明的,因为可以从一个人的穿着来分辨他或她的政治特征。这种观点发展到极致就引导人们去寻找一种合适的公民统一服饰。如果每个阶级或群体中的人都有相同的美德,那就没有理由进行 82
服装的社会或政治区分了。所有真正的共和党人看上去都应该彼此相似。

但另一方面,共和党人也认识到,新国家要实现真正的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要在共和主义的模子里被重新锻造。这样看来,服装就不是性格的反映,而是重塑性格的方式。穿着全国性的公民制服能加深公民的民族观念,实现全民共和,就像说法语而不说方言会让他们更有民族观念和公民精神一样。红色官服能让立法议员的举止更显庄重严肃,最终使政治程序本身成功地具备共和主义特色。服装可以衡量一个人,更可以塑造一个人。

对平等的迷惑使共和党人越发不确定服装的政治意义了。督政府 83
的政客们明白,他们必须毫不妥协地直面此问题,因为他们想避免以前政权中他们所认为的过激行为。因此,《政治漫画》的作者还是明确区分了优秀的共和党人("独立人")与真诚鲁莽的无套裤汉们("排他分子")。在这种区分中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的社会成分:优秀的共和党人穿得像精英资产阶级一般,没有旧制度下贵族们的矫饰造作。甚至在恐怖统治时期,国民公会的议员们也担心服装与个人行为标准的退化。格雷古瓦为雅各宾派政府说话,指责说:"那种污秽的言谈,连妇女都会被其道德败坏所吓倒……语言、品味和道德的败坏是真正的反革命……只有体面周到(soigne)的语言才能配得上共和党人高尚灵敏的情感(senti-

ments exquis)。"①在这段话里,他还可以将语言替换成服装。如果下层阶级还有希望的话,那就是要学会跟上比他们更优秀的人;比他们更优秀的人是不愿意自降身份的。

关于平等,最让他们困惑的不是社会平等,而是政治平等。即使有,也只有极少数雅各宾派领袖会相信所有人都应该或可能实现社会平等;很少有人会想看上去像无套裤汉。雅各宾派像卢梭一样,相信极端的不平等很危险,但他们没想到,政府可以不用去改善所有的不平等。更紧迫的问题是民主,尤其是如何处理人民及其代表的关系。甚至督政府也相信,人民应该通过频繁选举来参与政府政务;代表们就是格雷古瓦所谓的人民的选举成果。但人民与代表之间有界限吗?随着大革命的推进,似乎没有出现任何界限。源源不断的请愿书、信件和演说使人民的要求都得到了议员们的注意。1789 年 10 月,国民议会迁到巴黎,议员们发现自己必须与巴黎人民面对面交流,因为巴黎人民希望能在立法院里叙述他们的好恶。
84 1793 年 5 月中旬,国民公会搬到杜伊勒里宫观景厅(Salle de Spectacle),使听众参与的可能性更高。即便如此,罗伯斯庇尔也不满意;他建议国民公会建一个能容纳 12,000 名观众的会议场所,因为只有这样,普通民众的意愿、理性的声音和公共的利益才能被听见。②要确确实实地对待民众的参与。

经历了 1793 年至 1794 年的广泛民主之后,共和三年(1795)新宪法

① *Rapport sur les inscriptions des monuments publics, par le citoyen Grégoire* (*séance du 22 nivôse an 2*).

② Joseph Butw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Theatrum Mundi*", *research Studies* 43 (1975): 141—152,尤其是第 144—145 页.

的撰写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限制观众的数量和作用。① 罗伯斯庇尔的继任者认为,应该在人民及其代表之间更加清楚地划清界线。如果要保证政治生活的稳定,就要更加清晰地绘制政治会场的界线。格雷古瓦称,官员服装可以"以某种方式"区分议员,消除可能干扰立法会议进行的"不稳定现象"。官员服装的合理不是因为它重新确立了社会等级,而是因为它鼓励适当的共和主义(政治)尊重。立法议员、法官、行政人员和部队军官不一定在社会意义上更优秀,至少在理论上并非如此,但政治意义却不同。议员们希望官员服饰可以固定政治符号体系,消除政治阐释中一再出现的不确定现象。官员服饰可以明确国家的声音。

服饰并没有像议员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成为新的政治习惯,鲜红的官服也没能阻挡拿破仑的崛起,相反,是一些穿红色长袍的人将波拿巴引进了权力的走廊。共和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状态,不是一种时尚潮流。然而,由于这些古怪夸张的努力,共和党人学会了一套重要持久的真理。共和主义的学徒期即使不需要新服饰,也确实需要新习惯和新风俗。如果没有政治场所的界线、对立法议员的尊重和受过政治教育的人民,共和主义就难以幸存。罗伯斯庇尔倒台后,共和主义仍旧幸存,督政 85
府的政治实践与历时长久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也非常接近,这些都证明,1790 年代的共和党人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家。他们的红色官服没有流行,许多黑圣母像反而得到了保留,但是,玛丽安娜、政治宴会、红

① 尽管议会会议向公众开放,但观众的人数不能超过议员的一半(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discourse préliminaire pronouncé par Boissy-D'Anglas,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s Onze, dans la séance du 5 Messidor an III[Niort, n. d.], pp. 93—94)。

帽子、三色旗和“自由、平等、博爱”都成了反抗和论争的标准曲目中的一部分。当时,谁又能预测什么会延续,什么会消退呢?只有在当时的混战和共和派的政治忙乱中,共和主义的象征物和仪式才得到了尝试与测试,最终被选定。没有它们,共和主义的集体记忆和革命传统都将不
86 复存在。

第三章 激进主义的意象

所有政治威权都需要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文化架构"或"主导性虚构"(master fiction)来界定自身并声明自己的主张。政治威权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能与更全球化、甚至更宇宙化的文化预设形成共鸣,因为政治生活也被"包容"在关于现实如何糅合的普遍概念之中。① 而且,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坚持认为,每个文化架构都有一个神圣的"核心"。② 这个神圣核心有助于社会和政治定位,让社会成员认清自身的地位。它是事物的中心,文化、社会和政治汇聚的所在地。

旧制度下的法国政治威权非常吻合这种模式:在君主制下,国王是神圣核心,牢固支撑其威权的文化架构就是由来已久的天主教等级秩序的观念。③ 在宏大的生命链中,国王立于凡夫俗子与基督教上帝之间,

① Clifford Geertz, "Centers, Kings, and Charisma: Reflections on the Symbolics of Power", in Joseph Ben-David and Terry Nichols Clark eds., *Culture and its Creators: essays in Honor of Edward Shils* (Chicago, 1977), pp. 150—171.

② 同上,以及 Edward Shils, *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Chicago, 1975)。

③ 我并没有暗示说旧制度的文化架构是静止不动的,它确实也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例如,可参见 Ernst H.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Princeton,1957)。Kantorowicz 展现了国王实体对于君主制文化架构的核心重要性;它是大部分"政治"讨论的焦点。

国王的威权神秘、类似于神。直到1792年1月,一份保守派报纸还这么解释:"上帝的全能之手轻抚过王位底座,开始了其所创生命链条的第一
87 环,将环绕于我们头顶的千万星球与我们连绵起伏的地球紧紧相连;国王之父权犹如上帝之父权。"①1789年之前,这种威权的文化架构看似永恒不朽,被认为是"传统",其合理性根本无需自觉、特意的论证。事实上,除了重复上演的加冕仪式和入场典礼之外,大部分内容都没有受过这种论证。

在法国大革命向旧制度的政治威权发出挑战的同时,也向文化架构提出了质疑。热忱的共和党人最终激情高涨地迎接了政治挑战,但对文化挑战却不确定。这种反传统会将他们引向哪里?激进派反对传统的威权模式,揭露旧制度下"主导性虚构"中的虚构性,并将其展现于自己及所有观望者的面前,但在此过程中却在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空间里产生了可怕的真空。他们拒绝承认国王的魅力,否定传统威权架构的核心。之前提到的那份保守派报纸的编辑称:"为了让人民忘记这个神圣的世系……他们否定上帝获地球人敬仰、国王受臣民赞颂,以及父亲受孩子们尊敬的权利。"②

哪里才是社会的新核心,如何表现这个新核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核心,一个并不神圣的核心?这个新的民主国家能不能被安置在某种制度或再现形式之中呢?通过提出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法国大革命就不仅仅是又一个政治如何被文化塑造的例子。大革命的经验首次显示,政治由文化塑造,新政治威权需要一个新的"主导性虚构",而且

---

① *Gazette de Paris*, 1792年1月6日。

② 同上。

最重要的是,社会成员可以为自己创造文化和政治。法国革命者不只是寻找另一个威权的再现形式或国王的替代品,而是开始质疑再现这一行为本身。

不过,再现危机也是逐渐才浮出水面的。在令人兴奋的1789 - 88
1790年,只要举办节庆和共同宣誓就够了。新共同体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开始行动,创造并再创造了自己的神圣出场,并证实新国家足以抗衡君主制国家。随着君主制作为一种制度越来越受到质疑,大多数革命者都同意废除旧制度的象征物,尽管关于如何公开和明确这种废除还存在争议。在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宣誓就职的会议上,一个议员认为根本不需要官方来宣告废除王权:"我既不考虑国王也不考虑王权;我只关心自己的使命(建立一个新政府),根本不去想这种制度(王权制)*可能存在过*。"①无需官方来宣告废除王权,因为这种制度已经成为了过去。

为了反对这种观点,格雷古瓦议员(图11)表达了一个几乎一致同意的看法:旧制度可能已经消失,但是,能让人们回想起旧制度的所有具体事物都要从民众的意识中连根拔除,"当然,我们没人会提议要在法国保留腐朽的王室家族……但我们必须向自由的朋友们郑重承诺:有必要破坏'国王'这个词,因为它还有麻痹人民的魔力。因此,我要求通过严正的法律来正式地、神圣地*废除王权*"。② 在一次赞同格雷古瓦提议的自发性示威后,国民公会通过了一个为记录这次示威而设计的新印章。这个新的国家官印上,替代国王头像的是"一个斜靠的女子,

①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1st ser., 52: 81 (斜体为林·亨特所作)。

② 同上。



图 11 亨利·格雷古瓦像

一只手放在权威束棒上,另一只手拿着长矛,矛上顶着自由帽,还有'法兰西共和国档案'的题字"。① 不久以后,这个印章(图 5)就成了所有公
89 共行政机关的印章,国民公会命令今后所有公共决议都要以法国共和国元年纪年。两周后,议员们通过法令,将王权印章、节杖和王冠毁为碎

① 直到9月26日《教练员报》(*Montieur*)才提到关于印章的决定,当时它只报道说"sceau de l'état portera un faisceau surmonté du bonnet de la liberté",并没有提到女性形象(*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14,1792 年 9 月 26 日)。*procès-verbal* 中提供的叙述与《高等法院档案》(*Archives Parlementaires*)中的一样,两者都未提到印章中出现的方向舵。另外可参见 Maurice Agulhon 在 *Marianne au combat*: *L'Imagerie et la symbolique républicaines de 1789 à 1880*(Paris,1979),第 29 页中的叙述。

片，运到造币厂，熔化后铸成共和国的硬币。旧文化架构的标志物就这样被转化成了新文化架构的材料。

有关废除王权的辩论将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问题摆上了桌面，那就是如何看待政治生活中的象征物和意象（imagery）。在之后的几年里，国家印章成了再现危机的晴雨表。一旦王权及其象征物被废除，有 90
什么能取代它们的位置呢？如果有的话，符号或徽章是不是共和政府的必需呢？在最初关于印章的讨论之后又过了三年多，无处不在的格雷古瓦在一份递交给五百人院的报告中又提出了这个已经被提过的"奇怪问题"："共和国是否需要印章？最初，他们告诉我们，印章只是为了弥补无知或写作上的不完善才被采用。"①最激进的观点认为，一个能获得印刷品、能公开谈论的民族是不需要图标的。一个作家断言："洛克和贡迪拉克（Condillac）的形而上学原则会普及，人民会习惯在塑像中只看到石头，在意象中只看到画布和颜料。"②一旦一个国家从迷信的象征和意象中被解放出来，它就不需要创造新的象征和意象了。

事实上，很少有人会持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立场，1796 年格雷古瓦的回答更普遍。他主张，所有文明人都认为，要赋予公众行为"权威性，就需要一个符号或一个标志"。实质上，国家只能通过某种公共象征物的再现才能得到确认。格雷古瓦认为，使用国家印章是理性的做法，因为印章比签名更容易被辨认、更长久，也更难被伪造。印章更凸显威权

---

① Corps législative, *Rapport fait au Conseil des Cinq-Ents, sur les sceaux de la République, par Grégoire: Séance du 11 pluviôse an IV* (1796 年 1 月 31 日)。

② E. H. Gombrich, "The Dream of Reason: Symbolism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ritish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 (1979): 190 中的引文，该引文来自 *Annales Patriotiques* 中的一篇文章。

的公共性，因为它代表了比个人签名更普遍的意义。确实，格雷古瓦也承认，“纹章学中荒谬的象形文字现在只会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心而已”。共和国的印章不能像贵族与王室的徽章那样迷信晦涩，但并不意味着要完全舍弃象征物。

> 要重新建构一个新政府，就有必要共和化所有事物。立法议员如果忽视了象征物的重要性，就无法成功完成使命；他不能让任何能抓住感觉、唤醒共和主义观念的机会溜走。不久，
> 91 眼前不断重现的事物就会触及灵魂。原则、事实以及不断提醒公民其权利与职责的象征物结合在一起，以一种话语的方式形成了共和主义的铸模，该铸模将赋予公民国民的特征和自由人的举止外表。①

这里，格雷古瓦对贡迪拉克的心理学做了自己的阐释。他认为，正确选择的符号和象征物可以通过“抓住感觉”和渗透灵魂的方式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那么，印章就不仅是公共威权的再现形式，也是教育的工具，是“共和主义铸模”的元素之一。作为新文化架构的一部分，新象征物能够塑造新人。

但是，格雷古瓦对印章的勇敢维护也不是没有不确定的地方。格雷古瓦在 1796 年作此长篇报告，是因为议员们又要重新考虑印章的选择了。1792 年 9 月的决定几乎完全出于偶然，提议的印章最初是为国民公会的档案准备的。当时，议员们还不清楚对新政治威权的向往会将他们

① *Rapport... sur les sceaux... 11 pluviôse an IV.*

引向何处。1796 年,已经历经了三年的“共和主义铸模”实验,印章还是没得到重视。虽然有格雷古瓦的努力,这种状态还是持续到了拿破仑的出现。尽管大部分议员都赞成徽章是必要的,但应该是什么样的徽章,他们没能达成长期的一致意见。政治威权的结构及其文化再现还是不确定。

对印章选择的争论反映出革命者很重视他们的核心象征物。印章从来没有被明确固定过,因为革命本身一直在变化。在革命的三个主要转折点,有关印章的争论尤其激烈:1792 年 9 月最初建立共和国时期、大恐怖时期(1793 年夏—1794 年夏)和更温和的新立法系统宣誓就职后不久的 1795 年末至 1796 年初。可以以两种方式来解读有关印章的争论:将其看作探究政治冲突的指示器,或作为更全面了解再现作用的戏剧性舞台。这两方面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正如政治威权不可能与文化架构完全分离。有关威权符号的争论对符号和象征物本身的功效表示了怀疑, 92
每次关于符号和象征物的决定都会产生各自的、有时是无意的政治结果。

1792 年 9 月,王权制被废除,共和国宣告成立,选择新徽章似乎顺理成章。档案学家提议在新徽章上使用自由女神像。在关于印章讨论的叙述文字中没有提到过任何反对这一提议的意见,对于这种几乎完全一致的反应,阿格宏在其“女性公民隐喻”的研究中提出了几点原因:按图像学的传统,大部分品质,尤其是政府的不同原则,甚至君主制,都是由女性形象来表现的;女神的弗里吉亚便帽或自由帽与象征国王威权的王冠明显不同(女性形象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不同);天主教教义让法国人更易接受玛丽安娜的形象(玛丽安娜这个别名在语义学上接近耶稣的母亲玛丽);而且法国共和派发现,女性比喻中的形象与在革命过程中从英

雄变成恶棍的真人不同。米拉波、拉法耶特以及其他很多人都令他们的追随者大失所望,并消逝在了历史中;而玛丽安娜却幸存了,这正是因为她抽象,不是真人。①

阿格宏还发现,表现玛丽安娜的不同方式也有不同的政治含义。在1792 年的印章中,玛丽安娜是站着的,年轻、坚定,但没有攻击性。她手握人民革命的长矛,头戴自由的弗里吉亚帽。这种形象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中间态度,介于另两种形象之间:1793 年流行的更激进的自由女神,袒露着胸脯,勇猛地冲锋陷阵;和 1790 年代及 19 世纪后来的政府所钟爱的更保守的自由女神,安坐、无动于衷、平和,既未手持长矛也未
93 头戴自由帽。② 这种在激进与保守的自由女神之间的选择还出现在1848 年期间和 1871 年之后,即第二和第三共和国时期。

经过几代人对共和国及其象征物的争论,玛丽安娜这个女性公民的比喻不仅被接受,而且在法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但在大革命期间,她的支配地位却并不很确定。③ 玛丽安娜受到的第一轮挑战来自共和派内部。吉伦特派议员(他们反对巴黎各区及其激进的雅各宾派领导人日益增长的权力)被捕后,大家都积极地想将共和国重新投入更加激进的熔炉中。1793 年 10 月,国民公会决定,共和国的印章和硬币上今后都要印

---

① Agulhon, "Esquisse pour une archéologie de la République: L'Allégorie civique feminine," *AESC* 28 (1973): 5—34; and *Marianne au combat.*

② Hannah Mitchell, "Art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Exhibition at the Musée Carnavalet",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5 (1978): 123—145; and Lynn Hunt, "Engraving the Republic: Prints and Propaganda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y Today* 30 (1980): 11—17.

③ 在此我要说,阿格宏的不同观点非常卓越,他认为玛丽安娜这一形象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上束棒和装宪法的盒龛作为象征物。印章上还要刻上新铭文“唯有人民才是最高统治者”(Le peuple seul est souverain)来强调对人民支持的新仰赖。但一个月之内,国民公会又一次改变了想法。1793 年 11 月初,艺术家议员大卫提议,国民公会应该颁布竖立一座巨大塑像来代表法国人民的命令。十日后,公会投票决定是否将此塑像作为国家印章的主题,[①]议员们选择了巨人赫拉克勒斯作为激进共和国的象征。

国民公会的意愿至少可以通过发生在共和二年的两件事再次得到证实,一件发生在 1794 年 2 月,另一件在 1794 年 4 月。[②]巴黎卡纳瓦雷博物馆收藏了由官方雕刻师杜普尔绘制的几张草图,这些草图正好符合了国民公会针对新印章制订的指导方针(见图 12)。[③] 虽然这个印章不是用来排挤其他设计的,但还是出现在从 1794 年 6 月(共和二年牧月)到 1797 年 6 月(共和五年牧月)出版的《共和国法律公报》(*Bulletin des lois de la République*)中政府法令的末尾。[④] 大卫的想法就是要用赫拉 94
克勒斯作为印章中的模特,这一点不仅可以从杜普尔的草图,也可以从大卫最初的文本中看出来。在杜普尔的草图中,赫拉克勒斯手上拿着根

---

① 公共指导委员会与货币委员会就印章和硬币的问题有望合作。最初,前者有意于宪章上的拱门,后者则倾向于代表法国的女性形象。大卫的提议解决了此争端,至少暂时性地解决了争端。参见 M. J. Guillaume, e. d.,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2 (1793 年 7 月 3 日-共和二年雾月 30 日[1793 年 11 月 20 日])(Paris,1894):667—668,714,742,772,778—779,808—811。

② 同上,3 (共和二年霜月 1 日[1793 年 11 月 21 日]—共和二年风月 30 日[1794 年 3 月 20 日]) (Paris, 1897): 465, 493, 499; 和 4 (共和二年芽月 1 日[1794 年 3 月 21 日]—共和二年果月 11 日[1794 年 8 月 28 日]) (Paris, 1901): 107—110。

③ 卡纳瓦雷博物馆存放室中关于杜普尔的收藏是本章的主要基础。

④ A. N.,《法律公报》(*Bulletin des lois*)。此印章与图 12 中杜普尔的草图在图像的各个方面都很相似。



图 12　杜普尔绘赫拉克勒斯草图

独特的短棒，狮皮就瘫在身旁。大卫在文本中写道："这个站立的人民形象应该在另一只手上拿着那根古人为赫拉克勒斯配备的骇人短棒。"①

①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iton publique* 2：779（大卫于共和二年雾月 17 日[1793 年 11 月 7 日]所作的演说）。另外一种稍有不同的版本可参见 *Révolutions de Paris*, no. 217（共和二年霜月 10 日至 18 日）："Que cette image du peuple debout tienne dans son autre main cette massue terrible et réelle, dont celle de l'Hercule ancien ne fut que le symbole."

现在,一个巨大的、神话中的男性形象使玛丽安娜相形见绌。 95

赫拉克勒斯的政治含义在其出现的场景中得到了尤其清晰的展现。在 1793 年 8 月 10 日大卫策划的一次盛大节庆上,这个形象第一次被公开使用。① 虽然节庆在推翻君主制起义的周年纪念日举行,但很明显设计目的是为了庆祝成功镇压了 1793 年夏联盟派为支持被捕的吉伦特派议员而发动的叛乱。在这一关键时刻,大卫排演了一次节庆游行,目的就是要回顾大革命的发展过程。这是一次有着一整套显著的讽喻信息的道德演出。节庆中安排了四个追溯大革命主要转折点的"分站",对新宪法的最后圣化庆典进行铺垫:竖立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地方、象征自然的塑像;献给 1789 年 10 月的英雄们的凯旋拱门;为纪念 1793 年 1 月国王被处决而安排的自由女神像(与图 1 非常像,即使不完全一样);最后,是一尊代表法国人民的巨神塑像(图 13),该巨神正使用短棍击打象征联盟主义的九头怪。官方没有指出节庆中采用的形象是赫拉克勒斯,但受过教育的参与者不会认不出这个传统形象。众所周知,赫拉克勒斯的"工作"就是杀死九头怪,几百年来,九头怪就象征着各式各样的罪恶,从诡辩到堕落、从无知到战时的国家敌人等等。② 一位在节庆那天一早去参观的雕刻师提到:"赫拉克勒斯的巨大塑像足有 24 英尺高。……这个赫拉克勒斯的左脚踏住了反革命(之再现形式)的

---

① *Recueil complet de tout ce qui s'est passé à la Fête de l'Unité et l'Indivisiblité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Paris, n. d.), B. N., 8⁰Z Le Senne 9.438 之下。该册子的第一部分重现了大卫的节庆计划。

② Marc-René Jung, *Hercule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XVIe siècle: De l'Hercule courtois à l'Hercule baroque* (Geneva, 1966), esp. pp. 129—131. 另参见 Leopold D. Ettlinger, "Hercules Florentinus", *Mitteilungen des Kunsthistorischen Institues in Florenz* 16 (1972): 119—142, esp. p.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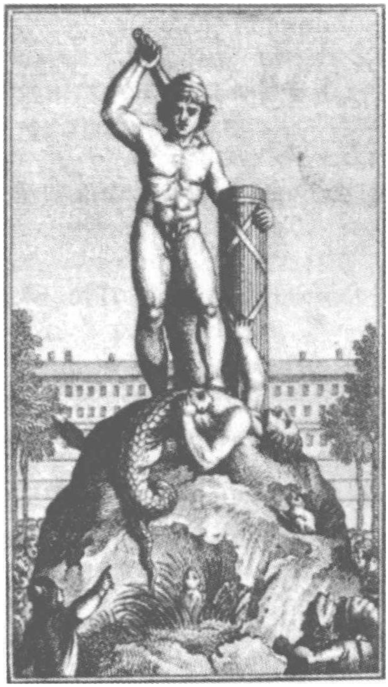


图 13　1793 年 8 月"巴黎人民制服联盟主义九头蛇"图

咽喉。"①

将赫拉克勒斯像安排在自由女神像附近是有特别意义的——自由
96 女神像在游行路线上被安排在赫拉克勒斯像的前面。这说明,自由女神的含义很重要,但只代表了某个特定时刻,一个现在已成为过去的时刻。在自由女神像那里,来自各省的代表用火炬点燃万众唾弃的君主制象征物,重新上演了将君主制这一祭品献给共和国女神的仪式(国王于 1 月

① *Mémoires et Journal de J.-G. Wille, graveur du Roi*, 2 vols. (Paris, 1857) 2: 387.

份被处决,就在9个月之前)。到了下一站,代表们却无事可做;赫拉克勒斯,即法国人民,才是唯一的行动者。他一手拢住象征统一的束棒,一手挥舞着短棒砸向象征联盟主义的怪物(据观察者所说,是个半女半蛇的怪物)。[①] 游行的政治意义非常明显:当人民的代表就路易十六所犯下的罪行惩处了他,他们就确立了自由。之后,人民要自己保卫共和国,防止分裂和派系主义等魔兽的破坏。赫拉克勒斯不需要议员的帮助,虽 97
然他将自己牢牢扎根于象征国民公会中的正直议员(当然包括大卫)的山峰上(尽管该山峰没什么生气)。没有人民的干预,共和国及其宪法不可能在最后一站被平安地送入圣殿——大革命不可能完全实现。那么,相比于自由女神,赫拉克勒斯就代表了大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更高阶段——以人民的力量和统一为特色,而不是以代表们的睿智为特色的阶段。

当大卫于节庆的三个月之后提议竖立巨神塑像时,政治形势又不同了。联盟危机虽然已经过去,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9月初,国民公会在愤怒饥饿的无套裤汉的包围下,正式同意将恐怖列入"议程",宣布全面限价,并加速由巴黎革命法庭执行的处决。10月16日,王后被处绞刑。11月,最易造成分裂的运动——非基督教化运动开始高涨。在大卫最初提出塑像建议的会议上(1793年11月7日),议员中有几名牧师与主教公开发誓要弃绝神职职务。[②] 在大卫提出建议的三天后,也就是国民公会决定将巨神作为印章主题的一个星期前,著名的理性节在被称

① *Mémoires et Journal de J.-G. Wille, graveur du Roi*, 2 vols. (Paris, 1857) 2: 387.

②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2: 775—82. 全面的历史背景可参见 Georges Lefebv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1793 to 1799*, trans. by John Hall Stewart and James Friguglietti (New York, 1964), 尤其是第二章。

作理性殿的圣母院举行。激进的议员推荐使用赫拉克勒斯作为对这一系列政治和文化危机的象征性回应。

赫拉克勒斯面临着许多与其名声相称的任务。最激进的议员及其追随者只想要一次能够摒弃所有基督教先例的文化大革命。1793 年 10 月推出的革命历法是这种愿望的显著证明(见第二章)。一年中的 5 个补充日被称为无套裤汉日,并被尊为全国性节日,称为天才节、工作节、
98 美德节、观点节和酬报节。[1] 历法、理性节和赫拉克勒斯都是新象征语言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新近被动员起来的民众而设的。罗伯斯庇尔、大卫和其他雅各宾派领袖必须对这种要求激进革新的愿望(和人民对奉行惩罚主义和干涉主义之政府的诉求)做出回应;但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更加牢牢地控制可能异化很大一批虔诚天主教徒的运动。因此,从一开始,大卫的赫拉克勒斯就不仅要表现出激进的期盼,还要表现出能够驾驭这种期盼的能力。

大卫在 1793 年 11 月 17 日所作的正式演说明确表现了他的直接政治意图。当时,国民公会在投票决定是否采纳他提议的塑像作为印章的图案原型。大卫说,塑像将用来纪念"法国人民的光辉业绩"和人民战胜专制与迷信的胜利。"国王与牧师的双重暴政"将在塑像基座的建设中被象征性地克服,因为该塑像基座的材料将采用从圣母院的柱廊上敲下来的国王塑像碎石。因此,国民公会凭借其"解放的力量",将洗刷现在、将来,甚至过去"长期被奴役的耻辱"。[2]这个塑像

---

① 简要叙述可参见 Serge Bianchi,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de l'an II: Elites et people (1789 - 1799)* (Paris, 1982), 第 198—203 页。

②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2: 806—811.

将以最如实可能的方式代表人民的力量:高达46英尺的赫拉克勒斯将掩盖人们对所有国王,甚至最受尊崇之国王的记忆,例如亨利四世,他那真人般大小的塑像会被坐落在新桥(Pont-Neuf)的赫拉克勒斯像取代。

选择巨神赫拉克勒斯既体现了激进派再现观点中的自相矛盾,也表明他们在极力克服这种矛盾。大卫明确强调人民与君主制之间的敌对;毕竟,选择赫拉克勒斯就是要使这种敌对清晰明显。但是,大卫的演说和该意象本身却都隐约提到了人民与国民公会、新政权与其代表之间的令人不安的紧张。当激进派选择赫拉克勒斯作为共和国的印章时,他们其实已经认为有必要寻找某种再现形式来代表政权。在赫拉克勒斯那里,他们找到了可能是最"透明"的再现形式,也是一种体现自我隐退的再现形式。他们需要能够表达团结的人民所具备的庄严与伟大的意象,所以这个塑像不应该带有任何有关议员或公会的明显指征。然而,即使它是一种自我削减权势的再现形式,但本质上还是一种意象,这一点就破坏了其作为再现形式的意义。由于它是由人民代表提供的一种人民的再现形式,所以天生就 99
包含了代表对人民的解读。这种隐性的解读因素可能会以文化的形式来重新建立激进派许诺要废除的政治威权关系(即一种人民之外的威权)。因此,虽然这个意象宣告了人民的至尊地位,但又重申了人民代表的优越性。

大卫向国民公会发表演说时,极力强调简约的观念:"你们的委员会(即公共教化委员会,也是大卫代表发言的委员会)相信,议案中的塑像,包括材料和形式的每一项,都应该以敏感有力的方式来表现我们对革命的伟大记忆。"塑像应采用胜利的法国军队所提供的青铜作为材料。

而且,“既然它是民族的再现形式,就不能太华美”。这个巨形塑像应该展现“力量与简约”,这也是人民的美德。① 这个巨人(现在大卫不再明确地称呼他赫拉克勒斯)的一只巨手要托着两个紧挨在一起的代表着平等和自由的小塑像,正如大卫所说,这说明平等和自由要完全依靠人民的智慧和美德。

1793-1794 年,巨大的男性形象获得了强烈的共鸣。新激进共和派根本不需要“虚荣的小男人”,罗伯斯庇尔将这种男人斥为大革命的天敌。大革命带来了神话般的、新的英雄男人:

> 法国人民似乎比其他人类超前 2000 年,人们甚至要发自肺腑地将他们视为不同物种了。欧洲人还在我们严惩的暴君阴影下下跪乞怜……欧洲人无法想象人们可以生活在既没有国王也没有贵族的国家;而我们却难以想象,有人竟然还生活在既有国王又有贵族的国家。欧洲人为了铆紧人类的枷锁在流血,而我们却为了打破这一枷锁甘洒热血。②

100 除了巨神还有谁能打破人类的枷锁呢?

在大卫想到在 8 月 10 日举行的节庆上使用赫拉克勒斯这一意象之前,这种赫拉克勒斯的比喻就已经出现在激进派话语中了。1793 年 6 月末,弗歇(Fouché)这么描述巴黎人民反对吉伦特派的胜利:

---

①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2, pp. 778—779, 806—811.

② "Sur les rapports des idées religieuses et morales avec les principes républicains, et sur les fêtes nationales", *Oeuvres de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c (Discours: 27 juillet 1793 - 27 juillet 1794) (Paris, 1967): 455.

> 过度的压迫使愤慨的人民忍无可忍，在这个伟大的城市里，人民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警钟和大炮唤醒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告诉他们，自由危在旦夕，一分一秒都不能再耽搁了。突然之间，48 个区的人民武装了起来，组成了军队。这个令人敬畏的巨神站了起来，行走着，前进着，像赫拉克勒斯一样跋涉在共和国，为了消灭旨在诅咒人民至死的野蛮叛乱。①

从弗歇的卓越叙述中可以看出，对巴黎的激进派来说，赫拉克勒斯这一意象的力量非常强大，与玛丽安娜完全不同。从弗歇在人民和巨神、过去式和现在式、“他们”和“他”之间的来回转换中，我们几乎已经看到令人震惊的变形正在发生，“可怕”（或令人敬畏、超凡）的野兽从城市的深处崛起，人民向敌人开始了复仇。现在，哪里才是神圣的核心呢？因为民主，这个神圣核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力量场，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点：“人民”到处都是，但等他们集合起来作为批判的群众聚集在一起，他们就转变成了一种强大的新能量。“恐怖政府”是一种为了对付一系列生死存亡危机而采取的激进、应急的政府形式，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那些被认定是这种形式的发明者来说，这也是一种真正困扰的经历。恐怖政府就是行进的人民，是毁灭性的赫拉克勒斯。在激进派创造者的眼中，赫拉克勒斯，也就是人民，可能会像弗莱克斯坦(Frankenstein)那样，最后毁灭

① 引文来自 1793 年 6 月 29 日弗歇向奥布(Aube)省的公民所作的宣言(Troyes)(*Archives Parlementaires* 68：73 [1793 年 7 月 2 日公会的会议记录])。

其创造者。

这种可怕的怪兽形象只是在恐怖时期,即人民群体的强大力量更可见时,才开始出现在激进派话语中。其实在大革命之前,赫拉克勒斯就有着悠久的图像学历史。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非常清楚这段
101 悠久的历史。赫拉克勒斯不是"流行"形象,例如,他没有出现在那些在旧制度王国里广泛流通的流行木刻(imagerie populaire)的图案中。[①] 相反,赫拉克勒斯常常被当作法国国王的神话再现形式。例如高卢赫拉克勒斯(Hercule gaulois)。这种形象可追溯到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又如,在1549 年,为纪念亨利二世进入巴黎而设计的凯旋门顶端,就有一个代表亨利前任弗朗西斯一世的高卢赫拉克勒斯。[②] 就像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赫拉克勒斯一样,这个也有一条锁链从他的嘴延伸到同伴的耳朵,因为人们认为这是赫拉克勒斯的典型特征:他依靠劝服,而绝非武力来领导人民。[③]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赫拉克勒斯经历过某些图像方面的演变。显然,波旁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路易十六与赫拉克勒斯从来没有过联系。[④] 但有一次,这个形象却出现在了美国。1776 年之后的某一时刻,

---

① Jean Mistler, François Blaudez, and André Jacquemin, *Epinal et l'imagerie populaire* (Paris, 1961).

② Lawrence M. Bryant, "*Parlementaire*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Parisian Royal Entry Ceremony",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7 (1976):15—24 中有关于该拱门的描述。我非常感谢该作者让我注意到了这一点。J.-B. Gaignebet, "Essai sur le cheminement d'Hercule au cour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Provence historique* 25 (1975): 111—124 中没有提及赫勒克勒斯形象的最早出现。

③ Jung, *Hercule dans la litérature française*, esp. pp. 73—93.

④ Gaignebet, "*Essai*", p. 121.

雕刻师杜普尔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制作了一块奖章,正面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头像,题铭是“解放美利坚”(Libertas Americana),背面则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与两条蛇纠结在一起。这个年幼的赫拉克勒斯受到一头豹子的攻击;那个女神手拿镶嵌着鸢尾花花边的盾牌,正准备用长矛去驱逐这头豹。① 这象征君主制的法国正在保护美洲新生的共和派赫拉克勒斯。1776 年 7 月 4 日,一个负责美国印章图案的专门委员会成立了。委员约翰·亚当斯提议采用格瑞布林(Gribelin)的篆刻“赫拉克勒斯的裁决”,这个篆刻经常被用作扉画,出现在夏弗茨伯里(Shaftesbury)所作的读者众多的艺术小册子上。② 印章的选择在美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经 102
过六年的深思熟虑和几次错误的启动后,终于在 1782 年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最后被选定的皇室鹰,据一个艺术史学家说,“晦涩难懂,(按夏弗茨伯里的说法就是)‘像谜一般’。除了发明它的中层和上层阶级的绅士们,没人能理解得了它”。这只鹰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五世的徽章,源自德国一本关于象征与题铭的书。③

在 1793 年前的革命法国,赫拉克勒斯曾经出现在一些印刷品和雕刻中,但大卫(可能在杜普尔的推动下)几乎独自一人担起重任,将其复原,转化为革命宝库中力量强大的新象征。长期以来,赫拉克勒斯已经与修辞或劝服没什么关系了。在大革命头几年出版的主要图像学词典

---

① Gaignebet, “*Essai*”, p. 121. 这还不是杜普尔对美国的革命艺术所作的唯一贡献。参见 Joshua C. Taylor, *The Fine Arts in America* (Chicago, 1979), 第 30 页中的奖章图片。杜普尔的革命前生涯可参见 Charles Saunier, *Augustin Dupré: Orfèvre, Médailleur, et Graveur-Général des Monnaies* (Paris, 1894)。

② Frank H. Sommer, “Emblem and Device: The Origin of the 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 *Art Quarterly* 24 (1961): 57—76, esp. pp. 65—67.

③ 同上,第 73—74 页。

中,赫拉克勒斯只出现在"勇气"和"力量"等词条下。[①] 有关"力量"的一些叙述也指出该比喻被女性化了:"图像学家表现力量时,使用的形象是一个身披狮皮,手握赫拉克勒斯短棒的女子。"[②]大卫没有延续这种图像学的传统,只选择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并颠覆了以前的含义。在受过教育的精英眼中,赫拉克勒斯在法国历史上一直代表着国王的个人权力;而在革命的现在,大卫却将他转化成民众集体权力的再现。他选择了最受青睐的君主制符号,将其再生产、提升、立碑,成为象征君主制之对立面的符号。

我们不可能确切了解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在选择赫拉克勒斯作为印章图案时在想什么,因为这个选择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正式的评论。他们可能对其图像史不感兴趣,那段历史在旧制度的最后几代人中已经淡忘了。但他们肯定喜欢这个形象的男性气概,因为他们已经投票要替换掉
103 印章上的自由女神了。这个决定在第一刻就是政治的:选择赫拉克勒斯能让雅各宾派在图像学上与他们的对手吉伦特派保持距离。赫拉克勒斯代表人民,雅各宾派就是依靠人民在国家政治中获得了并不十分稳固的优越地位。

但是这其中不仅涉及直接的政治含义。大卫的赫拉克勒斯复原并改善了这个男性的政体再现形式,一个总是意味着主宰和至上的概念。

---

① B. N., Réserve. *Iconologie ou Traité de la Science des Allegories à l'usage des Artistes en 350 Figures, Gravées d'après les dessins de M. M. Gravelot et Cochin: Avec les explications relatives à chaque sujet* (Paris, n. d.). 根据此作品扉页的"出版社告事"(Avis de l'Editeur)来推断,它的出版时期是在1791年。

② 同上,2:55。在1792年印制的一套革命扑克牌上,"力量"的女性再现形式是黑桃女王(Henry-René D'Allemagne, *Les Cartes à jouer, du XIVe au XXe Siècle*, 2 vols. [Paris, 1906]1:131)。

然而,赫拉克勒斯不是父系的威权象征;在大卫和杜普尔的设计中,他是保护自由女神和平等女神的力大无比的兄弟。赫拉克勒斯的男子气概间接反映了议员自身;议员们通过他再次确认了自己是取代国王父亲的一帮兄弟。赫拉克勒斯不仅根除了国王,还使其女伴相形见绌。通过推出赫拉克勒斯,议员们就与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的妇女保持了距离。考虑到妇女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会导致"只有歇斯底里症才能引发的各种分裂和混乱",国民公会于1793年10月末宣告所有妇女俱乐部非法。[①] 这次行动就发生在大卫建议竖立巨大塑像的几天前。在雅各宾派领袖的眼里,妇女们正试图将玛丽安娜作为她们积极参与的隐喻;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女性形象,无论多么勇猛、多么激进,都无法吸引他们。赫拉克勒斯将妇女又放回到远景当中,放回到依靠男人的位置和关系中。这个巨大的男人现在是唯一积极主动的形象。

与所有强大象征物一样,赫拉克勒斯也有多重含义,一次传递的不只是一个信息。他可以是"民众的"、兄弟般的、弑父母的、反女性的,虽然同时也是被改换过的、放大了的君主制符号。赫拉克勒斯反映了雅各宾派和激进派的期盼,象征了激进派议员与巴黎民众阶级的联盟,是他们意识形态库里的武器。赫拉克勒斯可以是一种对受过教育之人的毫不掩饰的警 104
告,也可以是一种提醒,提醒他们注意其世界如何被大革命改造。人民,这

---

① Jane Abray, "Feminis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0 (1975): 57. 另可参见 Darline Gay Levy, Harriet Branson Applewhite, and Mary Durham Johnson, *Women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789 - 1795* (Urbana, Ill., 1979)。Levy 最早让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暗示这可能和赫拉克勒斯的出现有关。还可参见 Neil Hertz, "Medusa's Head: Male Hysteria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Representations*. 4 (1983): 27—54,其中有关于1848年相似革命形势的高见。

个新生的、令人敬畏的巨人已经成了国王,甚至议员们也得听命于它—他。然而,赫拉克勒斯对人民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没有正式命名的巨神对民众阶级而言,只是一个体型庞大的巨人而已,不会让他们想起经典故事或法国历史,只会让他们想到怪物、英雄或者民间传说中的圣哲。[①]

精英的与民众的赫拉克勒斯意象之间也出现了相互渗透,这一点可以从1794年1月21日在格勒诺布尔举行的节庆上窥见一斑,这个节庆是为了庆祝一年前国王被处决。平台上摆放着一个代表路易·卡佩特的模特(头上戴着王冠和乌龟的触角),右边坐着"所谓的"教皇,左边则摆放着代表贵族的模特。当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高呼着复仇时,两个"法兰西赫拉克勒斯"就从模特身后走出,用短棒结果了他们的性命。然后,摔倒在地的模特被拖过淤泥地,被参加者踩踏于脚下。[②] 精英们认为,法兰西赫拉克勒斯(Hercule français)已经取代了高卢赫拉克勒斯,成为一个真正的国民形象,不再只局限于君主。但对于民众来说,这两个赫拉克勒斯形象则成了复兴嘉年华活动的一部分,在这种嘉年华上到处都有被嘲笑的人和被颠覆的传统角色。例如,传统的五月花柱以前是向威权宣誓效忠的宣言,而后就转变成了煽动叛乱和代表农民力量的符号。[③] 同样,象征

---

① 例如可参见 Geneviève Bolleme, *La Bibliothèque bleue: Littérature populaire en France du XVIIe au XIXe siècle* (Paris, 1971)。

② Auguste Prudhomme, *Histoire de Grenoble* (Grenoble, 1888), pp. 640—641. Albin Gras, *Deux années de l'histoire de Grenoble, depuis la suspension de Louis XVI (10 août 1792) jusqu'à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9 thermidor an II [27 juillet 1794])* (Grenoble, 1850), 第65—66页中有相同的叙述。

③ J. Boutier, "Jacueries en pays croquant: Les Révoltes paysannes en Aquitaine (décembre 1789 - mars 1790)", *AESC* 34 (1979): 760—786, 尤其是第764页中有一些关于五月花柱的有趣内容。

国王权力的赫拉克勒斯也转变成了象征人民力量的符号。

但是,赫拉克勒斯与五月花柱的文化根源不同。五月花柱是深深扎根于法国,至少是法国西南部的农民文化的"民众"象征。[①] 但赫拉克勒斯却更直接地来自精英文化,虽然也可以把他理解为一种对民众有吸引 105 力的意象。而且,赫拉克勒斯的转变并非由民众完成,而是由巴黎雅各宾政府中的激进派实现的。因此,赫拉克勒斯不仅可以被认为是激进派尝试动员更多人民来重新构建社会的一种表现,还反映了他们对自身权力源头的一种矛盾心理。因为,赫拉克勒斯从来都不是智慧的巨人。在弗歇的叙述中,赫拉克勒斯力大无穷,因背叛而痛苦地咆哮,受到挑衅时又变得凶恶勇猛;他的表现更像一头受伤的猛兽,而不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动者。大卫的塑像提案中不知为何特别强调了一个请求,就是要在巨人的身上刻几个关键字:眉毛上刻"光明"(这个词并不能有效地表示智慧),胸部刻"自然"和"真理",胳膊上刻"力量"和"勇气",手上刻"劳动"。[②] 根据大卫的想法,赫拉克勒斯凭借"力量"、"勇气"和"劳动"给世界带来了光明和真理,而不是凭借学识或智慧。

大卫的措辞明确表达了激进派对人民的看法。巨人是一种自然力,透明使他成了真理和光明的自然媒介。不言而喻,他不会三思,没有秘

① J. Boutier, "Jacueries en pays croquant: Les Révoltes paysannes en Aquitaine (décembre 1789 - mars 1790)", *AESC* 34 (1979): 760—786, 尤其是第 764 页中有一些关于五月花柱的有趣内容。

② 在 1793 年 11 月 7 日向国民公会作的第一次演说中,大卫没有包括"劳动"(travail),至少根据《教练员报》的报道是这样。但是 10 天后,官方政令确实提到了"在手上,劳动(sur ses mains, Travail)"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2: 778—779, 806)。Judith Schlanger 在其关于大卫提案的文章中非常精彩地讨论了"书面文字的表意维度"。

密,也不可能卷入令人担忧的反革命阴谋。显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他没什么建树,但作为士兵和劳动者却有很大贡献,这就是他的勇气与力量。没有它们,激进派的事业注定会失败。他是"恐怖政策"的中流砥柱,没有他"美德将疲软无力"。[①] 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个巨人代表了用双手劳动的"无套裤汉",也就是穿着长裤的人,而不是穿着马裤的悠闲阶级。在旧制
106 度下,劳动受到歧视;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只会使人成为"粗俗机械工阶级"中的一员。[②] 激进派极力重新评价劳动,将其看作自豪与尊严的源头;他们最为唾弃的反而是无所事事的富人们。但是,在试图记录这种新评价的同时,大卫的赫拉克勒斯却削弱了其意义。因为,巨人手上的"劳动"使他成了代表无声力量的另一个符号。只有大卫的言词才能让他发声。

提案中的镌刻文字只是例证之一,反映了努力为人民展现其自身时的矛盾。本来塑像本身就可以传达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人民是不朽的、令人敬畏的,其力量势不可挡;人民独自屹立。然而,人民的代表却对他进行了阐释,不断以阐释者的身份溜回画面。赫拉克勒斯第一次出现在 1793 年 8 月 10 日的节庆上时,只是被简单地贴上了"残疾军人巨神"的标签,因为当时他被树立在残疾军人广场(Place de Invalides)上。参加者聚集在分站前,国民公会的主席向他们解释了人民应该从塑像身上看到的意义:"法国人民们!就在这里,你们看到了自己的象征,一个富于指导意义的象征。这个巨人用强有力的双手重

① 引文来自 1794 年 2 月 5 日罗伯斯庇尔的关于"民主政体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的演说,trans. by Philip Daws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7), 第 135 页。

② Colin Lucas, "Nobles, Bourgeoi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no. 60 (1973): 84—126, esp. p. 88.

新聚拢了成就其雄伟力量的各省,使它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这个巨人就是你们!"[①]议员们为了向人民展示人民自己的意象而安排了这个隐喻,但是,人民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却要仰赖人民代表的演说。视觉意象只有在言词的语境下才有正确的效果。

在一篇对大卫最早的有关该塑像的演说所作的报纸评论中,赫拉克勒斯作为激进派的意象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巴黎革命报》(*Revolutions de Paris*)的编辑当即看到了这个意象的政治重要性:"我们会看到人民站了起来,一手托举着被夺回的自由,一手握着用于保卫其胜利果实的短棒。无疑,在所有进入角逐的模特中,我们最中意用人民的形象来最好展现无套裤汉特征的那一个。"然后,这个编辑又称赞了大卫为塑像所选的词语,称埃及人在公共纪念碑上书写就是因为那些书写"是民众唯一的基本书籍"。他还情不自禁地提出建议:为什么不在法国的城市与乡村也建立相同的纪念碑呢?为什么不在国境线上的每个要塞都树立一座纪念塑像呢?而且,因为"荷马称他那个时代的国王是'食人民者'(mangeurs de peuples),我们也可以在法国无套裤汉的形象上写道:人民,食国王者(Le Peuple Mangeur de Rois)"。[②] 不久,这份报纸还推出了自己印制的人民意象(见图14)。 107

在这幅图中,赫拉克勒斯俨然已成了一名无套裤汉。神话英雄手中具有图像学意义的短棒,现在成了人民权力的真实武器。在杜普尔的形象设计中(见图12),古典的赫拉克勒斯赤身站立,轻轻倚靠在"富有象

---

① *Recueil complet de tout ce qui s'est passé.*

② *Révolutions de Paris*, no. 217 (10—18 frimaire an II). 与文本相配的版画后来才出现,以装订好的杂志插页形式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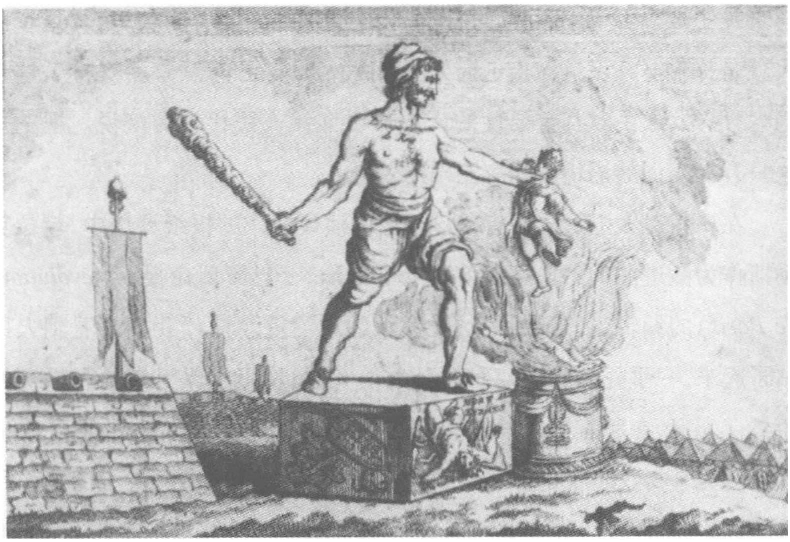


图 14 “人民食王”图

征意义”的短棒上。但在这幅漫画中，他却积极扬起了短棒，准备砸向君主。而且，他还穿上了衣服，打扮得像一名粗犷的无套裤汉，戴着弗尔吉
108 亚帽，卷起了裤腿，已经为一天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头上和脸上的茂盛毛发也使他完全有别于那些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议员们，以及大卫想象中不长胡须的赫拉克勒斯（见图 12 和 13）。大卫的赤身赫拉克勒斯不具备任何社会识别特征，完全是一个超然于阶级和派系政治的抽象形象。简而言之，这个漫画人物甚至比大卫的提议更激进；食国王者更“透明”，因为他真实而不古典，社会内容清晰，行动明确，不晦涩，不会“像谜一般”。这个意象不是什么隐喻，他就是无套裤汉，就是人民。所以，这个意象几乎算不上什么再现，因为其中没有任何隐喻的成分。作为激进派意象，它就是要反映现实，而不是对现实进行

歪曲抽象的重新阐释。

这个漫画形象显然采用了民众素材来增强吸引力。在典型的颠覆式嘉年华(carnivalesque inversion)上,国王成了侏儒,就像一个无助的玩偶被捏在民众孔武有力的手中。但这次,颠覆并非游戏,人民不是要做一时或一日的国王,而是要吞噬国王(并化身为君主权力,也就是在引申意义上成为他们所吞噬的事物)。那个编辑的评论也委婉地进一步强调了兄弟们对权力的征服。这个形象应该"一手托举着被夺回的自由,一手握着用于保卫其胜利果实的短棒"。自由,这个珍贵脆弱的成果现在成了对国王作战中获得的奖杯。兄弟们已经把它从敌人(父权统治者)的手中夺回,现在必须拼尽全力来保卫"夺回的果实"。在此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女性的主动行为。自由女神没有出现在漫画中,可能是因为在当时女性的参与根本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对于雅各宾派领袖和追随他们的无套裤汉来说,政治是男人们之间的争论。①

尽管这个食国王者的漫画形象努力要成为透明的人民意象,但与大卫设计的形象一样,它也存在一种基本的矛盾。像古典赫拉克勒斯一 109
样,这个漫画更多体现的是行动,而不是理性;他只是一股蛮力,没有经过深思就采取了行动。这个激进报人像大卫一样,必须提供标识来表明人民行动背后的理由。所以,这个形象也是"被镌了字的"。为了将人民与人民的力量重新纳入到激进的政治世界中,激进派在人民的身上写了字:"你们用暴力捍卫了我们刚获得的自由",又一次向人民描绘了他

① "Les sans-culottes, même s'ils eurent à l'occasion une attitude plus libérale, estimaient comme les Jacobins que les femmes doivent être releguées ' dans la sphère étroite de leur ménage' " (Albert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 2nd ed. [Paris, 1962], p. 507).

们自身。但是,谁能想象这个形象能撰写宪章呢?力量的形象毕竟只是野蛮人而已。

虽然大卫关于塑像设计大赛的提议与其他许多议案一样被搁置了,但有些石膏像还真的被制作了出来。① 一个19世纪末的史学家称一尊赫拉克勒斯像曾经确实被竖立在新桥,但他的描述与8月10日节庆上的形象相符(棒击联盟九头怪的赫拉克勒斯),而不是大卫的赫拉克勒斯塑像。② 在表现1794年6月8日最高主宰节的版画上,一尊赫拉克勒斯塑像矗立在玛尔斯校场上的高山边,非常显著(见图15)。这尊古典塑像与大卫的新桥巨神非常吻合,虽然没有提议的那么大,但倒是手托自由与平等女神的小雕像。③ 从这幅版画可以明显看到,大卫、罗伯斯庇尔和国民公会的其他激进派成员都无意背离古典的人民赫拉克勒斯形象。那个漫画形象中的野蛮和暴力,在这个优雅镇静的塑像中被摒弃
110 了。这个人民的形象向最高主宰呈献了自己的贡品,举止比1793年秋提议的那个形象恭顺。此时,人民已经处于被控制之中。

最高主宰节的这幅版画提出了一个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还是值得提出来。版画中的赫拉克勒斯看起来非常像米开朗基罗的

① 曾经有过一次关于各种纪念碑的设计比赛,但最后没有作评判,其中包括8月10日节庆上的"法国人民的塑像"。1794年11月29日(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和大卫失势之后的几个月),Thibaudeau 建议艺术家们自己命名一个评审团。就我判断,虽然该建议被采纳,但从未被实施,见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4(共和二年芽月1日[1794年3月]-共和二年果月11日[1794年8月28日]):253—258。

② M. Castonnet-Desfosses, *Paris en* 1794: *La Fête de l'Etre suprême* (Paris, 1883), B. N., 8^{0} Le Senne 6790.

③ 最高主宰节的账目明细表包括泥瓦工匠在大山的左面搭脚手架和在立柱上竖塑像的12天工钱。不管此塑像从何而来,这份记录表明大卫版本的塑像确实被制作过(A. N., F^{1C} I 84, *Fêtes publiques*, 共和二年-共和四年,卷宗II,7月14日[共和二年穑月26日])。



图15 1794年6月最高主宰节细节图

大卫，这只是一个巧合吗？[1] 这是不是大卫的自我主义征兆呢（他的名 111
字现在总与赫拉克勒斯、人民和圣经英雄相联系）？或者，这只是某个

① 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赫拉克勒斯往往让人联想到圣经中的大卫（Ettlinger, "Hercules Florentinus"）。而且，大卫自诩为米开朗基罗的崇拜者（David Lloyd Dowd, *Pageant-Master of the Republic: Jacques-Louis David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incoln, Neb. 1948], p. 10）。

匿名雕刻家的嘲讽评论？相同的塑像还出现在一幅描绘1794年10月底举行的胜利节的版画中，这次节庆就发生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和大卫本人失势的三个月后。但是，这些版画的真实性非常不可靠，因为正如布朗尼斯洛·巴兹寇（Bronislaw Baczko）所说，版画中节庆时期的巴黎往往与真实事件或地志没什么关系。版画家掩盖了石膏纪念碑的临时性特点，将他们表现得像是用大理石或花岗岩所制。有时，艺术家还会加入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塑像或纪念碑。[①]版画家也受到了教化的驱使，他们的作品是为了重新建构这个世界，而不是为了报道这个世界。

像许多其他用于雅各宾派节庆上的石膏像一样，这个巨神在1795年初被毁。[②] 1795年10月底，一个议员提议国民公会投票表决是否采纳一种印有蜂巢的印章。但这个提议被否决了，因为另一个议员说，蜂巢象征保王党，因为其中有蜂后。这个议员认为，适当的共和国象征应该是自由帽和天平（象征自由与公平）。[③] 换句话说，激进派倒台以后，剩下的议员越来越倾向于抽象的象征物。1796年格雷古瓦的报告就显示了这种影响。他提议了三个设计方案：没戴标志性自由帽的女性形象；表现两个立法委员会和行政督政府相联合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上有一顶自由帽）；中央绘有三个互相紧扣之圆环的盾牌，盾

① Baczko, *Lumières de l'Utopie* (Paris, 1978), pp. 361—362. 根据版画反映的情况来看，胜利节的装饰格调与几个月前的最高主宰节非常接近。参见 Marie-Louise Biver, *Fêtes Révolutionnaires à Paris* (Paris, 1979) 中复制的版画，图34。

② Biver, *Fêtes révolutionnaires*, p. 101.

③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6 (6 germinal an III [26 mars 1795]-4 brumaire an IV [26 octobre 1795]) (Paris, 1907): 818, 861, 869.

牌的边缘是代表各省之间坚不可摧的联合关系的链条图案(其中一个圆环里有自由帽)。[1] 五百人院的官方会议记录上的印章是一个椭圆 112
形,中间有自由帽、阳光、指南针和秤。[2] 同之前的美国共和党人一样,法国共和党人越来越钟情于象征性再现中的抽象与神秘。意象不再直接表现人民;共和国可以民享,但不可能民治或民有。

虽然赫拉克勒斯没有出现在共和国的印章上,但并没有在罗伯斯庇尔及其激进派追随者倒台后完全退出流通领域。1795年8月通过的一项法律将共和国的硬币分成两种:刻有"联合自由与平等"的赫拉克勒斯像、题铭是"联合与力量"的银币和刻有自由女神像、题铭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较小的铜币。[3] 但是,赫拉克勒斯有些变化:他被驯服了。(见图16,杜普尔按法令规定绘制的草图)[4]现在的他是自由与平等的兄弟,真人般大小;不是巨人,不能将他的小姐妹们托在巨大的手掌上,也没有挥舞图像学中象征人民权力的威慑力十足的短棒。相反,他看上去更年长、更睿智、更宽厚,甚至带有几分父亲的威严。人民的力量也被驯服了。在1795年春最后一次绝望的叛乱之后,无套裤汉退出了政治舞台。抽象的、与真实妇女鲜有相似之处的女性形象大量回归到了图像中。

---

① *Rapport... sur les sceaux... 11 pluviôse an IV.*

② 例如可参见 *Procès-verbal des séances du Conseil des Cinq-Cents, nivôse an IV* (Paris, n. d.)。从大革命一开始,许多抽象象征,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来自共济会(Jules Renouvier, *Histoire de l'Art pendant la Révolution considéré principalement dans les estampes*[Paris, 1863])。

③ Michel Hennin, *Histoire numisma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 vols. (Paris, 1826) 1: 519—520.

④ 同上,第519页。



图 16　1795 年杜普尔绘以赫拉克勒斯像为图案的硬币草图

许多议员想彻底抛弃赫拉克勒斯。1798 年 7 月，五百人院提议用“坐着的女子”来取代银币上的赫拉克勒斯。题铭也改为“自由、繁荣”。[①] 赫拉克勒斯——人民，将让位于一个象征富庶繁荣的、安静怠惰的形象。激进的男性与激进的女性（即使图 5 中的自由女神也显得

① *Journal des débats*，五百人院（Cinq-Cents）的共和六年花月会议报告。

更加积极主动)都要被取代。更高等级的元老院也表示同意,称这种 113
变化“不可避免”,因为他们认为赫拉克勒斯是“在概念与实施上都很不幸的比喻”。[1] 但是,因为元老院担心要重新面临其他的货币提案,所以赫拉克勒斯继续流通了一段时期。[2] 114

1799 年之后,有关赫拉克勒斯的记忆慢慢淡化。玛丽安娜,这个自由与共和国的形象没有消失,但不久也被波拿巴本人的形象掩盖。玛丽安娜在后来的共和国又出现时,赫拉克勒斯也重新出场,但只作为一种次要形象:出现在 1848 年、1870 - 1878 年、甚至 1965 年的硬币上。[3] 他再也没有像在 1793 - 1794 年恐怖时期那么风光过。然而,虽然男性形象在大革命之后的共和国意象中从来不是最权威的,但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图像学中却起着杰出作用。埃瑞克·赫伯斯邦(Eric Hobsbawm)解释了为什么从 19 世纪的民主-平民革命过渡到 20 世纪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时,女性形象的重要性会下降。[4] 他提出的原因有:女性婚后不再工作,女性被禁止进入行会,以及女性形象与衰败的工业前千年的关系。

无论这些社会性与政治性解释有什么优点(或受到怎样的争议[5]),

---

① *Journal des débats*,元老院的共和六年穑月会议报告。

② 同上,还可参见同上的共和六年穑月 12 日的讨论。赫拉克勒斯硬币至少流通到共和九年(P. Ciani, *Les Monnaies françaises de la Révolution à la fin du premier empire, 1789 à 1815* [Paris, *1931*], p. 122)。

③ Barbara Ernst, *Les Monnaies Françaises depuis* 1848: *Die Französischen Münzen seit 1848* (Braunschweig, 1968), pp. 20, 33, 54. 后来,杜普尔的设计重新被采用,而且除了铭文“联合与力量”被改为“自由、平等和博爱”之外没有其他较大改动。

④ “Man and Woman in Socialist iconograph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 (1978): 121—138.

⑤ 参见 Maurice Agulhon and Sally Alexander, Anna Davin, and Eve Hostettler 在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8 (1979): 167—182 中所作的批评。

它们都没有考虑到，男性与女性形象之间的竞争其实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赤膊的工人”第一次出现不是在 19 世纪初（赫伯斯邦没有给出精确时间），而是早在大卫提出人民的意象时（其手上写着“劳动”），远远早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事实上，正如赫伯斯邦无意中提到的，赫拉克勒斯往往是社会主义图像学的模特。除了赫拉克勒斯，赫伯斯邦描述的这个形象还会是谁呢？“一个肌肉发达的裸体男子，跪在一块岩石上与一条巨大的绿蛇搏斗，一头狮子软瘫在
115 一边”（1890 年，这个形象出现在码头工人工会出口分会的旗帜上）。①早在 1818 年，英国的一次工联运动就被称作“慈善的赫拉克勒斯”。②这个形象在 19 世纪中期的法国产生了极大的共鸣，足以影响古斯塔夫·福楼拜；他的小说《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中的英雄人物——工人杜萨蒂尔（Dussardier）第一次出现在叙事中时就被认为是“一种赫拉克勒斯”。③

在对赫伯斯邦的批评中，阿格宏坚持认为男性形象受到了 19 世纪左翼的青睐，因为女性形象与温和的共和派有着太紧密的联系。④但是，根本无需 19 世纪第二和第三共和国的经历我们就能看出温和派与激进派在共和制观念上的紧张关系，因为玛丽安娜和赫拉克勒斯之间的选择早在 1790 年代就被提出了。而且，巨大的男性形象表现

---

① “Man and Woman”, p. 129.

② John Foster,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Three English Towns* (London, 1974), p. 101.

③ *Sentimental Education*, trans. by Robert Baldick (London, 1964), p. 41.

④ 阿格宏对赫伯斯邦的批评与他在 *Marianne au combat*: “On Political Allegory: A Reply to Eric Hobsbawm”,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8 (1979): 167—173 中的许多主题一致。

的不仅仅是对温和的女性公民形象的拒绝，它还提醒着观看者，激进革命就像工业劳动和许多社会主义政治一样，是“男人的工作”。

赫拉克勒斯形象还包含了一种基本的紧张，这种紧张也困扰着之后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自我观念。赫拉克勒斯不是毫不含糊地表现了人民。大卫选择的形象不是人民自己的自我意象，也不是来自民众文化深处的反映，而是艺术家、知识分子兼政客为了教化人民而设计出来的人民的意象。赫伯斯邦描绘的无产阶级形象也有相同的矛盾：他们的外表很少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往往是理想主义的、古典的，通常是力量强大、赤裸着或半裸着的男性形象，而不是欧洲煤矿或工厂里那些疲惫、营养不良、浑身脏污的形象。例如福楼拜书中的杜萨蒂尔就是个“大个子(le terrible garçon)……他强壮，至少要四个警察才能制服他”，这种形象表达的只有蛮力而无智慧。[①] 像法国大 116
革命中的人民一样，工人的形象也非常难表现，但领导这份事业的那些人不得不去表现。

尽管各种激进的人民形象包含了许多紧张与矛盾，但还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开辟了新的突破口。激进派号召人民反观自身，认识到自己才是核心形象，让人民“愤怒的吼声”响彻国民公会大厅和巴黎城的街头巷尾。在1794年2月罗伯斯庇尔的重要演说《民主政策的道德与政治原则》中，我们可以听出激进的人民再现形式中的力量与紧张：

> 然而，当一个民族凭着巨大的勇气和理性，终于砸开了专政主义的枷锁，并把枷锁转化成了自由的奖杯；当它凭着

① 法文版可参见 Gustave Flaubert, *L'Education sentimentale* (Paris, 1965), 第49页。

> 道德的力量，从死亡的臂弯里重新夺回了年轻的活力；当它交替着敏感与自豪、勇敢无畏与温顺驯良时，无论是坚固的堡垒，还是暴君装备精良的大批军队都阻挡不了它，能够阻挡它的只有法律的意象。那么，如果它不能迅速地攀爬到命运的巅峰，**那肯定是统治它的人犯了错**。①

对罗伯斯庇尔来说，人民是大革命的力量，是驱动的马达。但是，人民一旦行动起来就很难停止。这时，人民的代表就要在人民面前高举“法律的意象”，及时阻止他们，向他们解释法律其实就是人民自己的作品，指导人民走上通往“命运的巅峰”的正确道路。没有人民，大革命就没有驱动力；没有人民代表，大革命就会失去方向。

激进派为吸引人民而开辟的新突破口到底有多深，这可以从之后尝试缝合此突破口和假装此突破口根本不存在的决心中看出来。1794 年之后，所有号召人民的呼声都被镇压。巨大宏伟的赫拉克勒斯像从视线中消失，大部分共和国的再现形式都是真人大小、抽象、比喻意义晦涩难懂，而且经常与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象征物杂陈相处。赫拉克勒斯需要几个说明性词语，但资产阶级的抽象比喻则需要整页整
117 页的说明，这都是为那些能读懂复杂文章的人准备的。督政府的花饰（见图 17）被推出时就有一整页的说明来解释其比喻内容。花饰的主要部分是一个戴着帽子的自由女神，但周围环绕着许多其他不易察觉的象征物。② 与 1792 年的玛丽安娜不同（见图 5），这个自由女神是坐

① 译文来自 Philip Dawson，*The French Revolution*，第 134 页。着重标记是亨特所作。

② 该比喻的解释可参见 *Collection de Vinck* 4（Napoléon et son temps）（Paris，1969）：3—4。



图 17　1798 年行政通讯录上的官方花饰图

着的，看上去若有所思，根本不打算有所行动。她既没拿枪也没拿矛，只是疲倦无力地斜靠在共和三年的宪法碑上。可能最重要的是，她看着旁边（右边），而没有正对着观看者。自由女神对她的观众没有任何要求，她只是坐着，并等待着。

1800 年，重新得势的大卫监督了自由女神石膏像的替换。矗立着 118
这尊塑像的“革命广场”被改名为“和谐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女神像也被一根国家立柱取代。这根高 67 英尺的立柱是建筑家莫洛（Moreau）设计的，柱子的顶端有一个自由女神像，据观察者说，这个自

由女神“表情忧郁，愁眉不展”。[①] 现在，自由真的非常遥远，远远高过了人民的头顶。几个月之后，为了建造拿破仑的凯旋门，即使这个遥远的自由女神像也被拉倒了。以军事胜利为基础的帝国战胜了共和国。

国家印章与其他革命再现形式不仅仅是永无休止的政治冲突的独特反映。与路易十六痴迷的、繁复的国王着装仪式一样，革命的再现形式界定了权力经验。君主制的“主导性虚构”被削弱了，共和派就开始寻找新的方式来建立他们的世界。玛丽安娜和赫拉克勒斯是他们新政治体系中的两个核心形象。在美国，共和派可以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个印章，因为政治阶级能够就共和国的意义达成一致。在法国，权力的再现形式却不断引起争论，因为政治阶级很难就大革命在何处才能结束这一点上形成共识。革命的十年里，再现危机从没被解决过，但结果却使共和派，尤其是激进派将问题推到了最远极限。激进派大胆地再现人民，虽然这种再现本身充满了矛盾与含糊，但他们通过这种再现确实提出了关于政府的本质和可能性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因为它们不仅仅局限于政治论述与简评，而是在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回响。革命的记忆不是通过书本或文献来传达，而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标语、绶带和帽子，以及更易记的、
119 真人般的塑像得到了宣扬。

① Biver, *Fêtes révolutionnaires*, p. 148.

第2部分

政治社会学

第四章 革命的政治地理学

修辞、仪式和意象为革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一种象征性架构。虽然在大革命期间，演说、节庆，以及诸如印章与硬币之类的威权再现形式的政治内容有所改变，但形塑的原则与期盼却基本相同，这些延续的动机包括反传统的愿望、对民族再生的信念、在新价值观建构中对理性与普世性的仰赖，以及对共同体的需要高于个人利益与特别群体利益的强调。甚至革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也一再重现：透明与教化，人民与人民代表，自然、理性的自明与象征物、服装的晦涩。就在制定这些原则和处理这些两极矛盾的过程中，革命者开发了新的政治领域，包括直接民主、恐怖统治，以及最终的极权统治。

革命的象征性架构使新政治文化得以统一与延续。反复提及新民族、共同体和普遍意愿有助于形成更强的民族目的感。创作发明出来的玛丽安娜、赫拉克勒斯、国家帽饰和节庆吸引了所有的法国人民。自由树、爱国圣坛、雅各宾派俱乐部和选举程序也在各个地方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得到了确立。这个象征性架构不是反映了已有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群众性民主斗争，而是从无到有地创造了它们。游行、宣誓，以及镌刻着自由女神像和赫拉克 123
勒斯像的硬币的流通，都造就并巩固了革命修辞所首要强调的新民族。

大部分新实践都在巴黎获得了官方的正式许可，这些获取许可的过程往往使中央官僚政府的权力得到增强。统一度量衡、货币制度及选举程序等举措都便利了以巴黎为中心对全国的统治。但是，新政治

文化并不完全由巴黎主宰。革命价值观与象征物的力量强大,是因为众多不同地方的人民都在实践着它们,目标都是重建社会与政治生活。远离巴黎的人们有时候发明了自己的象征物和仪式。而且,即使他们愿意唯巴黎马首是瞻,他们也是以自己的条件和方式去学习巴黎的。那么,关于这个政治中心,究竟什么是"巴黎的"呢?巴黎的很多居民都是来自外省的移民,绝大多数国家立法院议员也都来自外省。巴黎政府可以自称为整个民族说话,因为它由来自法国不同地区的人们组成。

然而,通过革命来构建新民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仅是中央将地方囊括进新政体的过程。因此,绘制革命传播与发展的地图并不容易。但是,有些问题还是要问:革命在何处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具体在什么地方,被哪些群体接受?谁对新价值观最感兴趣?谁负责将它们付诸行动?构建革命过程的这一整套政治实践的意义不可能从思想与哲学源头中求得,应该将其置于社会情境之中。自由树由某个人栽种,节庆在某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成功。象征性架构不会从天而降,也不可能从书中信手拈来,而是由那些在新政治文化提供的图景中发现有趣事物的人们搭建的。

本书的第二部分继续这种假设:是人民,尤其是共同行动的人民,创
124 造了文化。当然,不可能从相关人士的社会身份中推理出文化或政治意义,但社会身份可以为分析新政治实践的发明和确立过程提供重要线索。时人也有这种想法。1791 年,厄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称:"富人、商人、行会头领和文人……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行动者。"[①]1790

① 引自 *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 in Robert A. Smith, ed., *Burke on Revolution* (New York, 1968), 第 190 页。关于伯克的观点可参见 J. G. A. Pococ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urke's Analysi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ical Journal* 25 (1982): 331—349。

年代的法国保守派也看到了共济会会员、新教徒、愚钝的暴民、狂热的反教权者、雅各宾派，以及更广泛的胸怀抱负之人的所作所为。革命者本人非常讨厌这种区分，因为他们要强调革命的普遍性。只有敌人才喜欢搞派系斗争，自私、势利、毫无爱国心。例如1795年，保守的共和派成员波尔希·当格朗斯（Boissy d'Anglas）就坚持“法国大革命……根本不是少数个人的成果，而是启蒙与文明的结果”。①

虽然革命者更喜欢强调革命过程的普遍性，但在日常实践中还是非常关注所遇到的不同形式的抵抗。官僚机构大幅度扩大规模，以便收集民众意见。政府需要定期的报告和忠诚的仆人，以求了解地方上对其革新的不同反映。基于这种考虑，1790年代的政府收集了大量有关革命实践传播方面的信息。在公开声明国家一致性的同时，政府却在狂热地研究不一致的源头。

除了对公共秩序的传统治安关注外，革命政府在政治上最操心的是每年的选举。虽然节庆聚集了更多人众，包括没有投票权的妇女和儿童，但选举才是国家新主权的最重要表述。选举自1789年以来就是革命成就的基石；正是选举为有才华的人士开辟了政治、司法、教会，甚至 125
军事生涯。② 在旧制度下，许多高级职位都是世袭的，法官的职位作为财产由父亲传给儿子，教会和军事职位也只向有限的家族圈内的最高竞标者开放。结果，选举成了革命对抗特权的基本方式，即使在1795年之

① *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discours préliminaire* (Paris, an III), p. 7.

② Lynn Hunt, David Lansky and Paul Hanson,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Republic in France, 1795－1799: The Road to Brumair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1 (1979): 734—759.

后，也没有任何革命政府想过要放弃它。但是，选举系统也是脆弱的法治结构的最弱点。因为多数法国男性都有资格在“初级议会”中投票，所以选举为动员群众、抵制当时的政治方向提供了一个常规机会。拿破仑发动国家政变后，他的支持者就反复强调共和国时期频繁选举的危险。例如，医生卡布尼斯（Cabanis）就说：“每年的选举使人民每12个月中至少有6个月处于高烧狂热的状态。”①

于是，选举是大革命最重要的象征性实践之一。选举提供了通过实施公民职责直接参与到新国家的机会，开放了以前只有少数人才能承担的政治职务。由于选举对政治结构有这么直接的影响，所以引起了官员们的注意，也就留下了丰富的档案材料。国家档案馆的 F^{1c}III 系列很多都是关于选举结果的报道，省市档案馆中也有大量关于政府所关注问题的档案。而且，与节庆和自由树不同，选举留下了具体的结果，就是当选的投票人代表的姓名。赫拉克勒斯、玛丽安娜和三色帽饰代表的是所有人，所以很难从它们身上看到冲突与斗争。这些象征物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们缺乏特殊性。相反，那些当选的人代表的却是他们的俱乐部、
126 职业、居民区、村庄、城镇、省——以及普遍的意愿。他们从某一地方被选举出来，所以肯定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因此，选举结果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探寻在接受大革命这一点上的差异。

但这并不是说，对选举结果的解读就可以直截了当。投票人并没有就赞成或反对大革命投票，他们只是选择了能在法庭、市政当局、省级机关和国家立法院代表他们的人。选举的职位离投票人越远，他们对参选

---

① Lynn Hunt, David Lansky and Paul Hanson,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Republic in France, 1795 - 1799: The Road to Brumaire”, p. 737.

人的了解就越少。例如,立法院议员的选举要经过两个步骤:先是投票人在初级议会上选出选举人,然后每个省的选举人再到中心地点选出议员。[①] 因此,通过议员来解读公众观点就不一定确切可靠。即使在选举非常直接的地方层面,这种解读也非常困难。因为革命修辞反对党派性质的身份认同,所以党派标签的发展至少可以说是不连贯的。而且,投票是个新生事物,很难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所以投票人所占的比例会因为不同的选举,在不同的地区发生很大的差异,有时还不到 1/10。[②] 有些地方的投票成了支持政权的宣告,而不是不同政治观点的测试。

然而,选举结果还是提供了比较的可能,虽然粗糙,但也非常有趣,不容忽视。例如,对几个特定省份的研究就显示,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中确立的政治分歧出现在县与县之间,而且一直持续到 1849 年,甚至 1956 年。[③] 有史以来第一次,法国几乎全面实现了成年男性的选举权。[④] 虽然政党本身受到官方的轻视,但无疑,频繁的选择还是促进了准政党组织的发展,例如雅各宾派俱乐部。地方研究和特定选举的研究都显示,那些确实投了票的人在投票时都有着自觉的政治意识。雅各宾派俱 127

① 选举程序的描述可参见 Jacques Godecho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2nd ed. (Paris, 1968)。Jean-René Suratteau, "Heurs et malheurs de la 'sociologie électorale' pour l'épo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ESC* 28(1968): 556—580 强调了选举分析的难度。

② Melvin Edelstein, "Vers une 'sociologie électora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itadins et campagnards", *RHMC* 22(1975): 508—529 比较了各种已经出版的结果。

③ 例如可参见 Paul Bois, *Paysans de l'Ouest: Des structur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s aux options politiques depuis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 dans la Sarthe* (Le Mans, 1960)。

④ 自 1792 年开始,选举权在成年男性中几乎普及。1795 年之后,又重新开始对选举人的财产作出规定(Godecho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尽管对选举人有财产要求,甚至在 1790-1791 年只有缴纳一定平均税款的人才能参加选举的政体下,大革命时期的选举权范围也比之后 1800-1847 年的要广泛得多。

乐部从成立一开始，就在行动与口头上开展了拉选票的活动，甚至在相对压制性的督政府政权下，重新抬头的雅各宾派俱乐部还组织了示威、集会和公共宴会去影响地方投票。① 作为回应，保王党和温和派也开始发展自己的选举组织。② 大省会和巴黎的报纸为各自支持的事业呐喊助威，试图影响选民的政治选择；掌权的政府则利用特派员和地方行政人员来引导地方选举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③ 虽然投票人有时为数不多，但都不是在政治真空下做出选择的。

选举政治的发展使人们更敏锐地感受到了政治分歧的意义。在革命十年间，政治词汇急剧增长。各种称号也名目繁多，诸如民主派、共和派、爱国者、超爱国者、排他分子、雅各宾派、狂人(enragés)、无套裤汉、先贤祠伟人、山岳派(montagnards)、无政府主义者、温和派、吉伦特派、斐扬派、君主立宪派、保王党、极端保王党、联盟派等等，更不要提那些与特定政客和特定革命时期相关的许多称号了。④ 其中有很多称号到19世纪都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是，最持久的可能就是国民议会中的“左翼”和“右翼”了，它们分别指议会大厅中被主席座椅分成的左右两
128 边。米拉波(Mirabeau)将这种区分称作“议会的地理学”。就像法国整体存在空间区分，国家立法院也有空间区分：观点接近的议员会坐在中

① Michael L.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First Years* (Princeton, 1982), esp. pp. 210—223. Isser Woloch, *Jacobin Legacy: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under the Directory* (Princeton, 1970), pp. 241—271.

② W. R. Fryer, *Republic or Restoration in France? 1794－1797* (Manchester, 1965).

③ 关于政府自身的努力可参见 Jean-René Surratteau, *Les Elections de l'an VI et le "coup d'état du 22 floréal" [11 mai 1798]* (Paris, 1971)。

④ Max Frey, *Les Transformations du vocabulaire français à l'époque de la Révolution (1789－1800)* (Paris, 1925), pp. 138—167.

央走廊的同一边。① 国民公会时期，这种区分更加微妙：最激进的议员被称作山岳派（或山岳人），因为他们喜欢坐在最高排的座位；他们的政敌被称作吉伦特派，因为其中一些领导人来自首府设在波尔多（Bordeaux）的吉伦特省（Gironde）；大部分中间的较低座位则没有明确倾向，被称作平原或湿地。报纸和俱乐部向所有投票人通告了这种新的分类。

尽管对政治分歧更敏感了，但投身于政治的那批人继续沿用强调透明、美德和共同体的修辞。从 1798 年来自亚眠的一份典型的后雅各宾派竞选小册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令人焦虑的矛盾组合：

> 保王党已经在邪恶的老巢里拟好了选举人、立法委员会、行政机关和法庭的候选人名单。他们想重新启用在果月 18 日（那天在立法院发生了反保王党政变）被共和国的大棒击垮了的那批人。那么，你们在初级议会召开的那天要做什么呢？你们的任务是从第一次会议开始就拣选淘汰（如果我可以用"拣选淘汰"这个词的话），仔细寻找那些希望实践光荣职责的人……仔细观察竞选者的表情，你会发现不忠实于自己使命的人往往面色苍白。……要提名认可我们的原则，分享我们的情感的那些人，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需要的是卓越的品格、坚强的灵魂、强健的体魄和运动的精神。②

---

① Ferinand Brunot,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9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769—770; and Frey, *Les Transformations du vocabulaire*, p. 46.

② A. N., F^{1c} III Somme 9, correspondance et divers, 1789 - an IX，标题为"Aux Amis de la République"的竞选小册子，签名是索姆省（Somme）一家名叫 Caron-Berquier 的出版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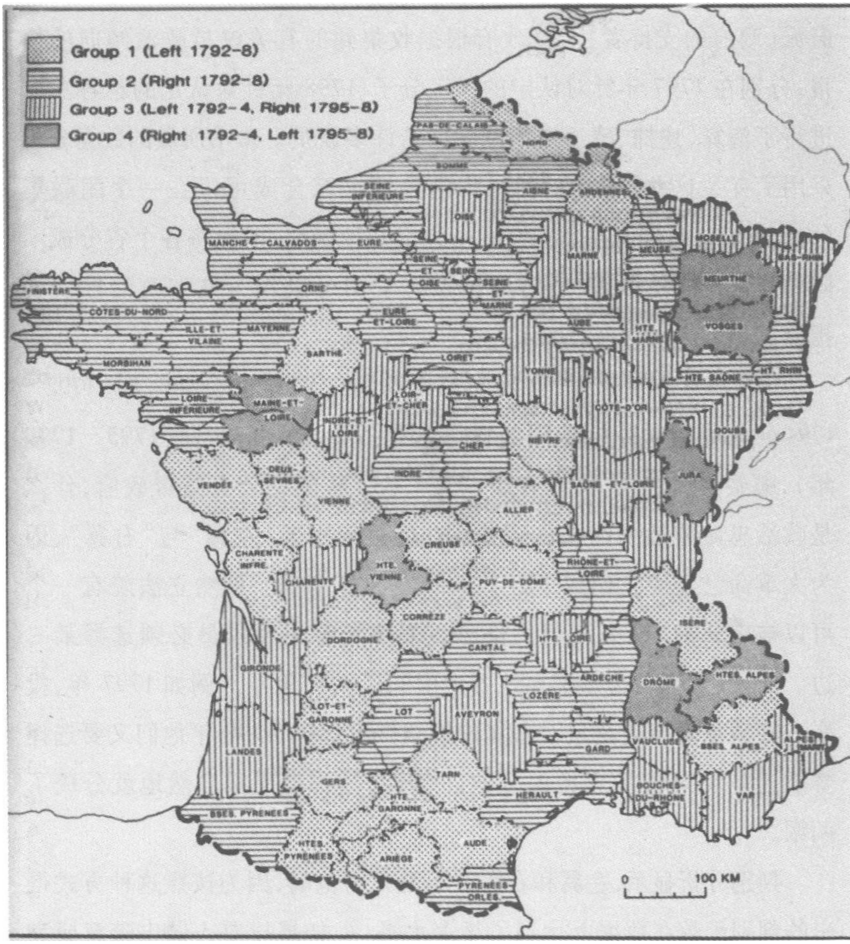
作者可以建议一些政治策略,但唯一直接提到的政党是他要反对的保王党。虽然他明白有些人支持他,有些人反对他,但却只能公开提倡一些非常模糊的品质,如精力旺盛、果敢坚决和性格坚强等。然而不久以后,这个出版商又发行了一本更加直率的小册子,这次是为了支援一家新成立的宪章圈(Constitutional Circle,重组后的雅各宾派俱乐部都被称
129 作宪章圈)。上面写道:"宪章圈要组建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行动吧。就在宪章圈,你才能找到打垮'反动派'(les réacteurs)的武器:联合起来,成为有用的人,相互支援。"①持续的政治冲突教导战斗派要一致行动。

虽然法国到处都有人坚信一致行动的重要性,但只在部分地区成功影响了选举。我们可以借助判别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的统计学技术来绘制一张有关议会选举结果的地图(见地图1)②。以前曾经有人研究过1792年国民公会议员的选举和1795-1798年督政府议员的选举,这些研究已经发现,当选的议员确实分属不同的政治团体。③ 1792年当

① A. N., F[1c] III Somme 9, correspondance et divers, 1789 - an IX,亚眠省宪章圈的小册子,日期为共和六年雨月26日,签名是宪章圈出版商Caron-Berquier。

② 此章最早发表在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4[1984]:535—559)上,其中所附地图只包括了那些具有高归类概率的省份。21个省因为缺少判别分析中一个变量的相关信息而未被包括在内。在此,所有省份都以各自的最高概率进行了归类,而忽略了其缺省值;最低概率是.63。但是,为了做进一步的分析,那些有缺省值或低归类概率(<.99)的省被排除了。参见表格1-3。对分析中的技术方面感兴趣的读者应该参考那篇论文。

③ Alison Patrick, *The Men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Political Alignments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1792* (Baltimore, 1972); and Surrateau, *Les Elections de l'an VI*, 后者还包括了1795年、1797年和1798年选举结果的地图(第298—300页)。



地图 1　大革命时期法国的政治地理图

选的议员后来分裂成山岳派、吉伦特派和中立派或平原派。更基本的分歧是关于如何适当处罚国王，一半以上的议员赞成处以死刑，不得缓刑或上诉。1795 年、1797 年和 1798 年当选的议员被各省的政府代理人分

成保王党(反革命分子)、雅各宾派(恐怖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和督政府派(政府的支持者)。督政府根据收集到的有关议员政治倾向的情报,分别在1797年针对认定的保王分子、1798年针对认定的雅各宾派
130 进行了清算,逮捕、驱逐或拒授席位给许多议员。本书所做的数据分析采用了有关这些议员的情报,将这些情报综合成可以在一个闭联集(continuum)上定位各个省份的一种或几种函数,以便将各个省分成不同的阵营。换句话说,各省的国家代表团可以作为该省政治性质的指征。

为了考察政治忠诚,必须问三个问题:(1)国民公会时期(1792-
131 1794年),哪些省属右翼,哪些省属左翼?(2)督政府时期(1795-1799年),哪些省属右翼,哪些省属左翼?(3)从国民公会到督政府,什么是政治忠诚的延续性或非延续性?这里使用了"左翼"与"右翼",因为大革命已经使它们成了经典的政治区分范畴。虽然立法院有一个可以被确认的"中央",但大部分重要决定都迫使议员必须选择某一边。而且,大部分选举都在地方上引起了两派争斗。例如1797年,投票人必须就赞成还是反对右翼的挑战做出选择;1798年他们又要选择赞成还是反对雅各宾派的复兴。①政治结构似乎很自然地就分成了两派。

判别分析显示,左翼和右翼并不是人为范畴,因为按照这种方式得出的判别函数在数据上达到了显著水平。② 如果投票人做出随意或完

---

① Surattean, *Les Elections de l'an VI*.

② 社会科学的数据程序包中,判别分析是其中的一个子程序,该程序包产生了许多显著水平测试。这里采用的显著水平标准是 .05。参见 William R. Klecka, *Discriminant Analysis*, Sage University Papers, no. 19 (Beverly Hills, 1980)。

全个人化的决定,那么各省的选择就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不仅明显不同,而且相对持久。留在相同阵营的省份比改变政治方向的省份更多(54:29)。在1795－1798年督政府时期,甚至在1792－1798年整个共和国时期,都存在延续性。在国家政治经历频繁剧变和回转的整个时期,投票人一直坚持着自己对政治范畴的感受。

地图1显示,全国选举形成了明确的地区模式。议会右翼在巴黎盆地(塞纳省[Seine]从左翼转向右翼)、罗纳山谷(Rhône Valley)和西北地区势力最强。议会左翼在中西部和西南部势力最强。从左翼转向右翼的许多省都位于以某一大城市为中心的地区,例如巴黎、波尔多(Bordeaux)、里昂(Lyon)、马赛(Marseille)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从右翼转向左翼的大部分省都位于靠近边境的山区。总的来说,左翼在边缘地区(除了东南地区)势力最强。这种地理模式非常重要,因为这显示出,雅各宾派议员从法国边缘地区获得了大部分支持,而不是中心地 132
区。[①] 巴黎在忠实于左翼这点上摇摆不定,而紧挨着巴黎的地区却通常都是忠实可靠的右翼。那些热忱地聚集在新修辞、仪式和意象周围的议员大部分都来自远离巴黎式世故的地方。

---

① 雅各宾派俱乐部基地地图显示,许多俱乐部分布在诺尔省(Nord)和西南部(还有一部分在东南部)(Michel de Certeau, Dominique Julia, and Jacques Revel, *Une politique de la langu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patois: L'Enquête de Grégoire* [Paris, 1975], p. 37)。从佩皮格南(Perpignan)和图卢兹(Toulouse)到涅夫勒省(Nièvre),然后再延伸到罗纳山谷的广大半月形地域,被理查德·寇伯称作"极端种族主义和革命极端主义"地区,这种地区划分可以与议会倾向的地图作个对比。寇伯描绘的是恐怖时期的情况,所以他的地图与我的并不完全一致。但是,雅各宾派地图和寇伯的极端主义地理都强调了南部的激进主义(*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French Popular Protest, 1789－1820* [Oxford, 1970], pp. 127—128)。

这幅地图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第一共和国时期,因为许多地区直到现在还延续着相似的投票倾向。例如,1970 年代,左翼不再掌权了,社会主义(非共产主义)力量的堡垒还是位于远北地区和中部的西南地区。[1]在 1981 年 6 月立法院的选举中,非共产主义左翼在西南部,以及中部与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表现最好。而“以前的多数派”(戴高乐派[Gaullists]和吉斯卡典派[Giscardiens])政党在法国的北半部和延伸到罗纳河的一连串外省形势最好。[2] 虽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没有人系统研究过政治忠诚的延续性,但保守的北部和更激进的南部这种分裂形势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传统”。[3] 判别分析就显示出,这种分裂其实可以追溯到第一
133 共和国时期。

---

① Hervé Le Bras and Emmanuel Todd, *L'Invention de la France: Atlas anthropologique et politique* (Paris, 1981), 地图 p. 348.

② 参见 *Le Monde*, 1981 年 6 月 16 日,第 6—7 页中发表的选举结果。

③ 经典的研究是 François Goguel, *Géographie des élections françaises de 1870 à 1951* (Paris, 1951)。勒布拉斯(Le Bras)和托德(Todd)(n. 21)的颇有争议的分析没有包括第一共和国。但他们提出法国政治分歧的长期根源是地区性家庭结构。他们识别了三种形式:核心结构地区(诺曼底[Normandy]、近西部、香槟[Champagne]、洛林[Lorraine]、布甘迪[Burgundy]、弗朗什-孔泰 [Franche-Comté]和奥尔良[Orléanais]);婚姻受到较少干预的复杂结构地区(西南部、普罗旺斯[Provence]、诺尔省);和婚姻受到控制的复杂结构地区(布瑞特尼[Brittany]、巴斯克[Basque]农村、马斯弗[Massif]中央的南部、萨瓦[Savoy]、阿尔萨斯[Alsace])。每一种形式对应一种政治结构:核心家庭结构对应着对独立与分离的向往;婚姻受到较少干预的复杂结构对应着对集体与依靠的向往;婚姻受到控制的复杂结构对应极权主义。虽然这种列表式的、有时显得表面化的分析存在许多问题,但还是暗示了一些有趣的研究方向。例如,看起来我们很可能依照其各自带有政治结果的显著文化差异将落后的西部(布瑞特尼)与落后的西南部区分开来。家庭结构很可能只是其中之一。使用一种单一原因式的阐释(家庭结构)来取代另一种单一原因式的阐释,如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虽然有一定启发,但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例如,地图 1 显示,西南部与普罗旺斯地区虽然在家庭结构上相似,但在政治上并不相同。

第二共和国时期(1849 年选举),在 1790 年代一直站在右翼这边的省份继续投票给右翼。[①]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从左翼转向右翼的省在 1849 年还是倾向于右翼。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多数是在东南地区。阿格宏在瓦尔省(Var)调查时发现,该省在大革命时期转向右翼,在 19 世纪前半期是忠实可靠的世袭王位派,但在 1848 年第二共和国时期又转变成了激进的共和派。[②] 临近各省也发生过明显的类似情况。

然而,除了在远北地区和中部的西南地区有一些重要特例之外,第一共和国时期给左翼投票的省在政治忠诚上远远比不上那些投票给右翼的省。从左翼转向右翼的省比从右翼转向左翼的省更多。而且,从长远来看,南部这个总的来说更愿意接纳左翼的地区,事实证明比北部易变得多。不仅东南部有许多省从左翼转向右翼,后来在 1849 年又重新转回左翼,而且西部到 1849 年也有很多省从左翼转向了右翼。旺代 134
(Vendée)、德塞夫勒(Deux-Sèvres)和下夏朗德(Charente-Inférieure)各省在 1849 年投给左翼的选票都少于 20%。

旺代各省的剧变可以例证立法院选举研究上的不足。这些省位于

---

① 参见 Maurice Agulhon, *1848 ou l'apprentissage de la République, 1848 - 1852* (Paris, 1973)中第 174 页的地图。这种比较在亨特的"The Political Geography"中有更详细的讨论。与 1849 年进行比较非常重要,因为第二共和国的选举与第一共和国时期的选举在广泛的选举权上非常相似。相同的地区模式在 1820 和 1830 年代看起来并未形成(Thomas D. Beck, *French Legislators, 1800 - 1834* [Berkeley, 1974]; Patrick-Bernard Higonnet, "La Composition de la Chambre des Deputes de 1827 a 1831", *Revue historique* 239 [1968]: 351—378)。但是,与两次共和国之间的时期相比就很困难,因为这一时期的选举权定义比两次共和国时期的更严格。因此,共和派左翼可能代表不多;当时的反对派更像共和派右翼。

② 阿格宏没有具体讨论革命时期,所以对于瓦尔省的这种转变原因不明(*La Vie sociale en Provence intérieure au lendemain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1970] 与 *La République au village* [Paris, 1970])。

臭名昭著的旺代地区,在第一共和国时期被民众的反革命运动包围。为了对付这种威胁,当地的共和派显要们为激进共和派(即左翼议员)提供了有限但坚决的选举支持,而叛乱者又不投票,于是雅各宾派获得了很大空间。在旺代,甚至督政府也鼓励雅各宾派成为反对叛乱者的制衡力量;督政府并没有像在其他地区那样坚定地压制左翼,因为在旺代,无论左翼多么激进,督政府也承担不了疏远共和国支持者的严重后果。① 所以,虽然旺代的群众对共和制并不热衷,但投票人还是能够表达对左翼的支持。然而在 1790 年代以后,这种形势却没有延续,旺代地区,除了萨尔特省和曼恩-鲁瓦尔省(Maine-et-Loire),在 19 世纪又回到了右翼。

第一共和国时期投票的地理模式具有社会意义。事实上,左翼地区和右翼地区的社会差别,比它们在革命剧变中的不同经历意义更重
135 大。② 选择左翼还是右翼与该省的迁出率、恐怖时期的死刑率和地方牧师对大革命的态度都无关(见表 1)。

---

① Marcel Reinhard, *Le Département de la Sarthe sous le régime directorial* (St. Brieuc, 1935).

② 在 William Brustein, "A Regional Mode-of-Production Analysis of Political Behavior: The Cases of Western and Mediterranean Fra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10(1981): 355—398 中可以看出他试图解释现代时期的地区差异。他使用了 1849 年、1885 年、1936 年和 1978 年的全国选举结果,尤其着重西部的右翼投票和地中海沿岸各省的左翼投票。这种选择削弱了与革命时期作比较的有效性,因为左翼在这些地区之间的地域实力最强。正如 Brustein 自己所承认的,他的关于生产方式效果的模式最适合 1936 年和 1978 年的选举(第 396 页)。Brustein 对物质利益的合理计算与 Yves-Marie Bercé 所坚持的西南部长期持续地区性反叛的观点(*Croquants et Nu-pieds: Les Soulèvement paysans en France du XVIe au XIXe siècle* [Paris, 1974])截然相反。17 世纪农民起义的地图与大革命时期左翼投票的地图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有重叠。Bercé 本人对革命时期所说不多。

表 1　政治派别和革命经验表(平均数)

政治派别	教士宣誓率(百分比)	迁出人口数(每 100,000 人)	恐怖时期死亡人数(每 100,000 人)
左翼(N=16)[a]	50	337	50
右翼(N=21)	50	310	75
转右翼(N=15)	61	793	49
转左翼(N=5)	62	304	2

资料来源:参见附录 A 中 OATH、EMIPER、TERPER 项。

[a]为了便于比较,这里只包括可信度高的省。参见本书第 154 页注释②。

考虑到宗教感情和政治信仰之间在 19 和 20 世纪确实存在某种关联(坚持宗教实践的地区投票给右翼),我们可以认为它们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也存在某种联系。① 但表 1 却显示左翼和右翼在这一项上并没有差别。而且,在更易摇摆的省(那些转变信念的省),神职人员尤其恭顺,所以,牧师的态度没有产生明显的政治效果。表 1 中值得注意的只有转向右翼的省迁出率高,转向左翼的省在恐怖时期死亡率较低。但是,这些数字也很难说明什么问题。高迁出率可能造成转向右翼的省内政治形势不稳定,但是,为什么恐怖时期的低死亡率会促使一些省转向左翼,而没有让他们对当时的掌权政府感到满意呢? 似乎没有理由。

以所有省为基础而不管政治范畴所做的相关性(correlation)分析,同样没有显示大革命时期的特殊经历(例如人口迁出)与投票选择之间的联系(见附录 A)。例如,省代表关于审判国王的表决与省教士宣誓率 136

① 但是很明显,宗教在某些地区是一个因素(Timothy Tackett, "The West in France in 1789: The Religious Factor in the Origins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4[1982]: 715—745)。

之间的相关性几乎近似随机(r=-.04)。但是,迁出率和处决率同教士宣誓率成反比(对比度分别是 r=-.26 和 r=-.23):教士越不恭顺,该省的迁出率和恐怖时期的死亡率就越高。但是,这些创伤性经历对国家选举的影响都不大。

相反,左翼和右翼的经济差异和社会差异却很重要(见表2)。

表2 不同政治倾向之省份的社会差异表(平均数)

政治派别	与巴黎的距离(法国古里)	识字率(百分比)	城市化(百分比)	土地税(人均法郎×1000)
左翼(N=16)	129	22	14	80
右翼(N=21)	68	41	17	91
转右翼(N=15)	95	31	26	91
转左翼(N=5)	126	51	14	13

资料来源:参见附录 A 中的 DISTPAR、TOTLIT、URB1806、PCFONC 项。

左翼在远离巴黎的地区非常成功,在那里,相对来说人口城市化水平不高(法国整体的城市化平均水平不高,是 18.8%),[1]也不富庶,而且识字率低于平均水平(所有省的比率是 33.3%)。[2] 转向左翼的省数量很少,所以很难有所发现,但山区几个省比较突出,平均识字率高、城市化低、
137 人均土地税低。[3] 尤其是东部山区,在旧制度下就因高识字率闻名,但地势却不适宜发展大城镇和密集型农业。

---

① 报道的平均数引自 René Le Mée(附录 A,URB1806 项)。此处所提到的 83 个省的平均数是 17%。

② 这里使用了男女平均识字率,不只是男性识字率。男性识字率与"整体识字率"的比率为 .98,女性识字率与整体识字率的比率为 .96。

③ 而且,转向左翼的省用于农业的土地面积更少。转向左翼的省平均值为 42,000 公顷,左翼省是 55,000 公顷;右翼省是 61,000 公顷,转向右翼的省是 53,000 公顷(附录 A,AGPROD 项)。

右翼有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成分:一种是坚定的右翼省,富裕、发展农业、识字率高、距巴黎近;另一种是转向右翼的省,相比于右翼省,偏远、城市化高、识字率低。从转向右翼省的社会经济特征中可以看出,一些周边大城市(最主要有马赛、波尔多和斯特拉斯堡)在 1794 年之后从左翼转向右翼的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巴黎及其所在的塞纳省也属于此列。最易变的省,尤其是转向右翼的省,往往城市化较高。最坚定的政治选择(坚持右或左翼,没有任何转向)则主要发生在以农业为主的偏远地区。那么,爱德华·怀汀·福克斯(Edward Whiting Fox)的两个法国之说就不准确,因为当时似乎存在至少 4 到 5 个法国。本书没有将法国区分为内地城镇和周边城市两部分,而是认为内地本身也可以更深入地区分为右翼和左翼。周边商业大城市的地位很关键,但并没有促使它们所处的省去支持吉尔特派,而是推动这些省在恐怖时期之后支持吉尔特派的继任者,即议会右翼。① 在这方面,周边城市与巴黎处于同一阵线,没什么不同。

如果将比较范围缩小到右翼省和左翼省之间,那么社会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就更明显(见表 3)。

为了比较,我们就要选择分类可能性最高的省。我从北部的坚定右翼群体中选了 11 个省,没有包括布利特尼和南部的几个偏远省份,保留了奥布省(Aube)、卡尔瓦多斯省(Calvados)、厄尔省(Eure)、卢瓦雷省(Loiret)、芒什省(Manche)、奥恩省(Orne)、加莱海峡省(Pas-de-Calais)、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塞纳-瓦兹省(Seine-et-Oise)、下塞纳省(Seine-Inférieure)和索姆省(Somme)。从坚定的左翼群体中选了中部

① Fox,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The Other France* (New York, 1971).

表3 抽样省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数据表

样本省政治派别	识字率（%）	城市化（%）	土地税（人均法郎×1000）	教士宣誓率（%）	恐怖时期死亡人数（每100,000人）	迁出人口数（每100,000人）
左翼（N=9）	19	11	75	50	4	263
右翼（N=11）	54	18	118	57	12	330
所有省（N=83）	33	17	84	53	45	452

资料来源：参见表1和表2。

138 和西南地区的9个省（旺代各省由于情况特殊，不予考虑）。左翼省的低迁出率和低死刑率在这里微不足道，因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在这两点上都远远低于平均值；政治立场坚定的省在恐怖时期的痛苦经历并不多。无论议会的左翼核心还是右翼核心，都不是应大革命时期的剧烈经历而形成的。然而，他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却惊人：右翼地区富庶、识字率高；左翼地区相对贫穷、明显未被城市化、识字率也低。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农业内地：一种现代、富庶，临近巴黎；另一种落后、远离农业和商业主流。

考虑到18世纪的数据测算不充分，我们即使将社会经济因素单独抽离出来，也很难精确推测它们如何运作。例如，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认为反革命的产生是由于城市化增长率的不平衡，但我们不可能证明这种假设，因为我们能够得到的各省信息只能描述城市化水平，不能说
139 明城市增长率。① 而且，社会经济因素在抽离状态下也不能被充分处理，因为它们的效果会随情境不同而有所变化。城市化就是一个例子。②

---

① Tilly, *The Vendée* (Cambridge, Mass., 1964).

② 同上，及 Gilbert Shapiro, John Markoff, and Sasha R. Weitman, "Quantitative Studi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y and Theory* 12(1973): 163—191 中综述的各种研究中都强调了城市化的重要性。

表 2 和 3 显示,坚定的右翼省和后来转向右翼的省都可能城市化程度很高。但是,所有省的部分相关性(附录 A 的相关矩阵图)却显示,相同的城市化水平产生了不同、甚至相对的政治选择。城市化在 1797 年与右翼的支持率成正比(r = .64),在 1798 年与左翼的支持率成正比(r = .41),而在 1799 年又与波拿巴政变的支持率成正比(r = .41)。换句话说,高度城市化的省有时会每年转变政治忠诚的方向,所以只考虑城市化是很难预测各省如何做出政治选择的。

本书提供的只是关于不同地区政治文化发展的一套假设。这些假设与表 1 和 3 中的信息一致,但却不能通过计量方法得到证实。地区政治文化在社会和经济因素所设定的范围内发展,但不仅仅是从这些因素到政治的简单转化。地区的政府代理人很快就发现,地方与区域政治的关键是要发展个人关系的同心圆。政府需要个人接触来获得信息,相互竞争的政治组织也需要这种联系来赢得选举胜利。正如 1798 年一个省代理人给内务大臣写信称:"每个乡村都有一定数量的精力充沛、品德高尚的人真诚拥护共和国。他们具备必要的影响力,可以让心怀不轨的人保持中立,引导人们做出有利于革命的选择。"[①]雅各宾派和保王党的思想都是通过小册子、宣传书和报纸得到传播,但只有确保这些信息能在
个人、村庄和俱乐部之间传递下去,它们才能扎下根。有些地方,雅各宾 140
派的信息传递得又快又远;但在另一些地方,抵制革新、秘密支持复辟的观点却占了上风。我们还应该在有关接受不同形式政治关系的地方模式中寻找变量。

---

① A. N., F^{1c} III Vendée 7, Correspondance et divers, 1789 – 1815,省代理人写给省行政部门的信,共和六年风月 19 日。

群众保王党除了在许多农村里组建了反对共和国的准军事部队，还在大城市里利用老主顾的关系建立了基地。在有些地方，可能最早是联盟派网络建立了这种模式。[①] 1794 年以后，群众保王党在巴黎和里昂都有了牢固的基地，官员们担心这种基地也会从其他大城市向外扩张。[②] 例如，1799 年，一份警察报告就气急败坏地称，路易十六的支持者在波尔多市内建立了庞大的准军事组织。[③] 1799 年 4 月一份官方报告得出结论说，只有 8 个省才是可靠的共和派：克勒兹省（Creuse）、默尔特省（Meurthe）、上索恩省（Haute-Saône）、上比利牛斯省（Hautes-Pyrénées）、菲尼斯太尔省（Finistère）、汝拉省（Jura）、上加龙省（Haute-Garonne）和东比利牛斯省（Pyrénées-Orientales）。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地区只有两个大城市（南锡[Nancy]和图卢兹）。那时，其他所有地方都有嫌疑。[④]

有关里昂和马赛的研究显示，大城市有大量流动人口，包括经常失业的日间工人和周薪工人，他们与索布尔笔下更稳定更好斗的无套裤汉有很大不同。[⑤] 在食物短缺和政治不稳定时，他们很乐意被那些靠老主

---

① 关于联盟运动中委托关系的启示性评论可参见 Paul Richard Hanson, "The Federalist Revolt of 179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aen and Limoges"，博士论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 年，尤其是第 337—423 页。

② 关于里昂，参见 A. N., F^7 6759, Police générale: Troubles à Lyon。

③ A. N., F^7 6216, Affaires politiques, an V – 1830, no. 3963, "Conspiration de la Gironde"，治安部给督政府的报告。

④ "Résumé des comptes-rendus a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par les Commissaires du Directoire éxécutif près les administrations centrales des départements, pendant le mois de floréal an VII", reprinted in Félix Rocquain, *L'Etat de la France au 18 brumaire* (Paris, 1874), p. 380.

⑤ Albert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 2nd ed. (Paris, 1962). Michel Vovelle 在其 "Le Prolétariat flottant à Marseille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nnales de démograhie historique*, 1968, 第 111—138 页中简要提到了此问题。

顾关系组织起来的右翼群体所雇用。例如,警察报告称,在1796年9月
的波尔多,市里有钱的商人和货主领导发动了一次反雅各宾派暴动,吸
引了许多在夏特朗区(Chartron)作坊和仓库工作的工人与手艺人。[1] 如 141
果将时间限定在恐怖时期,巴黎在这方面似乎是个例外,因为在恐怖时
期反而是雅各宾派成功地发动了一部分手艺人和工薪人员。但在1794
年之后,巴黎还是被共和派右翼成功地控制了。城市在大革命之前的几
十年中迅猛发展;农业歉收和战争引起的食物短缺造成了经济混乱;地
方俱乐部解体后,民众变得冷淡默然;恐怖政策导致了激烈分歧(在高度
城市化的省,被处死的人也更多);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存在宗教冲突,所
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大城市里的混乱和剧变。[2]

西南部和中西部的左翼省都聚集在几个"老"城市(就是有些人所谓的"villes-villes")周围,这些"老"城市是相对于那些新工业或商业中心而言的。其中,"红色"图卢兹最大,也最让督政府烦忧,但是,雅各宾派和新雅各宾派在西南许多类似小镇上都有类似的组织。沃洛克(Woloch)在他有关1798年选举的研究中就发现,在布里弗(Brive)、杜勒(Tulle)(都在克雷兹省[Corrèze]),佩里格([Perigueux],在多尔多涅省[Dordogne]),奥科([Auch],在热尔省),科勒蒙(Clermont),以及伊斯瓦([Issoire],在多姆山省[Puy-de-Dôme]),都有雅各宾派的重要根据地。[3] 传统上,这些小

① Gaston Ducaunnès-Duval, *Ville de Bordeaux: Inventaire-Sommaire des Archives municipales: Période révolutionnaire (1789 - an VIII)*, 4 vols. (Bordeaux, 1896 - 1929) 3: 37 (共和五年葡月8日文件的重印版)。

② 例如可参见 Gwynne Lewis, *The Second Vendée: The Continuity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Gard, 1789 - 1815* (Oxford, 1978)。

③ *Jacobin Legacy*, p. 283.

镇在所处的相对落后的地区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虽然它们中没有一个是快速成长的工业或制造业中心（即使不是全部，很多地方的发展也还是相对停滞），但在贫穷而且居民几乎都是文盲的内地，还是作为商业和文化中心脱颖而出。

西南部的这些小城市成了左翼传统的持久中心，因为雅各宾派不仅能在城镇建立影响，还能将影响扩展到周边的农村地区。例如，布瓦斯（Bois）的关于萨尔特省（Sarthe）的研究就显示，1792 年至 1793 年，雅各宾派将总部设在城镇（尤其在勒芒［Le Mans］）和村镇，这样就能够在萨
142 尔特省的东半部和省选举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主导地位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东半部的农民非常贫穷，必须依靠城镇组织的增补纺织业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正如市里的商人能通过商业关系渗透到农村，雅各宾派也能通过他们的新政治关系渗透进农村。在有些地方，他们遭到更富裕、更独立的农民的反抗，比如在该省的西半部，革命失败了，反革命运动建立了基地。[①]

马塞尔·瑞哈德（Marcel Reinhard）论述了这种渗透在 1794 年以后在萨尔特省是如何继续的。在 1798 年雅各宾派的复兴期，勒芒的雅各宾派建立了宪章圈，并在不久以后扩大了影响。几乎每个休息日（décadi，革命立法的休息日），宪章圈都组织行进到附近城镇或村庄的游行；到目的地后，每个参加者种植自由树，分发“公民汤”，一个新宪章圈的成立可能将活动推向高潮。不久以后，其他宪章圈也组织相同的游行。他们在该省的东半部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这恰好也是早期雅各宾派赢得支持的地方。在全体会议上，宪章圈起草候选人名单，并将其发行

① *Paysans de l'Ouest*.

流通。[①]

在中部和西南部投票给左翼的省内,相同的故事也一再上演。雅各宾派不一定要获取民众的热情,正如维埃纳省(Vienne)的行政机构于1798 年所说:"民众在大革命中根本不重要"。[②] 但是,他们却赢得了为选举胜利而积极工作的坚定皈依者。在维埃纳省的省会布瓦蒂尔斯(Poitiers),宪章圈到 1798 年春季已经拥有了 600 名会员,而且在该省的其他城镇还有一些附属小社团。1798 年的胜利通常可以反映革命早期所取得的成果。例如在 1791 年 3 月的热尔省,有 14 个雅各宾派俱乐部与巴黎俱乐部有联系。奥科俱乐部是最早的一个,与图卢兹更大的俱乐 143
部联系紧密。[③] 在阿里埃日省(Ariège),图卢兹的雅各宾派俱乐部影响力太大,以至于省行政部门在 1792 年向内务大臣抱怨。[④] 小的村俱乐部附属于更大的市级俱乐部,更大的俱乐部则相互依存,共同附属于巴黎。

雅各宾派俱乐部的商人、律师、店主和手艺人能够实施影响,部分是因为他们在这些省鲜有对手。在坚定的左翼省中,除了图卢兹、格勒诺布尔和杜阿(Douai)之外,没有任何城市曾经产生过高等法院或具备贵族身份的地方官员。而且,教士对大革命也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城镇和市场中心的那些小人物就有了机会,可以行使新权力。在中部和西南部,这些人是当地为数不多的识文断字之人。法国南部整体上比北部的

① Reinhard, *Le Département de la Sarthe*.

② 来自 Roger Doucet, *L'Esprit public dans le départment de la Vienn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Paris, 1910), 第 263 页中的引文。

③ G. Brégail, "Le Ger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et d'archéologie du Gers* 30(1929): 89—120, 224—259, 354—377.

④ G. Arnaud,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l'Ariège (1789 - 1795)* (Toulouse, 1904), p. 309.

识字率低，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识字率差距在南方也比在北方严重得多，但在北方较新的工业城镇里，识字率却非常低。① 例如，克雷兹省那些不识字、母语非法语的农民就可能跟随布里弗和杜勒两地的领导，然而卡尔瓦多斯省能读会写的富庶农民就很少会仰赖冈地(Caen)在思想和政治上的领导。

正如上文所述，共和派显要们的统治在左翼省没有受到来自上层的挑战，同样也没有遭到来自下层的威胁。因为，所有左翼省(除了普遍情况有些例外的诺尔省)都没有具备大型工人阶级共同体的大城市(类似于北部的鲁昂[Rouen]和南部的马赛[Marseille])，所以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人无需面对由于动员大批无技术、经常处于失
144 业和饥饿状态的下层人民而引发的问题。没有大城市里来自工人、贵族、抗拒的教士和分裂的资产阶级(例如，除了诺尔省之外，左翼省都没有大型的富裕商人共同体，至少没有任何一个能与波尔多或南特[Nantes]的相比)所造成的困扰，左翼省内并不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可以不受阻碍地实践他们的共和主义思想了。

所以吊诡的是，左翼——运动的政党——的政治文化在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甚至停滞的情境下牢牢地扎下了根。在快速变化的政治世界中，那些在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中有着最少痛苦经历的人在新政治秩序到来之时却有了最多的期盼。

相反，右翼共和主义思想和保王党的想法却吸引了居住在最有可能发生社会冲突地区里的政治显要们。例如在萨尔特这个农业省，纺织品

① 关于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可参见 François Furet and Jacques Ozouf, *Lire et écrire*: *L'Alphabétisation des français de Calvin à Jules Ferry* (Paris, 1977), 第229—245页。

纺织为贫穷的农民提供了额外收入,也加固了共和派资产阶级所看重的主顾关系网。但在更加城市化的省,纺织品纺织却将农民从农村赶到了城市。在城市,农民对资产阶级的控制构成了较大的潜在威胁。面临大批失业、难以管制的工人,这些省的贵族们转向了右翼,因为民主和平等对他们而言意义不同,威胁更大。大革命已经显示了政治动员的危险。同样,北部大农场和谷物生产区的地主们,不管是老地主还是新地主,都没有发现动员无地的农民和小农场主有什么好处。快速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经历助长了有利于右翼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例如,对波拿巴政变的支持就与城市化、识字率、财富及以前对右翼的支持成正比(见附录 A)。[1] 145

---

① 另参见 Hunt, Lansky, and Hanson,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Republic"。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知之甚少,不足以得出更精确的判断。关于全国土地销售的系统化比较可能提供更多信息。布瓦斯指出,这是萨尔特省的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关键差别之一:在西部反革命地区,教区土地更多,而且更多土地由非居民的市民耕种。乔治·勒弗布尔(George Lefebvre)发现在诺尔省,农民可以购买相当多的土地,但是他没有将土地销售与选举模式进行纵列比较(*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Bari,1959], pp. 514—523)。可惜的是,大部分关于销售的研究都集中在法国北部,而且研究所显示的土地销售对农民的影响也有不同。综述可参见 Michel Vovelle, *La Chute de la monarchie, 1787 - 1792* (Paris,1972), 第 195 页。

自 Andre Siegfried 的著作以后,评论家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土地保有权之规定的影响上,但事实证明,整体模式很难得到确立。参见Theodore Zeldin, *France, 1848 - 1945: Politics and Anger* (Oxford, 1979), 第1—28 页中的评论。Brustein 试图系统化探索 19 和 20 世纪法国政治中的该变量。在更地方性的层面上,T. J. A. Le Goff 也强调了该因素:*Vannes and its Region: A Study of Town and Country in Eighteen-Century France* (Oxford,1981)。还没有人能成功地在全国层面上整体性研究该因素。

Dominique Margairaz 最近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价格研究展示了一幅有趣的地区与政治的交叠地图:在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北部,粮食价格低,但牛肉价格高;在东南部,粮食价格高,而肉的价格低;在西南部,肉的价格低,而粮食价格不定。Margairaz 将这些差异归因于发展的不同("Dénivellations des prix et inégalités de développement régional dans la France de 1790: Essai de cartographie", *AHRF* 53[1981]: 262—278)。

相反,在西南部和中西部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更加封闭的普通群众却赞同雅各宾派。一些城市和小城镇里的雅各宾派不仅能控制大部分俱乐部,还能控制许多新的地方机关,这些地区的俱乐部和执政机关往往包括了无套裤汉的上层和共和派资产阶级(见第五章关于图卢兹的情况)。在远离巴黎的地区,没有快速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也没有重要的宗教分裂,地方共和主义昌盛兴旺。在这些地方,对心里话的强调、简朴民间故事里的美德和出于教化目的的政治活动都有着良好的听众。

以全国为基础的计量分析不能显示政治文化在地方层面的运作,只能揭示在何种情境下不同的政治选择是如何做出的。但是,这些数字确实否定了某些说法。例如,分析表明,尽管 1793 年至 1794 年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联盟非常重要,但巴黎并不是全国政治的范本,至少不是持久性左翼政治的范本。同时,数据分析还显示,革命法国的特色并不是极端的单一主义,法国也不是一幅由居民区、村庄、城镇和外省完全随
146 意组合的拼贴画。确实,不能根据阶级或地区,或现代还是落后,就将法国一清二楚地一切为二。北部的资产阶级与南部的资产阶级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北部的部分地区选左翼,南部的部分地区选右翼;一些落后地区是右翼,而另一些则是左翼。但是,这种区分也不是随意的。在有些地方,城镇和村庄的雅各宾派能发展出有利于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修辞的关系和组织,左翼就赢得了选举;在别的地方,保王党和/或具有共和性质的某些派系鼓动追随者发起反对共和派革新的运动,右翼就赢得了选举。

这里展示了左翼和右翼的一些区别,但有些依旧很神秘。例如,人们对地方文化如何重新构建政治发展这一点上还是知之甚少。关于 18 世纪共济会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共济会会所的扩展与人口密度、地方

财富模式或识字率并不成正比，然而人口少于 2，000 并拥有共济会会所的城镇地图却提供了有趣的发现：这些城镇也是 1790 年代左翼获得成功的地方，这种城镇在法国西南部分布最稠密，北半部最稀疏。① 那么有可能，虽然会所不会自动转变成雅各宾派俱乐部，②但共济会和雅各宾派还是反映出了会产生明显政治结果的社会和文化倾向。西南部的小镇式社交可能让居民更容易接受共和国的承诺。

尽管革命的政治地理学这种分析存在一定缺陷，但还是暗示了研究的新方向。为什么政治会有地区基础？假如有 4 或 5 个不同地区（反革命的西部、右翼的北部、左翼的西南部和易变并经常发生暴动的东南部），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异？每个地区的政治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尽管这些问题还没有完整的答案，但是地图本身却为我们叙述了许多有
趣的故事。革命的修辞吸引了法国的周边地区和居住在经济、社会与文 147
化落后地区的人们。然而，这些人却站在了参与和归属的前沿阵地上，相信政治能改变日常生活并随之改变人类的品性。在下一章，分析的重
点要从地域转向人，以图确定是哪个群体领导了这一进程。 148

---

① 参见 Ran Yedid-Halévi, "La Sociabilité maçonnique et les origines de la pratique démocratique", *Thèse de 3e cycle* (Paris: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1)第 84 页的地图。

②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s*, pp. 5—7.

第五章 新政治阶级

近来关于革命者社会身份的著作大致可以被分成两大针锋相对的阵营。在一个阵营,已故的阿尔伯特·索布尔及其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强调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有组织、有意识形态的运动。[①] 在他们的著作中,革命者看上去都是坚定的战斗派,分享一定的社会观(人人平等的思想),虽然他们可能只是暂时团结在一起,但由于政治目标(比如保卫共和国、相信民主、反对旧制度)相同,所以团结得特别紧密。这种观点认为,资产阶级雅各宾派和小资产阶级无套裤汉的革命联盟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

在另一个阵营,修正主义则提醒人们注意,许多根本不适合任何可预测的社会阶级架构的群体,并不一定代表某种高尚利益。寇班认为,革命资产阶级由"衰落的"职业人士和王室官员组成,而不是"崛起的"资本主义商人和制造商。[②] 寇伯提出了一种更极端的修正主义观点,主要研究战斗精神的个人基础和心理基础。例如,他认为无套裤汉是"自然的怪胎,是一种思想状态,而不是社会、政治或经济的完整体"。[③] 在寇班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革命者似乎是正常社会的边缘人,是社会和

① 尤其参见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 2nd ed. (Paris, 1962)。

②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1964), esp. pp. 54—67.

③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French Popular Protest, 1789 - 1820* (Oxford, 1970), p. 200.

政治垮塌的产物，而不是经久不衰的新秩序的建构者。 149

大部分有关社会性阐述的争论都只有相当有限的论据，比如一个城市中无套裤汉运动的社会构成，一两次国民议会议员的职业，或一次立法院上的派系差别。[①] 我认为，革命政治行动的社会情境中有三个决定因素，即地理位置、社会身份和文化联系与价值观。第四章已经阐述了革命行动具有显著的地区模式，最革命的省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相对落后。在这一章，我要系统地分析革命精英的社会身份。通过回顾可以看出，新政治阶级可以通过文化地位和关系被界定，同样也可以通过从属的不同职业的社会群体被界定。

寇班基于对制宪议会（参加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们）和国民公会的职业分析，坚持认为，“是官员（指王室官员，大部分有世袭职位）和自由职业人士筹划并指导了革命”。[②] 对于革命方向是否仅由几个全国领袖来决定这一点还不确定，而且寇班的断言也不完全正确。如果将该分析延续到督政府时代，他就会发现王室官员的比例在缩减。即使在国家立法院，王室官员开始时占据第三等级中将近一半的议员席位，到公会时期只有 1/4，到督政府时期就只剩下 1/8 了。[③] 旧制度下的官员并

① 例如，Elizabeth Eisenstein 的文章“Who Intervened in 1788? A Commentary on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1(1965)：77—103 引发了进一步的争论。在早期关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性阐释的争论中，缺乏论据是其固有的弱点。

②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p. 61; and Cobba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1970), pp. 109—111.

③ Lynn Hunt, David Lansky, and Paul Hanson,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Republic, 1795 - 1799: The Road to Brumair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1(1979): 734—759, esp. p. 746.

不能指导大革命；虽然最初他们参加的人数众多，但之后却持续减少。

然而，寇班关于国家议员的论述另外一半却是正确的：他们中大部分虽然以前并不是什么王室官员，但都是律师，或从事其他受过专业训练的
150 职业。商人在立法机关中所占比例从来没有超过 14%，而且，在革命十年里，商人的数量一直在缩减，到督政府委员会时就只有 4% 了。[①] 商人议员的数量稳步递减，这说明立法机关正在专业化，投票人越来越钟情于专业政客，而不是受人尊敬的地方显贵。国家议员的年龄也能显示这种偏好：他们都不会比地方官员年长。也就是说，投票人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技术，而不是因为他们在地方上更年长或更显贵。例如，1795 年督政府议员的平均年龄是 43 岁。1789 年，制宪会议里 32% 的议员年龄低于 40 岁；1793 年，国民公会里 46% 的议员不到 40 岁；1795 年，督政府议员中 40% 不到 40 岁。[②] 地方领袖的年龄也差不多。例如，在南锡，市议员的平均年龄在君主立宪时期是 43 岁，恐怖时期是 43 岁，督政府时期是 47 岁。[③] 换句话说，国家议员与地方官员是从同一批人中选出的。

---

① 关于制宪会议可参见 Edna-Hindie Lemay, "La Composition de l'Assemblée natinale constituante: Les Hommes de la continuité?" *RHMC* 24(1977): 341—363, esp. p. 345。关于公会可参见 Alison Patrick, *The Men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Political Alignments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1792* (Baltimore, 1972), p. 260 ("商人"议员 = 9%)。督政府委员会的数据(3%，但如果将未知情况排除的话，是 4%)基础是 Autuste Kuscinske, *Les Députés au Corps législative, Conseil des Cinq Cents, Conseil des Anciens, de l'an IV a l'an VIII* (Paris, 1905)中 100 名议员的随机样本。

② 三个立法机构的年龄分布概要可参见 Hunt, Lansky, and Hanson,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Republic", 第 745 页。

③ 资料来源参见附录 B。1790 年至 1799 年 71% 的市议员有年龄记录。提供的是特定时期所有官吏的年龄，即 1790 年、1793 年和 1795 年。市议员并不比普通战斗派年龄更大。例如，Martyn Lyons 发现，在图卢兹的革命特派员的平均年龄在 1793 年是 45 岁(*Revolution in Toulouse: An Essay on Provincial Terrorism* [Berne, 1978], p. 188)。

议员通常都带着一些政治经验走向国家职位，但这种政治经验的性质却一年年地发生了变化。不仅前王室官员的数量在减少，而且前议员的比例也在下降。国民公会议员中只有37%曾任过议员，虽然即将闭 151
幕的国民公会颁布法令，规定在第一届督政府立法机关必须有2/3的议员是国民公会议员，但是，公会议员的比例还是在每次选举中急剧减少，从共和四年的67%缩减到共和七年的12%。曾经在以前的立法机关任职的议员数量（包括从1789年至1794年的所有立法机关）从共和四年的77%下降到了共和七年的16%。到共和七年，议员中只有4%曾经任职于最初的制宪（或国民）议会。① 这些议员在数量上经常被第一次走上职位的人超过。这种形势让一个观察者醒悟，"人们无可奈何地看到了（给大革命造成烦扰的主要原因），那就是许多新人被仓促推上了新职位……这些新人即将成为派系斗争中的玩偶"。② 专业化并没有让职位永久。

虽然许多议员第一次承担国家职务，但在地方事务中却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几乎大部分（86%）公会议员都承担过某种革命职务，即使在共和七年的督政府立法院中也有3/4的议员曾经效力于地方机关。③

---

① 关于国民公会可参见 Patrick, *The Men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第204页；关于督政府议员可参见 Hunt, Lansky, and Hanson,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Republic", 第750页。

② Quatremère de Quincy, *La Véritable liste des candidats, précédée d'observations sur la nature de l'institution des candidats, et son application au gouvernement répresentatif*, 2nd ed. (Paris, 1797), pp. 37, 39.

③ Alison Patrick 并没有提供国民公会议员中地方官吏的具体数据；86%这一数据是从她的表格（*The Men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p. 203）中推算出来的（通过将那些没有经历的和那些只是俱乐部成员或记者的人相加，并将所得之和从议员总数中减去）。督政府议员的数据来自 Hunt, Lansky and Hanson,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Republic", 第747页。

因此,虽然他们比较年轻,是新手,但还是经常出现在巴黎的政治情景中,他们带着政治经验和专业背景走上了新职位。而且,不断有议员以同样的路线来到巴黎。最显著的预备处所之一就是省行政机关。例如,阿利埃省(Allier)中11个行政官员有4个成了国家议员,其他省议员中
152 也有10个得到了类似的提升。在马恩省(Marne),9个行政官员中有3个后来任职于国家立法机关;在上索恩省,10个省议员成了国家议员。①相反,在以前革命议会中任职的人往往后来回到家乡,任职于地方机关。例如,当埃梯恩·杜耶(Etienne Douyet)在1790年当选为阿利埃省议员时,还是个36岁的公证员。在立法议会任职之后,他回到家乡躲避恐怖政治。共和三年,他被选举担当所在区的行政长官,在共和四年被提升到省机关,后来又被拿破仑任命为其家乡的市长。②

杜耶的职业生涯说明了革命政治越来越稳定的特点:虽然官员没有长期占据某个职位,但通常都是从一个职位走向另一个职位。官员的流动促进了新政治阶级的形成,因为通过流动,官员彼此之间变得熟悉,而且也熟悉了各行政层面上的各种问题。省行政机关是这个相互连接的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因为拥有追求国家政治利益所必需的时间、金钱和技术的人通常都是在省行政机关里找到了职位。

正如我们所料,省行政机关大部分职位都由律师、公证员和越来越

① 阿利埃省的数字是以 G. Rougeron, *Les Administrations départementales de l'Allier (1790-an VIII)* (Montluçon, 1957)提供的列表为基础。关于马恩省可参见 Raymond Nicolas, *L'Esprit public et les élections dans le départment de la Marne de 1790 à l'an VIII* (Châlons-sur-Marne, 1909)。关于上索恩省可参见 Jean Girardot, *Le Département de la Haute-Saôn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3 vols. (Vesoul, 1973)。

② Rougeron, *Les Administrations départementales de l'Allier.*

多通过担任革命官员来建功立业的人所占据。根据罗兰德·马克斯(Roland Marx)所说,在上莱恩省(Haut-Rhin)的行政机关里,商人占少数,几乎没有手工业者,大部分都是律师及包括教师、公务员和医生的“资产阶级专业人士”团队。在上莱恩和下莱恩(Bas-Rhin)两省,选举人都明显青睐于有政治经验的人,如市长、退职的行政长官和区官员等等。这两个省的大部分行政长官都是城市居民,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农民。①

在法国中部的阿利埃省,律师尤其突出,在被列出职业的行政长官 153
中,有59%是律师或旧制度司法机构的官吏。在这个城市化较低的地方,地主还有一定影响力:23%的行政长官自称有产者。其他还有医生、商人、教士或退役军官。那些没被列出职业的行政长官往往就是市长或地区官员。与阿尔萨斯省一样,在阿利埃省,政治经验非常重要:1792年8月后选出的省行政长官中有43%曾经是地区官员,而且,共和国时期将近3/4的行政长官在被任命为省议员之前都承担过地方革命职务。②

虽然农村地主在阿利埃省有一定影响力,但不管在法国何处都没能在省议会中占据主要席位。在1790年的马恩省,律师和专业人士以高于2:1的比例超过农村有产者(指以此为唯一谋生途径的人);1792年省议会中商人(10名)甚至比地主(6名)更多。上索恩省议会与阿尔萨斯省议会相似:1790－1791年,省议员中有60%是律师和旧制度官员,

---

① *Recherches sur la vie politique de l'Alsace pré-révolutionnaire et révolutionnaire* (Strasbourg, 1966), pp. 165—167.

② 这里提供的数据基础是 Rougeron, *Les Administrations départementales de l'Allier*。这是为数不多的包括整个革命十年,而且提供了每个省行政官员相当多的传记信息的研究之一。大部分研究都只提供了整体特征,而没有提供可供量化的计量数据或信息。

18%是商人,只有4%是农村有产者;1792-1794年,50%是律师和旧制度官员,12%是商人,6%是农村有产者。在默尔特省,商人代表却处于极端劣势:1790年没有一个商人或店主被选举进入省议会,而议会中律师占58%,农村有产者占11%。[①]

虽然每个省的职业构成有些变化,但整体模式却非常明显:地方上的新官员阶层绝大多数是由最初以其城市职业来界定身份的城市居民

154 构成。在这方面,国家议员与省官员相似,大约一半的议员来自人口超过5000的城镇,而这些城镇的所有人口还不到全国人口的20%。[②] 在地方上,城市精英的主导地位甚至延续到了拿破仑王国的最后几年:1810年的显贵中有40%在革命前曾经是专业人士、官员或商人,而地主只有34%。[③] 对于大部分革命官员和拿破仑时期的显贵之类来说,土地无疑是获得地方声望的重要因素。然而,农村里那些英式绅士们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都未能赢得政治显贵的地位,反而是成千上万的城市专业人士抓住机遇,开始了他们的政治事业。

各省与国家立法机关的情况一样,前王室官员在大革命开始时影响力非常大。在默尔特省和歇尔省(Cher)(1790年选举时),王室官员的

---

① Nicolas, *L'Esprit public... départment de la Marne*, annex III; and Girardot, *Le Département de la Haute-Saône* 2: annex V 与 3: annex I. 在默尔特省,1790年以后,行政人员只能通过他们的革命职务来确定身份(Henry Poulet, "L'Administration centrale du département de la Meurthe de l'établissement des départements à la création des préfectures (1790-1800)",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51 and 52 [1906-1907], esp. 51: 446—447)。

② 居住分布的概要可参见 Hunt, Lansky and Hanson,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Republic", 第744页。

③ Louis Bergeron and Guy Chaussinand-Nogaret, *Les "Masses de granit": Cent mille notables du Premier Empire* (Paris, 1979), p. 29.

数量高达 39%，但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限制：1790 年，在安德尔省（Indre）王室官员占 19%，在上索恩省占 14%，而在安省（Ain）只占 4%。虽然资料来源不允许我们做透彻的比对，但还是可以看到，在共和国时期，各地排除王室官员的呼声越来越高。例如，在阿利埃省，相比于 1790 年的 11%，1792 年选举的行政长官中就只有 1% 曾经是王室官员。①

王室官员的衰减并未有利于地方与全国层面上的商业阶层，但有证据显示，商人有可能在城市里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在马赛，1790 年选举的市府官员中有一半以上是商人或制造商，而宣称从事法律专业的却一个也没有。 155
即使在更小的内陆城市昂热（Angers），在 1790 - 1795 年的镇议会中，商人也是唯一最大的团队；1796 - 1799 年在已知的职业中，商人的比例更是从 35% 上升到 65%，律师只占第二位。②

但在很大程度上，关于大城市精英的材料还是非常零碎，往往只涉及大革命时期某个城市某段有限时间内的情况。但是，这部分有所缺憾的知识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地方上选举的官员在大革命时期特别重要。他

---

① 关于王室官员数量的推算基础是 Poulet, "L'Administration centrale du départment de la Meurthe"; Marcel Bruneau, *Les Débuts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es départments du Cher et de l'Indre (1789 - 1791)* (Paris, 1902), pp. 143—149; Girardot, *Le Departement de la Haute-Saône 2*: annex V; Eugène Dubois,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Ain*, 6 vols. (Bourg, 1931 - 1935), esp. 1: 204—205; and Rougeron, *Les Administrations départments de l'Allier*, pp. 8—10, 39—40。很明显，对王室官员的拒绝持续了整个拿破仑时代；1810 年的贵族中只有 7% 在帝国的民事行政部门任职（Bergeron and Chaussinand-Nogaret, *Les "Masses de granit"*, p. 29）。

② Louis Méry and F. Guindon, eds., *Histoire analytique et chronologique des actes et des déliberations du corps et du conseil de la municipalité de Marseille*, 8 vols. (Marseille, 1841 - 1873) 5: 37. 如果将未知情况从昂热的总数中排除，增值率则为 29% 至 37%。推算是以 F. Uzureau, "La Municipalité d'Angers pendant la Révoluiton", *Andegaviana* 13 (1913): 272—284 中的列表为基础。

们由各种宪法授予了相当的威权，而且在过于频繁的危机中拓展了眼界。尤其在大革命初期，很多人都热切寻求职位，所有对塑造新秩序感兴趣的人都努力想获得有影响有威权的位置，而这些都要落实到选举上。在一定程度上，地方上不存在“声名显赫型”(reputational)和“位高权重型”(positional)两种精英之区分，因为那里没有通常所说的政治，有地位才有影响力。[1] 新秩序不稳定，常规的幕后操纵也就没办法实行。甚至在经历了恐怖政策的混乱和后来来自巴黎的干涉之后，地方显贵如果想控制地方事务，还是必须要为自己谋求职位。在地方上，职位就意味着权力。

假如还有地方可以让商人在政治事务中有发言权，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大城市。为了系统比较地方上不同社会群体所拥有的财富，我选择了四个大城市来研究：在地理和政治上都不相同的亚眠(Amiens)、波尔多、南锡和图卢兹。虽然它们都是主要的行政、市场、服务和文化中心，
156 但分别位于法国的四个角，是四个政治色彩不同的省会。

亚眠位于巴黎的北边，是索姆省的主要城市和行政指挥所(见地图1)。这个城市以其哥特式天主教堂和羊毛制造业闻名，40,000 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受雇于羊毛制造业。[2] 亚眠从没成为过坚定的共和派。1795 年 11 月五百人院派到亚眠的一个议员报告道：“本该让公民重新回归宁静的热月 9 日(罗伯斯庇尔倒台)反倒让他们重新燃起了复辟王

① 这些问题曾被运用于美国城市的研究中，有关这种研究的综述可参见 David C. Hammack, “Problems i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Power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00-196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3(1978)：323—349。

② Roger Agache et al., *Histoire de la Picardie* (Toulouse, 1974)，尤其第 12 章，“Forces et faiblesses de l'Ancien Régime”, by Pierre Deyon, pp. 313—328。还可参见 Charles Engrand, “Pauperisme et condition ouvrière au XVIIIe siècle: L'Exemple amiénois”, *RHMC* 29(1982)：376—410。

朝的希望。"①两年以后,省市两级行政机关因为被怀疑是保王党而被宣告废除。1799 年夏,政府重新征兵的企图激起了人民的示威,人民高喊着:"打倒雅各宾派,打倒行政机关,打倒乞丐,国王万岁,路易十八万岁。"②那时,亚眠是北部右翼制造业城市的代表。

南锡,居民 33,000,是洛林地区的首府,东部的文化中心。像波尔多和图卢兹一样,南锡是高等法院和一所主要大学的所在地。要概括这个城市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形势不是件容易的事。根据第四章所作的分析,默尔特省(见地图 1)是在革命十年中从右翼转向左翼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省之一,政府资料也认为它是 1799 年为数不多值得信赖的共和派省份之一。但是,研究这个省的主要历史学家将它称作"安静省份的好榜样,而就在这些安静的省,对督政府的冷漠却导致了其最终的失败"。③ 省议员在 157
革命十年末期的行为也表明,波拿巴派在那里寻求到了相当多的支持,代表团的一半成员在为执政府铺平道路时起了领导作用。④ 督政府派往省行政机关的特派员很快就接受了拿破仑在 1799 年 11 月发动的政变,并

① A. N., F^{1c} III Somme 9, Correspondance et divers, 1789-an IX, 五百人院成员 Scellier 写给内务大臣的信,共和四年雾月 30 日。

② A. Dubois, *Notes historiques sur Amiens, 1789 - 1803* (Amiens, 1883); Albéric de Calonne, *Histoire de la ville d'Amiens*, 3 vols. (Amiens, 1899 - 1900), esp. vol. 2; and F. I. Darsy, *Amiens et le département de la Somm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Episodes historiques*, 2 vols. (Amiens, 1878 - 1883) 1: 181.

③ Pierre Clémendot, *Le Département de la Meurthe à l'époque du Directoire* (Raôn-l'Etape, 1966), p. 502. 关于更早时期可参见 Albert Troux, *La Vie politique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la Meurthe d'août 1792 à octobre 1795*, 2 vols. (Nancy, 1936)。

④ Regnier, Jacqueminot 和 Boulay 在过渡到执政府的委员会中任职,三个人在帝国时期都被授予伯爵称号。另一个议员 Mallarme 在法案评议委员会中任职,并成为一名男爵(Christian Pfister, "Les Députés du départment de la Meurthe sous la Révolution [1791 - 1799]",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Archéologie de Lorraine*, 4th ser., 11[1911]: 309—425)。

且急切地向内务大臣报告:"一听到消息,得知这些日子里取得的成果,首府(南锡)的公民都显得兴高采烈、信心十足。"①简而言之,这个省不止一次转变了政治忠诚的方向,但都没有成为反对执政政权的温床。南锡市本身也被分裂,但无论是恐怖还是反恐怖的反应都没能激起其他大城市所经历的骚动。南锡市非常有趣,因为它没有站到任何政治派系一边。

波尔多在四个城市中最大,有100,000人口,面积几乎是图卢兹的两倍,经济也最具活力。制酒商(往往是当地高等法院法官)和运输商主导当地和地区经济。② 1793年,吉伦特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联盟派叛乱,尽管并不是所有吉伦特省的议员在政治上都是"吉伦特派"。然而,波尔多市是叛乱的领导中心。打败联盟派后,大批表现突出的波尔多人被当地激进派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推上了断头台。③ 后来,钟摆就越发朝右翼倾斜了。地方官员抱怨反革命的"强盗行为",而且1797年的地方和省选举都被认为有保王倾向而被宣告作废。④ 然而,波尔多却没

---

① A. N., F[1c] III Meurthe 15, Correspondance et divers, 1789-an V, Saulnier 所写的信,他的签名是"行政权专员"(commissaire du Pouvoir Exécutif)(省略了官方表格上的"督政府"[Directoire]),共和八年雾月25日。

② William Doyle, *The Parlement of Bordeaux and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1771 – 1790* (New York, 1974).

③ Alan Forres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Bordeaux* (Oxford, 1975). 在1793年10月和1794年7月之间,有302人被委员会判处死刑(Pierre Bécamps, *La Révolution à Bordeaux* [1789 – 1794]: J.-B.-M. *Lacombe,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militaire* [Bordeaux, 1953], p. 384)。

④ 例如可参见派往该省的督政府特派员所作的演说,该演说公开指责吉伦特派内部的"强盗帮派"(the hordes of brigands)(重印于 Gaston Ducaunnès-Duval, *Ville de Bordeaux. Inventaire-Sommaire des Archives municipals: Période révolutionnaire [1789-an VIII]*, 4 vols. [Bordeaux, 1896 – 1929] 3: 45—46 [A. M., Bordeaux, D 155 的详细目录,共和五年5月28日])。

有遭到声势浩大的内战的摧毁(里昂就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在很 158
多方面,波尔多的革命经历与其他大港口城市相似。

四个城市中,图卢兹无疑是最矛盾的。在旧制度下,一个由高等法院法官组成的特别富裕的群体主宰着这个人口大约58,000的城市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在革命的最初几年,图卢兹不引人注意,面对贵族和高等法院反对制度革新的形势,革命威权尽量采取温和的做法。尽管有市镇领导人表示同情,但联盟派在图卢兹只有非常微弱的反响。[1] 然而在1794年之后,这个城市作为雅各宾派的根据地却知名度大增。例如,1797年右翼开始控制国家政治时,图卢兹的市行政机关被指责是"恐怖派",所以被迫写下一份备忘录来作自我辩护:"有人说,共和四年在公社议会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官员已经变得胆小怯懦,成了恐怖政府的工具,"但他们坚称,"这不是真的。"[2]在法国的大城市中,唯有图卢兹一直是左翼,而且最终成为雅各宾派政治在广阔西南地区的中心(见地图1,上加龙省)。

这里要比较的焦点是四个城市的议会。它们不是当地唯一的政治实体,力量也不总是最强大的。雅各宾派俱乐部对地方事务经常具有虽非正式但却很强大的影响力,而各种各样的革命委员会也随着政治情绪来来去去。从1793年到1795年,国民公会特派专员(representative-on-mission)频繁干预地方争端;而整个市政府也可能被推翻,只有等几个月
后政治风向发生转变才得以重新设置。然而,尽管市议会在规模和选择 159

① Lyons, *Revolution in Toulouse*.

② A. M., Toulouse, 2D 4, Correspondence de l'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17 fructidor an V, "Observations analitiques [sic] de l'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de la commune de Toulouse sur les points du rapport du citoyen Saladin qui la concerne".

方式上有许多交替变更，但在大革命时期仍旧是地方政治生活中最常规最持久的特色。①

尽管这四个城市存在社会和政治差异，但革命议会的职业代表总的来说还是非常接近（表4）：

表4 1790－1799年亚眠、波尔多、南锡和图卢兹的市议会各职业代表情况表（%）

职业	亚眠（N＝84）	波尔多（N＝195）	南锡（N＝129）	图卢兹（N＝112）
教士	0	1	2	1
法律	17	13	35	21
其他自由职业	4	16	11	15
商业与制造业	46	41	18	36
手工业者与店主	22	23	24	18
军队	0	4	5	0
农业	2	1	2	5
资产阶级[a]	9	1	3	5
未知职业	2	28	12	12

注：给出的百分比都是关于已知职业的。波尔多的数据可靠性最差，因为这个城市的未知职业所占比例最大。

[a]“资产阶级”包括食利者（rentiers）和房产主（propriétaires），就是那些以各式财产进行投资获得收益，但不从事任何职业的人。

除了南锡以外，这几个城市都是以商人和制造商为主导，手工业者和店主往往其次（见附录B，了解关于制表方式的讨论）。伯克非常精确地描
160 绘了1791年的大城市特征，他所指的“有钱人、商人、主要贸易商和文

① 关于地方政府中的变更，可参见 Cobban，“Loc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第112—130页。关于制度问题最标准的叙述是 Jacques Godechot，*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Paris，1968）。

人"才是真正的"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行动者"。[①] 城市精英与地区、国家精英在社会构成上存在极大不同:在三个城市中,议会中唯一的最大群体是商人,而不是律师。甚至王室官员在地方上还不如在更高层面上的地位突出。在亚眠,只有三个旧制度官员坐在革命议会席上,其中一个是管辖区(bailliage)法庭(处于高等法院下的地区法庭)的法官。在南锡这个满是保王党官员的城市里,议会中只有 10 个(8%)旧制度官员,其中 5 个在管辖区法庭或高等法院。大部分前王室官员或积极反对大革命,或完全退出公共生活。[②]

商人在地方权力上的崛起,标志着这些城市里重要的政治转移。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在研究旧制度城市年鉴时,发现四个城市中被列入地方显贵的绝大多数都是教士、军官、法官,或在王朝的公民行政机关中任职的官员。从事商业的人只占到旧制度下城市显贵的 1.2%(亚眠)到 5.5%(波尔多)。[③] 商人在旧制度下只排在地方显贵的末尾,社会地位比他们更低的人则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名单上。在波尔多和亚眠,商人共同体相对较大,不能被完全忽视。波尔多的运输商经常被当地高等法院里富裕尊贵的法官遮蔽,但在亚眠,商人在大革命之前就在市议会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虽然市长和副市长的位子几乎总是被贵

---

① 来自 Robert A. Smith, ed., *Burke on Revolution* (New York, 1968), p. 190 中的 *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

② 关于官员的信息都来自附录 B 中引用的资料。Philip Dawson 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大多数管辖区官员,在革命时期都显示出对民主政治的无能,他们不愿意卷入派系纷争,但又不能放弃对熟悉的合法性概念的信念。"(*Provincial Magistrates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France, 1789 - 1795* [Cambridge, Mass., 1972], p. 329)

③ *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en province: Académies et académiciens provinciaux, 1680 - 1789*, 2 vols. (Paris, 1978) 2: 347—356. 百分比是以罗什的数据为基础。

161 族霸占，但 1782 - 1789 年有 1/3 的亚眠市政官认定自己是商人。[1] 然而，即使在亚眠，商人也根本不可能主导地方政治。

相反，在南锡和图卢兹，商人在 1789 年之前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往往被法官和律师这些更大更积极进取的共同体忽视，这些人中有许多是贵族，比商人更有钱。根据让·森透(Jean Sentou)的研究，在图卢兹，一个普通高等法院法官的平均财产是一个普通商人或制造商的 8 倍。而且，图卢兹的商人数量到 18 世纪末已经减少了。[2] 下面可以进行旧制度下商人与官员、自由职业人士的粗浅比率计算，从结果可以看出，商人在南锡和图卢兹势力相对较弱：亚眠是 1.2(这表示，根据 1776 年的人头税[*capitation*]税单，1.2 个商人对应一个自由职业成员或官员)；波尔多是 1.5(根据 1777 年人头税税单)；南锡是 0.5(1789 年所作估算)；图卢兹是 0.5(根据 1788 年婚姻契约)。[3] 虽然在旧制度下的四个城市里，贵族、教士、王室官员和自由职业成员主导地方政治，但亚眠和波尔多的商人比南锡和图卢兹的在数量上潜力更大。

结果一点也不奇怪，亚眠和波尔多的商人和制造商从革命形势中直接获利(见表 5 和 6，1790 - 1791 年的社会成分表)。

但在恐怖时期，商人在议会中的数量较少，手工业者和店主的代表

---

[1] Marie-Yvonne Dessaux, "La Vie municipale à Amiens de 1782 à 1789", U. E. R. de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géographiques (Amiens, 1978).

[2] *Fortunes et groupes sociaux à Toulouse sous la Révolution (1789 - 1799): Essai d'histoire statistique* (Toulouse, 1969), pp. 84, 153. 关于商人的数目可参见 Georges Marinière, "Les Marchands d'étoffe de Toulous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D. E. S. (Toulouse, 1958)。

[3] 以 Roche, *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2*: 363—372 提供的数据为基础。罗什使用的每种资料都有缺陷，但从这些资料中获得的比率确实能显示不同城市之间差异量级的顺序。

表 5　亚眠:1790－1799 年市议会各职业代表的变化表(%)

职业	1790－1791 (N＝32)	1793－共和二年[a] (N＝28)	共和三年 (N＝34)	共和四年－七年 (N＝19)
法律	25	12	18	5
其他自由职业	3	12	0	5
商业	56	23	47	42
手工业者和店主	16	38	26	32
其他	0	15	9	16
未知职业	0	7	0	0

[a]按法令规定,选举应该在 1792 年 10 月进行,但亚眠直到 1793 年初才完成。

表 6　波尔多:1790－1799 年市议会各职业代表的变化表(%)

职业	1790－1791 (N＝45)	1793－共和二年[a] (N＝92)	共和三年 (N＝44)	共和四年－七年 (N＝64)
法律	21	8	9	10
其他自由职业	5	21	20	24
商业	55	33	40	37
手工业者和店主	17	32	20	20
其他	2	6	12	9
未知职业	7	32	20	36

[a]按法令规定,选举应该在 1792 年 10 月进行,但波尔多直到 1793 年初才完成。

翻倍。共和三年的反动让商人卷土重来,但没有了 1790－1791 年的绝对优势。在图卢兹,尤其在南锡,商人在革命一开始就被法律界人士和 162
自由职业者的优势遮蔽(见表 7 和 8)。

但在共和国时期,这两个有着高等法院的城市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图卢兹的商人十年内增加了代表数量;律师退到次要位置。在南锡,商人也不断改善地位,但从没有像其他地方的商人那样获得过突出地位。

表7 南锡:1790－1799年市议会各职业代表的变化表(%)

职业	1790－1791 (N=44)	1792－共和二年 (N=55)	共和三年 (N=30)	共和四年—七年 (N=30)
法律	53	26	24	25
其他自由职业	7	15	8	21
商业	16	15	32	29
手工业者和店主	12	36	32	11
其他	11	8	4	14
未知职业	2	15	17	7

表8 图卢兹:1790－1799年市议会各职业代表的变化表(%)

职业	1790－1791 (N=41)	1792－共和二年 (N=40)	共和三年 (N=35)	共和四年—七年 (N=26)
法律	35	9	18	9
其他自由职业	5	29	15	9
商业	32	21	47	52
手工业者和店主	11	26	9	26
其他	16	15	12	4
未知职业	10	15	3	12

在像厄尔波夫镇(Elbeuf)这样的小制造业市镇里,商人和制造商在大革命时期的优势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在革命前就已经主导了镇上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而且一直如此,直到革命十年末,甚至是执政府和帝国时代,虽然期间也曾受到过来自底层的短暂挑战。① 在厄尔波夫镇,从事商业的人几乎没遭遇过任何激烈的竞争。但是在大城市,商业精英没有在旧制度下享受过的优势,是大革命给他们带来了获得公共突出地位的

① Jeffrey Kaplow, *Elbeuf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Hist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Baltimore, 1964), 尤其是第86、87、162、167、169、170、171页中的表格。

新机遇。在诸如图卢兹和南锡这样的地方,商人的数量和财富相对较弱,却能够获得令人瞩目的地位,这点尤其令人惊奇。商人不是简单地 164
填补地方事务的“自然”空缺,而是在努力争取地方上的领导权。律师、公证员和前法官在大革命开始时在城市里还有着相当的分量,但1791年之后,各地的数量就都在减少。其他职业,如医生、学校教师和普通公务员,却常常比律师更重要。

商人在较小的行政市镇里不如在大城市里的代表多。南锡是所考察城市中最小的一个,那里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居民大约28,000的王室行政首府埃克斯镇(Aix-en-Provence),革命精英的情况相似。整体上,埃克斯的商人数量排在律师后(12%,相对于律师的21%)。[①] 在附近的阿尔勒斯镇(Arles),商人整体上只能少许超过律师(10%,相对于9%),但是商人继续提高他们所占的比例,从1790年2月占镇议会的3%,到1792年12月的13%,直到1797年5月高达38%。在这两个没有大规模制造业的南方市镇,商人和律师的比例却被手工业者和店主超过了,手工业者和店主在埃克斯的革命议会中占31%,在阿尔勒斯镇 165
占37%。[②]

甚至在普鲁旺斯地区的小旺斯镇(Vence),人口2,600,农民占61%,但商人在革命政治中也表现积极:1790年选举的10个镇官员中有

---

① Christiane Derobert-Ratel, *Institutions et vie municipale à Aix-en-Provence sous la Révolution* (*1789-an VIII*) (Millau, 1981), pp. 602—603, 590.

② 关于阿尔勒斯镇政府的社会构成可参见 Fabio Sampoli,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Arles: Chiffonistes and Monnaidiers",博士论文,耶鲁大学,1982, 第331、326—327页。关于埃克斯的手工业者和店主,可参见 Derobert-Ratel, *Institutions et vie municipale*, 第590页。

3个是商人或店主(还有3个法律界人士),镇上29个商人中有8个在第一届镇革命议会中担任一定职务。商人和店主,像律师、医生和所谓的"资产阶级"(靠投资为生的人)一样,对革命政治非常感兴趣。这些人在1790年的投票参与率比手工业者、工人和农民高,有40%投票,而农民只有20%,手工业者14%,工薪阶层更少。①

关于城市和国家政治的研究总是着重其动荡的历史,与此相反,大部分农村研究则将重点放在从旧制度到新制度领导权上的延续,尤其是相同地方显贵的霸权延续。例如,帕特瑞斯·赫格内(Patrice Higonnet)就断言,在彭特德蒙弗尔([Pont-de-Montvert],位于洛泽尔省[Lozère],人口1,350),"工作、头衔和荣誉都归地方显贵";对于"显贵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能够轻易利用人民,"他感到很惊讶。② 研究奥姆瓦([Ormoy],在上索恩省,人口747)的作者也得出结论,在奥姆瓦,"如其他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制度改变了,但统治阶级却不变。实际上,是那些富有阶级接管了公社里最重要的机关"。③

贝纳西-马赫姆(Bénesse-Maremne)这个富庶的小乡村(在朗德省[Landes],人口380,4/5是农民)就证实了这种模式,一小股富裕的农场
166 主在村政治中很少遭到反对。村长直到1795年都由让·德斯特瑞巴(Jean Destribats)担任,他是一个40岁的农场主,也是村里排名第六的

---

① George Castellan, *Une Cité provençale dans la Révolution: Chronique de la ville de Vence en 1790* (paris, 1978), pp. 47—51. 在二月投票时,没有"积极"公民的名单,所有缴税家庭的个人都符合条件。

② *Pont-de-Montvert: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s in a French Village, 1700 - 1914* (Cambridge, Mass., 1971), pp. 85,87.

③ R. Rondot, *A Ormoy pendant la Révolution* (Besançon, 1958), p. 41.

纳税人。后来,他输给了皮埃尔·德斯特瑞巴([Pierre Destribats],他们是亲戚吗?),村里排名第二的纳税人,由皮埃尔继任村长。再下一任的村长则是最富有的地主弗朗索瓦·德斯克罗(François Desclaux)。大革命时期几乎所有的村职位都由农场主占据。①

然而,许多村庄也经历了与大城镇相同的民主化进程。例如,在旁-拉比(Pont-l'Abbé,在菲尼斯太尔省,人口 1,885),第一届村政府主要由村里的律师构成:村长和村检察官都由律师担当,5 个其他官员中有两个也是律师(另 3 个是鞋匠、面包师和商人)。但在 1792 年宣布共和后,发生了重大的权力转移,新议会里都是手工业者和店主。7 个高层官员中,有两个是屠夫,一个鞋匠,一个商人,两个店主。② 在圣奎恩港的奥西耶(Les Authieux-sur-le-Port-Saint-Quen,在下塞纳省,人口 395)发生了相同的变化。第一届村政府仍由 1789 年之前就掌管当地事务的富裕农场主主导,但在 1792 年 12 月,无套裤汉把他们推到了一边。一个由学徒出身的驳船主成了村长,另两个村官是船夫和马车夫。他们的职位一直维持到共和四年。③ 在大部分村庄,1793 - 1794 年间,手工业者和贫穷的农民进了村议会;与此同时,在城市里手工业者和店主也参与到了城市政治当中。④

---

① Francis Hirigoyen, "Bénesse-Maremn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Borda* 103 (1978):51—70.

② Alain Signor, *La Révolution à Pont-l'Abbé* (Paris, 1969), pp. 132—135, 216—217.

③ Albert Soboul, "Une commune rural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Les Authieux-sur-le-Port-Saint-Ouen (Seine-Inférieure), 1789 - 1795", *AHRF* 25(1953): 140—160.

④ 在鲁尔马林,手工业者和工人出现在 1793 和 1794 年的议会中(Thomas F. Sheppard, *Lourmar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tudy of a French Village* [Baltimore, 1971], p. 204)。Sheppard 努力弱化这种转变的社会意义,但此时大部分村庄都有着相同的发展。

所以整体上来说，新政治阶级在社会构成上并不是只有一个种类。律师主导了国家和地区政治；商人、手工业者和店主在城市里比较突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掌管村庄。但是，在这种明显的多样化的背后
167 有着意义更重大的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社会和政治上与旧制度的决裂。1792 年之后，贵族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在图卢兹，议会中有 8 个贵族（占全部的 7%），1792 年之后只剩下了 3 个。在亚眠和南锡，议会中只有 3 个贵族。[①] 王室官员也以缓慢但必然的趋势慢慢从革命政治中退出。旧制度的市议员在新制度的议会中数量也极少。在图卢兹，1780 年代的大型“普遍议会”（general council）中有 13 名前任议员在各种革命政府中占一席之地；其中 7 个在 1790－1791 年的第一届新议会中担任职务。[②] 在思想更传统的埃克斯省，1790 年 2 月选出的议员中有 63% 曾是旧制度下的议员，但到督政府时期，这个数目就下降到了 4%。[③] 新时代是留给新人的。

革命政治阶级的“新”有几种形式。在地方上，最新的方面体现在以前被拦在权力走廊外的社会阶级出现了。在城市里，大革命初期，商人和非贵族出身的律师扭转了局面，从王室那些傲慢的高等法院法官和

---

① 关于贵族的数据可能估计过高。其中包括亚眠的两个自诩为普通小贵族的人，但他们并未出席 1789 年为亚眠的大法官裁判权而召开的贵族会议。两个人都是富有商人。贵族的姓名来自 Louis de la Roque and Edouard de Barthelemy, *Catalogue des gentilshommes en 1789 et des familles anoblies ou titrées depuis le premier empire jusqu'à nos jours*, 2 vols.（Paris, 1866）。在另一个有着高等法院的埃克斯，革命议会中的贵族占 7%（Derobert-Ratel, *Institutions et vie municipale*, p. 590）。

② 革命市议员的卷宗都与 *Almanach historique de la province de Languedoc, 1780－90* 中提供的列表进行过核对。

③ Derobert-Ratel, *Institutions et vie municipale*, p. 601.

寡头政治的官员手中夺取了权力。[①] 在革命的第二潮中，手工业者与店主、财产不充沛的商人和地位不高的专业人士，诸如刀剪匠和木匠、有少许雇员的制衣商、针对有限地区市场的商人、兼理发的医生(barber-surgeon)以及学校教师，从医生和法律专业人士手中夺了权(见表格 8)。 168
克雷恩·布瑞特恩(Crane Brinton)发现，在城市里的雅各宾派俱乐部会员中也存在相同的权力向下转移的现象。[②] 在农村，情况类似，只是讨论的社会群体与城市中的不完全相同。

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议员的财富来看地方政府的民主化。在资料最完整的图卢兹，市政官员平均税款估值在 1790 - 1791 年是 962 法郎，恐怖时期降到 706 法郎，到热月政变又回升到 1093 法郎。当地方议会向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开放时，地方官员的财富较少。当图卢兹在督政府时期(1795 - 1799)重新回到雅各宾派的影响下时，议员的平均征收税款又重新下降，这次降得更多，直到 448 法郎。[③] 甚至在某个社会群体内部也能看到这种社会开放的过程，比如在商人内部。在督政府时期(当图卢兹是雅各宾派根据地时)，图卢兹议会的 6 个商人中有 5

---

① 关于这点的具体阐述见 Lynn Hunt, *Revolution and Urban Politics in Provincial France: Troyes and Reims, 1786 - 1790* (Stanford, 1978)。在地方层面上，律师并不像他们的数量所标示的那样积极。Lenard R. Berlanstein 发现 276 名在大革命时期在图卢兹所有层面担任公共职务的人中只有 54 名律师，而且他们中大部分在恐怖时期或之后离职(*The Barristers of Toul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40 - 1793*] [Baltimore, 1975], esp. pp. 165, 176)。

② *The Jacobins: An Essay i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1930), p. 60.

③ A. M., Toulouse, 1G 38—53, 地产税(Contribution foncière), 1791。找到了 44% 议员的税款估值。恐怖时期议员的数据也不少:40% 都有了。Lyons 在比较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时发现“热月党人比雅各宾派同僚收入更高，财产和资金更多”，然而他坚持认为社会差别还是“模糊不清”(*Revolution in Toulouse*, pp. 172—174)。考虑到市议员之间的差异，看起来更适合说社会差异确实存在，但并不突出。

个财产收入估算在700法郎以下;相反,1790-1791年被选举出来的商人中有5个,共和三年中有7个财产收入估算在700法郎以上。[①]

令人惊讶的是,地方政治的民主化甚至发生在右翼联盟控制的地方。例如,在督政府时期,波尔多与亚眠的右翼议会和图卢兹著名的左翼议会有着几乎一样的社会构成。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社会构成的相似性只是反映了以职业进行社会分类的模糊不清。在督政府时期,图卢
169 兹议会的商人可能不如亚眠和波尔多的有钱。在督政府时期的市议会中,7个图卢兹商人中只有1个的财产收入估算超过1,000法郎;但在同时期的亚眠议会中,3个商人中就有2个估算超过2,000法郎。[②] 可惜的是,税收单不完整,不足以做出可信的比较,市镇之间的估算也不一定能比较。然而,还有其他证据也显示出亚眠的议员特别富有。共和九年,在督政府的亚眠议会担任过议员的人中,有2/3被拿破仑定为索姆省的"贵族",其中两个最初只是店主。[③] 肯定是地方社会的富裕才使其登上了拿破仑的"贵族"名单。尽管文献中存在一些固有的不确定因素,但我们似乎还是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大革命为那些以前由于社会原因而被排挤在外的群体提供了登上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地方政府越左(1793-1794年的所有地方,尤其在雅各宾派根据地),越有可能吸收资产不多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店主,以及一些地位不高的专业人员。

新政治阶级的"新"不仅在于其比旧制度下的统治人员"新",还体现在革命十年中的不断自我更新。地方政治最富戏剧性的现象就是它

① A. M., Toulouse, 1G 38—53.

② 提供的数据只包括那些估算值可以被找到的商人。亚眠的税收估算值可参见 A. M., 亚眠,1G 2.11,地产税,1791。

③ A. D., Somme, Mb 107529 bis, Liste de Notabilité du département de la Somme, an IX.

几乎一直处于剧变当中。例如，亚眠在九年之中有不少于 15 个的市政府，而在动荡的共和三年这一年就有 4 个不同的市政府。有时候，市府大厅的社会构成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剧变。例如，1793 年 1 月，波尔多经选举产生的“联盟”议会包括 61% 的商人、22% 的手工业者和店主，9 月取代它的激进派临时市政府却只有 13% 的商人和多于 44% 的手工业者和店主。① 但更令人震惊的是人事上的大量接管，1793 年 9 月被选出的 170
议员中没有一个曾经担任过市议员。

1793 年的波尔多是更全面的大洗牌和重新安置的极端例子（见表 9 和 10）。

1790－1791 年四个城市当选的人中，有大约 3/5 继续为之后的革命政权服务，另外 2/5 则退出了地方政治。在共和三年的反动政权下，一 171

表 9　恐怖时期的市议员在其他革命市政机关任职的情况表（%）[a]

城市	恐怖时期的市议员在以下时期也在市政机关任职的比例				
	1790－1793 年 1 月	共和三年	在前两个时期都任职	督政府时期	在共和三年与督政府时期都任职
亚眠（N＝16）	75	56	25	13	13
南锡（N＝39）	26	41	10	13	10
图卢兹（N＝25）	48	28	12	16	8

[a]这里列入计算范围的是在其他革命市政机关中以显贵（notables）或军官（officiers）的身份担任职务的议员。

① 提供的百分比只包括可知的职业。1793 年 1 月的议会中只计算了军官，不包括贵族；20 种职业中有两种不能确定。1793 年 9 月的市政当局中不可知的比例更高：50 种中有 18 种不确定。很明显，Forrest 在其关于 1793 年 1 月议会的数据中包括了贵族：他提到了 46 名从事商业的人、12 名从事自由职业的成员（包括 5 名律师）和 7 名手工业者或小生意人（*Revolutionary Bordeaux*, pp. 122—123）。

表 10 督政府时期的市议员在前革命市政机关任职的情况表(%)[a]

城市	督政府时期的市议员在以下时期也在市政机关任职的比例		
	1790-1793年1月	1793年-共和二年	共和三年
亚眠(N=19)	37	11	53
南锡(N=30)	37	27	33
图卢兹(N=26)	15	23	8
波尔多(N=64)	25	8	20

[a]这里列入计算范围的是在以前的市政机关中以显贵(notables)或军官(officiers)的身份担任职务的议员。

些曾经任职于君主立宪制政权的人得以复权;共和三年的市府官员中,南锡有73%,图卢兹有67%曾任过某种公职,从国家议员到居民区的治安官。但很少在共和三年之后继续任职:南锡只有27%,雅各宾派的图卢兹只有4%在督政府时期继续担任某种公职。

共和三年的反动使恐怖时期被清除的官员恢复了公职。除了共和三年这一短暂时期,政权的每一次变化都向新人敞开了大门。即使在雅各宾派的图卢兹,恐怖时期的议会和督政府之间的延续性也非常小;只有4个人在两个议会中都曾任过职(见表9)。地方政治命运中每个转折点都需要新人。所以,1798年任职的商人、律师或店主都不是1790年的那些人。人事上的不停转换在各地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结果:许多人在革命的十年中获得了革命经验。

积极的政治责任的传播在农村最明显。即使在富人占据高位的地方,大批村民也在地方事务中获得了直接的经验。在贝纳西-马赫姆,在1790年,52个投票人要选出10个人组成政府,而这只是许多选举中的第一轮而已。在更贫穷的奥姆瓦,只有22个人在第一轮村长选举中投票,当天下午他们还必须选出另外5个村官和13个显贵!9年中,7个

人担任过村长，包括一个磨坊主、一个“资产阶级”、一个商人、一个律师和一个农场主。[①] 安省的马克西缪(Meximieux)有 300 户人家，只有 119 个男人有权参加 1790 年的投票，62 人能担任公职，投票人要选出 19 人组成新政府。在革命的前五年，马克西缪产生过 4 个村长，虽然有时姓氏相同，但担任政府公职的人非常多，1790 年到 1795 年就有 42 人，即每 7 家就有 1 个代表。[②] 无论他们的回忆是苦是甜，成千上万的人都在革 172
命的法国品尝过政治。因此，讽刺的是，恰恰是革命经历的不延续加强了革命传统的力量。因为有如此多的人曾经参与了革命的塑造，革命的集体记忆才如此清晰。

在革命阶级的不断更新和扩大过程中，一些特征保持不变。其中之一就是年龄。不论是雅各宾派还是联盟派，共和派还是保王党，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精英们都是同一代人。他们出生于 1740 和 1750 年代，非常年轻，没有亲身经历过启蒙时期的主要战斗，但都目睹过 1770 年代早期现代化君主和旧式精英之间的争斗。1793－1794 年民主开幕式的议员可能比其他议员稍许年轻：在南锡，议员中有 68% 在 1789 年低于 40 岁，但在 1790－1791 年只有 44% 低于 40 岁。但是，新式精英在 1795 年之后并没有更加年轻：南锡 1795 年之后的议员中只有 46% 在 1789 年低于 40 岁。[③]

新政治阶级的突出之处还在于它与城市的特殊联系上。以城市为基地的专业人士主导了国家和地方政治，即使在农村，领袖职务通常也

① Hirigoyen, “Bénesse-Maremne”, and Rondot, *Ormoy*, pp. 14—16, 41.

② 像许多用法语书写的农村研究一样，这一份也是由地方教区牧师执笔的(F. Page, *Meximieux: Une commun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Belley, 1903])。

③ 参见 n. 9 以上。

是由那些与城市市场或城市文化有联系的人担当。在小镇与农村里，政治参与的程度并不一定都低于城市里，事实上可能更高，至少在某些地区是这样。例如，雅各宾派俱乐部会员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是4%，但是，在普罗旺斯的村镇，比例却占到18%、20%，甚至高达39%。① 然而，农村里每个社会群体的活跃度却不相同，农民代表尤其偏弱。在帕西（[Pacy]，位于厄尔省），虽然一些种植葡萄的农民和园丁在大革命初期在村
173 议会任职，但影响力不如前税收和法庭官员、手工业者和店主。在共和三年，村长是个木匠，官员中有两个杂货商、一个裁缝和一个旅店老板。② 相似地，在马克西缪的1794年议会中，虽然村长是地主，但影响力却不及两个旅店老板、一个医生、一个裁缝、一个公证员和一个马鞍匠。③

即使在镇上，这种模式也很明显。大多数18世纪的镇上都有许多居民从事农业。例如，在阿尔勒斯，37%的纳税人是农场主或农业生产者，但大革命时期只有10%的镇议员来自农业。④ 同样，虽然埃克斯有35%的人口从事农业，但革命议员中只有6%来自农民。⑤ 在一个有着80%的农业人口和大量受雇于农业生产的人口的地方，农民的参与对革命和共和的胜利尤其重要。然而，除了1789年农民起义和之后的一些间歇性骚动之外，农民在革命交战中没有得到任何醒目的表现。在一些村里，他们

---

① Michael L. Kenndy 审核了 *The Jacobin Club of Marseille, 1790 - 1794* (ithaca, N. Y., 1973)，第151页中的有效数据。

② 共和三年芽月4日的名单是唯一一份记录了所有官员的职业的名单(Edouard Isambard,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à Pacy-sur-Eure*, 2 vols. [Pacy, 1894] 2: 279)。

③ 这是马克西缪最完整的名单(Page, *Meximieux*, p. 228)。

④ Sampoli,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 Arles", pp. 58, 331.

⑤ Derobert-Ratel, *Institutions et vie municipale*, pp. 29, 590.

会掌管事务，但更常见的是他们期盼手工业者、店主和专业人士的领导。

法国大革命是由许许多多的人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缔造的。有人发起暴动抗议高价格，有人为了支持自己的政治事业进行示威。但通常，许多人还是采取在选举中投票或成为官员的方式来参与革命。革命不是那些从居住在首府的卓越战略家那里获取剧本的少数狂人创造的。众所周知的共和二年战斗派也只是在革命十年里新政治阶级中表现突出的一部分而已。例如，如果没有来自上层的支持或至少是上层的默许，在南锡被斥为"二级"恐怖分子的烟草商、前门警、酒贩、书商、鞋匠、园丁和舞蹈教师就不可能成功地"恐吓"以前的精英。① 174

大多数在革命议会中担任职务的手工业者和店主根本就不是其敌人所描绘的嗜血之徒(hommes de sang)，但不可否认，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确实让那些体面人(honnêtes hommes)胆战心惊，怒不可遏。在这批人中，许多在共和二年当选的官员后来都被当作辜负公众信任的叛徒(prévaricateurs)或恐怖分子(terroristes)被起诉。还有一些，例如共和二年的图卢兹市长，在1794年之后的白色恐怖中被反革命敢死队杀害。而幸运的就只被谴责为"俱乐部派"的拥趸。②

但绝大多数称颂并支持地方政府的人都是受人尊敬的。正如人们所预料的，相比于喧闹的地方战斗派、地方革命委员会和人民社团的会员，市议员和村议员受到了人民更普遍的爱戴。奇怪的是，甚至在那些

---

① 这份名单出现在 A. M., Nancy, D 14, Delibértions municipales, 15 prairial an III。

② Bernadau of Bordeaux 称他们是"ces atroupements [sic] de Bavards, dont on n'a plus besoin"（"Tablètes contemporaines, historiques et cryptografiques, de l'Ecouteur bordelais", vol. 3（1793 年 9 月 21 日到 1802 年 9 月 22 日）in *Oeuvres complètes de Bernadau*, B. M., Bordeaux, ms. 713, vol. 7，共和三年雨月 14 日项条目。

曾经在共和二年担任过公职的市议员中，也只有少数在1794年后被正式认定为恐怖分子。[1] 反而是那些在动乱的几个月里风头正劲的人受到了更多的压制（见第6章）。由于当选的官员和普通战斗派之间存在社会差异，所以大量商人和成功律师更可能出现在官员团队而不是战斗派中。例如，克雷恩·布瑞特恩称，他研究的雅各宾派俱乐部会员中只有不到10%是商人。迈克尔·肯尼迪（Michael Kennedy）根据克雷恩·布瑞特恩的分类发现，马赛俱乐部中商人的比例从1790－1791年的
175 17%下降到1793－1794年的0.6%。同样，马尔丁·利昂斯（Martyn Lyons）也发现，在30名图卢兹"恐怖"革命监管指挥部（恐怖时期的地方部门）成员中，只有2个或3个商人，律师更少。[2] 然而，在重要的地方职务、地区和国家的权力职位上，律师、公证员、商人和医生则一再冲锋向前，迎接挑战。1790年，莫里斯（Morris）总督称这些人是"权力上的新手，理论上野蛮，实践上生疏"。[3] 但是，他为之哀叹的"对形而上的奇思

---

① 很少有市议员出现在1794－1795年编订的"恐怖分子"名单上。所有出现在四个城市名单上的人，社会特征几乎都相同：许多职业没有标明，但标明的职业中许多是书记员、手工业者和店主。波尔多的名单上最常见的职业是鞋匠、假发匠和裁缝。

② Brinton, *The Jacobins*, p. 51. 他只计算了大批发商，并将不同规模的城市混在一起研究。他的关于勒阿弗尔的数据（1791）中有22%是商人，商人与职业人士的比例为2∶1。相似地，斯特拉斯堡的商人在1791年占俱乐部的40%，并超过职业人士一倍。参见Brinton的表格，第302—303页。当时在大城市，商人参与雅各宾派俱乐部并不违反常理，但随着大革命越来越激进，商人的参与可能会缩减。另外，数据可参见Michel de Certeau, Dominique Julia, and Jacques Revel, *Une politique de la langu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patois: L'Enquête de Grégoire* (Paris, 1975), p. 44;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 of Marseilles*, p. 156; and Lyons, *Revolution in Toulouse*, pp. 182—183。

③ 莫里斯指的是国民议会成员（Beatrix Cary Davenport, ed., *A Di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Gouverneur Morris [1752－1816], Minister to France during the Terror* [Boston, 1939], p. 68, 1790年11月22日）。

怪想的追求"却仍受到可敬的城市专业人士和商人的推崇与实践。

新政治阶级是马克思所指的"资产阶级"吗？如果不是很严格地解释马克思主义，那么答案是肯定的。答案包括两个不同部分，因为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概念就有两个不同的分析部分：与生产相关的社会地位和阶级意识。马克思本人在其理论著作（例如《资本论》）中强调前者，但在历史著作（尤其在关于 1848 年法国和德国革命的各种著作中）中也给予后者相当的重视。[①] 关于它们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作了经典描述："多达百万之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文化与其他阶级的区分开来，并将他们置于与其他阶级相敌对的位置，他们就形成了阶级。如果人们之间只有地理位置上的联系，而他们的利益性质却不允许在他们之中产生任何共同体、全国联合或 176
政治组织，他们就不能形成阶级。"[②]对于马克思来说，阶级的形成既取决于经济条件，也取决于文化；既取决于社会范畴，也取决于意识。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是要解释农民在法国 1848 年革命中的普遍被动性，他们没有共同行动，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也可以用来解释在 1789 年革命中，为什么农民相对来说没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农民通常被隔离出主流的政治生活，只能依靠他人（旅店老板、裁缝、店主等等）来获得信息，代表他们的利益。

革命政治阶级可以从社会地位和阶级意识两方面被称作"资产阶

① 这里不能更全面地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述进行充分展开。Frank Parkin,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New York, 1979)对这个问题的新近文献作批判性回顾。

② (New York, 1963), p. 124.

级”。革命官员都是生产方式的拥有者,他们是拥有资本的商人、拥有技术的专业人士、拥有自己店铺的店主,或拥有土地的少量农民。没有技术的人、工薪阶层和没有土地的农民都没有出现在领袖的位置上,甚至没有大量出现在普通民众中。[①] 革命精英的“意识”可以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毕竟它明显是反封建、反贵族、反专制的。在革命者的语言和比喻中,他们反对所有能让人们想起过去的事物,而且他们的队伍中只有极少数是贵族或旧制度官员。革命精英是由那些致力于建构新法兰西的新人组成的。

可惜的是,这些特征同时又太松散、太宽泛,没什么用处。作为一个社会范畴,“资产阶级”不能将富于战斗精神的革命派与共和派同他们的敌人区分开来。这样说来,波尔多的温和派和亚眠的保王党,同图卢兹、马克西缪或奥西耶的共和派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甚至更“资产阶级”。而且,法国最发达(资本最多)的地区经常是右翼,而共
177 和主义却在那些最少受到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地区繁荣昌盛。同样,反专制和反封建的相同文化背景并不能将富于战斗精神的共和派与他们在 1790 - 1791 年的先驱们区分开;或举例来说,它也不能将亚眠的雅各宾派与他们富裕的商人对手区分开。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解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某些具体细节,而在于它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辨别。它不能解释地区反应的不同、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和革命为什么不能在 1791 年当资本家和商业人士已经获得了最大收益时

① 当 Brinton 在描述雅各宾派俱乐部会员情况时,他说,他们“彻底横截了法国社会,旧时王廷贵族和近期工业无产阶级都被排除在外”(*The Jacobins*, p. 68)。即使是巴黎的无套裤汉们,也以拥有独立财产的店主和手工业者为主导(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pp. 439—455)。

结束。

修正主义解读也有谬误。修正主义叙述最主要的缺点就在于他们没有提出一个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实际可行的解释。许多修正主义评论家在与马克思主义阐释相辩论时都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一说法，但却没有提供任何令人心服口服的说法来取代它。例如，相比于提出大革命是由衰败的王室官员和自由专业人士所缔造的这一说法，寇班在反对大革命让资本主义获利这一观点上更为成功。王室官员在1790年之后就被逐出了运动；而律师，更广义的资产阶级，则出现在革命冲突的各方。寇班及其追随者的更极端的修正主义观点称，大革命的社会意义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这个观点认为，大革命是特殊性和独特的个人弱点的大杂烩，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反应，十年动乱被界定为“许多个人苦痛、雄心与渴望”的综合，“表达了在寻求贪婪的宣泄口与乌托邦式的希望时，无数未获成功之生命的绝望”。①

农村里的花匠和旅店老板，小镇上的杂货商和医生，大城市里的律师和商人，具有太多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不可能将他们统统归拢到某一个单一的经济或社会范畴。因此，革命意图和意义不可能从新政治阶级的社会构成中推导得出；同时，它们也不能被随意归拢到个人精神状态的集合体中。新政治阶级成员分享了一些很大程度上由共同的文 178
化位置所形塑的价值观，比如他们作为年轻一代的经历和他们与城市世界的联系。之前的章节已经阐述过这种文化中的一些抽象因素，例如世俗、理性、对民族高于所有特殊性的强调，以及共和派中沃洛克所谓的

① Lyons, *Revolution in Toulouse*, p. 174.

"民主劝服",即相信广泛的政治参与天生具有优点。① 在第6章,我会在新政治文化的地方结构中更加精确地分析这些价值观。家庭网络、组
179 织经历和共同的文化联系都有助于新政治阶级的形成。

① *Jacobin Legacy: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under the Directory* (Princeton, 1970), esp. pp. 149—186.

第六章　局外人、文化经纪人和政治网络

大革命像一场漫漫典礼，没人知道哪里才是终点。社会被彻底颠倒，旧结构分崩离析。革命者相信他们会随着建立在理性与自然之上的新共同体从乱世中破壳而出，但却发现很难迅速跨越新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门槛。按人类学家的说法，法国似乎被困在一个“阈限”(liminal)阶段，一个过渡时期。在此时期，民族似乎悬浮在已被宣告为旧的秩序和人们所期盼的新秩序之间。① 新的价值观已公布，但还未扎根，到处弥漫着对未来的不确定。

在这段令人焦躁的、对社会和政治都不确定的阈限时期，新政治阶级的作用非常关键。新官员要成为跨入新秩序的政治和文化先锋。就在旺代叛乱发生前，一个共和派满怀信心地写着他的期望：“我非常不幸地居住在一个对革命充满敌意的地方……但我高兴地看到，(人民)的本质是好的，他们只是迷失了方向。如果我们成功地教化他们，他们很容易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②不久以后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就证实了“教化”的必要性。然而，尽管对人民有些失望，统治管理工作又有危险，但还是不断有新成员加入革命政治阶级。许多不同因素都可能激励 180

① 这里采用的“阈限”是 Victor 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Ithaca, N. Y., 1969)，尤其第 94—130 页中所指的含义。

② A. N., F^{1c} III Vendée 4, Comptes rendus administratifs, 1791-an VIII, St. Christophe-du-Ligueron 写的信，1793 年 1 月 1 日。

他们承担新的责任。但是,在千千万万的个人选择中,隐含着决定性塑造革命政治运作的更普遍的文化模式。

最普遍最微妙的模式之一就是革命与动员之间的关系。革命的创伤性动乱让法国人民行动起来,广大人民从熟悉的居住地和工作习惯中被连根拔起。军队的召唤、新官职的诱惑、国家卫兵的服役、甚至政治原因造成的迁徙,所有这些都破坏了旧的习惯,有力地重新分配了人口。成群的难民为躲避内战的蹂躏而涌入旺代的城市,还有许多难民却从被侵略或被联盟骚乱所困扰的城市逃离。例如,波尔多的人口从 1790 年的 110,000 下降到共和四年的 88,394。[①] 在安静的夏特尔(Charters),在大革命的十年里,从外镇来的新婚人口比 1780 年代翻了一倍,而外来人口中只有大约一半来自邻近地区(十年前却有 3/4)。[②]

新政治文化强调公民平等和普世价值观,取消地区及地方特权,所以吸引了许多新来的人,让他们有了民族归属感,而新政治文化也仰赖他们进行更进一步的宣传。克雷恩·布瑞特恩在其开创性的有关雅各宾派俱乐部的研究中发现,他研究的会员中有 38% 是所居住城镇的移民。1789 年之后搬迁到所居住城市的会员比例虽然不大,但也很显著(13%)。在大城市,比例更高:马赛的雅各宾派俱乐部会员中有 54% 是移民,后来上升到 70%。[③] 移民和革命的联系没有躲过时人的注意。在

---

① Alan Forres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Bordeaux* (Oxford, 1975), p. 243.

② Michel Vovelle, *Ville et campagne au 18ᵉ siècle: Chartres et la Beauce* (Paris, 1980), p. 115.

③ *The Jacobins: An Essay i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1930), pp. 56—57. 关于马赛可参见 Michael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 of Marseilles, 1790 - 1794* (Ithaca, N. Y., 1973), 第 153 页。

有关1795年宪法的辩论中，一个议员就抱怨道："所有最有益于艺术与 181
科学的人都将离弃他们祖居的村庄……为的是能投身于广大人民当中，在那里为获得职位而奋斗。"①

迁移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小镇上，例如在夏特尔(13,000居民)，1780年代的新婚人口中有1/4来自镇外。在大港口城市，例如波尔多，非本地人的比例可以高达适婚人口的一半。② 然而，尽管18世纪有新来者汇入市镇，但1789年之前的地方政治仍是每个城市中旧式家庭的最后一个堡垒。在很多镇上，法律禁止新来的人担任职务，一直到1789年镇议会还在竭力阻止新来者的加入。③ 法国大革命打开了防止新来者涌入的闸门。所有反对新来者的规定都被取消，还有针对宗教少数派的限制和为了保证特殊群体主导地位的选举规定也被废除。1789年之前，大多数市镇都有某种关于议会中的教士、律师、贵族、商人，甚至手工业者数量的规定。④ 随着这些限制的消失，新社会群体、新家庭，甚至新宗教群体都走进了城市政治。

法国大革命为宗教少数派提供了无以比拟的机遇，而他们也没有忽

---

① 引自 Bordas 的演讲，其报道参见 *Le Monieur universal*, no. 302 (2 thermidor an III [1795年7月20日])，第1217页。

② Vovelle, *Ville et campagne au 18ᵉ siècle*, p. 113. 有关迁移的文献综述参见 Jean-Pierre Poussou, "Les Mouvements migratoires en France et à partir de la France de la fin du XVe siècl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Approches pour une synthèse",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1970, 第11—78页。

③ 在兰斯镇(Reims)，写给三级会议的陈请书(*cahier de doléances*)一再重申，许多社团要求修改只有当地人才能担任镇职务的规定；并建议居住15年的居民就可以担任职务。镇议会书面上否决了这种提议 (Lynn Hunt, *Revolution and Urban Politics: Troyes and Reims, 1786-1790* [Stanford, 1978], p. 60)。

④ 同上，第23页。关于亚眠可参见 Marie-Yvonne Dessaux, "La Vie municipale à Amiens de 1782 à 1789", U. E. R. de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geographiques (Amiens, 1978)。

视这一时刻。新教徒和犹太教商人从大革命一开始就出现在波尔多市议会上。例如,新教徒皮埃尔·瑟尔斯(Pierre Sers)是波尔多雅各宾派
182 俱乐部的首任主席。他在1790年被选入市议会,后来又当选为立法议会的议员。他在1793年成了联盟派公共安全民众委员会(Popular Commission of Public Safety)的主席,后来虽然被判过刑,但在拿破仑时期又摇身一变,成了改良教会(Reformed Church)的官员。[①] 图卢兹的新教徒瓦伊斯家族站到了雅各宾派一边。让克·瓦伊斯(Jacques Vaysse)和保罗·瓦伊斯(Paul Vaysse,他们是堂兄弟)在督政府时期经选举担任市政府职务。他们两人都是雅各宾派,但在1796年之前在政治上却不为人熟知。让克是个殷实的商人,也是共济会成员;保罗在共和四年曾是一名警官,通过购买国有产业(biens nationaux,为确保国债而被没收的天主教会的土地)积聚了相当的财产,于共和六年当选为市行政机关主席。[②] 但是,同瓦伊斯堂兄弟不同,大部分宗教少数派成员都避免极端激进。在波尔多,大部分新教徒和犹太人都倾向于联盟主义,支持吉伦特派。但在各外省,宗教少数派的出现似乎并没有影响投票模式。例如,虽然新教徒的数量与支持审判国王的选票数成反比,但是省人口中的新教徒比例与决定支持左翼或右翼的选票数却没什么关联(见相关矩阵图,附录A,PROTPOP项)。

宗教少数派成员共享了新政治阶级的态度。例如,出生在伦敦的

---

① Rorrest, *Revolutionary Bordeaux*, pp. 243—245.

② Jean Beyssi, "Le Parti jacobin à Toulouse sous le Directoire", *AHRF* 22(1950): 28—54, 109—133, esp. p. 37; Maryn Lyons, *Revolution in Toulouse: An Essay on Provincial Terrorism* (Berne, 1978), pp. 186—187; George Marinière, "Les Marchands d'étoffe de Toulouse à la fin du XVIII siècle", *D. E. S.* (Toulouse, 1958), pp. 154—188.

犹太商人弗尔塔多(Furtado)是早期雅各宾派俱乐部成员，支持波尔多联盟运动。他躲过了恐怖统治的杀戮，于共和四年经再次选举担任地方职务，但他断然拒绝了这一荣誉。他认为共和国是个"早产儿"。然而，尽管他摆脱了对共和主义的幻想，却基本保持了对革命承诺的信念：

> 我相信，一个政府的好坏取决于领导者的道德。有什么比专制更糟糕，比贵族政治更容易引起叛乱，比民主制更动荡不安呢？……(然而)，想象一个由严肃高尚的、尊重法律的人所组建的民主制吧，你将会拥有最大可能的自由和最稳定的秩序与和平。 183

像其他新官员一样，弗尔塔多坚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差别。1799年他在巴黎与德·斯蒂尔夫人共进晚餐时说："我无法理解那些人的精神或假定的爱国主义。他们热衷公共事务，而不是公共利益(la chose publique)。对公共利益的热爱并不总是能带来地位、津贴和商业利益，只有阴谋诡计才会带来那些东西。"①

新社会群体、新家庭和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被归入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即局外人(outsiders)在地方政治中崭露头角，甚至表现突出。在巴黎，众所周知，来参观和定居的外省人很重要，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在外省，来自巴黎的特派议员影响力大，尤其在恐怖时期和之后的

---

① "Souvenirs d'Abraham Furtado",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69(1916)：543—551，引文第549、547页、共和七年穑月14日条目。

反动中。但令人惊讶的是地方圈子里“边缘”人的作用。这些人是访问议员的自然合作者,但远远不只是受外来入侵力量控制的傀儡。一个政治活动家可能由于社会地位、地理出处、宗教或综合因素而成为一个局外人。在威权不确定的革命十年中,局外人成为国家政府和地方人民之间的重要连接者。特派议员因为他们是局外人而走向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被心存疑虑的当地关系所感染,而当地人民无疑出于各种动机也会走向他们。对于那些对迫近的变化心存疑虑的人来说,局外人提供了便利的责任转移,一旦危机过去,反对他们会更加容易。对于当地的战斗派来说,局外人传递了一种从属于某种更大型运动的感觉。而对于当地的反对派来说,局外人的存在能够使他们更彻底地与以前的统治者决裂。

184 局外人在地方冲突最严重的时期和地区尤其重要。以大城市的市长为例,1790 年投票人选择了能够体现旧制度的自由成分与革命运动可能达成相互妥协的象征性人物。那年波尔多的市长约瑟夫·德·福梅尔(Joseph de Fumel)伯爵,70 岁,是驻扎在圭耶纳(Guyenne)的军队总指挥。图卢兹的瑞果德(Rigaud)市长是法律学教授,当时也70 多岁。南锡的市长是声名显赫的卡斯丁·多夫兰斯(Custine d'Auflance)伯爵。亚眠的市长是富有的商人德冈德-卡内(Degand-Cannet),他刚购买了一个倍显尊贵的职位。1792 年 8 月 10 日的叛乱之后,亚眠的投票人选择了路易·勒斯库维(Louis Lescouvé),一个富有的 58 岁假发匠;他和妻子都不是亚眠本地人,与重要的商人—制造商共同体也没有任何家庭或社会联系;他们的亲戚所从事的职业也可以显示出这对夫妇的社会地位非常卑微:他们结婚契约上的亲戚有农民、马鞍匠和兼职理发师的医生(一种医学专业知识相当贫乏的医生

同行)。[①]

1793－1794 年,其他大城市的市长职位因频繁动乱受到了很大震撼。波尔多的新市长约瑟夫·博特朗德(Joseph Bertrand)是一个于1779 年或 1780 年来自阿维尼翁(Avignon)的钟表匠。他步入政治聚光灯下的踏脚石是当地一家激进派俱乐部,他于 1793 年那个关键的夏天成了这个俱乐部的主席。共和三年,博特朗德被省刑事法庭判处监禁 12年,罪名是非法没收恐怖时期受害者的财产,包括他的前任弗朗索瓦·塞基(François Saige)的财产。共和五年,他被释放,迁居到了巴黎。[②] 他的接任者是另一个更受尊敬的局外人皮埃尔·托马斯(Pierre Thomas)。托马斯是多尔多涅省一个名叫大圣弗瓦(Sainte-Foy-la-Grande)的小镇上的新教牧师。当他于 1794 年被任命为市长时,只有 34 岁。他得到特 185
派议员的青睐,因为他是值得信赖的省官员。尽管他被谴为恐怖分子,但还是于 1799 年夏被督政府选为其派往省行政机关的特派员(commissioner)。[③] 1799 年督政府的动机与共和二年那些特派议员的一样:波尔多的本地领导人不足以信赖,根本无法有力地反抗右翼的蚕食。

---

① 勒斯库维的地产税据评估是 1,295 法郎;所有议员的平均税是 1,164 法郎(42% 的议员的评估税值都找到了记录)(A. M., Amiens, 1G 2. 11, Contribution foncière, 1791)。他于 1757 年娶了一个农夫的女儿,他的婚姻契约很微薄,估价只有 2,000 利弗尔(A. D., Somme, 2C Etude Morel, 1757 年 5 月 28 日)。而 1764 年结婚的商人 Pierre Guérard 的婚姻契约则丰厚许多,估价有 131,000 利弗尔(A. D., Somme, 2C 705)。Guérard 于 1790 年当选进入市议会。

② Renée Dubos, "Une Société populaire bordelaise: Les Surveillants de la Constitution", *Revue historique de Bordeaux* 25(1932), 26(1933), 27(1934), 29(1936). 根据 Dubos,俱乐部基本上由手工业者和小店主构成。

③ R. Brouillard, "Un Maire de Bordeaux inconnu: Pierre Thomas", *Revue historique de Bordeaux* 11(1918)和 12(1919).

南锡在1793年和1794年也有局外人出任市长。第一位是40岁的尼古拉斯·格林(Nicolas Géhin),一名来自杜尔(Toul)的教士。他的继任者是42岁的演员艾蒙纽厄勒·格拉松-布瑞斯(Emmanuel Glasson-Brisse),接下来是来自萨尔布格(Sarrebourg)的约瑟夫·乌利耶兹(Joseph Wulliez)。其中两个不是本地居民,另一个则从事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职业(表演)。无疑,当地人看到克劳德·马拉尔美(Claude Mallarmé)于1794年12月就任市长时,就意识到暴风雨已经结束了。这名35岁的律师兼前高等法院法官是南锡本地人,自1790年以来就担任过各种革命职务。1795年春,格拉松-布瑞斯和乌利耶兹被新市政府列为"一级恐怖分子",也就是"压迫人民的主要始作俑者或共犯"。这一点将他们与二级和三级区分开来,二级是"可能同样可恶,但由于没有同样影响力而并未造成同样致命后果的那些人",三级是"出于怯懦、软弱或虚弱而躲在暴君代表的旗帜之后的那些人"。①

市长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局外人并不仅限于担任这个威严的职务,革命军事的关键堡垒往往也由局外人掌管。南锡民众社团的主席皮埃尔·菲利普(Pierre Philip)就是个漫游政客。他于1750年生于波尔多,是个船长的儿子,年轻时做过海员,之后在巴黎做书记员,自称诗人和剧作家。1792年,他获得了一个官员职位,是军事部供应品仓库的主
186 管。1793年9月,他为了完成建立服装仓库的任务第一次到了南锡。他在南锡的短暂政治生涯不时被打断,后来因共谋被捕入狱,最终提前终止了这段事业。无疑,他与前任市长们一起,都上了一级恐怖分子的名单。②

① A. M., Nancy, D 14, Delibérations municipals, 15 prairial an III.

② Henry Poulet, "Le Sans-culotte Philip, président de la Société populaire de Nancy", *Annales de l'Est de du Nord* 2(1906): 248—283,321—366,501—529.

但是,没人比 J.-B. 拉寇姆(J.-B. Lacombe)在地方上更加臭名昭著,他是波尔多为处罚联盟分子而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生于图卢兹,是个卑微裁缝的次子。当地的一个牧师首先发现了他的聪明才智,愿意教育他。1784 年,24 岁的拉寇姆成了一名学校教师。三年后,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到了波尔多。像许多其他战斗派一样,拉寇姆从一个大城市搬到另一个就是为了要功成名就。无疑,看起来搬到远离自己低微社会出身的地方会更容易一些。像马拉一样,拉寇姆也发现通向成功的大门向他关闭了,因为他被拒绝加入波尔多知识精英聚集的文学院协会(Société littéraire du Musée)。波尔多的联盟派市长,后来成为拉寇姆委员会的受害者,就是文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后来,拉寇姆被允许进入一家共济会会所,1790 年又加入了国家俱乐部(Club National)。在经历了又一次的失望经历——他希望被提名为临时市长或市律师——之后,他于 1793 年秋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主席。1794 年 8 月,罗伯斯庇尔倒台后几天,拉寇姆也以勒索、道德败坏和叛国罪等罪名被处以死刑。[①] 拉寇姆和博特朗德市长这类人都能很快吸收革命修辞的主旨,并通过更激进的俱乐部扶摇直上;而在这种俱乐部里,一个人的政治影响主要仰仗其说服公众的演说能力。这些人的成功让一个深感敬畏的波尔多人感叹道:"他们通过*言词*达到了目的,*言词*决定一切。"[②]

---

① Pierre Bécamps, *La Révolution à Bordeaux (1789 - 1794): J.-B.-M. Lacombe,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militaire* (Bordeaux, 1953).

② Saint-Luce-Oudaille, *Histoire de Bordeaux pendant dix-huit mois ou depuis l'arrivée des représentants Tallien et Ysabeau, Beaudot et Chaudron-Rousseau, jusqu'à la fin de leur mission* (Paris, n. d.), p. 3.

187 界定局外人的方式可能有很多,例如有宗教局外人,如新教徒和犹太教徒;有社会局外人,如被诋毁的演员和在世俗学校里苦苦挣扎的教师;也有地理局外人,如从外市或外国来的移民。甚至殷实的商人和富裕的生意人在贵族、法官和一些高级教士主宰着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旧制度下也会感觉自己是局外人。然而,"局外人"不是一个像职业或专业一样的范畴,并不界定某种革命时期或旧制度下的社会地位,它只是一种关系,一种以某种方式被遗漏的关系。学校教师兼战斗派分子拉寇姆和犹太商人弗尔塔多属于不同的社会或政治范畴。事实上,拉寇姆担任主席的那个委员会就是要谴责弗尔塔多及其朋友之流。然而,拉寇姆和弗尔塔多都是某种局外人,同是边缘人这一点使他们有了加入新政治阶级的理由。

边缘化这一共同特点并没有使新政治阶级成为游手好闲、惹事生非之徒——这是一种令人恐惧、但不常见的职业革命者。① 拉寇姆和菲利普之流的非凡故事不能让我们仓促下结论,说大革命只是"许多个人苦痛"的综合,即个人挫折与愤恨的综合。无疑,对某些人来说,这其中是有挫折与愤恨。但对其他人来说,动机却完全不同。不能将个人动机归拢为新阶级的整体意愿,因为政治阶级不是通过个人心理来界定,而是通过共同机遇和共同承担的角色来界定的。边缘化——从结构意义上来说,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会引起怨恨的社会性比较术语——使新官员类似于文化和权力经纪人。正如处于国家外围或边缘的地区比较容易接受革命政治文化的渗透,边缘人也更急于承担政治和文化经纪人的角色。这种角色至关重要,因为大革命本质上就是要多元化并扩散文化与

① Brinton 表述了相似观点(*The Jacobins*, p.57)。

权力。 188

移民、新教徒、犹太人、学校教师、演员和商人都与所处城市外的世界有联系，尤其与全国的文化、知识、商业或宗教网络有联系。农村里也有这种人，虽然数量不大。很多村里的首要竞选人就是当地的男教师。在厄尔的帕西村（Pacy-sur-Eure），特拉尔德（Taillard）于 1791 年正值 36 岁之际，带着父亲和妻子从巴黎搬迁至此，就任补助金和教育主管（maître de pension et d'éducation）。作为次要官员的短暂经历曾使他锒铛入狱，后来他得到三个访问议员的提名，进了省行政机关，而且还通过与他们的关系让自己的朋友与盟友得到了提升，进入到新近重新组建的村议会。①

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一个男教师来到镇上（像帕西一样的村庄或甚至像波尔多一样的大城市。在波尔多，教师拉寇姆就在军事委员会威慑着那些富裕、冷漠、满怀敌意的人），很快就拥抱了革命事业，这不仅让他脱离了教士的控制，还确实给他提供了一份新工作。有关外面世界的学识为他在当地赢得了听众与影响，但也导致了来自某些角落的敌意，这些特点引起了来自巴黎或邻近大城市、正竭力寻找可靠合作者的代表们的注意。

文化和权力经纪人并不都是像特拉尔德那样的局外人，但他们的职业与利益确实促进了与外界的联系。在汝拉省的芳西纳-布朗西（Foncines-et-les-Planches）公社，让-巴蒂斯特·卢梭（Jean-Baptiste Rousseau）于 1792 年当选为国家代理人（agent national）。他的纺织生意不仅

① Edouard Isambard,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à Pacy-sur-Eure*, 2 vols. (Pacy, 1894) 2: 25,182—183.

使他与许多当地人有了联系,也为他提供了资金,可以考虑为公众服务,甚至需要时还能借钱给公社。[①] 奥西耶的关键人物是尼古拉斯·胡波尔特(Nicolas Hubert),一个旅店老板,作为第一届革命市政当局的检察官,他于1794年春成为当地监督委员会(comité de surveillance)委员和民众社团的主席。比他更重要的人物是另一个有着同样经历的地方战
189 斗派奥古斯丁·玛格瑞特(Augustin Marguerite),他是一个30岁的园丁,能读会写,除了担任议会秘书一职,还组织市民宴会和游行;1794年春他建了一所共和学校。[②] 贝纳西-马赫姆的国家代理人是议会中的少数非农民之一,名叫达瑞格兰德(Darrigrand),是一名前法庭监守官(huissier);面对由富裕农民主导的反抗性议会,他提醒村民,如果他们不服从,"我就必须向上级行政部门汇报了"。[③] 地方权力经纪人都认识到,他们的影响力取决于自己与外界的联系。

最成功最持久的中间人不仅是外界力量的合作者,也是外界与当地利益的调解者。在小小的圣阿曼(Saint-Amans)(有100户人家,在阿韦龙省),让-雅克·罗格特(Jean-Jacques Roquette)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附近的罗德兹(Rodez)上学,在图卢兹完成了法律学业,之后回到家乡,选了一份要求不高的工作——庄园主法官,这样他就有时间阅读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了。1790年他30岁,第一次当选为村里的检察官,

① Pierre Doudier, *Villages comtois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Dôle, 1975), pp. 138—139.

② Albert Soboul, "Une Commune rural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Les Authieux-sur-le-Port-Saint-Ouen (Seine-Inférieure), 1789-1795", *AHRF* 25(1953): 140—160, esp. 153—156.

③ Francis Hirigoyen, "Bénesse-Maremn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Borda 103*(1978): 51—70, esp. pp. 66—67.

后来被提升到省行政机关。1791 年他当选为地区法庭的法官,1793 年被任命为圣阿曼的村长。在他这个村子上,只有他早在 1790 年 7 月就开始寻求建立与雅各宾派的友好关系。1793 年他同几个朋友一起,终于成立了一个民众社团,而且很自然地就被任命为这个社团的主席。不久以后,他成为新革命监督委员会的主席。

1793 年 11 月一个名叫拉格尔德(Lagarde)的访问特派员来到圣阿曼,要在当地为穷人举办一个节庆。虽然罗格特出身村里的富裕家庭,但还是不卑不亢地主持了这个在当地一家旅馆举行的节庆。有关节庆程序的官方记录没有提到过拉格尔德制定的第八条法令:"所有被捕的人、富人、自我主义者或有嫌疑的人都要到举办节庆的指定地点;他们必须呆在那儿,站在穷人身旁为他们服务;但不能享用自己端上来的菜肴, 190
因为旧时的礼仪规定侍从不能坐在主人的桌边。"[1]很明显,罗格特在此奇特的节庆中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与诚信,所以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后,他就被地区任命为特派员,去调查恐怖时期滥用职权的现象。之后,他谢绝了更高的职位,继续留在村里做一个简单的和平法官。

积极地将罗格特之流卷入革命,就使城乡差距不至于过于明显。他把从城市里和阅读中学会的价值观带到了农村。他不像圣茹斯特和巴贝夫那些人一样搬到罗德兹、图卢兹和巴黎,而是宁愿住在离家近的地方,但同时又急切地追随着民族的发展。他的这一决定意味着,即使没人能摆脱与城市的联系,但也不能简单地将大革命看作外来事物。虽然很多农民厌恶征用食物,讨厌一直征召年轻人去参加永无休止的战争,

① Antoine Rouquette, *Jean-Jacques Roquette ou la Révolution à Saint-Amans-des-Cots* (Paris, 1978), pp. 118—122.

但圣阿曼的农民发现，当他们投票表决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划分公有土地时，他们是可以信赖罗格特的。因为他不仅向地区议会保护他们的决定，而且还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来分析该地农民所面临的问题。[1]

一个学校教师、旅店老板或年轻显贵的热忱在农村地区显得尤其重要。革命官员发现，虽然不是完全没办法，但与农民沟通起来还是很困难。例如，在卢瓦尔省（Loire），农村公社被描绘成“公共观点的杠杆无法撬起的大山”。[2] 如果确实有一个成功的杠杆在运转，那么就是像罗格特一样的权力经纪人和文化调解员所使用的微妙力量。在某些地方，他们的成功显而易见（见第4章）。一名前任市长在1796年解释了耐心
191 的必要性：“选举的会议记录可能不是按法律要求的表格来起草的，但是你知道，农村里的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已经是尽其所能地来处理自己的事务了；我们可以告诉你们，选出的两个公民都是我们公社里受教育最好、最睿智的公民。”[3]他可能还会说，他们还是最开明的人，是最愿意接受城里人给我们带来的新文化的人。

政治中间人能实施影响，是因为他们曾经在新政治文化的连接环节和组织内工作过。罗格特利用了家族联系、与村外官员的联系、与雅各宾派俱乐部的交好，以及与加入当地民众社团或参加当地共和派节庆的村民们之间的新联系。在城市，相同种类的关系在更大规模上展开。新

---

① Antoine Rouquette, *Jean-Jacques Roquetle ou la Révolution à Saint-Amans-des-Cots*, pp. 145—148.

② Colin Lucas, *The Structure of the Terror: The Example of Javogues and the Loire* (Oxford, 1973)，引文第235页。关于利用特派员将革命信息传达到农村，Lucas提供了进一步的细节（尤其在第189—219页）。

③ J. Brélot, *La Vie politique en côte-d'Or sous le Directoire* (Dijon, 1932), p.42.

政治阶级中力量最强的非正式社会网络是家庭网络。在图卢兹,至少三个家庭有两个成员在市议会任职:瓦伊斯堂兄弟、格瑞(Gary)和马瑞(Marie)家族的父子组合。家庭联系可以以任何一种政治方向运转。大格瑞(父亲)是旧制度下的前首要市政官员(capitoul),1790 年担任市政府职务的律师;他的儿子也是律师,在共和三年的反动中担任职务。在对立阵营,大马瑞(父亲)是个商人、共济会成员、雅各宾派,在 1790 年担任职务,而且在督政府时期当他儿子也加入议会时又担任了职务。共和九年,大马瑞被列入图卢兹市前 100 名纳税人名单。[①] 在南锡,布雷(Boulay)兄弟、尼古拉斯(Nicolas)兄弟和罗林(Rollin)家族(父亲和儿子?)在城市事务中都非常显著。

亚眠的家庭联系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在当选官员的结婚契约上都记录在案。安瑟林(Anselin)和勒汝科斯(Leroux)家族的两对父子都在市议会中任职,但这只是编织绵密的商人家庭网络中最清晰可见的亲属而已。1790 年当选的市议员中至少有 6 个是姻亲,而且都是商人或染色师。从那时起,家庭关系继续吸收新人担任官职。1791 年,小安瑟林(儿子)和德拉默尔利(Delamorlière)被选入议会。让-巴普提斯特·德 192
拉默尔利(Jean-Baptiste Delamorlière)是个染色师,初婚使他成了皮埃尔·弗勒瑟尔(Pierre Flesselles)的姻亲兄弟(brother-in-law)。弗勒瑟尔是 1790 年 1 月被选入议会的商人。他又通过母亲与另一个于 1790 年当选的商人安东尼·克莱蒙(Antoine Clément)有了亲戚关系。德拉默尔利由于在 1792 年 6 月签名了一份支持国王的请愿书而受到连累,殃

---

① A. N., F^{1b} II Garonne (Haute) 25, "Proclamation de la liste des cent plus imposés de la commune de Toulouse, an IX".

及了官位,但是在共和三年又被选入议会。后来,他成了波拿巴的重要支持者。他的第二次婚姻使其与1790年议会中的另一个商人安东尼·杰尼斯-杜姆尼(Antoine Genesse-Duminy)成了亲戚,并且和杂货商尼古拉斯·达尔杰(Nicolas Dargent)也成了亲戚,达尔杰与他一起参加了共和三年的两届议会和波拿巴时期(从执政府到帝国)的几届议会。[①]

小安瑟林的父亲是个兼职理发师的医生,随着小安瑟林也短暂出席了亚眠共和二年的议会。小安瑟林的一个妹妹嫁给了商人皮埃尔·马瑟(Pierre Massey),马瑟同岳父一起当选为专门筹备三级会议的地区或管辖区会议的镇议员。[②] 马瑟在1791年被选入立法议会,在共和三年进入市议会,1798-1801年进入商业法庭,后来在执政府时期又进入议会。他还是参加了1790年和共和二年议会的染色师路易·杜邦(Louis Dupont)的姻亲。[③] 而且,杜邦还通过其姻亲兄弟与1790年议会中的商人克莱蒙有了亲戚关系,而克莱蒙又是德拉默尔利的亲戚,如此等等。

这种家族联系确保了亚眠行政机关的隐秘连续性。最强的联系之一是查尔斯-弗朗索瓦-巴斯特德·德拉洛奇(Charles-François-Bastard Delaroche),这个中年商人从1790年直到执政府时期一直是议会议员(1793年被短暂降级为显贵)。德拉洛奇通过母亲成了查尔斯·德利(Charles Dely)的亲戚。德利是商人,在1793年当选为显贵,后来在共

---

① 关于德拉默尔利的婚姻可参见 A. D., Somme, 2C Etude Scribe,1764年7月15日。关于他的第二次婚姻可参见 Etude St. Germain,1788年10月21日。契约包括出席者及其与新郎新娘的关系。

② Albéric de Calonne, *Histoire de la ville d'Amiens*, 3 vols.(Amiens, 1899-1900)2:415—416(36名来自城市的议员名单)。

③ 关于马瑟,可参见 A. D., Somme, 2C Etude Machart,1779年12月8日;关于杜邦,可参见 Etude Delattre,1792年1月22日。

和二年和三年的市政府中成为议员。德拉洛奇的一个姻亲兄弟和舅舅都来自勒弗布尔的商人家庭,其中一人在 1790 - 1791 年参加议会。德 193 拉洛奇的姻亲兄弟也是于共和三年被选入议会的路易·勒弗布尔(Louis Lefebvre)的叔叔。路易·勒弗布尔后来和 1790 年与共和三年任议员的商人亚力山大·布莱-寇特(Alexandre Poullain-Cotte)成了亲戚。[①] 德拉洛奇通过另一个姻亲兄弟与克莱蒙和杜邦这两个 1790 年的议会成员成了亲戚。他还通过一个表哥与德拉默尔利成了亲戚,并一起参加了执政府时期的首届议会。[②] 至少,在商人共同体里,通婚关系将革命官员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拿破仑时期,相同的这批人继续主导着这个城市:两个勒弗布尔、大安瑟林、达尔杰、德拉默尔利、德拉洛奇、弗勒瑟尔、杰尼斯-杜姆尼、杜邦、布莱、勒汝科斯和马瑟在共和九年、共和十年或 1810 年,或出现在显贵的名单上,或出现在最高纳税人的名单中。[③]

看来,亚眠市的大商人和制造业家庭之间连续深厚的婚姻纽带如果不是造成政治上保守思想的原因,至少也加强了这种保守思想。一旦在 1790 年之后确立了主导地位,他们就不会再放弃。然而,来自巴黎的压力和新民主思想的冲击还是在一定时期内对他们的控制发起了挑战。瑞果洛(Rigollot)医生(自 1790 年以来就任市政府官员)在 1793 年 1 月选举之后的言说中宣称"诚实勤劳的工人不再因为没有丰厚的财产而被

---

① 关于路易·勒弗布尔可参见 A. D., Somme, 2C Etude Baudelocque,1775 年 11 月 5 日。公证员 Baudelocque 本人是 1790 年的市议员和共和三年的显贵,波拿巴政变后又成为议员。

② 关于德拉洛奇可参见 A. D., Somme, 2C Etude Turbert,1756 年 4 月 19 日。

③ A. D., Somme, Mb 107529 bis, Mb 107547 和 Mb 107574。

鄙视或拒绝，他们终于恢复了所有的尊严和最光辉的权利，即不可剥夺的提名地方官员的权利”，[①]他表达的可能并不是制造商的观点。“诚实的工人”参与到政治当中，尖锐地插入到了商人与制造商代表之间（见表格5，第5章）。然而那时的瑞果洛虽然是个成功顺从的政客（他在共和四年成为市长，这说明他可以为各种政治色彩的政府服务），但并不是本地人。[②]

194 可惜的是，很少有城市能像亚眠市那样具备可以利用的结婚契约，所以很难进行亲属网络的比较。右翼亚眠与左翼图卢兹的主要不同是不是一种亲属体系呢？这种想法很有吸引力，但却得不到证实。然而，亚眠的证据确实显示了商人与手工业者、店主之间有着不同的亲属网络。虽然手工业者和店主的结婚契约更不充分，但那些已经被发现的契约还是表现出手工业者和店主有着与商人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例如，假发匠路易·勒斯库维与波德洛（Baudelot）家族有亲属关系，那么他有可能与和他一起在1793年被选入议会的尼古拉斯·波德洛（Nicolas Baudelot）是亲戚。[③] 退休的鞋匠菲利普·德梅里（Philippe Demailly）于1793年1月被选入议会。当他在1783年再婚时，出席婚礼的人有退休的面包师和织布匠，织布匠就是他年轻的新婚妻子的弟弟。[④] 德梅里和勒斯库维与商人家族都没有亲戚关系，他们的亲属体系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可能与纺织工人有些联系，因为德梅里的妻弟是羊毛工人）。

---

① *Affiches du Département de la Somme*，1793年1月26日。

② Marc Edme Rigollot 出生在 Boegevin（Haute-Marne）（Calonne，*Histoire de la ville d'Amiens* 2：475）.

③ A. D.，Somme，2C Etude Morel，1757年5月28日。

④ A. D.，Somme，2C Etude Baudelocque，1783年6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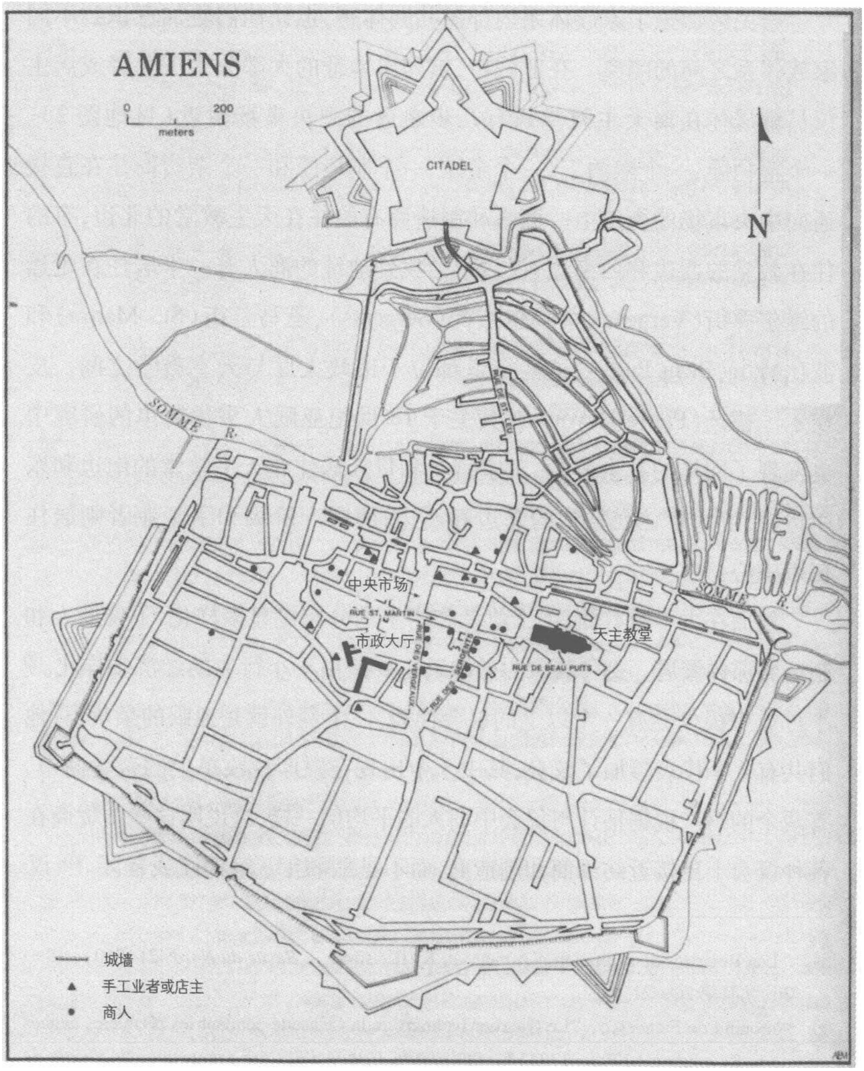
居民区加强了家族体系内部的共同体感,也让他们更加意识到不同家族体系之间的隔离。在亚眠市,被列出地址的大部分手工业者或店主议员都居住在离天主教堂只有几步之遥的中央市场附近(见地图 2)。一个箍桶匠、一个酿酒工、一个金匠、一个制皂匠和一个杂货商住在直接通向中央市场的街道上。商人和制造商有的住在天主教堂的北边,有的住在教堂的西边和西南边;议会中已找到地址的商人有一半居住在毗连的维尔乔街(Vergeaux)、沙尔杰街(Sergents)、圣马丁街(St. Martin)和波比特街(Beau Puits),这些街道都位于市政大厅与天主教堂之间。皮埃尔·德扬(Pierre Deyon)在其关于 18 世纪亚眠人头税税单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社会隔离:王室官员和贵族居住在天主教堂的南边和东南边;工业大亨住在教堂的北边和西边;而中产阶级和手工业者则居住在市中心。①

然而在大多数方面,手工业者和店主的分布更显多样化,不像商人和 195
制造商那样聚居。这种凝聚力的缺乏主要是由于小行业的经济多样化。②小行业中很少会有一个以上的议会代表,一个例外就是亚眠的杂货商,他们共有 4 个代表参加了议会,其中 3 个出现在财产税收单上的杂货商中,有两个的财产税据估计与议会中商人的平均值一样,这说明这些杂货商在各种议会上更接近纺织商和制造商,而不是酿酒工、箍桶匠或鞋匠。③ 议

① "Les Registres de capitation d'Amiens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du Nord* 42(1960):19—26,尤其第 20—21 页。

② Antonino de Francesco, "Le Quartier lyonnais de la Croisette pendant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e la Révolution (1790 - 1793)", *Bulletin du Centr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gion lyonnaise*, no. 4(1979):21—64 中对这一点有具体的探究。

③ 据估计议会中有 8 个商人比那两个富裕杂货商的财产多,而有 5 个则比他们的要少(A. M., Amiens, 1G 2. 11, Contribution foncière, 1791)。



地图2 亚眠地区革命官员的居住区分布图

会上其他手工业者和店主来自不同行业,每种行业都有各自的利益,而且有时各自的利益还会彼此冲突。

手工业者和店主可能是因为同情下层阶级而当选,但值得注意的是,成千上万的纺织工人在议会中却没有自己的代表。许多要求激进变化的压力都来自城市的贫民窟。位于亚眠东北部的圣卢(St. Leu)教区是无套裤汉思想的老巢,居住着大量的失业纺织工人。[1] 在羊毛工人的七月节(fête des sayeteurs)上经常发生关于面包价格的暴乱和示威游行,而群众的激忿则发展成为一种政治诉求,要求组建能够更加响应人民呼声的地方政府。例如在 1792 年 7 月和 8 月,在圣卢教堂举行的大型"公民"集会就要求市政府采取步骤来武装国民自卫军,关闭修道院,将不顺从的牧师从医院中解雇,取下挂在会议大厅墙上的路易十六的画像。[2] 在不久之后举行的选举中,投票人选择了假发匠勒斯库维、医生瑞果洛和一个制皂工来领导新政府。纺织工人施加了民众压力,却到别处寻找 197
领袖。

工人对更高等级社会群体的依赖甚至在恐怖时期也很明显。1795 年春,在亚眠被列入"恐怖分子"之首的人中有一个锁匠、两个音乐家、两个书记员、一个共济会会员、一个前牧师和一个木工(这个木工被指控在木工棚中收藏了一个断头台!)。[3] 与 1792 年 8 月后在亚眠当选的市

---

① Calonne, *Histoire de la ville d'Amiens* 2: 462—463.

② 关于法国大革命最初几年亚眠历史的珍贵资料有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ans la ville d'Amiens*, 5 vols. (Paris, 1894 - 1902)。关于七月节和 1792 年 7 - 8 月的示威行动可参见第 5 卷第 189—298 页。

③ A. M., Amiens, 2I 19, "Listedes citoyens dénoncés au représentant du peuple Blaux, comme ayant participé aux horreurs commises avant le 9 thermidor à Amiens", 13 prairial an III. 名单中只有 16 个名字。

府官员相比，这些普通战斗派分子的社会地位更低，但还不是来自广大的纺织工人；其他城市的工人也仰仗同样的领袖，如手工业者、店主和各种次要的专业人士。例如，图卢兹议会中的手工业者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经济背景。一种手工业者要迎合高等法院提供的贵族主顾，包括一个珠宝商、一个制帽匠、一个皮草商、一个刀剪匠、一个锡匠和一个金匠；他们中许多人住在市中心，靠近以前的精英组织或住处，在大革命初期还得为这些精英服务。而另一种手工业者则是在雅各宾派政府中任职的鞋匠、木匠和其他更低微的手艺人，他们不会聚居在镇上某一特别地块，相当一部分的人住在拥挤的郊区，如河对岸犯罪孳生的圣塞普莱恩区（St. Cyprien）。而且，没有任何特定行业会站出来承担政治先锋的角色，手工业者和店主是作为中介人才被选入议会的，而不是作为某种行业或手工业的代表。他们在城市、小镇或村庄的散布，以及与各种社会群体的稳定接触和互动将他们推向了“代表”地方社会中等级较低的民众的位置。

除了家庭、居民区和专业网络，共同的组织经历也在塑造新政治阶级。在大革命之前，许多后来的官员都参加了共济会，这些共济会在18世纪数量激增。城市里的共济会反映了城市社会里各种非贵族社会群
198 体的重要性。在亚眠，96%的共济会成员来自第三等级，其中46%是商人和制造商，31%从事司法或自由职业，13%是小资产阶级。波尔多有更多的商人参加共济会，南锡和图卢兹相对少一些。例如，在南锡，共济会会员中只有79%来自第三等级，其中51%来自法律和其他自由职业，21%是商人，15%是手工业者和店主。①

---

① 共济会会所的社会成分数据来自 Daniel Roche, *Le Siècle des lumiéres en province: Académies et academiciens provinciaux, 1680 - 1789*, 2 vols. (Paris, 1978) 2: 419—424。

不是所有共济会成员都成了革命者,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共济会关着门策划了大革命。① 相对较详细的会员名单让我们有可能了解共济会在南锡和图卢兹的影响。在南锡,每个革命市政机关里都可以找到共济会会员:1790 - 1791 年,20% 的议员是共济会会员;到恐怖时期这个数字下降到 8%;在共和三年,有 10%;最后到督政府时期回升到 20%。② 在南锡有一个共济会会所作为市政官员的储备库备受瞩目,就是 1771 年成立的耶路撒冷圣让共济会(Saint-Jean de Jérusalem)。1790 - 1791 年当选的 9 个共济会会员中有 7 个、督政府时期当选的 6 个共济会会员中有 5 个都来自该会所。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只有一个该会所会员在议会中任职,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推测当时该会所是什么性质的。更复杂的是,督政府时期的议会中有一半以上的该会所会员是在大革命开始之后才加入该会所的。③ 相反,在 1790 - 1791 年的议会中,大多数该会所会员在 1789 年之前就已经加入,其中有两个在 1770 年代就加入了。因 199
此看起来,在南锡,颇有抱负的政客们已经认识到了加入圣让共济会的好处。该会所吸引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如军官、教士、商人和制造商、律师、官员以及许多手工业者和店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会所已经预

① 关于共济会和雅各宾派之间的关系可参见 Michael L.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First Years* (Princeton, 1982), 第 5—7 页。

② 议员的卷宗都对照 Charles Bernadin 的 *Notes pour server à l'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à Nancy jusqu'en 1805*(Nancy, 1910)中所列的姓名核查过。这些数据与埃克斯省的数据非常相似:1790 年 2 月是 37%;1793 年 9 月是 4%;督政府后期是 15%(Christiane Derobert-Ratel, *Institutions et vie municipale a Aix-en-Provence sous la Revolution*[*1789-an VIII*][Millau, 1981], p. 602)。

③ 南锡和图卢兹的有些共济会在 1789 年之后继续集会。这种延续性与普罗旺斯共济会会所的消失恰恰相反(Maurice Agulhon, *Pénitents et Francs-Maçons de l'ancienne Provence* [Paris, 1968])。

示了革命议会中复杂的社会平衡。大部分当选担任市职的共济会会员是商人(36%)、律师(41%)或专业人士,没有一个是手工业者和店主。

在图卢兹,没有任何共济会会所能够拥有同样的主导地位,可能因为共济会会员在法国南部的分布太广泛了。在大革命前夕,图卢兹大约有500到600个共济会会员。① 图卢兹比南锡有更多的共济会会所(在1789年有12家,而南锡只有7家),其中有好几家产生过市议员。议会中共济会会员所占比例从1790－1791年的1/5上升到督政府时期的1/3(恐怖时期只有一个共济会会员)。② 如果有某个共济会会所特别突出的话,那么就是博学共济会(Encyclopédique)了;1790－1791年8个共济会议员中有3个、督政府时期8个中有2个都出自这个大革命之前才刚刚建立的共济会。在建立后的一年之内,这个共济会就吸收了来自各种社会群体的120个会员。手工业者和店主大量加入,而且与南锡的情况不同,他们中确实有几个当选为市官员:虽然议会中的共济会会员60%是商人,但第二大队伍就是占16%的手工业者和店主。因此,共济会在图卢兹有效地巩固了商人同手工业者和店主的结盟,正如在南锡帮助建
200 立了商人—律师—专业人士的联合。

---

① J. Gros, "Les Loges maçonniques de Toulouse (de 1740 à 1870)",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40(1901): 234—270, 297—318.

② 议员的卷宗都对比了 B. N., Fonds Maçonniques (F. M.)^2 443, 444, 451, 454, 455, 458, 462, 464, 471, 478, 479 提供的成员名单。无疑,在图卢兹,有些会所未被察觉,因为并不是所有会所的名单都完整。对于博学共济会,采用的是1786年的名单。在 Fonds 里,波尔多的名单甚至更加不完整,所以这里就省略了波尔多。1789年在波尔多有12个会所(G. Hubrecht, "Notes pour server à l'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à Bordeaux", *Revue historique de Bordeaux et du départment de la Gironde*, n. s. 31954: 143—150)。有些单独的传记信息也得自 Johel Coutura, *La Franc-Maçonnerie à Bordeaux (XVIIIe－XIXe siècles)* (Marseille, 1978)。

共济会成员编织了一张人际网，有时甚至是一张意识形态网，对革命运动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①] 但如果将这个难以琢磨的网络等同于激进派政治，那就犯了错，因为会员的影响在恐怖时期最不明显。例如，在图卢兹，恐怖时期之前最后当选的议员中有 6 个是共济会会员，然而在恐怖时期却只有 1 个。而且，在大革命时期，共济会的表现并不非常积极，共济会与雅各宾派经常发生竞争和冲突，尽管图卢兹的雅各宾派中有近 1/3 是共济会会员。[②] 图卢兹的共济会在共和三年曾经被特派议员马拉尔美短暂遣散，他是在听到几个雅各宾派的抱怨后才做此决定的。但是，像姻亲关系一样，共济会的会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革命十年中城市政治的延续；而且，虽然在恐怖时期共济会的势力淡化，但并没有在 1789 - 1799 年完全消失。在图卢兹，共济会最终被允许重组，在 1797 年许多前雅各宾派加入了重新充满活力的博学共济会。[③] 共济会这一组织形式没有策划革命，但其会员关系却帮助许多革命官员接近了权力。

最显著的招募地方官员的中心是雅各宾派俱乐部。由于雅各宾派俱乐部出现较早，而且与巴黎总部保持着惯常的联系，所以雅各宾派俱乐部在每个城市都是最突出的政治组织。[④] 然而，每个地方的俱乐部原则和纲领都不相同。在波尔多，有一个最初几年被称作“宪法之友”

---

① Agulhon, *Pénitents et Francs-Maçons*, p. 186.

② Michel Taillefer, “La Franc-maçonnerie toulousain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HRF* 52 (1980): 59—90, esp. p. 72. Taillefer 称图卢兹的共济会与各种政治选择有关：38% 的吉伦特派、32% 的雅各宾派和 30% 的保王党是共济会会员。根据我所掌握的市议员的信息，其中有 25% 的雅各宾派也是共济会会员。

③ Gros, “Les Loges maçonniques”, p. 264; Taillefer, “La Franc-maçonnerie toulousaine”, pp. 83—89.

④ Brinton, *The Jacobins*; Kennedy, *The Jacobin Club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的雅各宾派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政治上温和,整体上支持联盟运动。在社会成分上,它"仍旧是未被干扰的富人和有产者的独占区"。[①] 1790-1791年的市议员中有一半人的名字出现在
201 这个俱乐部唯一现存的会员名单中。[②] 1793年"联盟"市政府中有一半以上官员(60%)出现在此名单中,而"恐怖"(根据国家标准,就是真正的雅各宾派)议员只有11%。共和三年的议员中几乎1/4曾是雅各宾派,督政府时期有44%。但恐怖政权(1793年9月至共和二年末掌权)中的更激进官员却来自其他俱乐部,例如由小资本商人、生意人和自由职业人士组成的国家俱乐部。[③]

相反,图卢兹的雅各宾派代表了一个历史学家所谓的"人民阵线",包括小、中和大资产阶级。[④] 由于缺乏像控制波尔多雅各宾派那样的大商业精英,小资本商人和小生意人就能够相互合作,在地方政治中维持更加典型的雅各宾派表现(赞成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或左翼)。议会中雅各宾派的比例从1790-1791年的46%上升到1792年至共和二年的65%,在共和三年短暂下滑至43%,到督政府政权时期最终上升到58%。[⑤] 事实上,图

---

① Forrest, *Revolutionary Bordeaux*, p. 68.

② A. D., Gironde, 12L 19,一份包括大约400名会员的未标注日期的名单。因为没有完整的会员名单,所以这里提供的数据只能作为约数来参考。

③ Forrest, *Revolutionary Bordeaux*, pp. 63—66.

④ Beyssi, "Le Parti jacobin," p. 46.

⑤ 目前未找到图卢兹的雅各宾派俱乐部成员名单。Jean Beyssi关于督政府时期"雅各宾派"的分析是基于政治忠诚,而不是有文件记录的会员情况(同上)。这里使用的雅各宾派名单是以俱乐部的会议记录上提到的姓名为基础。这种研究方式颇有成果(而且可能比Beyssi的方法更精确),但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为俱乐部会议记录只延续到1793年8月24日(A. D.,上加龙,L 4542-4544)。俱乐部其他记录的时间跨度也相同(1790年5月6日—1793年8月24日),但只提到了少量姓名。

卢兹是雅各宾派的根据地;虽然这里也出现了与其他大城市一样的人事变更,但雅各宾派还是保持了很强的延续性。

在亚眠,雅各宾派的影响遵循了最典型的轨迹:共和二年雅各宾派议员占最高比例(56%),在恐怖时期前后只有一半。[①] 但我们不应过多 202
关注城市间的不同,因为到手的会员名单都来自不同时期。这其中也有一些重要的相似点。在三个城市中,商人、手工业者和店主从雅各宾派俱乐部的会员身份中获利最多。在亚眠,雅各宾派议员中有 30% 是商人,30% 是手工业者或店主;[②]在波尔多,42% 是商人,13% 是手工业者或店主(还有许多职业未被列出);在图卢兹,28% 是商人,23% 是手工业者或店主。在这三个城市里,律师都远远落后。雅各宾派俱乐部是两方面合作的试验场,一方面是商人和制造商,另一方面是手工业者和店主。雅各宾派从来没有控制过市议会的所有席位,然而即使在 1794 - 1795 年俱乐部被关闭以后,以前的会员还继续当选市府职务(三个城市中至少有 1/4 的督政府官员曾经是雅各宾派)。这并不一定能证明激进派的影响在城市事务中仍在延续,但可以说明雅各宾派

---

① A. M., Amiens, Registre de présence des members de la société populaire, du 10 pluviôse an II au 7 frimaire an III. 记录涵盖了恐怖高峰时期和反动时期的几个月时间(1794 年 1 月 29 日—1794 年 11 月 27 日)。但是,记录上可能省略了那些早期加入而后来离开的人,所以很可能夸大了手工业者和店主的比例,他们中有许多是在 1792 年 8 月 10 日之后才加入的。埃克斯议会中雅各宾派的比例相当稳定:从热月反动时的 51% 到 1790 年 11 月的 69%(在其他所有时间里,其比例都在 51% 到 58% 之间)(Derobert-Ratel, *Institutions et vie municipale*, p. 602)。在埃克斯省,一般城市政治与地方雅各宾派俱乐部的立场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在这一点上埃克斯与图卢兹相同,但原因却不同:在埃克斯,两者都是中间派;而在图卢兹,两者基本上却是左派。

② 这里只给出了具有已知职业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因为未知职业的所占比例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有很大不同。例如在图卢兹,(在议会里的雅各宾派中)有 11% 的未知职业;在已知职业中,16% 是律师,11% 来自其他自由职业。

俱乐部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人们通过归属一个公开的政治组织确实获得了一定的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雅各宾派俱乐部还弥补了共济会的欠缺。共济会将人们的兴趣引向慈善、伙伴关系,甚至新思想。而且共济会与其他旧制度下的政治机构和文化组织恰恰相反,它向更多的社会群体开放。雅各宾派俱乐部追寻着某些与之相同的慈善目标,也提供了某些与之相同的
203 伙伴关系,但却增加了一种新的、有组织的政治维度。共济会是一张编织松散的网络,而雅各宾派俱乐部则通过一个地区不同俱乐部之间的交流,以及外省与巴黎之间的交流,蒸蒸日上。雅各宾派俱乐部是共和主义运动中的关键环节。它们内部很有可能会出现分歧,还经常遭受来自下层更加民众化组织的压力。然而,没有它们,就不会有共和主义思想。即使在联盟主义的波尔多,雅各宾俱乐部也为共和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商人皮埃尔·巴勒格西(Pierre Balguerie)是督政府官员,与家族的另3个成员都曾经是早期的(雅各宾派俱乐部)会员。在督政府时期,他同另一个前俱乐部会员苏力格纳克(Soulignac)想将俱乐部复兴为"宪章圈"。苏力格纳克后来也加入了他所在的一个协调波尔多政府的部门——中央市政局。他们两人都赞颂1797年9月发生在议会里反对保王党的督政府政变,而且指导当地人民努力抑制保王党。① 即使在有些地方,雅各宾派的人数被其他群体超过,他们也能继续坚持信仰,这都归功于他们之前的组织经历。

① Gaston Ducaunnès-Duval, *Ville de Bordeaux: Inventaire-Sommaire des Archives municipales: Période révolutionnaire (1789-an VIII)*, 4 vols. (Bordeaux, 1896 - 1929) 3: 66 and 76—77 (A. M., Bordeaux, D 156, 1 messidor an V and 28 frimaire an VI).

新政治阶级可能如莫里斯所说是"权力上的新手,理论上野蛮,实践上生疏",①但其成员并不是从形而上的真空中诞生的,他们有家庭网络、居住纽带和他们身后的组织关系。作为局外人,他们还有一种与启蒙理想的内在密切联系,为启蒙理想中的宗教宽容、世俗化以及广泛的政治参与所吸引。他们没有痴迷于权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很快放弃了权力),也不想成为政党官僚。这里最后举一个例子来展现他们的信念。1799年,经过十年动乱,波尔多又一次遭受了反阴谋暴乱和保王党的复辟活动。然而,一个市行政人员却面对人群勇敢地说:"我们是共和党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政府最适合人民;人人都依据各自的天赋为人民服务,并在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中联合起来。"②即使 204
在右翼的波尔多,在波拿巴政变之前的几个月,还有许多人仍旧相信大革命的承诺。

并不是所有商人和律师、手工业者和店主、农村男教师和旅店老板都能成为新政治阶级中的一员,但他们却比农民、法官、贵族、农村地主或城市工人更可能被卷入政治。如果他们住在某些地区或拥有某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地位,他们从事政治的可能性就更大。大部分参与政治的人都居住在现代世界的边缘地区,或占据了以前精英的外围空间。他们并不是相对于"内部人"的"外部人",而是那些几乎处于"内部"但却感到受排挤的人。他们是相对的局外人,不是被社会遗弃的人。

---

① Beatrix Cary Davenport, ed., *A Di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Gouverneur Morris (1752 - 1816), Minister to France during the Terror* (Boston, 1939), p.68,1790年11月22日。

② Ducaunnès-Duval, *Ville de Bordeaux* 3: 99—104 (A. M., Bordeaux, D 159, 20 thermidor an VII).

阶级的社会轮廓、调解者和文化经纪人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新政治网络所信奉的理性化和民族化价值观，都指向革命运动中城市文化的影响。新政治阶级的社会根源非常城市化；文化经纪人将城市的影响带到了农村；世俗思想、理性主义和普世论都与假定的城市生活的侵蚀功效有联系。这种模式似乎支持着一种法国大革命的现代化阐释。根据这种阐述，社会不断受到城市化、识字率和功能区分的影响，革命者就是发扬这个社会的理性主义和世界主义价值观的现代化者。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用托克维尔、涂尔干或韦伯(Weber)的现代化阐释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呢？

许多晚近研究都暗示着某种现代化阐述。鄂哲芙在她关于革命节庆的研究中，强调组织者的不同政治目的下潜藏着相同的文化概念，即他们都是为了“人类大同”而奋斗。[1] 对公开的大空间、圆形布置、巨大
205 纪念碑的喜好，都表明了要将个性和特殊性纳入到新型集体中的愿望。当节庆游行需要不同的范畴和区分时，人们就根据年龄、性别和新秩序中的职业或地位来形成不同的派系。旧制度下的群体与等级区分被清除，人们在热烈庆祝由平等公民组成的新共同体时，忽略了恼人的社会差异与经济差异。因此，正如鄂哲芙所说，节庆例证了平等化、标准化和理性化的过程，在托克维尔的观念中这一过程有助于绝对国家权力的扩展。[2]

但对法国大革命持反对观点的人则认为，大革命似乎体现了传统社

---

① Mona Ozouf,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1789 - 1799* (Paris, 1976), p. 337.

② 同上，第149—187页。关于节庆和城市生活之间的联系可参见 Michel Vovelle 的计量研究，*Les Métamorhoses de la fête en Provence de 1750 à 1820* (Paris, 1976)，尤其第151—156页。

会与雅各宾派革新之间的一种搏斗。卢卡斯在关于东南部热月暴力事件的研究中说:"恐怖分子打破了默认的均衡状态,为了获得不正常的权力,他们从外部引进了对于该共同体完全陌生的权力和价值观。"①恐怖分子"野蛮地"进行革新,而(1794 年之后的)热月青年帮派为了恢复垂直的共同体控制关系,以传统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惩罚及反对活动。青年帮派不是由粗暴喧闹的农民子弟构成,而是由仍然信奉旧方式和旧价值观的地主、律师和商人的孩子们组成。因此,热月暴乱事件并没有将农村与城市对立,而是将发生暴力事件的小镇共同体分割了。

正如卢卡斯和其他人所描述的,"传统"和"现代"之间的革命战争与那些在法国伴随着君主权力的增长而出现的周期性革新斗争有着相似之处。② 17 世纪中叶对总督(intendants)的推介、改革司法机构和消除官员贪污现象的间歇努力、甚至禁止圣哲日和过于喧闹的宗教节庆的教 206
会努力——所有这些都遭遇到了传统共同体中执政长官或村民的反抗。那么 1789 年之后现代化者的态度有何不同呢? 1790 年刚当选的鲁尔马林村议员抱怨说,贫穷的根源是"由歌舞餐厅导致的道德败坏和宗教信仰的缺失,以及由太多节庆造成的不敬和混乱"。③ 解决的办法就是更加严格地控制这类餐厅,禁止一些节庆,也就是要增长政府权力以确保日常生活的纪律。

---

① "Violence thermidorenne et société traditionelle: L'Exemple du Forez", *Cahiers d'histoire* *24*(1979): 3—43, 引自第 28 页。

② T. J. A. Le Goff and D. M. G. Sutherland, "The Revolution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tany", *Past and Present*, no. 62(1974): 96—119.

③ Thomas F. Sheppard, *Lourmar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tudy of a French Village* (Baltimore, 1971), p. 192.

在共和国时期,围绕新革命历法休息日的庆祝也发生过相同的冲突。在几百起这类事件中,有一起发生在1799年安省的一个小村庄上。督政府的地方代理人有一天下午散步时,碰巧看到一群人在中央广场敲锣打鼓,欢快歌舞(当时是旧历法的星期日,但在新历法中已不再是休息日了)。代理人立即召唤了最近的宪兵,但他马上就遭到了街上狂欢群众的攻击。群众头领掐住他的脖子,将他推挤到墙上,大声向他抗议,不准他禁止星期日的跳舞活动,并威胁着要杀死他。虽然当时有几个旁观者协助,代理人也知道这个头领的名字,但这个头领还是逃跑了,或者代理人是如此汇报的。[①] 这起事件在很多方面与旧制度下当地人想努力维持他们所热衷的圣哲日和节庆的做法相似。

但是,法国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在延续旧制度君主和贵族的现代化努力。政府官员希望得到金钱、人员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但在地方上遭到了抵制;在有些村庄,贵族仍然代表着外部世界对农村的侵蚀。尽管如此,政党的身份还是发生了改变:旅店老板、男教师及其在省会的资助人取代了牧师、封建领主及其宠臣。如今许多牧师和旧制度官员都到了
207 对立面的位置。身份改变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也发生了转型。共和国代理人以自由和平等的名义积极推进了改革;他们肯定希望维持秩序,但也希望无论是在军事阵地还是在意识形态阵地上都能动员人民群众来支持共和国。他们没有简单地募集钱财,而是更大规模地收集信息;他们四处奔走,煽动民众,策划新节庆,组织宴会,发表演说,命名委员会,简而言之就是要调高政治意识的声调。罗格特作为圣阿曼的革命官

① Eugene Dubois, *Histoire de la Rvolution dans l'Ain*, 6 vols. (Bourg, 1931 -1935) 6 (Le Directoire): 203—205. 这起事件发生在1799年1月13日的赛畜尔(Seyssel)。

员时的活动就与他作为庄园主法官时的表现有很大不同。

如果我们认为革命者比那些君主改良派的现代化努力更彻底，而且以主权的新原则为基础，那么该进程就不是一种现代化吗？很明显，这得看如何界定现代化。但糟糕的是，现代化是定义最宽松的社会学词汇之一。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现代化没有权威文本。大部分 19 和 20 世纪的杰出社会理论家都将现代化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显著特征。例如，韦伯强调理性化和官僚化，而涂尔干则关注社会解体和统一重建之间的交替。[①] 而且，在大部分的现代化理论中，法国大革命都占据着关键地位；正如马克思将法国大革命定义为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太多的现代化理论家将大革命定义为典型的现代化运动。结果，这两种叙述都赘述着大革命，大革命也被界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或现代化革命。

将法国大革命作为试金石的现代化叙述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塞缪尔 P.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变化之社会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亨廷顿将政治现代化界定为三个部分的发展：威权的理性化；新政治功能的区分和行使这些功能的专 208
门机构的发展；社会群体越来越高涨的政治参与。根据他的观点，革命是现代化的一方面，革命"最有可能在那些经历过一些社会和经济发展、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滞后于社会和经济变化进程的社会里发生"。[②] 正如人们所预料，这种叙述听起来很有道理，因为法国大革命确实促进了威权的理性化、新政治机构的发展和通过广泛选举活动不断增长的人

① Reinhard Bendix,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1967)：292—346 中有对文献有益的评论。

② (New Haven, 1968)，引自第 265 页。在此意义上，革命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暴力和不稳定。

民参与。

最近斯科克波尔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也受到了革命现代化模式的影响。她认为,现代社会的革命“发生在经济发展落后于竞争对手的国家”,在这些革命中,“在国家相互竞争的世界氛围下,革命团结的紧迫性有助于确保那些愿意建立、而且有能力建立中央集权的强制性行政组织的领导力量走在大革命的前列,而且确保他们的工作能为国家干部创建永久的权力基础”。[1] 虽然她优先考虑国际竞争,而不是国内经济增长和政治适应上的差异,但这种模式的运作还是非常明显:经济需要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差距加速了革命的爆发,革命之后这种差距就被填平了。根据这种观点,雅各宾派通过发扬其作为领导群体的凝聚力量,通过动员广大群众,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建立。[2] 正如亨廷顿和托克维尔的观点所说,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是增长了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

像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一样,现代化叙述也有其因循守旧的地方,因为它们都认为,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要参考最初的那套定义。现代化瓦
209 解了传统社会中预先存在的平衡,随之而发生的垮塌只有在某种和谐被恢复时才能终止。这样的话,大革命(政治现代化)的成果就集中在目的论上;制度化、理性化、民主和政治动员都平等地隶属于国家权力的增长这一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叙述将所有大革命中的特殊斗争都解释成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成果的必需;同样,现代化阐释也将每种特殊的政治革新解释成中央集权增长这一成果的必需。在前面那个阐释中,民主、

---

①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1979), p. 286.

② 同上,第170页。

极权、普世和理性都是为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发展服务;而在后面那个阐释里,它们却是为国家权力(政治现代化)工作。

就像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现代化阐释的最大错误也在于它缺乏精确的分析。几乎所有的法国政治精英都喜欢现代化,包括国王、旧制度王室、自由贵族、1790 年的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和督政官们。但是,改革一旦开始,在广泛同意变革的同时,分裂也越来越尖锐。不能说这种分裂是因为对普遍现代化存在不同意见,而应该说是对特定的民主存在不同意见。虽然革命精英有着相同的与传统社会分离的价值观,但是,他们中最激进的人却往往是最不现代的。例如,村里的旅店老板、芳西纳的地方纺织游商和出席马克西缪议会的马鞍匠都没有亚眠市信心满满的制造商和波尔多的运输商现代,而这些更现代的人却认为激进的共和主义没有吸引力。而且,最现代的省在政治上往往是右翼。

革命运动中城市文化的作用也是如此情况。城市地区和城市人民处于革命动员的最前沿,但城市又是政治分裂最严重的地方。激进的革命往往发生在小地方或中等大小的地方,发生在对城市事务生疏或者有在大城市的生活经历却在小地方发展事业的人之中。圣阿曼的罗格特和帕西的特拉尔德就是后面这种现象的例子。反革命没有发生在最落 210
后的地区,而是发生在开始经历梯利所谓的城市化的地区;同样,革命吸引的也不是最城市化最现代的人,而是亲身经历着两种文化冲突的人。[①] 在城市和农村、现代和落后的分界线上,在对抗的地区,在局外人和调解者占据的位置上,参与和革新的新准则才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

对民主参与的信念在法国发动了一场共和主义的"实习",新政治

---

① *The Vendée* (Cambridge, Mass., 1964), p. 11.

文化得到充分吸收，从而形成了革命的基础，即共和主义传统。[①] 大革命的这一成果在现代化阐释中被忽视了，从托克维尔到斯科克波尔都忽视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只专注于国家权力。波拿巴从雅各宾派的经验中认识到了民众动员的价值，但没有采用相同的方式来培育它，反而取消了所有有意义的政治参与。投票和政治俱乐部让位给强大的政治宣传；积极参与让位给被动旁观。因此，大革命的政治成果并没有在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充分的巩固"，因为他只捡起了现代化的一半，却压制了另一半。民主从来没有效率，通常又无法预测，还经常危机四伏。结果，现代化者，置理性化与标准化高于一切的人，后来都聚集到了波拿巴的旗帜下。不相信民主共和主义，也可能实现现代化。

最热情的共和派引进了政治统治的新基础，甚至社会关系的新基础。顺从让位于劝服，传统让位于革新，"狂热主义"让位于理性的共和
211 主义，世袭职位让位于选举和政治动员。共和派信奉这些理想，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对政治现代化有用，或是他们竭力避免被"挤出历史舞台"。[②] 1790 年代，他们才刚刚走上历史舞台。在长远的 19 和 20 世纪的历史上，共和派是运动的政党，是未来的人类。他们是第二和第三

---

① 在 1848 年的革命"实习"中，阿格宏区分了"以道德概念与最大值内容为主的共和派"(une republique à conception morale et à contenu maximum)和更保守的"以纯粹的立宪和最小值内容为主的共和派"(republique à conception purement constitutionell, et à contenu minimum)。这种区分刻画了图卢兹共和派(最大值计划)和亚眠共和派(最小值计划)领导人之间的差异(*1848 ou l'apprentissage de la République*, *1848 – 1852*) [Paris, 1973], p. 230)。

② 这里我对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1967], 尤其 n. 112, p. 84)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观点表示了异议。

共和国的先驱,而不是第一和第二帝国的前身。他们的观点令人感叹,不是因为它们吸引了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赢家和输家,而是因为它们为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希望。他们继承了政治参与和尊严的古老理想,但给它们穿上了新的装扮,那就是民主选举、广泛的责任心和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他们一时的失败掩盖不了长远的胜利光芒。 212

结论　政治文化中的大革命

从特别意义上来说,法国大革命根本上就是“政治的”。新政治修辞的发明和政治实践中新象征形式的出现改变了时人关于政治的观念。政治成了改建社会的工具。法国人相信,他们能够建立一个与过去不同的、以理性和自然为基础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些崇高的抱负需要新的政治实践去实现。于是,为了法兰西民族的复兴,群众性宣传、下层阶级的政治动员、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等策略应运而生。这些策略也很快成为界定大革命经验的要素。

新语言和新象征虽然是集体性的、匿名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发展出来的,但绝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变化的。致力于革命的人们不断地言说、使用和修改新修辞、新象征。革命政治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的利器,也不是走向现代化的精英们手中的工具。革命政治与新共和的政治阶级一起形成,两者都在普遍接受的理论假设和集体性政治实践的互动中被塑造。

虽然革命的政治文化从定义上来说总是变化和发展的,但仍有其连贯性和统一性的源头。革命者将理性和自然作为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基础,从此导出一整套的共同期望。他们认为,成功的职业生涯靠的
213 是能力,不是出身,不应该有任何世袭的、团体的或地方的特权,应该向广大公民开放通过选举和担任公职来参与政治的机会。简而言之,他们相信,新秩序应该以理性为基础并覆盖全国。这些自觉的政治原则都来

自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为一般受过教育的法国人所熟知。革命者的出众之处在于他们隐含的修辞学假设。指导他们行动的信念是:复兴后的民族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共同体,是建立在透明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这一理想基础上的。所以,他们认为所有职务、甚至服装上的不同都没有必要,最极端的想法是认为任何代表制度都是不必要的。新共同体不需要政客或政党,议员和官员只是暂时性地行使职权,而且要服从民众的意愿。

如果革命者关于政治世界应该如何运转都抱有这种假设,那么他们也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政治设想在实践上会存在哪些局限。在实践上,他们必须在体制和象征两方面都找到具有充分代表性的体系,因为人民不可能总是处于行动当中,也不可能总能把握得住普遍意愿。虽然大革命挑战了家长制的权力模式,但是,甚至激进派都渴望维持某种合法的(而且在他们眼中,应该是男性的)权威。当共和派在他们的政治道路上遭遇到更困难的障碍时,他们就越来越强调教化。如果法国人民不能立刻被重塑,那么至少可以给后代留下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范例。这就是共和主义的遗产。

革新的修辞和革命象征形式的发展得到了新政治阶级的推动。新政治阶级在政治事务上是新手,相对年轻,又是相对的局外人,这些都促进了革命修辞和象征形式的发展。透明和教化,决裂和复兴,直接回应了那些被称作"卑鄙的革新者"所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权力上是新手,而且以前曾经被排挤在外,所以更容易感受到政治革新中的不确定
因素和焦虑。他们对自己的革命文本的权威感到不确定,也无法预测自 214
己担纲主演的这出社会和政治大戏的结局。这个团体对于权力走廊运作的生疏无疑也使他们会相信阴谋的威胁。新近的移民、宗教少数派、

新学校校长、只在初级法庭工作过的律师，以及 1789 年之前从未在政治集会上发表过演说的商人和生意人——所有这些人完全有理由担心政治事务的走向，正如他们有充分理由抓住机遇，接过驾驭国家的缰绳。虽然他们中有些在 1789 年之前参加过共济会，但绝大多数新政客都没有过民主社交的经历。[①] 雅各宾派俱乐部是他们接受政治教育的第一所学校，而公共职位是他们接受实践训练的操练场。

因此，革命政治文化的连贯性有了象征性和社会性两个源头。革命者说着相同的语言，并且在权威的象征物和意象中寻找相同的品质。赫拉克勒斯和玛丽安娜代表着相似的内容，而且革命者的不同社会背景和经济利益使他们更倾心于理性的、民族的和普世的形象。因为法国新政治阶级没有精确的社会分界，所以革命者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能代表自己和自己行动的合适形式。对词语、节庆、徽章，以及时间、空间与距离的测量单位的关注，并非对重要的实际政治问题的偏离，而是界定革命进程与新政治阶级身份的根本。因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政治阶级因其社会身份的模糊不清而使革命经验更为激烈地挑战了习俗和传统。对新的民族身份的寻求导致了与传统权威模式和标准的全面决裂。

如果在革命十年中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界线不确定，那么处于边界
215 位置的人自然就尤其重要。新来的人，外出求学过的年轻贵族，在农村各地旅行的商人，与省会或巴黎有联系的律师，迎来送往各色人等的旅店老板，城镇里处于工人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生意人等等，都可能成为政

① 关于民主社交起源的经典论述可参见 Augustin Cochin, *L'Esprit du Jacobinisme: Une interprétation sociolog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79)，尤其是第 128—136 页。

治网络的建造者、新观点的传递者和外部政治权威的代理人。他们的职业与社会地位往往不同，但作为文化和权力中间人的身份却基本相似。

新人与新政治文化同时形成，要想弄清楚谁先出现，肯定会徒劳无功。在1789年，没人知道革命政治会吸引哪些人，也没人想象得到饰带、名字或服装风格会变得那么重要。新人与新政治彼此强化。在大革命早期，与旧制度的某种和解似乎还有望达成，因为政治领袖中还有许多贵族、王室官员、经历过地方政治的人和老一辈的人（例如，市长往往是年长的贵族）。参与者仍然希望革命这出戏会有无痛的结局，还没有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想法。随着革命修辞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坚持与所有现存习俗和传统决裂，政治阶级的特点也发生了改变。小资本商人和生意人、教师和公务员、很少或没有公职经历的人取代了富有的商人、律师、贵族、王室官员和以前的政治领袖。最早取代旧制度中同情革命的“局内人”（insiders）的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与他们最接近的人，后来则是离以前的权力中心越来越远的边缘人。

因此，新政治阶级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范畴。虽然我强调其统一性源头，但它同样有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分界线。正如革命历史的情节化设置在1789－1794年经历了从喜剧到浪漫剧、再到悲剧的过程，演员表也有所变化。政治阶级里来自底层（虽然很少有工人和贫穷的农民）的代表越来越多，来自上层阶级的代表却越来越少。随着时间的推 216
移，政治和社会区分开始融合。“无套裤汉”和“贵族”具有了社会和政治双重含义。人民是激进共和派一边的，而贵族、“温和派”和保王党则被统统归为人民的敌人。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文化维度上。通过家庭或社会关系与旧制度密切关联的人起初被那些“几乎处于内部 的人”推开了，后来又被离以前的权力中心越来越远的人推开。到1794年初，年

轻人(波尔多的拉寇姆在1789年只有29岁,与圣阿曼的罗格特一样年纪)和与之前的精英(甚至1790－1791年的精英)根本毫无联系的一批人出现在了领袖的位置上。在大革命最激进的时期(1793－1794年,共和二年),政治领袖是最新最边缘的人,而这个时期的激进基本上就产生自这种“新”与边缘化。1793－1794年,这些人的出现使得与过去的决裂变得具体真实了。革命的修辞与象征物同新的政治领导互为推动,对之后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政治阶级内部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存在差异。1789年,法国各地的人们对重新修订宪法的前景都热情高涨。随着冲突的可能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具威胁,一些地方就开始表现出对革命的不情愿,甚至抵制。到1793年中期,西部开始公开叛乱,几个分布在海岸和主要河流沿岸的城市(最主要的是里昂)宣布与革命运动脱离干系。不仅在时间上,空间上也存在很多分界。在许多地方,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撤退到了城镇。在大城市,激进派的基地经常被安排在居民区里。整个国家内,革命运动在边界地区和中部及西南部左翼地区获得了最坚定的支持。激进化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结构相似:大革命在更激进的同时也就更加外围了。然而与此同时,革命修辞和象征物却保留,甚
217 至增强了普世、民族和理性的特点。

“外围的”、“边缘的”和“局外人”在社会学词汇中具有很强的轻蔑含义,似乎意味着隔离、怪异或极端,尤其用于对政治行为的心理学阐述。边缘人不能正常行动,不能像那些处于或接近中心的人那般行动,在结构和行为上都反常。采用这些术语的革命理论都倾向于认为革命是不正常的,在革命中表现积极的人本身在某些方面就不正常。在查马尔·约翰逊(Charmers Johnson)所谓的“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理论”中,革

命者就被描绘成对社会病变(在一定情况下造反的反常人)、身份危机或某种个人沮丧情绪做出反应的人。[①] 他们嗜好暴力。[②] 在此声明,我并没有持这种观点。我认为,新政治阶级不是一个具有相同沮丧情绪、喜欢挑衅、反常、有暴力倾向的极端分子的集合体。其实,他们拥有一个建立新共同体的共同目标,并发现自己有能力为此未来努力奋斗,因为他们已经断绝了与旧机构的大部分联系,而且——由于年龄、流动性、宗教、社会地位或家庭联系等原因——已经准备要与过去的政治习俗及陈腐之言决裂。同时,他们也不是没有根基、完全被边缘化。家庭网络、居住区、专业、社会与政治联系都使他们能够集体行动。边缘、外围和局外人只表现关系,并不是具有自动心理结果的绝对范畴。

有关大革命的辩论经常以二分法的方式展开。有些作者强调无名的结构性力量,还有些作者则强调个人的、“唯意志论者”的选择与个性。[③] 对因果关系和对过程或经历的不同强调,似乎正好和这种结构与个人行为的二分法方式相契合。结构主义叙述集中研究结构问题(例如 218
经济、阶级结构或国际力量的平衡)中的革命根源和导致结果的结构性决定因素。以行动者为导向的叙述和过程理论则指向个人领袖、组织政党或意识形态,或更普遍的、政治进程中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无法避免的各种运动。[④] 我的叙述着重革命进程,强调修辞、象征物以及某

---

① *Revolution Change*, 2nd ed. (Stanford, 1982), pp. 169—194.

② E. Victor Wolfenstein, *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Lenin, Trotsky, Gandhi* (Princeton, 1967)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一些修改。

③ 有关两种强调结构性力量优点的看法,可参见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1979)。

④ Johnson, *Revolutionary Change*, pp. 169—194.

些群体和地方的参与如何形塑革命变化的不间断经历。我不寻求结构性因果,只想确定革命进程中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源头。然而,这些源头不在个人领袖、极权政党、某种意识形态或必定的政治“生命周期”当中。个人领袖、政党和意识形态,以及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诗学”和政治社会学中的隐含模式。修辞学假设和象征实践限制了政治领域的发展可能:它们阻碍醒目的“建国之父”的出现和自由政治(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确立。同时,它们也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对日常生活的政治化,随着革命者对答案的寻求和对阴谋的焦虑,革命从一个阶段走向了另一个阶段。然而,革命的诗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处于变化当中的革命领袖模式,即不断演变的政治社会学,决定性地影响了其发展过程。换句话说,革命进程蕴含了结构或模式,但这些结构反过来又受到了不自觉接纳的政治假设与社会中自觉的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的塑造与转型。

因此,我的叙述既是结构性的,也是以过程为导向的。但是,与其他结构性解释不同,我的重点是革命事件的展开,而不是其长远的决定因素。而且,与大部分过程理论不同,我的重点是思想和行动的普遍模式,
219 而不是个人、政党或被界定的意识形态。但最终,这种方式的优点之一就是为因果论提供了新的解释。一旦革命经历的特征被确定了,因果分析才呈现出新的意义。

据证实,层次化的阐释模式生命力非常持久,因为它为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提供了简洁明了的解释。马克思用新生产方式的出现来解释历史运动,尤其是革命:新生产方式在旧制度的裂缝中成长,最终引发摧毁旧制度基础并在废墟上建立新制度基础的社会和政治冲突。现代化理论家通常避免“生产方式”之类的词汇,但也将变化归因于经济

增长的断裂或经济竞争的需求。这两种理论都认为,社会变化的根源就在存在的前层次或下层次(不是经济,可能是人口,甚至是天气)之中。

法国大革命突显了历史变化的普遍问题,因为加速变化的步伐就是革命的决定性特征。结果,它也就成了大部分层次化历史阐释模式的焦点。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起着关键作用,是后封建社会蹒跚前进的方式。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开始掌权;在将来的革命中,则是无产阶级掌权。现代化理论将革命作为典型范例来证明更普遍的发展过程。例如在亨廷顿的分析中,革命就是证明经济增长与政治现代化的分歧导致暴力和不稳定的戏剧性范例。[①] 巴瑞汀·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则颠倒了阐释的次序,说"病态的社会不可能产生革命"。[②] 他认为,革命对于建立资本主义民主非常关键,但失败的革命或自上而下的革命却会导致法西斯主义。尽管这些模式之间存在不同,但都将革命融入到了 220
更普遍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优先的、有关历史发展的因果解释当中。

然而我认为,大革命导致的社会与经济变化并不是革命性的。贵族可以恢复头衔,回收许多土地。虽然很多土地在大革命中被易手,但土地占有的结构很大程度上还是一样;由于封建税款的废除,富人变得更富,小农民也巩固了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像蜗牛爬行一般慢。[③] 相反,在政治王国,几乎事事都发生了变化。成千上

①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1968).

②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1966), pp. 457—458.

③ 对社会和经济趋势的卓越综述可参见 Louis Bergeron, *France under Napoleon*, trans. by R. R. Palmer (Princeton, 1981), 第 119—190 页。Louis Bergeron 概述了大量文献,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书目。

万的男人,甚至很多妇女都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第一手的经验:他们用新方式交谈、阅读、倾听;他们投票、参加新组织、带着政治目的游行。革命成了传统,共和主义成了永远的选择。从此,国王没有议会就不能统治国家;贵族对公共事务的主宰只会激起更多的革命。结果,19 世纪的法国成了欧洲最资产阶级的政体,虽然法国从来都不是主要的工业力量。那么,需要解释的不是新生产方式或经济现代化的出现,而是革命政治文化的出现。

新政治文化的发明需要机遇、施展伎俩的空间。可供替代的政府在 1789 年之前还未成形;没有秘密的革命政党,也没有民众的政治组织。多亏先哲们和美国独立运动,共和、美德、透明,甚至民主的观念已经开始流通,但直到君主制开始崩溃时才有人按照这些观念来行动。[①] 在此,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尤其是斯科克波尔的分析就很诱人。她认为,[②] 法国君主制的瓦解是因为它不能为与英国的竞争买单。美洲战争花费
221 不菲,王室债台高筑。但最重要的是,债权人后来要求为上层阶级扩大政治参与的程度,结果导致了三级会议的召开。然而,这个最初的机遇到最后却并不是经济的。债务本身并非难以克服,英国就想办法借到了更多的钱。创造这个机遇的反而是旧制度政治文化的垮塌:贵族金融家、王室官员和部队军官都要求在政体组织上进行基本改革,他们的"政治"需求使事件呈螺旋式上升发展。

面对"贵族革命",君主制被推翻了,但这只是第一个行动。法国大

① 关于起因的文献综述可参见 William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80)。

②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及1640年代英国内战的区别,就在于旧制度精英内部的激烈竞争。在之前的美国独立战争和英国内战中,政府的瓦解开放了政治、社会和文化冲突的可能,但这种开放却从未被制度化。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精英很快就认识到了民主和动员民众的危险,所以为了保护财产所有者(在美国是奴隶主)的统治,他们紧密地团结了起来。托克维尔注意到了民主推动力在法国的重要性,并认为其威力有政治、社会和心理方面的综合原因。法国王室成功剥夺了贵族们的所有政治职责,贵族们为了对抗,坚持要捍卫自己的社会特权直到最后。而且,随着他们越来越钟爱等级制度,资产阶级也越来越沉迷于维持对下层阶级不利的界线。[1] 结果,对社会各阶层平等的希望越来越强烈;在法国社会,几乎每个群体都有理由憎恨另一些群体。

托克维尔的叙述精妙高明,但没有充分重视法国形势下的两个基本因素。虽然贵族丧失了社会家长制和政治责任的"贵族"职能,但力量还是很强大,并固执坚决地阻挠第三等级控制重大的三级会议。是贵族作为一个阶层进行的抵制,而不是他们的软弱无能,直接促使第三等级在立宪上实现了突破——产生了一个由个体公民,而不是"阶层"或等 222
级组成的国民议会。面对为支持贵族的抵制而待命的王室部队,第三等级从村镇中被动员起来的下层阶级那里获得了支持。因此,贵族比托克维尔想象得更强大更团结,第三等级比托克维尔想象得更愿意跨越社会障碍。

随着王室与贵族之间的竞争以及后来贵族与第三等级之间的竞争

---

①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Stuart Gilbert (New York, 1955), esp. pp. 81—107.

在1789年打开了政治空间,第三等级内部的竞争也从1789年到1794年不断加速政治动员的节奏。民众的政治空间飞速增长,民众的政治组织(地区委员会、民众俱乐部、甚至重组的卫兵和军队单位)也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股重要力量。虽然有些资产阶级领袖开始时只想为个人权利(包括财产权)构建一个法律与政治框架,但其他很多领袖首先关心的还是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①] 他们信奉有关革新、复兴和美德的修辞。两派之间的竞争——斐扬派和雅各宾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甚至后来的督政府和雅各宾派——使动员人民群众和开展有组织的集体政治行动成为可能。在开展民众政治组织实验的那几年,多少有点组织性的政治示威替代了食物暴动,推动法国走出了政治活动"早期现代化"的限制。只要政治精英中有分裂,这种实验就会继续。另外我们也知道,当时在英国和美国也有雅各宾派俱乐部和民众社团,但从未受到过官方的鼓动,反而受到了官方的压制。它们的机会很少,因为没有获得任何统治精英的明确支持。

托克维尔看得最清楚,必须在1789年之前法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中寻找革命的起因。他考察观念、社会关系、社会心理和政治之间的联
223 系,以求能解释大革命为何"不可避免,但又完全不可预知"。[②] 托克维尔在每个关键点既不强调社会结构,也不强调政治本身,而强调政治策划、社会关系、知识分子的理想以及民众心理彼此间的互动。但他的叙述在解释大革命一旦开始后为什么会如此发展这一点上却不是非常成

① Patrice Higonnet, *Class, Ideology, and the Rights of Noble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81)详细探究了这两种"资产阶级"概念(个人主义和普世论)之间的紧张性。

②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

功。例如,民主共和主义、恐怖以及社会主义就不完全是由1789年之前法国政治文化中的明显境况导致的。诚然,旧制度政治文化的结构弱点催生了精英内部使新政治形式和原则得以更自由发展的各种分裂。但是,这些形式和原则一旦开始,其塑造还得取决于新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即新政治阶级的修辞、象征和实践。恐怖与社会主义,同保守主义与独裁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学家一直为革命经验的真正开端和结尾争论不休,这在1790年代已经如此。从长远来看,大革命时期形成了三股法国政治文化:民主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三种思想都与传统的王室模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强调第一种思想,部分是因为民主共和主义在有关大革命的阐述中普遍未得到充分的重视。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强调从民主到恐怖,再到社会主义的过程;现代化理论家,包括托克维尔,则强调从民主到恐怖,再到极权的过程。这两种结果不容置辩,但民主共和主义的力量也在延续。而且在很多方面,无论从即时的冲击还是从长期的影响来说,民主共和主义都是大革命最重要的结果。

这三种结果都可以以某种方式从革命修辞的原则和革命政治实践中隐含的紧张推论得出。民主、恐怖、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出现,都源 224
自政治空间的拓展和民众阶级有组织的参与。没有以前的民主经验,人们无法想象恐怖统治;它是民主共同体纪律惩戒的一面,在紧急情况下被采用,并因为美德和保卫国家的需要获得了合理性。政府采用恐怖统治来控制民众运动,但如果没有民众运动,也就没有进行恐怖统治的需要了。

革命的社会主义,从根源上来说,可能是从恐怖统治和民主共和制

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根据1796年巴贝夫(Babeuf)及其追随者的观点,真正的民主和平等只有通过另一种形式的造反才能得以实现,是由“人人平等的密谋”秘密组织的造反。[1] 他们这种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来自启蒙运动的著作,但他们又增加了造反与民众独裁的新维度,这些新维度在19世纪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极权主义则是从制度化民众动员中吸取的教训:波拿巴取消选举,代之于全民公决(plebiscites);取缔俱乐部;延长军队服役期。他保留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但自己却是唯一真正的政治行动者,因此就消除了有组织地动员民众可能造成的无法预测的危险。

大革命催生了有关革命行动的早期社会主义观点,甚至原始列宁主义观点。这一点虽然有趣而且重要,但并不能说社会主义在大革命中起到了组织或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作用。巴贝夫只有为数不多的追随者,而且大多数都没有提倡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他们更关注“密谋”中造反的那一半意义。策划者一背叛,督政府就立刻围捕领导者。接下来的审判让巴贝夫得到了比他预期更多的公众注意。一个历史学家这么总结道:“政府试图营造‘红色威胁’的企图看上去可怜得很,因为他们对
225 付的只是几个不合格的空想家而已。”[2]

而另一方面,极权主义的结果却远不是空想,需要解释。既然民主共和主义既有力量又有韧性,那为什么波拿巴会崛起?极权政府是民主共和制的进一步发展(毕竟,它们在时间上存在先后次序),还是完全不

① 可参见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New York, 1960), 第167—247页中具体但片面的叙述。

② Martyn Lyons, *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Cambridge, 1975), p. 35.

同的现象？更普遍地来说，是什么造成了法国自由议会传统的势弱？有关波拿巴王朝的历史，同波拿巴掌权之前的革命十年一样，已经产生了许多不同的阐释，本书无意重述这段历史，只是认为在任何关于革命十年的叙述中都应加入拿破仑夺权这一段，因为它阐明了民主共和主义的短期失败。

在某些方面，1799 年的波拿巴政变并不是一种断然的决裂。督政府政权在此之前已经经历了两起、可能三起政变（这要看如何定义政变了），其中一次政变（1797 年，反右翼的）是在一个友好将军的协助下展开的。[①] 新政权称作共和国，拿破仑也强调自己对革命原则的忠实。他在第一次宣言中声称："我不做有党派意识的人。"他向法国国民保证"通过遣散压制议会的宗派分子，已经让保守、守护、自由的观点重新获得了权利"。[②] 在新政权开始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他们故意宣扬其意图中模棱两可的内容（即同时具备保守、守护和自由的特点），以求能吸引尽可能多的不同群体。

考虑到之前的十年动荡，波拿巴加入刚建立的执政府看似众望所归。故事的主要脉络众所周知。1796 年之后督政府实行跷跷板政治（politique de bascule），每当选举结果不利于多数中间派时，五人执政体就组织立法院清除议会中的右翼或左翼。立法院不稳定、投票弃权率高、宪法呆板、各省一直爆发有关天主教堂身份的骚动、通货膨胀，还有征兵等问题，都被法国军队在意大利和普鲁士的战争胜利大大冲淡了。 226
将军们，尤其是波拿巴·拿破仑，成功利用了不稳定的国内形势，将其转

① Albert Meynier, *Les Coups d'état du Directoire*, 3 vols. (Paris, 1928).

② *Proclamation de général Bonaparte, le 19 brumaire, 11 heures du soir.*

化为战场上几乎完全属于他们的自治。随着代表系统的声望下降,将军的声望就开始上升了,从而为波拿巴在共和八年发动著名的雾月 18 日政变搭好了舞台(见图 18)。

从这方面来看,第三等级内部的竞争确实给自由代表制政府的前景带来了毁灭性影响。因此,恰恰是允许民众组织繁盛发展的条件在暗中破坏自由共和国。政治阶级内的基本分歧不利于政府的稳定。然而这种说法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它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在政变时,由于过于急躁,波拿巴几乎功亏一篑。[1] 如果当时他担任五百人院主席的弟弟吕西安(Lucien)没有干涉,没有说服包围会议大厅的士兵开始行动,这次赌博可能就输了。即便如此,如果议员们能够或愿意组织反抗,这次政变也可能失败。经过七年的代表共和制,经历了政治阶级内部的分歧和宪法的交替仍旧幸存的共和制,从内部被瓦解了。圣克鲁(Saint Cloud)里"打倒独裁者"的呼声没有得到响应。

最终,革命政治文化的缺陷使 1799 年的独裁解决方式获得了成功。食物与征兵暴动、宗教战争和肃清立法院行动以前都曾发生过,但共和国仍能坚持。1793 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比 1799 年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战争扩展到了多处边界线,共和国军队还未经受过任何考验,民众动员如火如荼,非基督教化运动疏远了许多人,国王刚被处死,政府也是过一天算一天。所以,并不是紧张危险的境况使共和国在 1799 年失败了。

227 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些弱点在早期就有所表现,首先是在修辞上对政

---

① 经典叙述是 Albert Vandal, *L'Avènement de Bonaparte*, 5th ed. (Paris, 1908) 1: *La Genèse du Consulat, Brumaire, la Constitution de l'an V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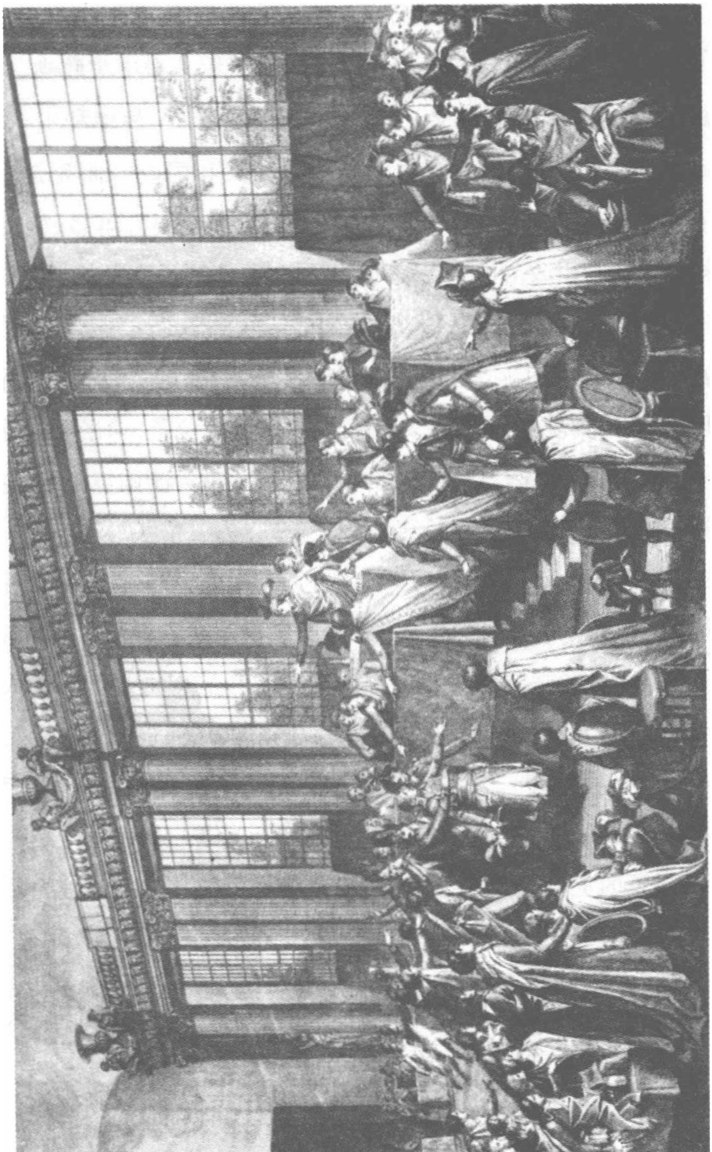


图18 雾月18日进入五百人院大厅的波拿巴

党政治的拒绝。督政府政客保存了代表制政府的原则,每年举行全国选举,而且许多人都享有选举权。但是政府没有组织一个中央政党,并拒绝鼓励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团体的发展。① 督政官拉·赫维利尔-勒波(La Revellière-Lépeaux)说:"为保卫共和国和共和国政府而死是光荣的,比在政党的污秽和宗派分子的玩弄中死去或苟活要好得多。"②在这种修辞架构中,自由政治作为代表利益的政治是无法得到发展的。中央只能通过人为地干扰立法院的平衡,即通过清除一旦当选的对手来维持其地位。波拿巴利用了后来立法政治的声名狼藉,以相同的革命修辞原则合理化了自己的登基:他站在高于政党和宗派的位置,承诺要清除国家中不体面的政治阴谋。自由政治因此从一开始就处于困境,拿破仑使这一过程更进一步,几乎废除了选举政治。

波拿巴也利用了革命的政治象征物。与其他人一样,他欣赏象征物的力量,在开始统治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继续沿用共和派最神圣的象征物。他是玛丽安娜的保护者。他的印章(见图 19)宣称,他为法国人民说话(au nom du peuple français)。他保留了共和女神,但用自己的形象为她做了标记(见图 20)。最后他完全取代她(见图 21),成了法兰西民族的化身。他的形象装饰着帝国的货币和印章,就像旧时的国王装饰着君主制政体下的货币与印章一样。③ 革命意象中的紧张使拿破仑的任

① Lynn Hunt, David Lansky, and Paul Hanson,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Republic in France, 1795-1799: The Road to Brumair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1(1979): 734—759 中对此观点进行了具体的展开。

② *Mémoires de La Revellière-Lépeaux*, 2 vols. (Paris, 1895) 1: 379.

③ P. Ciani, *Les Monnaies françaises de la Révolution à la fin du premier empire, 1789 à 1815* (Paris, 1931).



图 19　拿破仑任执政官时的印章



图 20　共和十三年的五分钱硬币

务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督政府时期的意象不再直接表现人民，玛丽安娜成了一个更疏远更懈怠的象征。拿破仑保留了她的形象和共和国的 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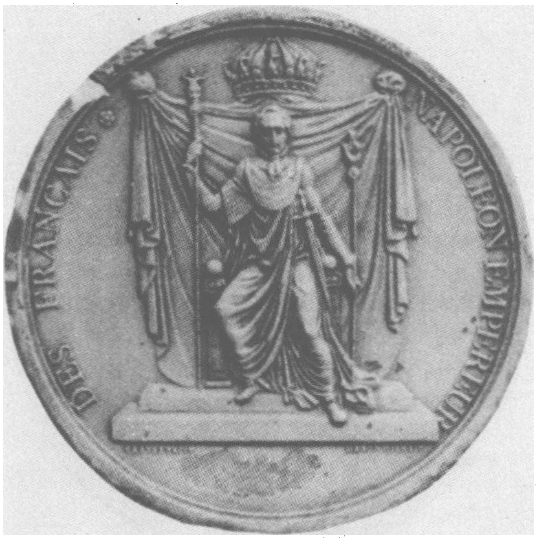


图 21　拿破仑任皇帝时的印章

名称，再给人民一个声音，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声音。使用象征物来表现政治和创造政治的革命念头也为波拿巴所用，但人们可能忽视了其中政治内容的倾空。当革命象征物被新的“道德和体制运动”①接管时，反抗复兴寡头政治和终结群众参与的示威游行就难有发展余地了。

230 但是，极权主义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修辞和象征上。波拿巴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他拥有大量选民（我们可以看到，在 1814 年和 1815 年他都快速倒台了），而是因为其潜在的反对方选民非常有限。激进革命的修辞和比喻尽管内容上具有民族性、理性和普世性，但并不具备全面

① *Opinion de Boulay (de la Meurthe), sur la situation de la République, et sur le projet présenté par la commission chargée d'examiner la cause de ses maux, et d'indiquer les moyens de les faire cesser* (séance de la nuit du 19 brumaire an VIII, à Saint Cloud).

吸引力。1792－1799 年的经验显示，民主共和主义还远未深入人心，学徒期才刚刚开始。一场在外围地区，在贫穷、文盲多、远离省会的农村地区更加成功的运动很难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其势力。一旦巴黎的战斗派和主要雅各宾派议员被逮捕、处死或折磨至沉默时，各地的民主共和派 231 也就进入到了防卫状态。大部分城市和最现代化地区到 1799 年时都已经转向右翼，波拿巴只需要将此发展状态进行全面化就可以了。一场吸引外来者、少数派、移民和调解者的运动很难克服来自内部人及其扈从，和所有感到新秩序的到来会带来威胁之人的抵制。波拿巴承诺要建立一个新旧统一的政体，因此在一定时期，除了最坚信民主共和主义的党派之外，他几乎为所有人都提供了一个保障。

同时，波拿巴的胜利也显示了法国保王党的弱点。共和派已经赢得了足够多的皈依者，可以恢复在 1799 年不可能实现的状况，而专制的君主制却不能被接受。只有经历过再多几年的战争、最后的失败、以新名义再生的贵族制以及外国干预的压力之后，某种君主制在法国才有可能。即便如此，这种君主制持续的时间也非常短。革命政治阶级——那些成千上万曾经经历过公职和会员制所带来的挫折和机遇的商人、律师、医生、手工业者和店主——不愿意让时间倒转。他们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而且数量庞大，不容忽视。

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波拿巴从法国政治中心的解体中获利了。到 1799 年，不管在全国范围还是在立法院，雅各宾派的势力都被限制在了外围地区。[①] 保王党尽管在 1797 年有一次短暂的复兴，在西部发动了持

---

① 这部分的信息来自 Hunt, Lansky, and Hanson,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Republic in France"。

续的骚乱,在城市里也会时不时地发动一些示威,但基本上处于被遏制的状态,而且每次保王党所挑起的侵略都以惨败告终。1797 年之后的重要变化都发生在立法院议员的多数派中。由于原则上反对政党的形成(甚至是政府政党的形成),并在立法院进行频繁的清算运动,最后形成了一个毁灭性的、由新人组成的督政府,其主要成员有半心半意的共和派和极力阻止共和派左倾的高等法院元老们。到共和七年(1799 年),议员中只有
232 12%曾经是国民公会成员,5%曾赞成处死国王。只有 16%曾在 1795 年前任职于立法机关。1799 年当选的议员中有超过一半在那年都是第一次当选。由于没有任何国家政治的经历,这些人特别容易接受西哀耶斯(Sieyès)和其他“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很少有议员甘冒生命危险去保卫共和国。

我们还可以从“雾月精英”的构成中清晰地看出这个中央政府的重要性。维纳·基尔斯曼(Werner Giesselmann)研究了执政府的 498 名高官(在共和八年拿破仑政变后担任职务),他发现有 77%曾是督政府时期的议员(83%自 1789 年后曾任过议员)。[①] 其中有很多在 1798 年(占整个团队的 15%)或 1799 年(16%)还是第一次当选议员。因此,督政府议员中新来者越来越多这一趋势,整体上对后来的政治形势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些新来者不仅没能抵制政体上的变化,而且还积极参与了新政体的运作。因此,督政府政体存在相当大的延续性,但这种延续性主要存在于右翼和中间派中。正如基尔斯曼所总结的,政变“排除了左倾派和即将离职的督政府精英中的雅各宾少数派”。进一步的民主实验为

① *Die brumairianische Elite: Kontinuität und Wandel der französischen Führungsschicht zwischen Ancien Régime und Julimonarchie* (Stuttgart, 1977), pp. 111—112.

了"资产阶级威权"[1]的利益而被提前终止了。拿破仑的精英核心是由已经摆脱了幻想的共和派组成的,他们更倾向于稳定的现代化,而不是广泛的政治参与所带来的剧变和动荡。

考察在执政府筹备委员会中任职的一小股议员,得出的结论相同(见附录 A,PROBON 下)。波拿巴派与当时被捕的 59 名被认定的雅各宾派分子相反(附录 A,ANTBON 下),主要来自城市化省份(r = .41),识字率高(r = .30),比较富裕(地税 r = .31;其他税收是 r = .52)。有趣的是,他们也来自左翼或右翼、或者两派都曾经非常强大的省份;外省 233
代表团中委员会成员的数量与 1797 年右翼的成功(r = .35)、1798 年左翼的成功(r = .24)成正比。[2] 换句话说,波拿巴派来自曾经废除过选举结果的省份,是督政府跷跷板政治的产物;雅各宾反对派却没有这些特点。

基尔斯曼关于拿破仑派精英的分析显示,政变确实标志着新的背离。虽然新政体的许多领袖曾经是革命者和某类共和派,但他们作为新秩序精英的重新组合却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后果。他们排挤了政治阶级中的左翼,丢弃了共和主义中的民主,还通过增选系统,为旧贵族重新整合成显贵们的寡头政治铺平了道路。[3] "修正主义"史学家所看到的、在

---

① *Die brumairianische Elite: Kontinuität und Wandel der französischen Führungsschicht zwischen Ancien Régime und Julimonarchie*, p. 430。

② 但是,判别分析显示 1798 年的选举结果与 1795 年和 1797 年的不一致;右翼省与左翼省并没有以同一种方式分离,所以在数据上没有考虑 1798 年的结果。参见 Lynn Hunt,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4 (1984):535—559。

③ *Die brumairianische Elite*: 基尔斯曼对社会背景、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涯都做了详细讨论,但可惜的是他很少提及省份出处。

1789年之前就在形成的贵族统治只有在极权主义的保护下才能得以实现。从这点上说,现代化君主制的真正继承者是拿破仑·波拿巴及其后来者。他们与革命十年的共和主义有联系,但只代表了原始理想的一种退化。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贵族统治、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民主共和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因为它们都以某种形式发生在其之后。民主共和主义是革命经历的核心,尽管它的新奇怪异无法预测,本身有弱点,又遭受了失败。民主共和主义不是由生产方式的冲突、社会动员的危机或启蒙理想的传播直接造就的,因为这些经济、社会和思想的特征和冲突自18世纪中期以来就已经存在。民主和
234 革命共和主义的源头要从汇集了所有不同政体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旧制度政治文化中的矛盾使民主共和主义有了可能,但直到革命进行之时它才确切成形。在革命中,新政治阶级为民主共和主义提供了声音与形式,而它对新思想和新象征的回应也塑造了其自身。法国的民主和革命共和主义没有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贵族统治或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君主制和帝国培育了资本主义、贵族统治、19世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及与社会主义争夺选民和信徒直到20世纪的激进共和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有着自己的、往往也是非常独特的遗产和传统。

民主共和主义最早、最有力地出现在法国革命情境下这一事实,对19和20世纪法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结果。共和主义在其拥护者和反对者的脑海中总与革命行动相关,结果,到共和制政府的"过渡"总是非常突兀困难。它不是众多政治选择之一,而是深刻剧变的信号,是会引发剧烈冲突和分裂的记忆。在这一点上,大革命让共和派和代表制政府更难取得好成绩。它也让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

运动长期有了联系，虽然那些运动反而会公开指责它的失败。共和主义也曾是革命的，共和派首先学会了革命的艺术。在法国，直到城市和更现代的农业地区接受了开始只对现代化较弱的外围地区有吸引力的理想，过渡到共和主义最后才取得了成功。然而直到今天，民主左翼如果不是在同一地方，那么也是在同一类地区最成功，正如在1790年代一样。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法国社会主义与第一共和国政体就有着很强的联系。

虽然法国大革命作为革命政治的范例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但其起因、结果及经历的本质却明显是法国特色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其许多独创性就是因为革命者坚持要突破欧洲过去的经验。他们对宗教 235
标识和历史契约的拒绝，很大程度上都产生自使法国革命者有别于英国与美国激进派的、法国政治文化中的特殊性。然而，恰恰是这些特殊性激励着他们以更普世化的方式来思维，因此正如托克维尔所认识到的，也就具有了救世主般的影响力。[①] 相反，英美对共同的法律、先例、甚至清教的信仰反而使英美激进思想不能具有很强的普遍性。

大革命一直迷惑我们至今，因为它催生了这么多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它不仅仅是现代化会引起暴力和不稳定的一个例子，或走向资本主义的关键一步，或极权主义诞生的环节之一，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它促成了所有这一切。关键是，它应该是一个时刻，就在这一时刻，人们发现政治是蕴含巨大效力的活动、意识转变的代理人，以及性格、文化和社会关系的铸模。从此，人们可以从这一发现中演绎出不同的结论，事实上也

---

① "它创建了一种具有传教士般热忱的氛围，并确实设想了宗教复活的所有方方面面"(*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3)。

确实出现了许多不同结论。托克维尔虽然对这次经历中"阴暗恶兆的"一面感到惧怕,但还是总结道:"所以,法兰西人民立刻成了所有欧洲民族中最辉煌也最危险的一支,在其他民族的眼里,法兰西人民最有资格
236 被膜拜、被憎恨、被怜悯,或者说,法兰西人民成了一种预警——一种绝对不容漠视的预警。"①

①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210—211。

附录A 精选政治、经济与人口变量的相关矩阵图

Correlation Matrix of Selecte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URB1806	TOTLIT	TERPER	EMIPER	ANTI93	DEATH	GIRONDE	FRUCTI	FLOR	ANTBON	PROBON	PCFONC	PCOTHR	AGPROD	OATH
URB1806	1.000	0.007	0.263	0.267	−0.218	0.188	0.151	0.641	0.411	0.172	0.414	0.279	0.653	−0.102	0.009
TOTLIT	0.007	1.000	−0.179	−0.010	−0.112	−0.210	0.107	0.023	−0.096	−0.075	0.299	0.301	0.131	−0.052	0.064
TERPER	0.263	−0.179	1.000	0.039	−0.048	0.091	0.067	0.263	0.158	0.213	0.073	−0.007	0.257	0.050	−0.227
EMIPER	0.267	−0.010	0.039	1.000	−0.136	0.154	−0.075	−0.033	−0.075	0.177	−0.164	−0.097	−0.078	−0.187	−0.263
ANTI93	−0.218	−0.112	−0.048	−0.136	1.000	−0.257	0.213	−0.088	−0.035	−0.058	−0.167	−0.214	−0.156	−0.093	−0.033
DEATH	0.188	−0.210	0.091	0.154	−0.257	1.000	−0.351	0.143	0.218	0.128	−0.142	0.106	0.158	0.049	−0.044
GIRONDE	0.151	0.107	0.067	−0.075	0.213	−0.351	1.000	0.229	0.055	0.121	0.127	0.074	0.123	0.218	−0.041
FRUCTI	0.641	0.023	0.263	−0.033	−0.088	0.143	0.229	1.000	0.459	0.028	0.350	0.320	0.645	−0.187	0.085
FLOR	0.411	−0.096	0.158	−0.075	−0.035	0.218	0.055	0.459	1.000	−0.131	0.243	0.167	0.433	−0.057	0.033
ANTBON	0.172	−0.075	0.213	0.177	−0.058	0.128	0.121	0.028	−0.131	1.000	−0.136	−0.157	−0.088	0.171	−0.234
PROBON	0.414	0.299	0.073	−0.164	−0.167	−0.142	0.127	0.350	0.243	−0.136	1.000	0.301	0.518	0.182	0.132
PCFONC	0.279	0.301	−0.007	−0.097	−0.214	0.106	0.074	0.320	0.167	−0.157	0.301	1.000	0.741	0.273	0.338
PCOTHR	0.653	0.131	0.257	−0.078	−0.156	0.158	0.123	0.645	0.433	−0.088	0.518	0.741	1.000	−0.007	0.213
AGPROD	−0.102	−0.052	0.050	−0.187	−0.093	0.049	0.218	−0.187	−0.057	0.171	0.182	0.273	−0.007	1.000	−0.092
OATH	0.009	0.064	−0.227	−0.263	−0.033	−0.044	−0.041	0.085	0.033	−0.234	0.132	0.338	0.213	−0.092	1.000
POP98	0.355	0.149	0.262	−0.061	−0.127	0.086	0.360	0.331	0.328	0.237	0.369	0.127	0.320	0.381	−0.325
DENSITY	0.661	0.248	0.291	−0.020	−0.095	0.173	0.012	0.643	0.487	−0.044	0.483	0.304	0.812	−0.236	0.013
PROTPOP	0.105	0.014	−0.027	−0.131	0.218	−0.217	−0.022	0.088	−0.036	−0.102	0.131	−0.036	−0.016	−0.067	−0.033
MASONIC	0.463	0.053	0.153	0.183	−0.067	0.037	0.410	0.226	0.158	0.370	0.198	0.173	0.130	0.404	−0.165
ACADEMY	0.326	0.218	0.042	−0.082	−0.175	−0.004	0.308	0.193	0.070	0.149	0.290	0.187	0.217	0.265	−0.088
MARINERS	0.194	−0.176	0.288	0.096	0.096	−0.110	0.356	0.057	−0.140	0.302	0.116	−0.272	−0.045	0.214	−0.250
PCTACTIFS	0.113	−0.066	−0.132	0.076	0.071	0.201	−0.142	0.007	−0.018	0.038	−0.098	0.219	0.077	−0.147	0.372
DISTPAR	−0.042	−0.395	−0.085	0.169	0.298	−0.091	−0.033	−0.210	−0.101	0.206	−0.221	−0.569	−0.393	−0.155	−0.164
AGYIELD	0.585	0.367	0.160	0.075	−0.254	0.132	0.282	0.457	0.352	0.170	0.503	0.461	0.644	0.199	−0.120

资料来源：

URB1806 = 1806 年居民数超过 2,000 的城镇之人口占该省人口的百分比，来自一份应 1809 年的一项行政要求所作的报告（革命年代中最可靠、最全面的数据）。René Le Mée, "Population agglomérée, population éparse au début du dix-neuvième siècle",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1971, 第 455—510 页。Le Mée 的数据与 Marcel Reinhard 所作有关 1798 年的报告中的数据相关率非常高（r = .81），见 Marcel Reinhard, *Etude de lar population pendant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Gap, 1961), 第 48—49 页。

TOTLIT = 1786 - 1790 年法国人民（男女都包括）的平均识字率，来自 Michel Fleury and Pierre Vamary, "Le Progrès de l'instruction élémentaire de Louis XIV à Napoléon III, d'après l'enquête de Louis Maggiolo (1877 - 1879)", *Population* 12(1957): 71—92。

TERPER = 恐怖时期每 100,000 居民中被执行死刑者所占比例。死刑数据来自 Donald Greer, *The Incidence of the Terror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35)，第 145—147 页。省人口数据见下
238 面的 POP98 项。

EMIPER = 每 100,000 人口中的迁出比例。迁出人口（émigrés）的数字来自 Donald Greer, *The Incidence of the Emigratio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Gloucester, Mass., 1966), 第 109—111 页。省人口数据来自下面的 POP98 项。

ANTI93 = 1793 年宪法投票中反对和有条件赞成的选票在所有选票中所占比例。选票总数来自 René Baticle, "Le Plébiscite sur la constitution

de 1793",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58(1910): 5—30, 117—155, 193—237, 385—410。

DEATH = 以 Alison Patrick, *The Men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Baltimore, 1972, 第 317—339 页)为基础得出的复合变量。在所有有权投票的议员中,赞成死刑的投票与"激进派"在三次决定性投票中的比例相等。这三次重要投票是反对号召人民、赞成死刑和反对缓刑的投票。

GIRONDE = 吉伦特派议员数量,来自 M. J. Sydenham, *The Girondins*(London, 1961, 第 222—226 页)。 239

FRUCTI = 共和五年果月政变中被判驱除出境的省代表所占比例。名单来自 *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28*: 1419 (共和五年果月 24 日)。记录中有 53 名议会议员和主管卡尔诺(Carnot,一名前议员)。

FLOR = 共和六年花月 22 日政变中被认定为雅各宾派而被清算的省代表所占比例。记录中有 84 名在 Jean-René Suratteau, *Les Elections de l'an VI et le 'coup d'état du 22 floréal'* (*1798* 年 *5* 月 *11* 日)(Paris, 1971, 第 370—382 页)中被列为雅各宾派。

ANTBON = 共和八年雾月 18 日政变后被认定为雅各宾派、并被逐出五百人院的省代表所占比例。*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31*: *200* (共和八年雾月 21 日) 中列出有 59 名议员被驱逐。

PROBON = 被选入为执政府准备宪法的"调解委员会"的省代表所占比例。同上文献中列出了当选的 50 名议员。

PCFONC = 1791 年人均土地税(contribution foncière),来自 P. E. Herbin de Halle, ed., *Statistique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 de la France et de*

ses colonies (Paris, 1803) 2: 390—397。此数据是除以下面 POP98 项得出的商。土地税根据财产的净收入征收。各省总税由国民议会根据旧制度最后几年所评估的税收来决定;结果,它们只具有近似的估算价值。

PCOTHR = 1791 - 1792 年人均个人和动产税(contribution personnelle et mobilière),来自 Maurice Minoret, *La Contribution personnelle et mobilièr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Paris, 1900),第 709—710 页。此数据是除以下面 POP98 项得出的商。此种税收根据财富的外在标识来估算:家仆、骡马、马车和为财产所付的租金。各省总税由国民议会根据 PCFONC 项相同的方式来决定。

AGPROD = 1812 年以用于谷物、酒类、肉类和羊毛生产的土地英亩数为基础的复合变量,可测量用作农业生产的土地英亩数。来自 Thomas D. Beck, *French Legislator, 1800 - 1834: A Study in Quantitative History* (Berkeley, 1974),第 154—157 页。

OATH = 1791 年宣誓效忠的教士所占比例。数据由 Timothy Tackett 提供。他提供的数据与 Michel Vovelle, *Religion et Révolution: La Déchristianisation de l'an II* (Paris, 1976),第 63 页中报告的结果相关率很高(.82)。

POP98 = 1798 年省人口数,来自 Reinhard, *Etude*, 第 48—49 页。

DENSITY = POP98 项数据除以同上文献提供的地理面积得出的商。

PROTPOP = 新教徒数除以 POP98 项得出的商,来自 Emile G. Léonard, *Le Protestant français* (Paris, 1955),第 21 页。教省(provincial)中的省(departmental)数除以 1760 年左右的教省数,就可以得到省的比

240 率了。

MASONIC = 共济会数量，来自 Alain Le Bihan, *Loges et chapitres de la Grande Loge et du Grand Orient de France* (Paris, 1967)。

ACADEMY = 虚设变量，用于区分设教省学院(provincial academy)与不设教省学院的外省，来自 Daniel Roche, "Milieux académiques provinciaux et société des lumières" in G. Bolleme et al., *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Paris,1965)1:95。

MARINERS = 沿海地区人口除以 POP98 得出的商，来自 Jacques Peuchet, *Statistique élémentaire de la France* (Paris, 1805), 第 253—255 页(1803 年的数据)。

PCTACTIFS = 1791 年有投票权的公民数除以 POP98 得出的商，来自 Reinhard, *Etude*, 第 26—28 页。

DISPAR = 省会城市与巴黎的距离(单位是法国古里:lieus)，来自 Peuchet, *Statistique*。

AGYIELD = 1812 年每公顷的农业产量，来自 *Beck*, *French Legislators*, 第 154—157 页。

注释:本相关矩阵图提供的是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显著性测试的结果没有报告，但所有高于 .2 的相关性都有 .05 的显著水 241
平。除 TOTLIT(其 N = 76)之外，所有变量的试样数都在 81—83 之间。

附录B 亚眠、波尔多、南锡和图卢兹市议员的职业分析

许多作者认为在大革命的十年中，各种职业称呼不仅模糊，而且多变；长官们自称"法律人"，商人们有时为争取有利形势自称手工业者，小贩们则可能自吹为商人（参见 Alfred C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Cambridge, 1964]，第56—57页和 Martyn Lyons, *Revolution in Toulouse: An Essay on Provincial Terrorism*[Berne, 1978]，第168—169页）。然而庆幸的是，这四个大城市中经选举进入市议会的大部分人都非常有名，不可能规避正确的职业划分，他们的职业称呼可以在不同的资料中得到证实，足以符合最精确的划分。

但是，有些区分线还是比较模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商业与制造业、手工业者与店主之间。前一个范畴包括批发商、银行家、制造商、海运业主和制衣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称自己是制衣商，虽然这个群体拥有的财富可能较多，但当选的那几名制衣商很少要交高额税款。还有些情况下很难确定制造商与手工业者、批发商与零售店主的不同；所以，这两个范畴里的数目只能是近似值。

亚眠的杂货商例子显示了职业划分上的模糊不清。有两个杂货商
242 的税收记录显示，他们可能是干货批发商，第三个交税不多，第四个根本就没被列入税收单（参见下文）。因为税收数据不完整，而且往往不可靠，所以只能以职业进行划分。大部分杂货商只是拥有中等财富的店

主。例如在图卢兹,一个批发商的平均结婚契约几乎是一个杂货商的3倍(Jean Sentou, *Fortunes et groupes sociaux à Toulouse sous la Révolution* [1789—1799]: *Essai d'histoire statistique* [Toulouse, 1969], pp. 153, 294)。尽管划分上有困难,但革命时期的社会身份证明还是比较精确的,使区分具备了可行性。

表4至表8只计算了市长、律师和市政官员。在大革命早期,每个市政机关中都有一定数量的贵族,但相比于数量庞大的"军官"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关于选举的信息往往不完整,而且不同来源的资料有时候也不一致。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不同资料的结果进行了比较。最好的资料有:A. Janvier, *Livre d'or de la municipalité amiénoise* (Paris, 1893); Gaston Ducannès-Duval, *Ville de Bordeaux: Inventaire-Sommaire des Archives municipals: Période révolutionnaire (1789-an VIII)*, 4 vols (Bordeaux, 1896—1929); Christian Pfister, *Les Assemblées électorales dans lé départment de la Meurthe, le district, les cantons et la ville de Nancy; Procès-verbaux originaux* (Paris, 1912); and J. Mandoul, "Les Municipalités de Toulous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Recueil de législation de Toulouse*, 2nd ser., 2(1906): 348—409。

关于职业、年龄、地址、财富和政治生涯的信息在很多不同资料中都进行了核对,这些资料根据可利用情况的不同,各城市之间也有所不同。最重要的资源有:

亚眠

A. D., Somme, 2C703——710, Tables alphabétiques des contrats de marriage, 1749 - 1792.

A. M., Amiens, 1G 2. 11, Contribution foncière, Table alphabétique des noms, 1791.

波尔多

A. D., Gironde, 4L 117, Emprunt forcé, an II.

A. D., Gironde, 12L 19, 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

南锡

A. D., Meurthe, 3M 1, Consulat: Listes de notabilitiés communales,
243 an IX-an XII.

Charles Bernardin, *Notes pour server à l'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à Nancy jusqu'en 1805*, 2 vols. (Nancy, 1910).

图卢兹

Almanach historique du départment dela Haute-Garonne, 1791 -1793.

A. M., Toulouse, 1G 38—53, Contribution foncière, 1791.

译名对照表

A

阿尔勒斯镇 Arles

阿尔萨斯 Alsace

阿格宏,莫里斯 Maurice Agulhon

阿里埃日省 Ariège

阿利埃省 Allier

阿维尼翁 Avignon

埃贝尔 Hébert

埃克斯镇 Aix-en-Provence

爱尔维修 Hervétius

安德尔省 Indre

安瑟林 Anselin

安省 Ain

昂热 Angers

奥布省 Aube

奥恩省 Orne

奥尔良 Orléanais

奥科 Auch

奥姆瓦 Ormoy

B

巴贝夫 Babeuf

巴勒格西,皮埃尔 Pierre Balguerie

《巴黎报》*Gazette de Paris*

《巴黎革命报》*Revolutions de Paris*

巴斯克 Basque

巴兹寇,布朗尼斯洛 Bronislaw Baczko

贝纳西-马赫姆 Bénesse-Maremne

《变化之社会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波德洛,尼古拉斯 Nicolas Baudelot

波尔,J. R. J. R. Pole

波尔多 Bordeaux

波科克 J. G. A. Pocock

伯克,厄德蒙德 Edmund Burke

伯克利国际问题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Berkeley

博内尔,维克多利亚 Victoria Bonnell

博特朗德,约瑟夫 Joseph Bertrand

博学共济会 Encyclopédique

博韦 Beauvais

布甘迪 Burgundy

布莱-寇特,亚力山大 Alexandre Poullain-Cotte

布雷 Boulay

布里弗 Brive

布瑞特恩,克雷恩 Crane Brinton
布瑞特尼 Brittany
布瓦蒂尔斯 Poitiers
布瓦斯 Bois
C
残疾军人广场 place de Invalides
《忏悔录》*Les Confessions*
D
达尔杰,尼古拉斯 Nicolas Dargent
达瑞格兰德 Darrigrand
大圣弗瓦 Sainte-Foy-la-Grande
戴高乐派 Gaullists
代格朗蒂纳,法布尔 Fabre d'Eglantine
丹东 Danton
当格朗斯,波尔希 Boissy d'Anglas
德冈德-卡内 Degand-Cannet
德拉默尔利,让-巴蒂斯特 Jean-Baptiste Delamorlière
德拉洛奇,查尔斯-弗朗索瓦-巴斯特德 Charles- François-Bastard Delaroche
德利,查尔斯 Charles Dely
德梅里,菲利普 Philippe Demailly
德穆兰,卡米尔 Camille Desmoulins
德侬 Denon
德塞夫勒省 Deux-Sèvres
德·斯蒂尔夫人 Madame de Staël
德斯克罗,弗朗索瓦 François Desclaux
德斯特瑞巴,皮埃尔 Pierre Destribats
德斯特瑞巴,让 Jean Destribats
德扬,皮埃尔 Pierre Deyon
迪穆里埃 Dumouriez
《迪歇纳老爹报》*Père Duchesne*
东比利牛斯省 Pyrénées-Orientales
杜阿 Douai
杜邦,路易 Louis Dupont
杜尔 Toul
杜勒 Tulle
杜普尔 Dupré
杜萨蒂尔 Dussardier
杜耶,埃梯恩 Etienne Douyet
多夫兰斯,卡斯丁 Custine d'Auflance
多尔多涅省 Dordogne
多尔赛 Dorset
多姆山省 Puy-de-Dome
E
厄尔波夫镇 Elbeuf
厄尔的帕西村 Pacy-sur-Eure
厄尔省 Eure
鄂哲芙,莫纳 Mona Ozouf
F
方德,法布尔 Fabre-Fond
芳西纳-布朗西 Foncines-et-les-Planches
菲利普,皮埃尔 Pierre Philip
菲尼斯太尔省 Finistère
《非资本主义财富与法国大革命的起因》"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费纳龙 Fenelon

福克斯,爱德华·怀汀 Edward Whiting Fox
福梅尔,约瑟夫·德 Joseph de Fumel
弗尔塔多 Furtado
弗莱,诺斯若普 Northrup Frye
弗莱克斯坦 Frankenstein
弗朗什-孔泰 Franche-Comté
弗勒瑟尔,皮埃尔 Pierre Flesselles
弗歇 Fouché
傅勒,弗朗索瓦 François Furet

G

冈地 Caen
格拉松-布瑞斯,艾蒙纽厄勒 Emmanuel Glasson-Brisse
格勒诺布尔 Grenoble
格雷古瓦 *Grégoire*
格林,尼古拉斯 Nicolas Géhin
格瑞 Gary
格瑞布林 Gribelin
《革命语言的狂乱》*Du Fanatisme dans la langue révolutionnaire*
贡迪拉克 Condillac
贡斯当,本杰明 Benjamin Constant
《共和国法律公报》*Bulletin des lois de la République*
古根汉姆基金会 Guggenheim Foundation
圭耶纳 Guyenne
《国家检举者》*Le Denonciateur national*
《国王之友》*L'Ami du Roi*

H

哈尔卜,拉 Jean-Francois La Harpe
哈瑞斯,珍妮弗 Jennifer Harris
和谐广场 place de la Concorde
赫伯斯邦,埃瑞克 Eric Hobsbawm
赫格内,帕特瑞斯 Patrice Higonnet
赫维利尔-勒波,拉 La Revellière-Lépeaux
亨廷顿,塞缪尔 P. Samuel P. Huntington
胡波尔特、尼古拉斯 Nicolas Hubert

J

基尔斯曼,维纳 Werner Giesselmann
吉尔兹,克利福德 Clifford Geertz
吉伦特省 Gironde
吉斯卡典派 Giscardiens
吉约姆,让克 Jacques Guilhaumou
加尔默罗圣母会教堂 Carmelite convent
加莱海峡省 Pas-de-Calais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委员会 Committee on Research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教练员报》*Moniteur*
杰尼斯-杜姆尼,安东尼 Antoine Genesse-Duminy

K

卡布尼斯 Cabanis
卡尔诺 Carnot
卡尔瓦多斯省 Calvados
柯恩,丽兹贝斯 Lizabeth Cohen

科勒蒙 Clermont
克莱蒙,安东尼 Antoine Clément
克勒兹省 Creuse
克雷兹省 Corrèze
肯尼迪,迈克尔 Michael Kennedy
孔多塞 Condorcet
寇班,阿尔弗莱德 Alfred Cobban
寇伯,理查德 Richard Cobb
昆帝连 Quintilian

L

拉法耶特 Lafayette
拉格尔德 Lagarde
拉寇姆,J. -B. J. -B. Lacombe
兰斯镇 Reims
朗德省 Landes
勒布拉斯 Le Bras
勒弗布尔,路易 Louis Lefebvre
勒芒 Le Mans
勒汝科斯 Leroux
勒斯库维,路易 Louis Lescouvé
利昂斯,马尔丁 Martyn Lyons
卢卡斯,柯林 Colin Lucas
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卢梭,让-巴蒂斯特 Jean-Baptiste Rousseau
卢瓦尔省 Loire
卢瓦雷省 Loiret
鲁昂 Rouen
鲁尔马林 Lourmarin
罗宾,瑞金纳 Régine Robin
罗德兹 Rodez
罗格特,让-雅克 Jean-Jacques Roquette
罗林 Rollin
罗姆 Romme
罗纳山谷 Rhône Valley
罗什,丹尼尔 Daniel Roche
洛克 Locke
洛林 Lorraine
洛泽尔省 Lozère

M

马丁,金斯莱 Kingsley Martin
马丁,莱斯利 Leslie Martin
马恩省 Marne
马克斯,罗兰德 Roland Marx
马克西缪 Meximieux
马拉 Marat
马拉尔美,克劳德 Claude Mallarmé
《马拉之灵报》*L'Ombre de Marat*
马瑞 Marie
马瑟,皮埃尔 Pierre Massey
马斯弗 Massif
马修斯,阿尔伯特 Albert Mathiez
玛格瑞特,奥古斯丁 Augustin Marguerite
麦凯恩,乔伊斯 Joyce MaCann
曼恩-鲁瓦尔省 Maine-et-Loire
芒什省 Manche
美国学术协会委员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米拉波 Mirabeau
密涅瓦 Minerva
密歇根大学研究生协会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ociety of Fellows
摩尔,巴瑞汀 Barrington Moore, Jr.
摩尔,约翰 John Moore
摩根,安德瑞恩 Adrienne Morgan
莫比乌斯带 Möbius strip
默尔特省 Meurthe
莫里斯 Morris
莫洛 Moreau
墨丘利 Mercury

N

南特 Nantes
南锡 Nancy
尼古拉斯 Nicolas
涅夫勒省 Nièvre
诺尔省 Nord
诺曼底 Normandy

P

帕西 Pacy
旁-拉比 Pont-l'Abbé
佩里格 Perigueux
佩里格尔 Périgord
佩皮格南 Perpignan
彭特德蒙弗尔 Pont-de-Montvert
普朗萨斯,尼克斯 Nicos Poulantzas
普罗旺斯 Provennce
普瓦图 Poitou

Q

七月节 fête des sayeteurs
《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

R

热尔省 Gers
汝拉省 Jura
瑞果德 Rigaud
瑞果洛 Rigollot
瑞哈德,马塞尔 Marcel Reinhard

S

萨尔布格 Sarrebourg
萨尔特省 Sarthe
萨瓦 Savoy
塞基,弗朗索瓦 François Saige
塞纳-马恩省 Seine-et-Marne
塞纳省 Seine
塞纳-瓦兹省 Seine-et-Oise
赛啬尔 Seyssel
瑟尔斯,皮埃尔 Pierre Sers
森赛尔,杰克 Jack Censser
森透,让 Jean Sentou
山岳派 montagnards
上比利牛斯省 Hautes-Pyrénées
上加龙省 Haute-Garonne
上莱恩省 Haut-Rhin
上索恩省 Haute-Saône
圣阿曼 Saint-Amans
圣奎恩港的奥西耶 Les Authieux-sur-le-Port-Saint-Quen

圣茹斯特 Saint-Just
圣克鲁 Saint Cloud
斯科克波尔,斯达 Theda Skocpol
斯塔罗宾斯基,让 Jean Starobinski
《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苏力格纳克 Soulignac
索布尔,阿尔伯特 Albert Soboul
索姆省 Somme
T
塔尔蒙,J. L. J. L. Talmon
泰勒,乔治 George V. Taylor
特拉尔德 Taillard
特鲁瓦 Troyes
梯利,查尔斯 Charles Tilly
涂尔干式 Durkheimian
图卢兹 Toulouse
托德 Todd
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托马斯,皮埃尔 Pierre Thomas
W
瓦尔省 Var
瓦伊斯,保罗 Paul Vaysse
瓦伊斯,让克 Jacques Vaysse
旺代省 Vendée
旺斯镇 Vence
维埃纳省 Vienne
韦伯 Weber
文学院协会 Société littéraire du Musée
沃洛克 Woloch
乌利耶兹,约瑟夫 Joseph Wulliez
X
西哀耶斯 Sieyès
西朗泽尔,朱迪斯 Judith Schlanger
夏弗茨伯里 Shaftesbury
夏特尔 Chartres
夏特朗区 Chartron
下莱恩省 Bas-Rhin
下塞纳省 Seine-Inférieure
下夏朗德省 Charente-Inférieure
"宪法之友"Amis de la Constitution
宪章圈 Constitutional Circle
香槟 Champagne
歇尔省 Cher
新桥 Pont-Neuf
Y
亚眠 Amiens
耶路撒冷圣让共济会 Saint-Jean de Jérusalem
伊斯瓦 Issoire
伊泽尔省 Isère
约翰逊,查马尔 Charmers Johnson
Z
泽尼克,雷金纳德 Reginald Zelnik
《政治漫画》*Caricatures politiques*
《自由人报》*Journal des homes libres*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在本书中，作者一反过去简单的政治史研究，转而探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因为在政治文化中，我们可以知晓在革命中政治行动的内在逻辑，理解革命者的价值、期望，以及固有的规则如何被表达并形成集体的意愿与行动。通过研究革命中的象征实践即特定的象征和仪式，亨特认为，革命者的政治实践并不是简单地表达着他们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事实上，通过他们的语言、象征、仪式和每天的政治行为，革命者重构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社会关系。

本书被评为最出色的介绍新社会文化史的著作。作者从政治、文化和阶级的角度论述法国大革命的内在复杂关系，从而了解法国大革命史如何改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易读、激动人心的读本。

上架建议▶社科总论、历史

ISBN 978-7-5617-8520-1

9 787561 785201 >

定价：29.80 元

www.ecnupress.com.cn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作者=（美）亨特著
页数=282
SS号=12831008
出版日期=2011.08